主　编/张一兵

社会批判理论纪事 第2辑

批判的历史计划 塔夫里及威尼斯学派　夏铸九

《球与迷宫》及其他　胡 恒

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　(意)曼弗雷多·塔夫里

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资本论》形成史上的意义　(日)内田弘

从文献考证与文本解读统一的视角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中的主导作用

——析广松涉"恩格斯主导论"的文献学依据　姚顺良

自然历史概念　(德) 泰奥多·W.阿多诺

论音乐的社会情镜　(德)泰奥多·W.阿多诺

社会主义的模式　(法) 托尼·安德烈阿尼

Register of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中央编译出版社
CCTP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社会批判理论纪事

第2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主办

主　　编　张一兵
执行编辑　胡大平 张　亮

Register of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批判理论纪事. 第2辑/张一兵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80211-478-4
Ⅰ.社...
Ⅱ.张...
Ⅲ.社会批判论-丛刊
Ⅳ.C9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14079号

社会批判理论纪事. 第2辑

出 版 人 和 龑
责任编辑 贾宇琰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52(编辑室)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字　　数 380千字
印　　张 23.5
版　　次 200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卷首语

20 世纪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已经向我们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者面对理论和现实双重危机所进行的探索和突破皆已铺陈为纸面上的惊涛骇浪。特别是自上个世纪 60 年代以来，随着“消费社会”的兴起，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和逻辑上逐渐式微，使得诸多学者开始对传统社会批判理论进行反思，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种努力不仅在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得到了强劲的反应，而且在建筑学领域中更是异军突起，形成了一批具有深邃洞察力和原创性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家。因此，打破不同的学科界限，广泛地引介相关领域的社会批判理论，积极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自身的发展，就是本刊所肩负的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缘此，本刊特意推出“曼弗雷多·塔夫里：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专题。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建筑理论家和建筑史学家之一，也是当代意大利左派知识分子的象征人物之一。然而，在国内学术界中对其思想的研究却是凤毛麟角，这不能不说是理论界的一件憾事。我们真诚地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真正改变国内学术界对塔夫里“广为人知，鲜为人解”的尴尬境况，为进一步推进对其思想的深入研究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专题内容主要分为三块。（一）主要是对塔夫里思想发展历程及其主要代表著作的介绍。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的夏铸九教授，作为著名社会学家、新都市社会学的创始人卡斯特尔的学生，在建筑学领域建树非

凡。他的论文《批判的历史计划：曼弗雷多·塔夫里及威尼斯学派》主要是对塔夫里本人学术成长历程的一种描述性研究。而胡恒博士的《〈球与迷宫〉及其他》则主要集中于对塔夫里在建筑学领域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介绍，对于国内学者进一步增进对塔夫里思想的了解和研究有着十分积极重要的意义。（二）主要是塔夫里重要文献的翻译，包括《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建筑与乌托邦〉序言》和《文化市场——瓦里采访塔夫里》。第一篇文献向我们详细展示了建筑本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所承担的功能，并进而倡导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的建筑理论，使建筑理论真正成为一种客观的历史的阶级批判。《建筑与乌托邦》作为前文的进一步拓展，是塔夫里主持威尼斯建筑学院建筑史研究室之后的第一本著作，也是塔夫里的第一本被翻译为英文的著作。在这里我们只是刊载了塔夫里为这本书所写的一个简要序言。（三）主要是对塔夫里建筑思想的研究，主要包括阿尔贝托·罗萨、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德米特里·波菲里奥斯、田中纯等学者的论文。罗萨教授是当代意大利的著名左派知识分子，也是塔夫里的好友和早期的重要合作者。他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历史实践》一文从个人经验与时代背景两个方面回顾了塔夫里在70年代初的知识实践和政治实践。希腊学者波菲里奥斯是当代建筑评论的代表人物，他的《论批判性历史》虽然篇幅不长，但却是对中期塔夫里的去神秘化的史学论点的最出色的阐释之一。詹姆逊教授的论文《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是专门为《建筑与乌托邦》所写的书评，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话语、塔夫里自身的历史叙事方式以及对现代主义批判的当代境况三个不同角度，对塔夫里这一著作进行了深入的解读，真实地展示了塔夫里作为建筑史学家所独具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意义。田中纯教授的《历史的废墟："计划"危机》一文则集中研究了塔夫里的建筑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深刻地揭示"历史即批评"的重要思想。其他几篇文章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思想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本辑的第二个专题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的再思考"，也是本刊第1辑的理论继续。广松涉编辑、张一兵教授审订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国内出版以来，在国际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些日本学者和中国青年学者专门撰文对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张一兵的代译序提出批评，认为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已经过时，而张一兵教授也没有注意到这一领域中以涩谷正和陶伯特为代表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使

得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学意义问题再次成为中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围绕这一主题，2007年4月3日至4日，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在日本东京举办了“第三届广松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了进一步推进该问题的研究并向国内学术界介绍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我们再次推出《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专题。

作为答辩，张一兵教授在《文献学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科学立场》中指出，在编辑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时必须遵守“不破坏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内在逻辑”的原则，同时，中国学者必须慎重对待西方“马克思学”这一特殊学术潮流，不能无批评地把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立场和结论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事学术研究的标准，必须严格地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内田弘教授对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的《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资本论〉形成史上的意义》一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充分阐发了广松版之于涩谷正版和陶伯特版的学理优越性，强调指出：丧失思想史研究指引的单纯文献学研究将不得不沦为一种机械的文献偏执主义。夏凡博士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篇的文本结构问题》则依据上述原则就手稿的编辑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姚顺良教授的论文反驳了广松的“恩格斯主导论”，他从文献学研究与文本解读相统一的视角出发确认了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章和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在本辑的第三个专题“社会批判理论经典拾遗”中，我们向大家推荐泰奥多·W. 阿多诺。尽管近年来国内阿多诺研究呈现上升趋势，但他的早期文献和音乐社会学作品却尚未进入研究者的视域。本专题特译介了《自然历史观念》、《哲学的现实性》和《论音乐的社会情境》等阿多诺早期文献，以期真实再现早期阿多诺主要哲学观点，从而为学术界正确地理解“否定的辩证法”以及他的音乐哲学的本质及其当代价值提供一种个人思想史基础。“域外之声”将把读者带入卡尔·魏特夫社会批判哲学的世界。日本著名学者石井知章通过对魏特夫的“第二自然”内涵的解释，从理论逻辑和方法立场上划清了魏特夫与地理决定论的机械唯物主义者的界限，向读者揭示了魏特夫社会批判哲学的生长点。“海外名家”栏目向您推荐的是法国著名学者托尼·安德烈阿尼教授，他曾任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研究中心主任，现为国际马克思大会社会主义学科主席。安德烈阿尼教授长期致力于政治哲学、社会学理论、马克思哲学、

社会主义史等领域的研究，成就斐然。这里的两篇文章《从否定辩证法到肯定辩证法：革命路径的转换》和《社会主义的模式》是安德烈阿尼教授2007年5月访问南京大学期间专门为我中心“马克思论坛”所准备的讲演。

《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辑去年年底问世以来，已经得到了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一致认可，并赢得了广泛的好评。这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在竭尽全力办好刊物的同时我们也热切地希望能够听到越来越多的不同声音，希望通过国内外学者思想的碰撞与交流能够将本刊打造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学术重镇，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一个高水平的交流平台。任重而道远，但“吾将上下而求索”！

《纪事》杂志编辑部

2007年11月

目　录

曼弗雷多·塔夫里：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 …… 1

批判的历史计划：曼弗雷多·塔夫里及威尼斯学派 …… 夏铸九/3
《球与迷宫》及其他 …… 胡　恒/12
建筑史的极限 …… 胡　恒/43
历史的废墟："计划"危机 …… 田中纯/52
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 ……（意）曼弗雷多·塔夫里/66
《建筑与乌托邦》序言 ……（意）曼弗雷多·塔夫里/107
意识形态批判与历史实践 ……（意）阿尔贝托·罗萨/111
论批判性历史 ……（希腊）德米特里·波菲里奥斯/118
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 ……（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125
文化市场
——瓦里采访塔夫里 …… 瓦　里/154

《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的再思考 …… 167

文献学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科学立场
——答鲁克俭先生和大村等日本学者 …… 张一兵/169
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资本论》形成史上的意义
……（日）内田弘/189
从文献考证与文本解读统一的视角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中的主导作用
——析广松涉"恩格斯主导论"的文献学依据 …… 姚顺良/203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篇的文本结构问题
——马克思学实证方法与思想史科学方法的根本对立…… 夏　凡/215

社会批判理论经典拾遗：阿多诺 …… 231

自然历史观念（1931）……（德）泰奥多·W. 阿多诺/233
哲学的现实性（1932）……（德）泰奥多·W. 阿多诺/247
胡塞尔与唯心主义问题（1940）……（德）泰奥多·W. 阿多诺/261
论音乐的社会情境（1932）……（德）泰奥多·W. 阿多诺/273

域外之声 …… 311

“第二自然”：卡尔·魏特夫的社会批判哲学……（日）石井知章/313

海外名家：托尼·安德烈阿尼 …… 329

从否定辩证法到肯定辩证法：革命路径的转换
……（法）托尼·安德烈阿尼/331
社会主义的模式……（法）托尼·安德烈阿尼/342

英文目录 …… 355

中文摘要 …… 357

稿约 …… 365

第 3 辑专题预告 …… 366

曼弗雷多·塔夫里：
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

批判的历史计划：曼弗雷多·塔夫里及威尼斯学派

夏铸九

建筑师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构造者，对城市规划进行个人化干预，对公众则扮演形式方面的说服角色，就其自身之问题与发展则是自我批评角色；这种相互关系对抗——在形式研究层面——在建筑“对象”与都市组织之间：这些是建筑上“启蒙运动辩证”恒常周期性出现的主题。

——曼弗雷多·塔夫里

在过去的20年之中，若依照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转变来分析意大利版本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就必须联系到威尼斯学派的贡献，特别是其类型学的研究途径与批判的历史分析。在观察意大利的具体情境之时，除了一群引人注目的建筑师的文献与作品之外，在他们的左近，还有一群建筑批评家与历史学家提供了有创见的、较有理论建构能力的历史诠释，这些建筑批评家和历史学家包括马西莫·卡西亚里（Massimo Cacciari）、乔吉奥·西欧奇（Giorgio Ciucci）、弗朗切斯科·达尔科（Francesco Dal Co）、安东尼奥·弗斯卡利（Antonio Foscari）、马里奥·马里瑞-伊里亚（Mario Manieri-Elia）、保罗·莫拉基艾罗（Paolo Morachiello）、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乔治·特索（Georges Teyssot）等等。在他们之中，曼弗雷多·塔夫里，一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建筑史家，是其中最主要、最具领导作用的角色。而且，塔夫里式的“历史的计划”（historical project）可以说是他们在一般理论方向上最具有深度的突破。

曼弗雷多·塔夫里于1935年生于罗马，1960年于罗马大学获得建筑学位。他曾在罗马、米兰、巴勒莫大学教授建筑史，也曾在苏联和美国等地讲学。自1968年起，塔夫里成为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the Instituto Universitario di Architettura di Venezia）（IUAV）的教授，主持建筑史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Architecture）的工作。此外，他也是研究安德瑞亚·派拉底欧（Andrea Palladio）的国际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塔夫里是一个有生产力的批评家与历史学者，他研究的范围极为广泛，至少涵盖了下述相关题材：

（1）一般性的现代建筑史与近代批评（与Dal Co合作，1976/1979），以及特殊性的进步的、前卫的乌托邦历史（1969，1973/1976）：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思想与建筑中的社会主义（1963）；丹下健三的作品（日本的现代建筑）（1965/1982）和勒·柯布西耶（1984）；美国的建筑与城市历史（与Ciucci，Dal Co，Manieri－Elia合著，1973/1979），如纽约五人团（1976）、摩天大楼的兴亡、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与约翰·伯吉（John Burgee）水晶大教堂（1980）；苏联的城镇规划史（1973）以及俄罗斯的形式主义；魏玛共和国的社会民主城市（1974）；奥托·瓦格纳（Otto Wagner）（1981）维也纳社会主义的住宅计划方案（1982）等。

（2）意大利建筑。由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的建筑［例如，菲利普·布鲁内莱斯基（Fillippo Brunelleschi）（Tafuri，1969a）］，建筑的风范主义（15世纪与16世纪的意大利建筑）（1966a），到意大利建筑师，像里昂·巴提斯塔·阿伯提（Leon Battista Alberti）（1979c）、弗朗切斯科·伯洛米尼（Francesco Borromini）（1965a，1966b，1972a，1979d）、乔凡尼·巴提斯塔·皮拉内西（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1976a，1977b，1979d，1987b）、吉瑟普·特兰尼（Giuseppe Terragni）（1977a）、鲁多维哥·格里高蒂（Ludovico Gegotti）（1980c）；马里奥·费奥兰提诺（Mario Fiorentino）在考味尔（Corviale）之IACP集合住宅（1981d）以及一部完整的，由战后1944年到1985年之意大利建筑史（1986/1989）。

（3）威尼斯历史。涵盖政治、科学、城市、建筑物等相互编织起来的层次，以及建筑师之间的竞争（1969b，1981/1982；1983；与Oscari合作，1983；1984，1986/1988）。

（4）建筑的表征与其形式（1980d，1982b）。

（5）理论的论辩与方法论上的拟议（1968/1970/1976/1980，1976，

1977，1979/1980/1986）。

事实上，有个关于塔夫里的理论论述（Tafurian theoretical discourse）的特征必须在此先提：塔夫里可说是经由其专业实践——在每一件陆续发表的主要著作中——来发展其理论架构。他持续地精炼其历史方法，界定批评家——史家的角色与任务。这种塔夫里式的论述可以经由威尼斯学派形成的国际脉络，经由战后欧洲气候中的社会与政治土壤着手了解。回溯塔夫里“历史的计划”之精炼过程，其立场与见解的转变说明了塔夫里知识之旅程：1969 年前后的转移将 60 年代青年塔夫里的研究途径与其后期的意识形态分析划分开来，同时这种转变也说明了其最近对史学方法的严谨要求。

（一）20 世纪 60 年代整合在卡萨贝拉（Casabella）团体中的青年塔夫里。由于欧洲强悍的左翼劳工之阶级运动曾共同面对反法西斯的斗争，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主要的欧洲工业国的资本主义是以福利国家的新面貌粉墨登场的。一般而言，战后欧洲的脉络由社会民主制的福利经济，伴随着美国支配的马歇尔重建计划（1948—1953），以及扩张的世界经济等元素所组成，这是美国经济复苏欧州活力的方法。意大利半岛特殊的情境是，自从 1948 年意大利大选之后，基督教民主党就成为支配性的国家权力，其合法性之基业在长达 20 年的时间里未受到挑战。在意大利的建筑论述建构过程中，存在于古典前卫主义、老学院派与官方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对抗、妥协与有争议的关系，以理性主义运动（Rationalist Movement）与“米兰 900”的失败而告终。① 这些事情彻底暴露了前卫主义的政治弱点。面对意大利战后资本主义的脉络，前卫主义已无法反映社会现实，于是也被要求重新界定其专业角色、任务与设计方法。在老的学院派之外，在对历史与现代性的研究方面有两种不同的新途径。其一为有机建筑学会（APAO），以布鲁诺·赛维（Bruno Zevi）为代表。另一条路线则为郭若尼（MSA 团体）以及恩奈斯托·罗杰斯（Ernesto N. Rogers）（BBPR 团体）所领导。他们都同样地向历史寻求支援，然而却诉诸不同的研究途径。前者之有机建筑取向将历史视为一种自然的力量，也未经由对过去的一种细致纤巧之意识来经营设计，以求在形式创新上有所助益，而后者则要求经由对建筑形式的精炼来对过去再做检查（Llorens，1981；84）。

---

① Gregotti，1968；33，36；Tafuri and Dal Co，1979；294；Portoghesi，1980/1982；34－35，Zevi，1981；41－43.

我们必须进一步追溯第二种趋势。由1954年到1964年，在罗杰斯的指导之下，一个新的世代与卡萨贝拉一同成长了起来，在意大利文化中扮演了一个知识领袖的角色。他们至少包括了圭多·加德拉（Guido Gardella）、维多里奥·格里高蒂、阿尔多·罗西、吉瑟普·萨蒙纳，以及塔夫里等等。由于学院往往是社会资源分派有限的场所，因此卡萨贝拉所鼓吹的方向也就容易涉及教育制度与机构中的权力斗争。意大利建筑学院老的学院派领袖与新的世代之间的对峙是严酷无情的。在1948年以后，除了在威尼斯大学的建筑学院中的进步教学尝试之外，老学院派可以说是完全控制了整个意大利的建筑机构。

1936年，萨蒙纳到了威尼斯。与意大利其他的建筑学校大异其趣，威尼斯变成一个被鲁西阿诺·西默兰尼（Luciano Semerani）称为“放逐的学校”（1984：4）。布鲁诺·柴菲、伊格兰济奥·卡迪那（Ignazio Gardella）、弗朗克·阿尔比尼（Franco Albini）、卡罗·斯卡帕（Carlo Scarpa）、乔凡尼·阿斯丁哥（Giovanni Astengo）、路多维哥·贝吉欧胡索（Lodovico Belgiojoso）、鲁西阿诺·西默兰尼、吉安卡洛·狄卡洛（Giamcalo de Carlo）、卡洛·莫安尼洛，以及曼弗雷多·塔夫里等等，都先后加入了威尼斯建筑学院的教授团。

在这个时期中，塔夫里的历史写作与萨蒙纳的作品（1971/1986，1929/1986；Semerani，1986）、格雷高蒂的作品（1968，1986；Tafuri，1982）和罗西的作品（1966/1982，1983）等等，高度整合在一起，甚至可以连系上丘里欧·卡洛·阿尔甘（Giulio Carlo Argan，1963）论建筑类型的文章。虽然每个人在不同的层次上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他们的作品基本上互相平行。所以塔夫里的历史写作可以说是一种在更大的理论模型中把他们放到一起，并在一个历史架构中来评估与定位这种趋势的一种尝试。下面我将试着经由其作品、意旨与哲学基础来简述在这段时间中的塔夫里式的理论论述：

塔夫里的第一本书是关于鲁多维哥·郭若尼（Tafuri，1964）的，此人是这个运动的开拓者，是罗马学派（the Roman School）最令人瞩目的建筑师之一。对这种历史取向的运动，塔夫里写道：“骄傲地宣称自主性的语言为传统的元素所组成，它与布尔乔亚文化无关，似历史的光彩般出声，这历史不是一个下层阶级，也不是一个向上运动阶级的历史，而是一个被压迫的、卑微阶级的历史：它更类型化，更类似于一种民间传统，存

在于所有健康写实之外。”

这个历史的主题，即使在塔夫里第二部作品——日本的现代建筑（1965/1982）中仍继续着。它在三条线索上展开：

（1）设计过程与其方法；

（2）城市是提供建筑写意的脉络组织；

（3）建筑语言是象征沟通的工具。

在他们之间，设计方法似乎成为主要线索。对塔夫里而言，这似乎成为历史学者的任务了，以至于能联系历史的分析与建筑教学，贡献于理论与实践间的连结。这也就是说，历史分析需针对设计过程中的原创性操作与方法论层次上的发展潜力全力以赴，作出贡献。正如托马斯·劳林（Thomas LIorens）精辟分析的那样，这种历史倾向贯穿了青年塔夫里那段年代中的所有作品。由卡萨贝拉上对修正的理性主义的辩论开始（Aymonino et al.，1964）——塔夫里关于风格主义的书（1966），两篇关于伯诺米尼的文章（1965，1966b），一本关乎人文主义的书（1969a）——一直到另一本关乎威尼斯建筑师杰可伯·桑索维诺（Jacopo Sansovino）的书（Tafuri，1969b），这个在设计理论中的历史研究之类型方法（typological method）像理论论述一般潜藏在塔夫里的作品之中。甚至塔夫里在1969年之后转移了他的研究途径，这个主题仍然可以在其1972年发行的另一本有关伯诺米尼的书上找到。

劳林论塔夫里文章中最精彩处的其中之一为：劳林指出了类型学的意旨（typological problematic）与唯心论艺术史的黑格尔假设之间的哲学关联。塔夫里针对“现代运动与过去的方法论之间的决裂，源于对建筑师作品所产生的一种非直接控制的新方法引入后所造成的决裂。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上，在历史上第一次谨慎地假设一种有美学创造力的内在元素，而非一无所有”（Aymonino，et al.，1964）。塔夫里的主要观点是“控制参数”（control parameters），即在设计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在设计的操作过程中，塔夫里假设：某些规律建构了“象征的形式”，它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展现以及控制形式。虽然塔夫里的兴趣并不在于这些“象征形式”与社会整体之间的交流，而是在于设计过程本身中所形成之行动，他对形式的早期观点仍然关乎恩斯特·卡西尔（Ernest Cassirer）与欧文·潘诺夫斯基的“象征形式”之“角度”，关乎路奇·伯里昂（Luigi Pareyon）之“构成”（formation）（Konrad Fiedler）的“纯粹视觉性”之结合。这些观点的康德

主义根源说明了塔夫里还未曾完全拒绝其青年时期之传统黑格尔式的意识形态。这些唯心主义的观点也提供他一个经由设计理论的类型学方法来联系历史分析与设计方法的幻觉。这是卡萨贝拉团体、威尼斯学派、或“设计方法”团体们，在不同的立场上却共同特有的普同的哲学基础。换言之，他们尝试经由专业实践来联系社会、历史的团体。

（二）1969年之后的意识形态批评。在60年代的美国以及欧洲，一系列重要的社会运动粉碎了福利国家自由主义与亲成长联盟（progrowth coalition）对整个政治、社会的安排。精确地说，这是政治、社会的危机影响了经济机制，它最终激起了经济危机（Castells，1980）。在60年代末，所有社会的、政治的压力聚集于一点：包括强悍的劳工运动、社会针对集体消费的都市社会运动、反文化运动，以及国际关系的转人。

（1）劳资间的斗争。一般而言，1968年五月运动之后，社会运动的烽火点燃，广播各地。特别是，1960与1974之间，意大利劳工对资本家提出了种种实在的要求，造成利润急剧下降［例如，1969年意大利工厂中的奥托诺·卡多（Autunno Caldo）事件］。

（2）针对集体消费的都市运动。都市运动包括了：住宅运动（例如，意大利的房客联盟（tenant union），自由主义的工会SUNA与激进工会UI；为争取国宅而动员等等），都市更新运动，争取交通运输之运动（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威尼斯），为了公共服务的价格与品质的运动（例如，1973年石油危机中的意大利）。

（3）反文化运动：妇女运动、违建运动等等。

（4）新国陆军关系。第三世界的崛起、越战等等。此外，都市社会运动始于1968年革命之后。1968年五月的运动，并不是都市运动，而是个一般性的社会运动。然而在这之后，运动是以空间领域为基地，基中于都市之课题。人们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脉络中动员起来。即使马克思主义也一时失去理论的容量来指导社会运动（Castells，1983b；299）。这不仅仅是欧洲文化的危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在意大利，意共（PCI）试图处理在1968之后来自学生与知识分子的批评。所以官方的马克思主义与来自左翼知识分子的批评能够在PCI中共存（LIorens，1981；94）。然后，特别是在意大利，在70年代，围绕着工人阶级，一个新的社会集团（social bloc）形成了。一个高度丰富多变的意大利都市改革按照不同的社会、政治脉络被实施了。在这个脉络中，塔夫里在1969年左右转变了他的理论研究方向。

一方面，《建筑的理论与历史》（Theories an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之中，塔夫里前阶段的、支持建筑实践的历史方法仍夹杂在结论的理论架构里，例如，类型批评的史学工具主义与卡西尔、潘诺夫斯基、韦伯等观点间的夹缠。另一方面，在此书中，塔夫里不但提出以意象作为批判的后设语言之建筑之角色与价值上的错乱，而且指出操作性批评（operative criticism）的理论问题——操作性批评不可避免地加诸近代的标准于古代之上。简言之，操作性批评从事的是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而不是创造历史，提出历史之诊断（historical diagnosis）。建筑批评必须由对建筑形式的分析转变到对形式外貌形成限制之所有脉络组织的批判。所以，历史研究变成“建筑意识形态的批评”，以找出建筑是什么，以及建筑如何神秘化了形式真正的历史意义。这与早期之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神话学》的意识形态批判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事实上，将建筑学视为一种被历史地限制的，以及在制度功能上运作的学科，就是一种政治的批评，即使是种间接的政治的批评。

劳林曾经指出塔夫里式的论述之整个发展过程的特征，可以在《建筑的理论与历史》一书再版修订的过程（1968/1970/1976/1980）中发现。在1970年意大利文第二版说明中，塔夫里拒绝了官方马克思主义、马库色学派、庸俗社会学、进步的建筑师等等。就像没有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而只有一种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批判那样，吾人不能“预期”一种阶级的建筑（一个解放的社会之建筑），而可能的只有引入一个对建筑之阶级批判。他拒绝了前卫建筑师与操作性批评的史家在知识上的取向，剩下的是历史批评的解密任务。这个立场是从“Per van critica dell ideologia architettonica”（1969）一文发展出来，它是塔夫里主要的著作《建筑与乌托邦：设计与资本主义之发展》（Architecture and Utopia; Design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1973/1976）的基础。虽然检验现代运动的历史遗产是塔夫里早期的研究方向（另一个是类型学分析）（Tafuri，1963），这个主题对现代建筑的个案做建筑的意识形态分析，以解密前卫与革命的关系，在10年之后的《建筑与乌托邦》中才得以实现。简言之，建筑被视为建构一种乌托邦的意识形态，它为布尔乔亚的意识形态所支配。这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建筑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或多或少假设着：意识形态的联结被化约为错误的意识。

这种建筑的意识形态分析在塔夫里两本与他人合作的著作中获得了完全的发展：《现代建筑》（Modern Architecture）（with Dal Co，1979）以及

《美国的城市：由内战到新政》（The American City; From the City War to New Deal）（With Ciucci Dal Co and Manier - Elia, 1973/1979），同时也散见于许多发行量广大的文章中。

最后，一个严格的历史方法在70年代末终于形成了（Tafuri, 1977, 1980）。追溯由皮拉内西到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建筑本身像制度一般被贯穿，成为一个既定时期的意识形态障碍物，关乎在既定时间中之知觉与心像结构。塔夫里试图去了解“建筑的语言”，然而却不经由一种纯粹的语言学的分析去打算重铸作品的知识脉络。历史被塔夫里视为一种生产、一种意义的生产，一种解构的工具。在这样的历史论述之中，“历史既是被决定的，又是决定性的：它被自己的传统，被其分析的对象，被其采纳的方法所决定，以及决定它自己的转化，一如它所解构的现实。”。

此外，他在威尼斯之建筑与城市中，在赞助者、专业竞争、政治、科学辩论的张力之间应用其方法（Tafuri and Foscari, 1983; Tafuri, 1983, 1984）。迄今为止，在其巨著：《球与迷宫：由皮拉内西到1970年代的前卫与建筑》（The Sphere and the Labyrinth: Avant - Gardes and Architecture from Piranesi to the 1970s）（1980/1987）的导言之中，塔夫里的史学方法呈现了一种理论的重新编组与理论的严谨。所以，以下的分析，大部分的材料都将以这部较能代表塔氏理论架构的著作为基础。

按照劳林的分析，在塔夫里持续不辍的每一本著作中，其精炼历史写作过程被刻画为“顺流而去，挟泥带沙，将其流经区域的养分一一保有”。例如，如我前面所述，现代建筑历史遗产的主题是在其后继之工作中才逐步完成的。甚至，在历史写作的风格上，在其议论之中存在的不是英美传统的线性思维逻辑，而是“朝向遥无但不是经常能识别的目标射击”。如同贺龙·巴赫德之写作方法，塔夫里在历史、社会学、哲学与新闻报道中抽取原料，收集在其宝匣之中，以备特定情况而用。它的叙述是“加诸其上”（superimposed）而非“融合”。事实上，这是与1968年以后马克思实践哲学与方法论相对应的。塔夫里式的历史计划，不仅仅受惠于阿尔都塞所提供的一般基础、意大利史学家卡洛·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与安德瑞阿诺·伯里斯培利（Adriano Prosperi）的微观历史、罗兰·巴特式零度写作与神话学所开展出来的意识形态批判、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系谱学/考古学、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之解构，而且奠基于亨利·罗伯特·齐美尔（Heinrich Robert Zimmer）、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弗洛伊德、尼采甚至

海德格尔的早期传统之上，因而，我们很难界定塔夫里的方法论边界：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以及尼采与弗洛伊德之思想。这就是所谓在后葛兰西的意大利土壤上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塔夫里立场。

20年前的意大利，现代建筑与近代城市的历史研究完全仰赖于二手与三手的资料与文件。现在，这种难以忍受的情境已经改变了，世界任何地方的建筑史学术成果在理论创新方面却无法超过意大利。曼弗雷多·塔夫里与其同僚的贡献是造就了这个成果的主要力量。对于陈腐保守的、在社会运动所催动的反省风潮下动摇的主流建筑史论述而言，威尼斯学派提供了一条不同的替代性选择。尤其是对有理想的第三世界留学生而言，若有志于建筑历史与理论的研究，今天的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已成为他们心目中新的取经地了。

参考文献：

[1] Manfredo Tafuri, Theories an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M], trans., Giorgio Verrecchia, Cambridge: MIT Press, 1976

[2] Manfredo Tafuri, Architecture and Utopia; Design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M], trans., Barbara Luigia La Penta, Cambridge: MIT Press, 1987

[3] Manfredo Tafuri, Francesco Dal Co, Modern Architecture/ Vol. 1, 2 [M], trans., Robert Erich Wolf,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1979

[4] Manfredo Tafuri, The Sphere and the Labyrinth; Avant - Gardes and Architcture from Piranesi to the 1970s [M], trans., Pellegrino D'Acierno and Robert Connolly, Cambridge: MIT Press, 1987

[5] Manfredo Tafuri, History of Italian Architecture 1944 - 1985 [M], trans., Jessica Levine, Cambridge: MIT Press, 1989

[6] K. Michael Hays, ed., Architecture Theory since 1968 [M], Cambridge: MIT Press, 1978

[7] Joan Ockman, ed., Architecture, Criticism, Ideology [M], Princeton: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85

（作者单位：台湾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

《球与迷宫》及其他

胡　恒

一、概述

意大利人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1935—1994），是当代最重要的建筑理论家和建筑史学家之一，左派知识分子的象征性人物。其著作以极度晦涩而著称，但也由此获得理论界的关注，并在学科界限之外引发触动。塔夫里自1968年出版其第5本著作《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开始，对当代建筑历史与理论领域的冲击就未曾停止。除去连续不断的创新性著作和夹杂其间的海量文章①，塔夫里还积极投身到现实的斗争之中。他从不回避矛盾，无论是学术上的，还是生活中的。行为激烈、有活力、富有革新精神，这些已无法描述塔夫里工作的广度和力度。从某种角度来看，他和他所热爱的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一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型知识分子”的典范。以连续的著作为核心，环绕四周的是高密度的单篇文章的补充、深化、延展，以及充分的讨论（研讨会、会议、授课、私人交谈）。用著作做引子产生社会回应，用讨论来扩大主题和观念对社会现实的介入面。与此平行的是真正具体的对现实的干预。塔夫里一直不遗余力地参与着有关现代建筑、城市规划和保护的论

① 塔夫里一生共出版约23本著作。另外，有200余篇文章在意大利、德国、西班牙、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重要建筑杂志上发表。

战。没有他的“热情洋溢且有理有据的反对”，[1](p.165)伦佐·皮阿诺（Renzo Piano）对帕拉蒂奥（Palladio）位于维琴察的巴西利卡进行现代化的计划或许就已经执行了。

除了个人著述和介入社会事务之外，塔夫里还积极投入机构的建立和杂志的团体活动之中。他于1970年创立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史研究室”（Istituto di storia dell'architectura）。1976年卡尔罗·艾莫尼诺（Carlo Aymonino）担任威尼斯建筑学院新院长，“建筑史研究室”扩大成为建筑批评和历史分析组（Dipartimento di Analisi Critica e Storica dell'Architettura），成为威尼斯建筑学院建筑系下六组（建筑设计、城市计划、建筑史、古迹维修、结构与营造）之一。在塔夫里积极推动下，该组于1993年得到教育部批准改制成为建筑、环境财产的历史与保存系（Laurea in Storia e Conservazione dei beni architettonoci e ambientali）。可惜的是，塔夫里于次年去世，留下一个巨大的、未完成的工程。

塔夫里对杂志的投入同样惊人。恩奈斯托·罗杰斯（Ernesto N. Rogers）和维多里奥·格雷高蒂（Vittorio Gregotti）所领导的 *Casabella* 杂志，①，马西莫·卡西亚里（Massimo Cacciari）领导的《新天使》（*Angelus novus*）②、《政治研究室》（*Laboratorio Politico*），阿尔贝托·罗萨（Alberto Asor Rosa）、卡西亚里、托尼·奈格里（Toni Negri）所领导的 *Contro-piano* 杂志等重要的学术刊物，都与塔夫里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并成为这些杂志的主要理论发言人。甚至在美国，由美国人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阿根廷人马里奥·冈德森纳斯（Mario Gandelsonas）和英国人肯尼斯·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编辑③，于1973年开始出版的 *Oppositions* 杂志中，塔夫里及其合作者的文章也成为其中主干。正如琼·奥

---

① 塔夫里认为在格雷高蒂领导下的 *Casabella* 杂志是世界上最好的杂志之一。见 Pietro Corsi interviews Manfredo Tafuri, “For a historical history”, *Casabella*, 619 – 620 (1995), p. 145.

② 卡西亚里创办这一杂志的目的在于继续青年本雅明的夭折的刊物《新天使》未完成的事业。这也是对本雅明著作在1962年开始出现意大利语译本，并且开始逐步影响意大利左派知识分子思想的一个反映。

③ 随后，英国人安东尼·维德勒（Anthony Vidler）和瑞士人科特·福斯特（Kurt Forster）先后加入编委会。*Oppositions* 杂志是当时理论贫瘠的美国大陆最有学术追求的建筑杂志。它积极引入欧洲大陆的学术成果，尤其是意大利人的作品。

克曼（Joan Ockman）所说的，“他们（这些编辑）也都接受塔夫里在《*Oppositions*》中的写作……显然，塔夫里的写作对每个编辑产生不同作用，但同时又帮助他们统一了他们的计划（program）。”[2](P.59)

塔夫里一生之中共约完成23本著作。其中有一些已经成为和300年前阿尔伯蒂（Alberti）、帕拉蒂奥等人的《论建筑》、《建筑四书》同等重要的学科经典，比如《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Theories an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1980年）、《建筑与乌托邦》（*Architecture and Utopia*；*Design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1976年）、《现代建筑》（*Modern Architecture/ Vol.* 1，2，1979年）。但是另有一些著作虽有多语种译本，却仍不为人所知（或者说，即使大家知道其存在，却极少有人费心研读），比如《球与迷宫》（*The Sphere and the Labyrinth*；*Avant－Gardes and Architecture from Piranesi to the 1970s*，1987年）、《1944—1985年意大利建筑史》（*History of Italian Architecture*，*1944－1985*，1986年）、《美国城市：从内战到新政》（*The American City*；*From the Civil War to the New Deal*，1979年）、《朱里奥·罗马诺》（*Giulio Romano*，1989年）、《威尼斯与文艺复兴：宗教、科学、建筑》（*Venezia e il Rinascimento*；*Religione*，*scienza*，*architecttura*，1985年）。更为大量的著作基本无人问津，它们以意大利文的形式躺在图书馆里，等待有缘人来发掘，比如：早期的（70年代前）《卢多维科·夸罗尼和意大利现代建筑发展》（*Ludovico Quaroni e lo sviluppo dellârchitettura moderna in Italia*，1964年），《日本现代建筑》（*Lârchitettura moderna in Giappone*，1964年），关于手法主义的《16世纪欧洲的手法主义建筑》（*LArchitettura del Manierrismonel500 europep*，1966年），《雅克布·桑索维诺和16世纪的威尼斯建筑》（*Jacopo Sansovino e lârchitettura del500 a Venezia*，1969年）；中期（80年代前）的《朱莉娅大道：16世纪的乌托邦城市规划》（*Via Giulia. Una utopia urbanistica del500*，1973年）；后期（80年代之后到去世前）的关于威尼斯画家圣·弗朗西斯科·维尼亚（San Francesco Vigna）的《协调与冲突》（*Lârmonia e I conflitti*，1983年），《建筑师拉斐尔》（*Raffaello Architetto*，1984年），以及《文艺复兴研究：君主、城市、建筑师》（*Ricerca del Rinascimento*；*Principi*，*città*，*architetti*，1992年）①。

---

① 《文艺复兴研究：君主、城市、建筑师》（*Interpreting the Renaissance*；*Princes*，*Cities*，*Architects*）在2006年正式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它在1995年曾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一个版本，估计是简化版。

塔夫里对建筑理论界和史学界的影响，目前集中在其对于现代建筑领域的研究。《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建筑与乌托邦》、《现代建筑》这三本书，是现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必备参考书目。《球与迷宫》、《1944—1985 年意大利建筑史》虽然相对被冷落，但是也有少量理论家表现出重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它们代表了塔夫里现代建筑研究的巅峰成就，也代表了现代建筑史研究难以逾越的鸿沟。尽管如此，这些著作的价值现在远未发掘出来。且不说极少有人将这些著作与塔夫里的原真语境（意大利当时的政治气氛和学术气氛）联系在一起，将这些著作和塔夫里其他时期的创作与同代人的写作联系在一起，即使像《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这样的流传广泛的名作，由于译本的问题（英语、法语等译本的翻译都受到严厉批评），它对理论界的作用也未免大打折扣。尤其是《球与迷宫》，其英文译者之一阿西里诺（Pellegrino d'Acierno）在一篇未发表（因为受到塔夫里的反对）的译者前言中一再强调，此书翻译之困难，简直可以比拟为将意大利的法拉力跑车改装为美国的福特轿车。并且，此书英文版刚一出现，即遭抨击无数。约瑟夫·里克沃特（Joseph Rykwert）的评价是其中的代表，他认为，用英语把握塔夫里的意思往往就像丈量巴比塔。[见《受虐狂的环境》（The Masochistic Environment），载《时代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1989 年，3 月号。]

本文希望对塔夫里 70 年代的代表著作《球与迷宫——从皮拉内西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先锋派和建筑》进行一个简略的介绍，并且尽力为它在塔夫里 20 余年的现代建筑理论与历史的研究全景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当然，对此书的价值认定已不是一篇短短的介绍就能完成的。事实上，这事也无须由作者来做。如果这一简略介绍能够让读者对此书产生一些兴趣，进而找到它，阅读它（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那么，书的价值将由此产生。当然，这也是本文作者的荣幸和真正的期待所在。

二、《球与迷宫》

《球与迷宫——从皮拉内西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先锋派和建筑》的意大利文版《*La sfera e il labirinto. Avanguardie e architettura da Piranesi agli anni70*》，1980 年由都灵的 Einaudi 出版社出版，1984 年由巴塞罗那的 Gustaro Gili 出版社出版西班牙文版（*La esfera y el laberinto. Vanguardisa y*

arquitectura de piranesi a los años setenta)，1987年由剑桥的MIT出版社出版英文版（*The Sphere and the Labyrinth*; *Avant - Gardes and Architecture from Piranesi to the 1970s*）。①

《球与迷宫——从皮拉内西到20世纪70年代的先锋派和建筑》一书既厚且沉，是塔夫里的几本关于文艺复兴的大部头之外最有分量的一本书（我们这里主要谈论的是其英文版）。它的巨大分量不只在于它的物质性，更来自于其中的思想密度。全书由一篇导言和三部分的九篇正文组成。目录如下：

导言——历史“计划”

第一部分——前奏：启示录

1. “邪恶的建筑师”：G. B. 皮拉内西、异位移植（Heterotopia）和旅程

2. 先锋派的历史性：皮拉内西与爱森斯坦

附录：皮拉内西，或形式的流变性（谢尔盖·M. 爱森斯坦）

第二部分——先锋派的冒险：从小酒馆到大都会

3. 作为“虚拟城市”的舞台：从福克斯到总体戏剧

附录：幸运的套鞋（布鲁诺·陶特）

4. 苏联—柏林，1922年：从民粹主义到“构成主义国际组织”

5. 走向“社会主义城市”：苏联，1917—1928年

6. 新巴比伦：“黄色巨人”和美国主义的神话

7. 德国魏玛时期的社会福利政策（Sozialpolitik）和城市

附录：建造活动的社会化（马丁·瓦格纳）

第三部分——玻璃球游戏

8. “卧室中的建筑”

9. 杰斐逊的灰烬

---

① 意大利版的封面是柏林达达的代表人物劳乌尔·豪斯曼（Raoul Hausmann）的作品《蒙太奇照片》（photomontage）；西班牙版的封面是艾森曼的作品《住宅2号》（house Ⅱ）的正轴测图；英语版的封面是皮拉内西的罗马修道院圣母玛丽亚教堂的大祭坛局部照片。三个封面选自书中的三篇不同的文章（《苏联—柏林，1922：从民粹主义到“构成主义国际组织”》、《卧室中的建筑》、《“邪恶的建筑师”：G. B. 皮拉内西，异位移植，航行》），从中可以看出两位译者和原作者对同一本书的认同点的差异。

全书是塔夫里从1972年开始至1979年中陆续发表的10篇文章的汇集。《德国魏玛时期的社会福利政策（*Sozialpolitik*）和城市》（Socialdemocrazia e città nella Pepubblica di Weimar），1971年意大利文版发表于《反平面》（*Contropiano*）杂志第1期，1974年德文译本发表于《作品》（*Werk*）杂志的第1期。《苏联—柏林，1922年：从民粹主义到“构成主义国际组织”》（Urss－Berlin，1922；du populisme à l'“internationale constructiviste”），1972年意大利文版发表于*VH 101*杂志第7—8期。《卧室中的建筑：批评的语言和语言的批评》（L'Architecture dans le Boudir，The language of criticism and the criticism of language），1974年英文版发表于《反对》（*Oppositions*）杂志第3期，1977年法文版发表于《现代建筑档案》（*Archives de l'architecture moderne*）杂志4月期，1978年德文版发表于*Arch－plus*杂志第37期。《作为“虚拟城市”的舞台：从福克斯到总体戏剧》（Il teatro come 'città virtuale'：Dal Cabaret Voltaire al Totaltheater），1975年发表于《帕拉第奥国际研究中心学报》（*Bollettino del C. I. S. A. Andrea Palladio*）第17期，1977年英文版发表于《莲花》（*Lotus*）杂志第17期。《新巴比伦：“黄色巨人”和美国主义的神话》（“Neu－Babylon”；das New York der Zwanzigerjahre und die Suche nach dem Amerikanismus），1976年德文版发表于《要点》（*archithese*）杂志的“大都会专集”第3期，总第20期。《杰斐逊的灰烬》（Les cendres de Jefferson），1976年法文版发表于《今日建筑》（*L'Architecture d'Aujourd'hui*）杂志第186期。《历史“计划”》（Il “progetto” storico），1977年意大利文版发表于《卡萨贝拉》（*Casabella*）杂志11月第429期，1977年法文版发表于《新批评》（*La nouvelle critique*）杂志4月第103期，1979年夏英文版发表于*Oppositions*杂志第7期。《先锋派的历史性：皮拉内西与爱森斯坦》（The Historicity of the Avant－Garde；Piranesi and Eisenstein），1977年英文版发表于*Oppositions*杂志冬季第11期。

导言《历史“计划”》是全书的总纲，也是塔夫里的现代建筑史研究的方法论总结。在此文中，塔夫里从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建筑史方法论三个方面对自己的历史观展开了详尽的阐述。这篇方法论纲领意义重大。一方面，它集中阐述了塔夫里自身对历史研究、建筑史研究的认识论前提和相应的方法论原则，这是几乎所有建筑史学家都不曾做过的。另一方面，这一阐述是塔夫里对现代建筑领域的历史研究，是对完成《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和《建筑与乌托邦》之后的新一轮探索的自我总结。它意

味着塔夫里的历史学家身份的确立，这一确立是在最广泛的史学范畴里来完成的，并且，塔夫里由此从《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时代的评论家和《建筑与乌托邦》时代的评论家与历史学家相混同的身份中完全走出。① 同时，这篇导言也表明塔夫里的历史研究工作的理论背景出现了大幅度更新。这些理论来源各不相同，自有独立之领域：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精神分析、美学、符号学和语言学、诗学、文学批评等等。但是，塔夫里通过其具体的历史研究活动，在这些理论之间建立起若干构成。《历史“计划”》全文共有86段，36个注释。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构成的复杂而精密的形式。我将这篇文章视为与马克思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弗洛伊德1937年的《有尽分析与无尽分析》相类似的文本（这两个文本也是《历史“计划”》的两个基本参照坐标）。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它是解释塔夫里70年代几乎全部历史工作的钥匙。

第一部分的两篇文章都相关于18世纪意大利建筑师和蚀刻画家乔凡尼·巴蒂斯塔·皮拉内西（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这是塔夫里为历史先锋派设立的一个源头。塔夫里从1971年的《乔凡尼·巴蒂斯塔·皮拉内西：作为“否定乌托邦”的建筑》（G. B. Piranesi; l'architettura come “utopia negative”）一文开始了对皮拉内西的系列研究。他以两篇关于皮拉内西的专题研究作为书的开端部分：“前奏：‘启示录’”（Prelude; “Apocalipsis cum Figuris”）。《“邪恶的建筑师”：G. B. 皮拉内西、异位移植和旅程》（“The Wicked Architect”; G. B. Piranesi, Heterotopia, and the Voyage）是第一篇。这是书中唯一一篇未刊登于各种杂志的文章。也许它是塔夫里专为《球与迷宫》结集而写。它的写作方式和其他文章的差异也很明显——更致密、更集中、更纯粹、更接近塔夫里后期关于文艺复兴的写作。塔夫里把皮拉内西牢牢嵌在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大量的研究文献、自身的写作、作品、同时代的哲学思想、艺术家的创作和写作，和塔夫里所关注的主题（“客体的危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辩证法的演变”、“建筑领域中的脑力劳动向抽象劳动的转化”、“语义学”等）交织在一起。塔夫里将皮拉内西的“无限辩证法”与福柯的“异位移植”概念（出自《词与物》）相比较，并将此概念改造为本文的核心。《词与物》成为这篇文章的重要参照。

---

① 塔夫里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将自己的身份明确定位为历史学家。见 Joan Ockman, “Venice and New York”, p. 67。

《先锋派的历史性：皮拉内西与爱森斯坦》篇幅较小（是前者的一半）。它是书中和建筑相距最远的一篇文章。塔夫里以俄国导演爱森斯坦对皮拉内西的研究技巧为出发点，对历史先锋派的内在困境做出分析，指出从启蒙时期开始这一内在困境就已保存在这些作品中。由于爱森斯坦所处的时代特殊，这一矛盾被体现出来——结果就是，现实主义成为先锋派的继承人，两者并非敌对，而是一直相依相存。在这两篇文章中，有些主题是连贯下来的，比如，客体的危机、先锋派追溯自身的历史根源。

第二部分的5篇文章全部关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历史先锋派运动。所以塔夫里给这部分定下“先锋派的冒险：从小酒馆到大都会”（The Adventures of the Avant - Garde; From the Cabaret to the Metropolis）这样一个总标题。塔夫里认为第一部分的两篇文章是“天堂的序言”，“皮拉内西的图形显然只是有助于确定一个开端的借口”。[3](p.95) 后面的文章是一个“飞跃”，是对皮拉内西所建立的两大主题的连续性的回应：关于形式界限的主题，和施加于形式自身的暴力的主题。《作为“虚拟城市”的舞台：从福克斯到总体戏剧》的研究主题是戏剧。塔夫里认为，20世纪的主体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就是从这里走进新的时代。历史先锋派也是从这里（想象的剧场中）坠入现实世界。塔夫里认为，我们要从这里重建现代建筑史的研究线索。塔夫里在这篇文章中铺张开德国、法国、俄国、意大利的先锋剧场（政治剧场、机器剧场、整体剧场），甚至包括美国20年代的歌舞片。各种舞台并置在一起，左右它们的意识形态也被一一陈列出。围绕在中心的就是大都市这一新生怪物。

《苏联—柏林，1922年：从民粹主义到“构成主义国际组织”》是《球与迷宫》中篇幅最长的两篇文章之一（中译文约4万余字）。在这篇文章中，塔夫里考察了建筑师在越来越具有集合性和技术性的社会中的角色和功能。塔夫里选择了一个高度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在兴衰变迁中的转折性时刻，即苏俄先锋派和德国先锋派在1922年左右的交遇。柏林被看作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历史交汇地。塔夫里追溯战后德国文化中表现主义和民粹主义趋势的转变轨迹。它们通过德国达达的政治化的力量，进入到在魏玛和杜塞尔多夫召开的大会，进入到里西茨基（Lissitzky）、凡·多斯伯格（van Doesburg）、莫霍利·纳吉（Moholy - Nagy）和阿尔普（Arp）等人签署的辩论宣言中，进入到国际化的构成主义运动中。在这个复杂且“否定性的”发展轨迹中，西欧的历史先锋派最终荒谬地成为“客观”美学的先

行倡导者，映照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理性意识形态。1985年，这篇文章被琼·奥克曼收入《建筑、意识形态、批判》一书。

《走向“社会主义城市”：苏联，1917—1928年》是塔夫里展开“意识形态以集群的形式发挥作用”这一命题的典型之作。这一“另一种”先锋派的活动是塔夫里十分感兴趣的一个历史工地。在1970年，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史研究室一经创立，欧洲先锋派和苏俄先锋派的运动就是一个主战场。《现代建筑》中第12章“苏俄先锋派，都市化和城市规划”和这篇文章所占用的材料基本一致，且都由塔夫里亲自撰写。

《新巴比伦：“黄色巨人”和美国主义的神话》最初在1976年以德文形式发表于*Archithese*杂志的“大都会专集”第3期。塔夫里关于美国城市的研究可追溯至1969—1970年，他和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IUAV）的其他教员组织了一系列有关于此主题的课程。这个计划被构想为IUAV关于苏维埃城市作品这些现代性的其他重要“全球体系”的产物的系列研究。并且，这个计划也反映了塔夫里及其同事认为美国的城市史还尚未被专著研究过这一看法。《新巴比伦》研究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城市——它的副标题是“表现主义，爵士风格、摩天楼，1913—1930”。其中的观点和塔夫里在其他几篇相关的文章中的观点相差无几。比如他在1975年发表于法国《今日建筑》第178期的《荒谬的辩证法，欧洲—美国：摩天大楼意识形态的灾害（1918－1974）》［La dialectique de l'absurde. Europe－USA；les avatars de l'idéologie du gratte－ciel（1918－1974）］，和他为《美国城市：从内战到新政》一书所写的《*The Disenchanted Mountain*：摩天大楼和城市》（1973年）长文。两者（且尤其是后者）都通过比较欧洲和美国关于美国摩天大楼的观念，来对美国的摩天大楼进行探讨；都表达了以欧洲视角来看，美国更像是一个文化神话，而不是客观现实这一观点。塔夫里将摩天大楼看作一种孤注一掷的尝试，看作一种试图控制城市中的意识形态和竞赛等活动的无政府主义力量，看作一种仍然脱离于城市的实体。塔夫里将这篇文章放在《球与迷宫》中关于苏维埃城市和关于德国魏玛城市的两篇文章之间，显然有其策略性考虑。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思考美国文化时，我们是否一定不能采取一种不同于评价先锋派之乌托邦观点的观点呢？”[3](p.127)

《德国魏玛时期的社会福利政策（Sozialpolitik）和城市》是书中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篇文章，它也是塔夫里在10篇文章中最早完成的。它是塔夫

里与 *Contropiano* 杂志的第二次合作成果。塔夫里本打算用他来引发 IUAV 的一项庞大的魏玛城市与建筑的研究，可惜半途而废。塔夫里在写作这篇文章时正处于其思想的转变期。也就是说，它与《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1969 年）拥有共同的理论出发点——意识形态批判。我们知道，塔夫里在《历史“计划”》中表现出相当复杂的意识形态观。意识形态和现代建筑史之间的关系，已不再是经典意义的马克思式，也不是法兰克福学派式，或者马里奥·托隆蒂式。塔夫里将这一文章放在书中第二部分的最后，一方面形成内容的系列：全景欧洲—柏林/苏联—苏联—美国—魏玛（德国）。另一方面也表达出他所认为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在应对某些特殊材料时也能发挥出效应。

第三部分的主题是“玻璃球游戏”（The Glass Bead Game）。其中两篇文章，都是关于 70 年代之后的现代建筑的新发展。它们对建筑理论界的影响相对其他 7 篇来说更大一些。《卧室中的建筑：批评的语言和语言的批评》有三种语言版本（英、法、德语，但是意大利语版本未见发表），和《历史“计划”》相当。这篇文章最先是作为讲座在普林斯顿大学发表①，次年正式发表于 *Oppositions* 杂志 1974 年第 3 期，它标志着塔夫里与美国建筑界的正式合作（小范围的，和曼哈顿的建筑与城市研究协会（IAUS）的合作）。塔夫里在该文中将斯特林、罗西和“纽约五”的作品，作为当代建筑师从“现实领域”（domain of the real）撤退到“符号世界”（universe of signs）的范例，他认为它们最终征兆了，“这样一种确实存在的普遍态度，一心要通过将客体从其经济语境和功能语境中移开，通过将客体置于生产体系所产生的“物”的流变之中（by placing it between parentheses within the flux of “things” generated by the system of production），而将客体指明为一个异常的（因而也是超现实的）事件，来恢复客体的维度和它作为个体（unicum）的特质。[3](pp. 282 - 283) 塔夫里将这种行为描述为“卧室中的建筑”。塔夫里这一标题来自萨德（Marquis de Sade）的《卧室中的哲学》

① 它是在 1974 年 4 月进行的一次名为“建筑学的实践、理论和政治”的讲座系列的一部分。塔夫里到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来自于狄安娜·阿格里斯特（Diana Agrest），她在当时既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师，也是 IAUS 的成员。她在普林斯顿大学会议期间，将塔夫里介绍给了 IAUS 圈的那些人，包括马里奥·冈德森纳斯、安东尼·维德勒和艾森曼。

(*Philosopie dans le boudoir*)。塔夫里赞同“萨德式的”见解，即在卧室的性爱乌托邦中，一切都必须专门地、残酷地谈论性；同样的，在建筑学领域，只有强加上最大的恐怖，“极度约束的几何结构”（supreme constraint of a geometric structure），才能产生越界的效果，绝对权力的效果。① 于是，“纯粹的走马”（knights of purity）构成了它们自律的神话：“如今那些希望让建筑有所表述的人，不得不采用毫无一丝含义的材料；他不得不将一切意识形态、一切社会功能的梦想、一切乌托邦的残余物缩减至无。在他手中，现代建筑传统的各要素立刻全部被简化成谜一般的碎片（被简化成一种已然遗失信码的语言的沉默记号）。这些碎片很偶然地离开了历史的荒漠。从50年代末到现在，一直在用他们自己的方法，试图为他们的学科重建一种世界话语的建筑师，已经感到必须采用一种新的‘克制的道德’。但是，其纯粹主义和严格主义的执行者，意识到自己正在进行的是令人绝望的行为，而这些行为的合法性就在于行为本身……”[3](p.267)

在塔夫里看来，这样一种态度仅仅暴露了建筑师从现代主义先锋派的命运中得出必然结论的无力：“对语言的回归证明了失败。”通过重述本雅明在《作为生产者的作者》一文中的论点，塔夫里结束了自己的文章，他劝告建筑师和建筑批评家，要在资本主义生产周期中重新界定建筑学的行动领域，并且，“不是作为语言专家，而是作为生产者”发挥作用。[3](p.288)

塔夫里在这篇文章中表现出他对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主要是福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主要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和卢卡奇）相结合的努力。特别是福柯和本雅明，在其他几篇文章中极少见如此明确的理论介入。

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塔夫里第一次面向美国建筑界的发难。虽然反响不一，它确实在语言贫乏的美国建筑评论圈中造成了一个冲击，随之，《*Oppositions*》对威尼斯学派敞开大门。该文后被收入海斯于1998年编辑的《1968年以来的建筑理论》（文章的第一段被替换）。

《杰斐逊的灰烬》是全书的最后一篇文章。这也是相对较短的一篇。1976年直接以法文形式发表于《今日建筑》（*L'Architecture d'Aujourd'hui*）杂志。这篇文章多少可算是《卧室中的建筑》的续篇。塔夫里从1978年

① 福柯对塔夫里这篇文章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关于萨德，尤其可以参见“越界的前言”和“无限的语言”两篇文章。

举办的关于纽约罗斯福岛（Roosevelt Island）的设计竞赛开始，对纽约重现18世纪威尼斯这一荒凉地的有机整体（system of solitudes）的原因展开分析。塔夫里认为，按照尼采（针对威尼斯）的观点，这样一个荒凉地之有机整体的魅力，不是来自于历史，不是来自“饱含深意的图像（images）”，不是来自被重建的“共同体”（a refound“community”），也不是来自价值的缓慢衰退。它来自“由‘浮华’（vanity）和‘喜剧’所控制的行为密码”。[3](p.291)奥克曼认为，塔夫里将纽约当作“新威尼斯”的寓言。她认为，《杰斐逊的灰烬》在塔夫里关于美国的写作中成为一个修辞极点（rhetorical climax），“作为《球与迷宫》的最后一章，他在该书中所追溯其历史的先锋派的‘冒险’在此达到了极点（culminates）”。[2](p.63)

塔夫里从《建筑与乌托邦》就已经开始对华盛顿和纽约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研究。一方面是建筑师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路易·康（Louis Kahn）的民主唯心主义，另一方面是纽约摩天大楼建筑师的实用观点和方法。在小说家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比利·伯德》（*Billy Budd*），和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无辜》（*Innocents*）中，20世纪70年代的纽约建筑，成为“不可能影响生产结构和生产关系”的“纸牌游戏”。[3](p.292)塔夫里认为，所谓的纽约先锋派（“纽约五”）的内向的建筑实验就产生在这样一个语境之中。

塔夫里在这篇文章中参照了福柯、德里达和巴特等法国人的观点。尤其是福柯的《越界的序言》，它是《卧室中的建筑》和《杰斐逊的灰烬》所共同使用的文本。塔夫里在《历史“计划”》中为全书定下的“越界”的基调，在书中最后一部分得到完整体现。

塔夫里在导言《历史“计划”》的最后两段中简略地概述了书的基本主旨和总体的结构关系：

> 眼前这本书，初看上去似乎是本文集。然而实际上，在写作这些单独章节——它们曾暂时刊登在从1972年至今的各种意大利及外国刊物上，并随后做过完全的修订——的时候，我们已经秉持了一种设计理念在其中，即希望读者将它们同该篇导言所阐述的命题一一对照来看。我们相信，贯穿始终的主题是清晰明了的：首先，研究“越界”（transgression）和形式写作（formal writing），把它们作为一种变形的超越（perverse excess），作为驶出赫克勒斯石柱（columns of Hercules）

之外，超越法定界限的主体的远航；而后，对“越界的语言”（language of transgression）逐步加以掌握，也就是，实现了主体的自由只是“对于技术的自由”，而非对于写作的自由。研究的核心在于探索这种新的写作方言和它新的制度上的指涉物之间不稳定的平衡状态。只有在某几个章节中，先锋派所论及的“技术”才面临着如下的问题，即证明技术的历史是他者(*other*)，当然还有，找出技术和我们选择要分析的主题的切合点。

所以，我的意图不是要呈现一段自身很完整的历史，而是要呈现一个穿越迷途的时断时续的旅程，呈现各种可能的“临时建造”（provisional constructions），它开始于所选的材料。我们可以重新洗牌，也可以再摸进曾经扔出的牌：游戏注定要继续。过去10多年里我所得到的具体帮助和鼓励使我的工作已然成型，我要感谢我在威尼斯大学历史系的朋友和合作者，他们和我一起承担了这些“拼图游戏”，这些“耐性的游戏”（*giochi di pazienza*）。[3](p.21)

塔夫里将这本书看作是“一个穿越迷途的时断时续的旅程”，一次“呈现各种可能的‘临时建造’”；或者说是一个游戏——“拼图游戏”、“纸牌游戏”、“积木游戏”，也许还应加上在第三部分的标题中暗示的“玻璃球游戏”。实际上，这两类说法没有什么差别。它们都表现出塔夫里的历史观的本质和主旨——越界。

三、关于《球与迷宫》

关于《球与迷宫》的研究在大陆尚无人涉及，但台湾的夏铸九先生在《理论建筑——朝向空间实践的理论建构》中第五章《批判的历史计划：曼弗雷多·塔夫里及威尼斯学派》中，对《历史“计划”》的内容有大量引用。文章从塔夫里所提出的批判的“历史计划”理论中抽出“认识论批判”主题。在将塔夫里和威尼斯学派置于意大利的战后欧洲社会语境中进行回顾的同时，作者把批判的历史与空间的形式、语境、应用三方面之间的关系分别加以阐述。在空间的特殊性，话语、空间形式与冲突的社会经济变动这两个层次，分析塔夫里的历史计划的理论性质与限制。最后以提出一个认识论的批判观点作为结束。虽然夏铸九先生围绕空间问题来组织塔夫里的

历史理论，但是论文中明确了其历史研究中的认识论主题是相当准确的。

国外对《球与迷宫》全书的整体研究也是极为少见。在 *Casabella* 杂志纪念专集中①，有 11 篇文章谈及此书，但基本都是一两句话就已了事。似乎这是本大家都应该谈，但是又不知如何去谈的棘手之书。比如，罗萨在《意识形态批判和历史实践》中只提一句，“伟大的‘科学性’作品——像《球与迷宫》和《威尼斯与文艺复兴》这样精彩的书……”。[4](p.33)在欧默（Carlo Olmo）的《一种史学，多种历史》中，他将《球与迷宫》和《意大利建筑史》相比，“……《球与迷宫》，这或许是塔夫里最难、最不易理解的书。”[5](p.75)心中赞叹，但欲说还罢，欧默的这句话可以看作对于《球与迷宫》的普遍看法。由于《意大利建筑史》和此书的特殊亲源性，这篇文章也算曲折地讨论了《球与迷宫》。无论如何，*Casabella* 杂志对《球与迷宫》的这一尴尬的态度可以看出意大利人对此书所抱有的一种难以明言的感受。

在英语世界中，对《球与迷宫》的态度要显得阳光许多。*Oppositions* 杂志从 1974 年开始就在陆续发表书中的单篇文章。《卧室中的建筑》，*Oppositions* 杂志第 3 期（1974 年 5 月）；《先锋派的辩证法：皮拉内西和爱森斯坦》以及《特拉尼：主体和“面具”》，*Oppositions* 杂志第 11 期（1977 年冬）；《历史“计划”》，*Oppositions* 杂志第 17 期（1979 年夏）。我们还须注意的是，*Oppositions* 杂志还刊登了波伊斯对法文版的《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所做的评论，以及卡西亚里写的一篇名为《*Eupalinos* 或建筑》的文章，作为对《现代建筑》的评论。

1985 年，琼·奥克曼为《建筑、批评、意识形态》所写的后记《批判性历史和西西弗斯的劳作》是难得一见的完全针对塔夫里的《历史“计划”》一文所做的评论。奥克曼在文中对于《球与迷宫》中的两篇文章进

---

① *Casabella* 杂志 1995 年 1—2 月号第 619—620 期，这是该杂志为塔夫里 1994 年的去世而做的纪念专集。该专集共收录 18 篇文章（如果算书目的话就是 19 篇），是到目前为止学术价值最高的针对塔夫里的研究文集。这 18 篇文章除了 3 篇访谈和 4 篇文献（已发表的关于塔夫里的短文）外，其他 11 篇都是专为此专集所写。作者几乎囊括了全部的（全球范围内）最高水准的塔夫里研究者：意大利人格雷高蒂、罗萨、丘奇、卡西亚里、欧默、约瑟夫·克勒（Joseph Connors）、弗兰西斯科·保罗·菲奥里（Francesco Paolo Fiore）；法国人柯亨、波伊斯；西班牙人拉斐尔·莫内欧（José Rafael Moneo）；美国人奥克曼、艾克曼。

行了分析。一篇是《苏联—柏林，1922年：从民粹主义到“构成主义国际组织”》（奥克曼在《建筑、批评、意识形态》中收录了这篇文章）。另一篇是《历史“计划”》。奥克曼只在文中开端处对前者略加描述，而后就直奔《历史“计划”》。这应该算英语世界中对《历史“计划”》和塔夫里的历史方法论进行专门研究的第一篇文章。虽然看得出来，奥克曼在寻找一种较为辩证的方式来分析塔夫里的历史方法论，但是劳林和詹姆逊的阴影已经笼罩在奥克曼身上——她在文中数度引用了他们的观点。奥克曼的这次研究没有取得太大突破。1993年，奥克曼在 *Casabella* 杂志为塔夫里所做的纪念专集中写了一篇较长的文章《威尼斯与纽约》。这一次，奥克曼的写作对象不再是理论或观点，而只是学术事件。

1987年《球与迷宫》英文版出版，约瑟夫·里克沃特对此书写了一篇不是很赞许的评论《受虐狂的环境》（The Masochistic Environment），载于《时代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1989年3月号。[①] 迪安尼·吉拉尔多（Dianey Ghirardo）的《曼弗雷多·塔夫里和1970—2000年的美国建筑理论》对《卧室中的建筑》有颇多引用。在MIT于1999年出版的《建筑与现代性》一书中，海蒂·海伦（Hilde Heynen）在“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一节中将《历史“计划”》中的部分命题抽出来，和《现代建筑》、《建筑与乌托邦》的相关命题一起，对塔夫里的历史观做了一个小结。

需要注意的是奥克曼的《批判性历史和西西弗斯的劳作》和海伦的《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因为前者有相当篇幅涉及塔夫里在《历史“计划”》中的认识论主题（这是大多数理论家有所忽视的一个重要主题，至少是有大量的曲解存在）。后者则强调了本雅明和卡西亚里与《历史“计划”》的密切关联。

《批判性历史和西西弗斯的劳作》大致有三处涉及认识论问题，其中只有一处是明确作为认识论问题来讨论。在这三个认识论问题（写作、知识、历史学家的自我意识或主体）上，奥克曼所进行的阐述（阐述内容和阐述方式），代表了理论家们在塔夫里的历史认识论问题上较为普遍的态度和反应。

第一次出现在文中第二段。奥克曼谈到了历史写作（the writing of his-

① 或许是在指责英文译本的糟糕。单导言一篇文章就有5处打印错误。

tory）。这里涉及写作和主体的关系问题，这也是塔夫里的历史认识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奥克曼阐述了塔夫里的历史写作的几个基本特征：不同于解释学；主题和目标不是为了揭示事实，而是为了超越自身。[6](p.183) 如果奥克曼沿着“超越自身”继续深入，就会探讨写作自身的问题，继而探讨写作主体的问题——认识论之维就此展开。但是，奥克曼的注意力却放在写作的临时性和无止境之上。“当每一次解构回返到‘反复蒙太奇’，以避免将片断冻结为自律的符号时，历史学家必须防止自满于其重构的语言自行变得制度化，以成为纪念碑式的‘想象的图书馆’，并最终成为另一种控制性计划。……一旦历史在资本主义符号下写成，它就得在知识的市场中冒被同化的危险；所以，它必须不断借助于推翻其自身结论的激烈之举。”[6](pp.183-184) 奥克曼将这一种历史写作的工作比拟为西西弗斯的反复活动。这一比喻恰如其分地描绘出塔夫里的历史写作的受难感和自我循环性。但是，奥克曼只描述了塔夫里的历史写作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而无视写作主体和现实世界的关系才是一切困境的基础。奥克曼所说的，塔夫里需要反复推翻自己的结论（这就是西西弗斯形象的表现），不能成为被批评的理由。因为塔夫里提示我们的是，要反复推翻主体和写作之间的本能的认同感。就这样，一个本该深度拷问的认识论前提，悄无声息地被一个对方法悖论（写作必须颠覆其成果，但这样又会陷入一个解构与重构的自我循环）的质疑所替换。

第二次出现在第八段。奥克曼引用了塔夫里关于福柯的《尼采、谱系学、历史》中部分内容，也就是福柯的知识概念。奥克曼将塔夫里所采用的福柯的谱系学——知识——真实历史的结构直接搬用过来。这是一个展开认识论问题的好机会，因为福柯的谱系学中的知识概念的作用就在于引发历史认识论的整体更新。可是，奥克曼再次偏离分析的轨道——她从福柯摘引的尼采的关于知识的一个阐述出发，将塔夫里的知识观推向了对詹姆逊所描述的“葛兰西式渐进主义”姿态的评判。“因此，知识是‘由细小的且不易见的真理组成，通过一种严格的方式获得’（这里引用了福柯摘自尼采的《人性，太人性》的句子）。在这点上，塔夫里对《一个科学的自传》第一系列里的罗西发出了共鸣［‘那么，我该在我的职业（craft）中追求什么呢？当然是追求细微的事物，我认为，巨大事物的可能性在历史上已经被排除了’］；事实上，这种态度同诸多晚期现代或后现代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显然是我们时代的症候。”[6](p.185)

塔夫里所谈的知识并不是个独立概念，它的真正重要意义在于对它的认知方式，在于认知和主体之间的契约性关系。这是福柯的谱系学对尼采的真实历史的借鉴的核心。抚慰人心的求知意志，在今天已不是知识的动机，而是被摧毁的对象。认知、求知意志、身体、主体、激情，才是当下知识的主题。奥克曼完全无视这一组关系，而专注于知识的最终的呈现形式（由细微事物构成），最终得出塔夫里具有渐进主义姿态的结论，“也正是这种对积累细小事实之可能性所持有的保留态度，将塔夫里的计划从纯粹虚无主义的边缘，推回到有点类似于先前提及的渐进主义观点的东西上。”[6](p.185) 奥克曼的批判显然没有击中目标。

第三次出现在第十二、十三段。奥克曼以托马斯·劳林（Tomas Llorens）对塔夫里的认识论的质疑作为自己攻击的开始：“在一篇名为《曼弗雷多·塔夫里：新先锋派及历史》的文章（《建筑设计》51，1981年第6/7期）里，托马斯·劳林认为，塔夫里“将他对意识形态决定论机制的研究，完全推到了认识论貌似有理的界限之外”，因为作为历史学家，他不可能始终立于自己所假定的全球(global）意识形态体系之外。在劳林看来，塔夫里的方法被困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6](p.187) 奥克曼认为，劳林和詹姆逊在这个问题上看法基本一致，两人都认为，塔夫里将历史学家的身份置于看似一切意识形态体系之外（因为，他认为世界全被意识形态所玷污）的地方。所以，在塔夫里身上呈现出这样一种话语——“它用单调的、重复出现的相同的判断消除掉所有的形状（shapes）和形象（figures）”；或者说，塔夫里运用的是这样一种判断，“他总是将同一概念当作预言，也就是所有事情都等同于沉默”。[6](p.188) 奥克曼由此得出结论：“塔夫里的历史显得‘极端唯心主义’（crass Idealism）——它是另一种乌托邦计划。”[6](p.188)

这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对塔夫里的批评——对其本质上的虚无主义立场的指责。当然，这关乎的是历史学家的身份问题，也是一个主体和现实之间关系的认识论问题。在塔夫里看来，历史学家的主体必然要和现实建立一个距离，但是这一距离并非表明他身处客观真理的位置，只是像神一样告诉大家世俗生活的蝼蚁命运。这一距离是一种关系，一种强烈、脆弱、冒险的关系。他在尝试进入现实的方式的同时，不断地质疑自身与现实之间一触即发的同化关系。塔夫里在1986年接受里查德·英格斯尔（Richard Ingersoll）的访谈时阐述了历史学家和现实之间的这一距离：“距离是历史的必须；研究当前作品的历史学家必须创建人为的距离。……我们同自

身时代保持距离的方式——也即我们的观点——将与过去不同。”[7](P.97) 塔夫里没有在导言的前14段中阐明历史学家的位置、身份何在。但是他用曲折的方式表明了历史学家在进行任何具体的历史研究工作之前所需思考的问题：学科现状、写作主体、历史认识的根本变革。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塔夫里将历史学家的主体和现实在知性和行动两个层面上联系起来。

显而易见，塔夫里对历史学家身份的反复追问不是一种自我解构，而是一种不断变换进入现实，改变现实的有效途径。身份位置的闪烁不定不是一种虚无主义者的表现，而是策略的表现。因为，“历史研究有其直接影响行动的方式。”[7](p.97) 奥克曼所认为的“冒着认识论矛盾的危险”，[6](p.1880) 对塔夫里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并不能简单的将其归为“极端唯心主义”的悲剧和失败命运，而应看作行动的有效性条件，“对我来说，正是事物之间的冲突才是重要的，建设性的（productive）”。[7](p.97) 遗憾的是，奥克曼没有看到这一切。

在这三个地方，奥克曼对塔夫里的历史认识论的批评都有失偏颇。我们也看到，不只奥克曼，评论家们对塔夫里的看法大抵相类与此。无论是写作、知识，还是历史学家的主体，这些认识论问题都没有得到深入的展开，或者说，没有在认识论层面展开。它们总是被匆匆地引向方法，引向姿态，然后得到一个结论，而不是引向更多的基础性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写作、知识、主体，以及我们没谈到的批评、现实、意义在塔夫里的认识论中都导向同一焦点——语言。对语言的漠视使关于塔夫里历史认识论问题的所有讨论以无效告终。

海伦的《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一节，对《历史“计划”》中的两个重要问题作出强调：本雅明和语言问题；卡西亚里和计划问题。

海伦将塔夫里的历史认识论的背景设定在本雅明，这无疑是有道理的。因为本雅明的犹太教神学和马克思联姻的弥赛亚历史唯物主义的动态性对塔夫里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通过以一种历史的形式来假定‘胜者历史’（history of the victors）的替代物，从而解决了这一问题。但这种历史的形式并不把历史事实看作是一系列有因果关联的瞬间（moments），却将其看作是一群单子（monads），整个历史现实伴随着实质上（virtual）的剧变可能和隐藏不现的内在联系，每时每刻都以一种不同的形式，不断结晶成形（crystallizes）。历史学家也通过用这种方式定义历史，站到了支持败者（loser）的立场上，从而加大了各历史时刻所出现的脆弱的救世主

力量（messianic power）占取上风的机会。”[8](p.146)单子、结晶、脆弱的救世主，这些标准的本雅明式的历史概念，以一种并不显眼的方式进入到塔夫里的历史认识论中。它们帮助塔夫里调节了马克思的真理概念和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因为本雅明的概念本身就是用来调节马克思的真理观和犹太神秘主义观之间的矛盾。）

当然，塔夫里从本雅明处的借鉴更重要的体现在语言上。“塔夫里没有过多采用本雅明的论述，但他在1980年的《历史“计划”》一文中，逐步提出了与之相似的一连串论点。他指出，建筑和批评不得不涉及的多元语言（plurality of language）——设计语言、技术语言和历史语言，不能用一般的解释学来叙述。它们基本上仍然疏远，在本质上不可转译，它们的多元性（plurality）是不可简化的。这意味着建筑批评不可能直接和建筑实践联系在一起。这两套规则（disciplines）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中运行，它们的目的并不相同。这种反牧歌式的（counterpastoral）看法防止了一种真正的计划性的态度（a truly programmatic attitude），因为它的逻辑排除了编造未来的可能性。”[8](p.146)①

语言问题也随本雅明而成为塔夫里的历史认识论的一部分，这是本雅明的一大功绩。但是本雅明的神学倾向不能为塔夫里所接受。如何弥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缺憾，本雅明用的是神学语言观②，塔夫里则用的是弗洛伊德和尼采的语言观。这一重要差异使得塔夫里的历史认识论不能完全建立在本雅明的基础上——本雅明只是一个局部的参照，或者是某种姿态的象征（“失败的历史学家”和“脆弱的救世主”的混合体）。

海伦所谈到的第二个重要问题，就是卡西亚里和计划问题。海伦认为，“塔夫里称历史为计划（project），因为历史也和设计（design）有关：历史连续不断地参与着对过去的再设计；连续不断地从事着重构理论框架的工作，以使历史事件能够被理解。”这固然有道理，但是“计划”并不仅仅是向后的设计，它更多的是向前的设计，是对当下的设计。它不仅仅是为了一种理解，而是为了一种怀疑。所以，海伦把“计划”看作是塔夫里和卡西亚里两人的一个共同之处，“我们可以设想，正是设计活动为这

---

① 海伦引用本雅明的《历史哲学文集》中的这段话来说明塔夫里在《历史“计划”》中的历史认识论和其直接的关联是有道理的。

② 本雅明的历史观本质是悲观的，这与历史唯物论相矛盾。

两位作者提供了一种自由度，而这是在考虑（calculating）大都市典型具有的一维思想中所没有的。”[8](p.147)这显然将“计划”的重要性降低。并且，海伦对“计划”的总结是，“计划”只是知识分子的“不存幻想”的“劳作”，虽非乌托邦式，但也满怀悲壮，“对塔夫里和卡西亚里来说，‘计划’（project）这一术语都不是指导致哈贝马斯论及‘现代性计划’（the project of modernity）的、具有乌托邦和计划式（programmatic）的直接解放的含义。因为他们太明白，现代制度所管理的社会，并不轻易地回应个人的行为和分析。”[8](p.147)实际上，塔夫里的“计划”没有这么悲观，相反，它是一种极其积极的行为。还有什么比破坏资本主义社会的表证（从最宏观的制度到最微观的个体行为）更让人有快感的呢？当然，快感是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研究的现在动力，这成为塔夫里的一个秘密。在《历史“计划”》的一些段落中（比如第58段），塔夫里对此略微有所表露。

总的来说，即使在西语世界，无论对《球与迷宫》全书，还是对《历史“计划”》一文的研究都相当薄弱。这种状况对于这样一本重要著作来说，是极不正常的。当下的塔夫里研究有一种本雅明化的趋向，比如2002年的萨拉·艾肯（Esra Ackan）的《曼弗雷多·塔夫里的建筑先锋派理论》和2005年的安德鲁·里奇的《塔夫里和历史再现的时代》[这是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发表在《建筑理论评论》（*Architectural Theory Review*）（2005年第1期）的本雅明与建筑理论的专集的第一篇]，都以本雅明和塔夫里的关系为出发点。这既是好现象（因为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但也是个不好的征兆——本雅明在英语世界的全面发热波及塔夫里（对塔夫里的本雅明思想寻踪成为一件赶时髦的事）。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回到塔夫里的原始文本，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与阐释，这才是研究塔夫里的不二之路。

四、其他

《球与迷宫》在八年中逐渐完型。这是一个塔夫里的现代建筑史研究不断发生变化的时期。这个阶段中，《建筑与乌托邦》、《现代建筑》接连出版，一些单篇的研究论文也不断出现。如果包括在此之前的《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和之后的《1944—1985年意大利建筑史》的话，可以说，塔夫里用他的5本著作为现代建筑史研究构成一个跨度为20年的漫长系列。那么，《球与迷宫》以何种方式存在于这一系列呢？它与这些迥乎不同的

著作之间具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在此，我们将简略梳理从1968年至1986年出版的四本著作——《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建筑与乌托邦》、《现代建筑》、《1944—1985年意大利建筑史》。对于这四本书，我将分别概述其主要内容。希望这些概述能够铺陈开一个足够大的空间，以便《球与迷宫》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一）**《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Teorie e storia dell'architettura*，1968年）。这是塔夫里的标志性作品，写于1966—1967年，出版于1968年。这是他对陈腐的欧洲建筑学界发动冲击的第一波。它出现在塔夫里担任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的建筑史教授的同年，也出现在当代欧洲最为激烈的政治文化革命（1968年学生运动）的同年，颇有象征意味。评论界对这本书的反响相当激烈。20年间再版8次。[①] 通过这本书，塔夫里开始了威尼斯建筑学院的教学生涯，也开始了建筑理论家的学者生涯。

这本书所身处的两层语境是它的来源。第一，意大利战后混乱的政治语境和建筑语境。第二，激烈动荡的60年代整体的欧洲知识语境。二战后，意大利建筑的伦理维度复杂多样：反法西斯传统、民主理想，以及对一个他种社会的需要。卢多维科·夸罗尼（Ludovico Quaroni）、圭多·加德拉（Guido Gardella）、马里奥·里多尔菲（Mario Ridolfi）、罗杰斯、吉瑟普·萨蒙纳（Giuseppe Samonà）、德·卡洛（De Carlo）、皮埃罗·波托尼（Piero Bottoni）、弗朗克·阿尔比尼（Franco Albini）、布鲁诺·赛维（Bruno Zevi）成为新时代的建筑文化的主角。他们所采取的文化态度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大体上都是创造一个新文明的场所和空间，用一种存在于大城市之间的新的功能和空间上的联系，来表现不同于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的社会所具有的新的社会关系的可能性。

战后数年中多个团体在这些新文化代表的催动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建筑师们通过宣言和声明，直接参与进负责重建工作的政治和行政机构。这些团体一出现便卷入和旧有的学院势力的斗争之中。1954—1964年间，罗杰斯所领导的新 *Casabella* 杂志成为新派建筑知识分子的集中地。1964—1965年，该团体主要成员吉瑟普·萨蒙纳在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组织一系列讲座。讲座的中心课题是：建筑理论与设计。讲座人为 *Casabella* 团体的

---

① 该书1973年出版西班牙语版，1976年出版法语版，英文译本在1979年首次出版，同原始的意大利语版相比，整整滞后11年。

成员，如圭多·加德拉、科帕（Coppa）、格雷高蒂、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萨蒙纳、鲁西阿诺·西默兰尼（Luciano Semerani）和年轻的塔夫里（不满30岁）。

一直到60年代初期，意大利的学术研究都为传统的学院派所把持。清一色的老式文献学和克罗齐式诠释，虽然也有些较为出色的人物，比如乔凡诺尼（Giovannoni）、巴诺尼（Baroni）和佩尼（Pane），但普遍气氛沉滞。赛维、阿尔甘（Giulio Carlo Argan）、夸罗尼、罗杰斯为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带来新气象——有机建筑思想（赛维）、现象学和艺术史研究法（阿尔甘）、马克思主义+现象学+人文主义（罗杰斯）。新 *Casabella* 团体以此为基础，对建筑历史与理论的方法论进行全面重建。他们引入大量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文学批评、人类学、精神分析的思想（既有新的，也有旧的），目光遍及全欧洲。年轻的塔夫里利用这一机会表现出了其卓越的学术能力。萨蒙纳发现其价值，“第一个赞赏其能力”，将他从巴勒莫召至威尼斯担任建筑史教授职务。随即，塔夫里出版了《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

这是塔夫里的第一本历史方法论著作，虽然冠以“批评”之名。它也是当代西方建筑史学理论中屈指可数的方法论专著。正如塔夫里在书中导言的最后一句中所写的那样，“我们相信，历史方法论应当结合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历史本身的使命密切联系在一起，为那些拒绝从日常观念或是神话中吸取灵感的人们——无论它们是相似的还是对立的——净化感情，他们不愿湮没在‘历史理性’中。”[9](p.17)本书与论文所分析的《球与迷宫》的导言《历史“计划”》具有一种内在联系。因为，《历史“计划”》是塔夫里关于现代建筑史的方法论基础研究的最后综述，而《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可称为塔夫里关于现代建筑史的方法论基础研究的最初阶段小结。两者之间跨度刚好10年（一个是1968年问世，一个是1977年问世①）。我们将两个导言相比较会发现，虽然差异巨大（《历史“计划”》所涉及的问题要全面和深入许多），但是也不乏相同之处（而不是相似）。

---

① 《历史“计划”》（Il “progetto” storico）最初发表于意大利的《卡萨贝拉》（*Casabella*）杂志，1977年11月，第429期，第11—18页。随后，法文译本发表于法国的《新批评》（*La nouvelle critique*）杂志，1977年4月，第103期。英文译本在1979年夏发表于美国的《反对》（*Oppositions*）杂志，第7期。

比如，在《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中的评论家应该“沉浸其中和超然物外”，“批评也不得不继续革自己的命以寻求适当的判断标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同时显示了危险性”，“危机”的主题[9](pp.12-16)——这些在《历史“计划”》中都找得到。[3](p.9ff)而且，该书的最后一段的第一句话“历史中并不存在‘答案’”[9](p.198)，亦是《历史“计划”》的一个重要命题（完全相同的表达）。[3](p.13)

简略地说，塔夫里在该书中论述了，批评在面对“现代运动”的历史巨变之时，应该如何看待自身的问题。虽然针对的是“现代运动”，但是塔夫里的对象仍将文艺复兴囊括进来，因为这是历史先锋派运动的起点。批评的过去、批评的现状、批评的未来、批评的使命、批评的手段、批评的领域、批评的对象、批评的类型、批评的失败、批评的成功，这些命题连在一起，组成书的主要内容。我们只需将“批评”换做“历史”①，就可以看到塔夫里在书的引言的最后一句关于历史方法论的阐述的目的。

书中提出的最为著名的两个概念是“操作式批评”（operative criticism）和“客体的危机”（crisis of the object）。就塔夫里同时代的人来说，进行建筑写作的大多数都是执业建筑师，塔夫里谴责他们的写作是“操作式批评”（“例如，作为执业者和设计理论家，通过日程来处理过去和现在的方法”[1](p.165)）。赛维和波托盖希（Portoghesi）都是塔夫里批评的对象。[10](p.147)70年代后期之后（在《球与迷宫》和1975年之后的几个访谈中），塔夫里将“操作式”更名为“操作式的——标准化的”（operative-normative）。如果说早期的“操作式批评”还有点时代意义的话，那么，在后期的塔夫里看来，它就是一个纯粹负面的东西。“客体的危机”来自瓦尔特·本雅明的“灵韵的消失”（the loss of *aura*）。它不仅表明塔夫里对现代艺术（建筑）的某一基本性质的看法——塔夫里对20世纪的先锋派的研究中反复阐发这一观点，在其80年代中期之后专注于文艺复兴研究之时，依然在桑索维诺（Jacopo Sansovino）或弗朗切斯科·德·乔尔乔（Francesco di Giorgio）的作品中发掘这一主题。这一主题还标志着塔夫里一生对于本雅明思想的追随。这几乎成为当代塔夫里研究者的一个不变的切入点。

---

① 批评即历史，也是《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和《历史“计划”》共同的命题。

塔夫里在这本书中，表现出极度全面的知识背景，涉及德国20世纪初期的社会学，如韦伯（Max Weber）、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藤尼斯（Tōnnies）；法国现代思想，如福柯、巴特（Roland Barthes）、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 - Strauss）；艺术史，如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里格尔（Alois Riegl）、沃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德沃夏克（Max Dvorùk）、温克尔曼（Johana Joachim Winckelmann）、瓦萨里（Giorgio Vasari）；文学批评，如勒内·韦勒克（René Wellek）、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杜勃罗夫斯基（S. Doubrovsky）；哲学家/美学家，如黑格尔（Hegel）、卡西尔（Ernst Cassirer）；本土思想家，如艾柯（Umberto Eco）、赛维、阿尔甘、夸罗尼；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如德拉 - 沃尔佩（Della - Volpe）、卢卡奇（Georg Lukács）、本雅明、布莱希特（Betolt Brecht）等。这一极度复杂的混合在《历史“计划”》一文中得到了再现。

（二）**《建筑与乌托邦》**（*Progetto e utopia*；*Architettura e sviluppo capitalistico*，1973年）。这是塔夫里主持威尼斯建筑学院建筑史研究室之后的第一本著作。它也是塔夫里的第一本被翻译为英文的著作（大概是篇幅较小的原因）。[①] 这本书为塔夫里带来广泛的国际声誉[②]。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对建筑学领域的兴趣显然产生于此书。他对此书的评论《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Architecture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也是来自学科之外的最重要的回应。

这本书是塔夫里一篇长文《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Per una critica dell'ideologia architettonica）[③] 的扩展版。《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于1969年发表在 *Contropiano* 杂志上。在1969年到1971年间，塔夫里为该杂志共创作了四篇文章，它是其中之一。我们应该注意到，塔夫里和 *Cont-*

---

① Manfredo Tafuri，*Progetto e utopia*；*Architettura e sviluppo capitalistico*，巴里：Laterza出版社，1973年。1976年MIT出版社出版英文版，1977年VSA出版德文版，1979年Dunod出版法文版。

② 这本书的英文本销量在塔夫里所有著作中首屈一指。1976年英文版出现以来，到90年代中期已卖出21000本，而《球与迷宫》在5年间也有5500本销量。

③ 英文版本的Toward a Critique of Architectural Ideology被收录于由米歇尔·海斯（K. Michael Hays）编辑的 *Architecture Theory since 1968*（Cambridge：MIT Press，1998）一书。

ropiano 杂志4年的合作，正好处于创作《球与迷宫》的前夜。合作到1971年结束，而《球与迷宫》从1972年开始启动。

Contropiano 杂志在四年的生存时期中一直坚持着两条基本的研究路线：一方面是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分析，既包括历史理论层面，也包括当前战斗层面（这一层面也被称为“工人的科学”）；另一方面是关于大众资本主义社会中观念的上层建筑和文化的上层建筑的分析（用马克思的术语，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批判”）。塔夫里这一阶段的研究和这两个层面正相吻合。

明显可见，塔夫里这一阶段的研究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色彩。这和《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有着相当的差别。原因在于，塔夫里进入威尼斯建筑学院之后，在整体气氛的影响下，开始对本雅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进行全面研究（零星的研究在60年代初就开始）。并且，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里奥·托隆蒂（Mario Tronti）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成为此时建筑学院知识分子们的新理论参照系。塔夫里开始整体反思其《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当中的观念结构，随之展开了以团体+个人方式来进行的，针对建筑的现代性所做的意识形态批判工程。

按照阿尔贝托·罗萨的看法，塔夫里这一阶段的研究开始于这样一个出发点。“他确信，现代建筑从启蒙运动到现在，与之相伴的是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生产。这和当时对不同领域的人文主义知识的一些看法是一样的。并且，通过这种方式，专家式的知识分子打算——或多或少是有意识的——填满一个鸿沟。一边是把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法则之上的学科戒律**富有成效的**(*effective*) 功能化；另一边是对自律和创造力所抱有的**永恒幻想**(*illusion*)。某些时候，这一幻想也是‘有选择性的’（alternativistic)。”[4](p.31) 罗萨认为，塔夫里的立场面向两条战线：第一，反对建筑思考将自身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并因而变成资本主义的世俗武器；第二，反对建筑思考源自城市无产阶级组织的某些方面（尤其是战争期间的欧洲中部），并详细阐述一种“替代性的意识形态”，这也完全服从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方针，这第二种变体形式，不可避免地要被误导，并因此被错误地管理。

塔夫里此时的“意识形态批判”内涵与 *Contropiano* 杂志的主张相一致。它“试图全方位地对所有知性的、政治的示威运动（和工人运动传统相关的）进行去神秘化。这一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并且通过各种方法，来试图与资本主义社会领域确定一个相结合的层面。”[4](p.31) 对塔夫里而言，

这一意图从头到尾带着一种彻底不妥协的态度。在文章的结尾，塔夫里尖锐地指出，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必须超越建筑问题，走向明确的政治维度。“由于这个原因，提出建筑的‘反空间’（counterspaces）概念是没啥用的：在控制设计之神秘特征的那些结构中寻找另一种选择，这无疑是个矛盾。对建筑的反思，成为一种对具体的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批判。这一意识形态由建筑自身所‘实现’。反思建筑，必须超越‘寻找另一种选择’之类的活动，而走向一种特定的政治维度。其目的之一，就是系统地摧毁那些维持建筑发展的神话。只有未来的阶级斗争状况才能告诉我们，我们设法实现的未来，是先锋派的任务，还是后卫派（the rearguarde）的任务。”[4](p.33)在《建筑与乌托邦》的最后，塔夫里重申了这一观点，“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相平行的系统的意识形态批判，只不过是此类政治行为的一个篇章。事实上，今日意识形态批判的首要任务就是破除掉虚弱无力的神话。这些神话一直维护着某种幻想——‘希望寄托于设计之中’（hopes in design），这样的时代错误的观点还有存在的余地。”[11](p.182)

“意识形态批判”是塔夫里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的主题。此时的塔夫里还不是现在大多数评论家所称之为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意识形态批判还未能和他所密切关注的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完全融合，马克思的历史科学还未和福柯的权力谱系学相融合（福柯的相关著作和文章到70年代中后期才出现，威尼斯建筑学院关于福柯的研讨会在1977年之后才开始，与此同时的还有对其他历史研究方法的讨论，比如卡罗·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的“微观史学”）。此时的塔夫里还是依据相当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加上本雅明和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现代建筑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在为资本主义的运转做掩护，60年代后期的建筑危机的原因在于现代理论在处理经济现实上的失败。

塔夫里从《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建筑与乌托邦》开始走向马克思之路。到《球与迷宫》，塔夫里的观念格式塔中马克思的位置发生了变化。马克思和尼采、弗洛伊德三人一同构成塔夫里的新的三角基础——“我们伟大的19世纪的思想：尼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7](p.99)在这一基础上，其他的思想（法国人的、德国人的、意大利人的、英国人的）进行了富有层次感的结合。这是《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时期和《建筑与乌托邦》时期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三）**《现代建筑》**（*Architettura Contemporanea*，1976年）[①]。这是塔夫里从1973年至1975年在威尼斯的第二阶段工作的成果（实际上，它从1971年就已着手准备）。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一系列规模庞大的集体研究计划开始启动，比如一项包含所有魏玛时期德国城市的集体研究。1976年出版的《现代建筑》是学院这一时期集体研究的总结，由塔夫里和弗朗切斯科·达尔科（Francesco Dal Co）合作完成。1976年也是建筑史研究室的改组之时。《现代建筑》的成功，为新的组织方式（塔夫里领导新的建筑批评和历史分析系）所进行的更广范围和更细致的分工协作，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另外，它对于在诠释和文献资料的积累之间获得平衡的新的史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也建立了经验。1976年后，塔夫里团体的研究全面铺开：多纳特拉·卡拉比（Danatella Calabi）、保罗·莫拉基艾罗（Paolo Morachiello）、艾尼尔·贡屈纳（Ennio Concina）和安东尼奥·弗斯卡利（Antonio Foscari）等人专攻文艺复兴；乔治·特索（Georges Teyssot）专注于19世纪的欧洲建筑；乔尔乔·丘奇（Giorgio Ciucci）和马西莫·斯克拉里（Massimo Scolari）研究设计与再现主题；马可·德·米凯利斯（Marco De Michelis）继续研究魏玛共和国；弗兰西斯科·达尔科研究世纪初遭遗忘的现代性观念痕迹。

《现代建筑》共有21章。两位作者基本各写一半。二战之前的部分，塔夫里集中于“现代运动”（也即先锋派的活动），达尔科则负责19世纪至二战前的美国城市化问题和欧洲的非先锋派的建筑实践（古典主义和民族主义）。二战后到70年代部分，除了二战后的城市管理和建筑政策一章和70年代的前半章（意大利和美国部分），其余都由塔夫里完成。简略地说，塔夫里写作了现代建筑的先锋派与乌托邦思想两部分，达尔科写作了与之平行的现代建筑发展的另一根线。《现代建筑》表现出了多线历史的研究策略，所以方法论的选择上也有相当的灵活性，“因为各种历史事件都有许多不同的起因”。方法论根据不同的对象而调整，这和《历史“计划”》中的观点是同一的。在本书中，塔夫里和达尔科的哲学思想背景的差异，也是方法论多元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是马克思+《年鉴》（*Annales*）；一个是海德格尔+马克思。

---

① 1976年出版意大利文初始版，1977年出版德文版（塔夫里的著作极少有德文版），1978年出版西班牙文版，1979年出版英文版，1982年出版法文版。

《现代建筑》的写作从1971年开始，至1976年结束。《球与迷宫》的写作也从1972年开始，到1980年结束。其中有4篇文章和《现代建筑》的写作时期相迭合：1971年的《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社会民主和城市》（*Socialdemocrazia e città nella Pepubblica di Weimar*），1972年的《苏联—柏林，1922年：从民粹主义到"构成主义国际组织"》（*Ussr - Berlin, 1922; du populisme à l'internationale constructiviste*），1974年的《卧室中的建筑》（*L'Architecture dans le Boudoir*），1975年的《作为"虚拟城市"的舞台：从伏尔泰小酒馆到总体戏剧》（*Il teatro come città virtuale: Dal Cabaret Voltaire al Totaltheater*）①。《现代建筑》中的第6、8、11、12、21章的内容（这几章全由塔夫里负责）和这四篇文章的内容十分接近。虽然写作方式和写作目的大相径庭，但是所用的材料却非常一致。当然，有些结论也未免重叠，比如关于苏俄先锋派和70年代的建筑实践［斯特林（Stirling）和"纽约五"（New York Five）等人］的研究。

不仅主体内容相近，《历史"计划"》中的许多纲领性观点也在《现代建筑》中出现，甚至也是这本著作的总论式的观点。比如，"具体劳动"向"抽象劳动"转化的问题；"建筑语言和超语言学领域之间应建立怎样的合理关系"[12](p.5)的问题。《历史"计划"》中所参引的大量案例，在《现代建筑》中都能够找到相应的阐述。比如美尔尼科夫（Melnikov）和斯特林、罗斯福新政等等。

（四）《1944—1985年意大利建筑史》（*Storia dell'architettura italiana*, 1944—1985，1986年）②。这部著作可算是塔夫里最后一次关于现代建筑的研究成果。塔夫里的这一著作回到个体研究的轨道。在此之后，塔夫里极少涉及当代建筑领域（虽然也未完全停止相关的写作，但都是在非正式的状态下进行的，其成果也是以讲课笔记、未发表的讲座等非正式的形式出现），其后的著作和正式发表的文章基本以文艺复兴为对象。

我们可以将之看作塔夫里研究中的一个转向——从现代建筑转向文艺复兴，从团体研究转向个体研究，从批评家+史学家转向经典的史学家，从全球建筑文化转向意大利半岛的100年文化——的过渡。《1944—1985年意大利建筑史》既是塔夫里对过去的回顾——身为现代建筑学的理论发言人，怎

① 这些文章在纳入《球与迷宫》时，标题有所改动。

② 1986年出版意大利原始版，1989年出版英文版。

能不为自己国家的现代建筑史作一本专著？它也是未来事业的出发点——要研究古代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怎能不先做好当代的意大利？由此可见，这本书的过渡作用是无法替代的，同时，它的责任也是无法回避的。通常最好的著作就产生在这种必然的境遇之中。由于此书的非凡质量，批评家不愿接受“过渡文本”（a transitional text）这种看似贬义的称呼。[5](p.81)

该书是塔夫里的《1944—1981年意大利建筑》一文的扩展。这篇文章是塔夫里为Einaudi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意大利艺术史》的第二部分第三卷“20世纪”所馔写的。塔夫里的前期学术著作以意大利为始（《鲁多维哥·夸罗尼和意大利现代建筑发展》），以意大利为终（本书）。相同类型的还有两篇文章：大学论文《根据现有问题看现代建筑史》（*La storia dell'architettura moderna alla luce dei problemi attuali*）第7章《战后意大利建筑》（罗马大学建筑系，1964—1965年度课程讲义），文章《“让人忧虑的缪斯”或统治者形成的命运》（*Les "Muses inquiétantes" ou le destin d'une generation de maîtres*）（1975年发表于《今日建筑》第181期）。这四篇文章代表着战后意大利建筑评论所达到的高度。《1944—1985年意大利建筑史》是最高峰。

在《卢多维科·夸罗尼和意大利现代建筑发展》中，塔夫里的研究围绕着以下观点展开，“人们无法从通史中概括出战后意大利建筑的历史”。塔夫里将建筑史看作一种“策略”。它对建筑经验有所限制，并且直接和“抵抗社会所面临的唯心主义文化危机”的国家史联系起来。在《根据现有问题看现代建筑史》中，塔夫里开始涉及意识形态的讨论，并且对理性主义遗产进行了修正。塔夫里认为，“精英分子出现危机”[5](p81)这一范式，已不能再用以解读当下情形。在《1944—1985年意大利建筑史》中，塔夫里对史学话语的内在规则做了新定义。这一定义源于他对“计划”的含义的思考。我们也发现，这也是对《历史“计划”》的主题的延伸。这一“计划”，允许多种方法、多种历史同时存在，也允许历史自身进行不断的校正，而不把史学重写为“多元范式”的简单汇编。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本书是《历史“计划”》的方法演习。

卡洛·欧默认为，《1944—1985年意大利建筑史》体现出塔夫里所建构的三种“临时体”（temporal entity）。第一种“临时体”是关于建筑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写作。关于建筑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描述通常集中在历史先锋派与政治的关系上。这种关系排除了经济和市场。在塔夫里看来，政治依

然是“计划”的唯一对应物，但其实质却几乎无法精确界定。第二种“临时体”是他种知识领域的交叉和建筑精英的合法化。通过这些精英，塔夫里试图界定法则和符号限制，并试图确认团体（组织、机构、学校）和工具（杂志、书）的意义。对这种精英的社会形式的关注，标志着该书与塔夫里其他关于意大利当代建筑史研究的巨大差异。后者只满足于在“政治的”视角下来看待事件。第三种“临时体”是专题性的。有三个主要专题：关于卡罗·斯卡帕（Carlo Scarpa）和吉瑟普·萨蒙纳两位“大师”，关于罗西的“案例”。三个专题的研究目标各不相同。关于卡罗·斯卡帕，研究的是艺术家的生平；关于萨蒙纳，研究的是建筑师的身份与由文化、机构所确定的人的身份的区分；关于罗西，研究的是其广泛的批判命运的诱因。

在《1944—1985 年意大利建筑史》中，叙述没有沿着一个单一的主题线索：关于特殊时期的章节还伴随着诸多传记片断和对案例所作的分析。在多种质询技术下，（现代性的）改革逐渐丧失了它的偶然性和它伪装出的绝对性。就这本书来说，人们无法谈及意识形态批判和工程修复，甚至尼采、海德格尔，以及之后的弗朗哥·雷拉（Franco Rella）和卡西亚里的思想都失去效用。塔夫里的这一“历史计划”产生于反思，却激进到“悲剧性”的地步。在消除了任何确定性的企图之后，塔夫里没有为我们作出任何一种相对论式的暗示，只留下危机。危机，这也是塔夫里在《球与迷宫》中所阐明的现代性的基本特征。

这是和《球与迷宫》在时间上最临近的一本书。欧默认为，《球与迷宫》或许是塔夫里“最难懂、最难以理解的书”。[5](p.75)但是《1944—1985 年的意大利建筑史》在继续了《球与迷宫》的若干重要理论观点的同时，也改变了其晦涩繁冗的文风，采取了较为清晰透明的写作方式。并且，在具体的历史书写中，塔夫里拓展了《球与迷宫》的方法论领域（比如，将“证伪”理论引入到对于罗西这样的艺术家的研究当中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1944—1985 年的意大利建筑史》和《球与迷宫》都有着最为密切的亲缘性。

我们在此简略概述了塔夫里在现代建筑史研究阶段（70 年代左右）的几个重要成果。这几个成果不是简单的重复，也无根本的断裂。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生产性的，交织、衍生、变形、分叉、合并、重叠。但是每一成果又极为独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任何一本书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文本来看。它对建筑学的价值正是因为每一本书都有一个明确且坚定的立场

（政治立场、哲学立场）。不能因为立场的转变（实际上没有停止变化），就舍此取彼。简单地说，它们都很重要，都需要我们进行彻底研究。

参考文献：

[1] James S. Ackerman, "The lesson of Manfredo Tafuri" [J], *Casabella*, 1995 (619-620)

[2] Joan Ockman, "Venice and New York" [J], *Casabella*, 1995 (619-620)

[3] Manfredo Tafuri, The Sphere and the Labyrinth; Avant-Gardes and Architecture from Piranesi to the 1970s [M], trans., Pellegrino D'Acierno and Robert Connolly, Cambridge: MIT Press, 1987

[4] Alberto Asor Rosa, "Critique of ideology and historical practice" [J], *Casabella*, 1995 (619-620)

[5] Carlo Olmo, "One history, many stories" [J], *Casabella*, 1995 (619-620)

[6] Joan Ockman, "Postscript; Critical History and the Labors of Sisphus" [J], in Joan Ockman, ed., *Architecture*, *Criticism*, *Ideology*

[7] Richard Ingersoll interviews Manfredo Tafuri, "There is no criticism, only history" [J], *Casabella*, 1995 (619-620)

[8] Hilde Heynen, Architecture and Modernity [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9

[9] 塔夫里，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 [M]，郑时龄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

[10] Pietro Corsi interviews Manfredo Tafuri, "For a historical history" [J], *Casabella*, 1995 (619-620)

[11] Manfredo Tafuri, Architecture and Utopia [M], Cambridge: MIT Press, 1987

[12] 塔夫里、达尔科，现代建筑 [M]，刘先觉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建筑学院）

建筑史的极限

胡　恒

在关于塔夫里的《球与迷宫》的一篇论文中，我曾经幼稚地认为，将书中的导言《历史“计划”》中的每一个命题整理出来、排列好，论文就可以宣告完成。就像巴特认为他的关于米什莱的博士论文，“只要列出米什莱的各种主题，就可以写出一本深刻的、创新的著作。”[1](p.74)很快，我发现这条路行不通，或者说，这最多只算是一个准备阶段。在艰苦的罗列《历史“计划”》各项命题的过程中，我感觉对塔夫里的研究离不开一个基本主旨——关于塔夫里的价值的认定。这实际上正是我一直以来力图回避的主旨。讲讲塔夫里多么重要，多么深刻，多么伟大，这有什么意义呢？无数本书（谈到塔夫里的书）都讲过相类的话。现在，我发现，这个问题还是应该成为一个主旨。并且，它或许还需要一个界外的参照，一个导引线。

我对塔夫里价值的强烈感受，产生于一篇关于雅克·拉康的访谈《不可能有精神分析学的危机》。这是拉康在1974年接受意大利《全景》（*Panorama*）杂志的一个访谈。拉康在访谈中驳斥了“精神分析学的危机”的论调。他认为，“这全部是捏造。首先，危机不存在，不可能存在。精神分析学还没有完全到达其自身的界限。在实践与认知中，仍然有这么多的东西有待发现……”[2](p.64)“危机”让我立即想到塔夫里。在《历史“计划”》中，“危机”是核心命题。塔夫里认为，历史就是“关于危机的计划”。历史，就是将主体，将写作，将全部的现实世界都推向危机。一个认为学科并没消亡，“危机”不存在；另一个则认为学科要生存下来，就必须制造危机，这两者不是正相逆反吗？

我认为，这就是理解拉康的论点和塔夫里的价值之间关系的要点。拉康认为精神分析学没有危机，这只是拉康自身的感受。实际情况是精神分析学的危机一直存在（在随后的一段中，拉康就开始大谈精神分析学的糟糕状况），但是由于拉康的存在，这一危机被缓解。他的创造性工作使危机重重的学科焕发生机。对于塔夫里来说，情况也是一样，建筑学的危机因为塔夫里的存在而被化解（尽管是暂时性的和局部性的缓解）。表面上，塔夫里的态度和拉康正相反，他高举危机的大旗，而不是对危机矢口否认。

但是，我们能够认为塔夫里和拉康为自身的学科所作的贡献是一样的吗？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一样的。这就是拉康所说的，“精神分析学（学科）还没有完全到达其自身的界限”。拉康将精神分析学带到了自己的边界——应该说达到了一个极限。这是学科的新界限，是弗洛伊德未曾划出过的。塔夫里同样将现代建筑学带到了新的界限。这一新的界限不是建筑学所覆盖的面积的盲目扩大而造成的。塔夫里并没有一味将经典建筑学学科界限之外的知识填充进来，将这些非建筑学知识转化为建筑知识。也没有强化建筑学自身的功能，使之超越学科界限，进行对其他学科领域的强行干预，更没有聪明得在不同学科之间寻找中间地带（所谓的学科间性），以证明建筑学自身模糊的生存权，最终暗示出具体、激进走向的不可能性。塔夫里所做的是，暂时抛开学科的规则，也就是现存的学科语法（概念体系、方法分类、教育格式）这些仪式般的自我呈现形式。他回到了一个原点，这就是拉康所说的实践和认知。“在实践与认知中，仍然有这么多的东西有待发现……”所以塔夫里在《球与迷宫》之后，开始逐渐摆脱掉“建筑史学家”、“建筑理论家”之类的称呼，而认为自己只是个“分析者”。一个不断地在实践中改变自身的“分析者”。分析的对象没有任何变化，仍然是建筑——建筑物、方案、建筑师、建筑活动。改变的是主体（分析者）的位置。他不再是一个既定学科内的规则的实践者，而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实践者。他自己划定分析范畴、分析方法、分析目标。并且在反复推翻自身的分析的内在情感原质（也就是分析的基础和基本动力）的过程中，使自身的分析活动达到一个极限。这是《历史“计划”》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同样，这一极限也蕴涵在每一个分析对象之中。因为，每一个分析对象中，都凝结着不同的经验。有多少个分析对象，就有多少种分析方法，就存在着多少条潜在的界限。

在此前提下，无论是拉康还是塔夫里，他们对其他知识领域的介入才

有了与众不同的意义。这些知识领域，一方面，为他们提供了不同的现实世界的构成模式，另一方面，也为研究主体进行自我质疑提供了有效武器。这些领域中的思想，有很多尚处于萌芽状态就被取用，它们帮助了主体重建研究平台，并且避免使这一新的平台迅速平庸化（这是很容易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塔夫里和拉康为自身的学科所作的贡献又不一样。一个是只有不足百年历史的新兴学科（如果从1900年《释梦》出版来算的话，只有70年生命），另一个则是延续300余年的古老学科（如果算上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的话，那就有千年的寿命）。它们所面临的"危机"有着不同的内涵。对于精神分析学来说，我们可以认为，正如拉康所说的，危机的表征是，"把弗洛伊德的教导简化为某种平庸格式的精神分析学：仪式般的分析技术、限制在行为治疗中的实践和作为方法的个体与其社会环境的再适应。这是对弗洛伊德的否定。这是一种舒适的、沙龙式的精神分析学。"[2](p.64)如果扩展这一话题的话，那么，危机更在于精神分析的"美国化"，被资本主义转化为一种"人体工程学"，一种缓和阶级矛盾的精神药剂，一种医学化的意识形态。所以，拉康的挽救策略是"回到弗洛伊德"。拉康用自己为精神分析学建立了一个"结构周期"，这显然可以很有效地免除了从一个端点开始下滑的学科悲剧。拉康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改变弗洛伊德的论题方法，用数学上的拓扑学再加补充，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来改造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规律的描述。他的弗洛伊德已离开原本的弗洛伊德很远。所以，"回到弗洛伊德"的结果是使拉康成了学科的真正创立者。

塔夫里对自身学科的作用没有拉康那样明确。古老的建筑学的体制的危机不在于它的精英身份的平庸化和世俗化，而在于它的命运和资本主义的命运紧密相连。也就是说，它的危机是因为，它在资本主义制度受到剧烈冲击的时候（19世纪的社会危机），起着掩盖这一社会矛盾的功能，这一现状导致了学科自身的自闭和停滞。学科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栖息地和保护所。所以，它的危机不是它无以为继，而在于它对社会变革（包括建筑变革）的麻木不仁，仍然不停地机械地生产着一看即知的学科话语——而且似乎这一生产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塔夫里的话语对这一状况提出挑战。按照他自己的话就是，"现代建筑学面临的重要问题是重建它的思想内涵。"[3](p.5)社会危机使得建筑活动出现革命行为（先锋派活动），那么，建筑话语同样应该出现革命行为。这一革命行为要去做的就是"重建学科的思想内涵"。

塔夫里的学科重建方式与拉康迥乎不同。他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建立在一个诸如弗洛伊德的新原点上。这是一种真正的彻底重建。因为他要做的是，在当下的时代中，如何建立对建筑的认知。也就是说，如何创造关于这个时代的建筑知识。所有建筑（一切时代、一切地点的建筑），在这个新的现实世界中，它们正在成为的那种知识是什么样的，我们（革命的理论家）应该如何去认知这一知识，如何揭示这一知识的生产过程，从而创造新的建筑知识。

这一彻底重建需要三个前提条件。第一，构造新的现实层。在《历史“计划”》中，塔夫里用尼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理论来进行这一构造。其中，马克思是主要的参照系。也就是说，塔夫里用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具体劳动/抽象劳动、学术劳动、劳动分工这些概念，组织起现实世界的构成模式。因为这个原因，本雅明的著名观点，“作品对生产关系说了些什么是次要的，首要需考虑的是作品在生产关系中所起的作用”[4](p.15)，在这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马克思式的现实构造层外，塔夫里还试图将尼采的权力理论当作其现实层的第二构造方式。相对于马克思，这一理论运用起来要困难得多（或许是因为尼采的陈述完全不具备像马克思那样的明确的功能形态）。虽然有福柯这个中介，但是权力理论要成为实实在在的现实层的构造基础，还是件相当遥远的事。塔夫里在《历史“计划”》中，只在几个重要的地方略微表现出这一意向。

第二个前提条件是，建立一个赋予一切建筑都有生存权的历史参数。这一点的提出，显然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下的建筑学学科中，参照阶级等级而建立起的学科对象的等级观——宗教建筑、市政建筑、府邸建筑、特殊建筑（监狱、军营）等。这些建筑在研究著述中占据的重要性，和它们在社会制度中占据的重要性相吻合。塔夫里将被历史抹掉的建筑和遮蔽的建筑重新提到研究对象的位置。正如塔夫里所说的，历史上的每一分钟都会给我们提供些什么东西[5](p.97)。

第三个前提条件是，将建筑史学家和建筑师的身份完全区分开。也就是说，建筑史学家的写作不干涉建筑师的创作，不为建筑师指引创作方向和提供创作方式，他只是“分析者”。而建筑师的创作也无须考虑史学家或理论家的观点或理论，只需安心创作就是。塔夫里用这一区分表明，建筑史学家的身份是知识分子，他的职责就是创造新知识。

第一个前提条件的作用在于将现实问题化。在一个充满疑问和矛盾的

现实世界中，建筑活动的含义该如何理解。第二个前提条件的作用在于无限制地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建筑学不再围绕那么几个老生常谈的伟大作品打转。第三个前提条件最重要。它的作用在于明确史学家的批评者身份、批判者身份、知识分子身份。也就是明确自己的政治身份。在这三个前提基础上，塔夫里开始新的建筑知识的生产。

塔夫里的学科重建，没有去攻击旧有的经典建筑学学科规范。他所做的是以个人之力来建立自己的建筑史。他在1960年的博士论文（关于施瓦本王朝时期的西西里建筑）的写作中，就置当时的博士论文候选人必须进行建筑设计创作的要求于不顾。无视现有的学科规则，对于塔夫里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对自己的研究进行不断的质疑（而不是对既有学科规则进行质疑）。所以，他的《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一出版，就开始了理论反思，结果《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在1969年出现。1973年《建筑与乌托邦》出版后，他就在1977年的《历史“计划”》中提出新的意识形态理论。这一个人的建筑史没有确定的规则，也没有确定的终极目标。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一直贯穿始终的话，那就是要在研究中改变自己。所以，塔夫里的这些研究，无论是具体的史学实践，还是方法论总结，它们都只是“临时建构”。虽然，它们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新鲜灵感和知识刺激，但是我们不能将这些“临时建构”绝对化、固定化、原则化。换句话说就是，塔夫里的研究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教学性。这也是个人建筑史的内在特征——它无法公式性地进入普通的教育体系。

原因很简单，教学（学科的基本运转条件之一）必然具有一个道德标准，或者说学科道德标准。好的建筑、不好的建筑、好的方法、不好的方法、好的写作、不好的写作，这些区分是教学的自然结果。塔夫里的研究不产生这样的结果。但是一旦强行将其纳入教学体系，将其固定化、规则化，也就是真理化，那么，一系列令人不解的自相矛盾将会随之出现。塔夫里的价值认定也随之成为疑问。

詹姆斯·艾克曼在一篇文章中集中表达了那种生硬地学习塔夫里而给自己带来困惑的思想。艾克曼认为，塔夫里的允许一切建筑存在的新史学参数和意识形态诠释视野这些史学新方法“不可限量地丰富了自己的工作”[6](p.165)。所以，他和大多数学生一样，也学着把关于建筑生产的相关动力的陈述完全建立在文献的基础上，并且注意力不再集中在个别的“伟大”建筑师。但是，塔夫里的后期著作中，却仍然保持了对伟大建筑师的

重视。“他的注意力一直都固定在皮拉内西和柯布西耶上。最近几年出版了有关他曾参与组织的个展的目录书，其中包括对拉斐尔、朱里奥·罗马诺和弗朗切斯科·德·乔尔乔的研究。当塔夫里去世的时候，他几乎已经完成了小桑迦洛（Antonio da Sangallo the Younger）画丛一书的词条。”艾克曼无法理解这一差异——似乎塔夫里并没有遵循他的启发性的方法论原则。“我不确定他会怎样解释这一变化……”[6](p.165)艾克曼的困惑的原因其实很简单，这就是将塔夫里的话语真理化的后果。

正如我们所知，像《历史“计划”》这样的方法论文章已被广泛引用。当然，主要的引用形式是脱离前后文地摘引几个句子，以此作为自己立场或观点的佐证。而且，大家摘引的都相差无几，似乎文中其他部分并不存在。实际上，该文的中译文大约3万余字，常被援引的大概是其中的几百字。也就是说，绝大部分都被视而不见。一旦我们将此文的完整性还原，那么，我们会立即发现，这不是一篇关于建筑史方法论的结论式综述。它只是塔夫里在1977年针对历史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所做的小结式阐述。它是探索性的，而不是宣言式的。它是一次“临时建构”，而不是永恒规律的揭秘。以之为参照，我们会发现，其中各项主题在其他的著作中已经反复出现过，有些已经得到大幅修改，有的则基本不变。我们还会发现，在《球与迷宫》中的9篇正文中，塔夫里开辟了9个建筑史的研究场地。并且，9种建筑史的视角与方法的具体运用，和《历史“计划”》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对应关系。9次不同的写作（时间跨越8年），将塔夫里的主体带出了学科的法定界限。这已是有目共睹。但是，事情并非到此为止。因为建筑史的学科界限从来都是暧昧不明，或者说无关紧要。简单地说，学科界限只是在不同研究工作的相互模仿之下而形成的默认之规。它的唯一功能，也是不变功能，在于它维持着学科脆弱的自尊和合法性。它是学科生物链的一个端点。了无生气的从业者通过它而获得生存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并在社会网络中占据相应的安全位置。这一点对塔夫里而言毫无意义。9篇文章以自己的方式将塔夫里带出了自身。这是它们唯一做到的一件事。

我们能够从这些文章中获得很多启示，但只是启示而已。塔夫里的作品并不树立起榜样，要我们跟着他一起这样或那样做。它们所传达出的信息是，建筑史的写作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当然还可以……所以，塔夫里的个人建筑史抵达的是自己的极限，而不是学科的极限。学科不需要极限，只需要规则，但是个体实践却正好相反（用卡西亚里的话说，就是塔

夫里所钟爱的“无法则和约束的秩序”[7](p.169)）。这一点即使在拉康来说也是一样的。

我们无法将塔夫里与建筑学学科相比较，来确认他的写作的价值。因为他不是为学科写作，而是为自身写作。在1976年的一个访谈中（几乎和拉康的这一访谈同时，而且是接受法国人的访谈，这和拉康的访谈形成一个有趣的对应），塔夫里谈到他的书不为读者而写，也无需读者[8](p.39)。但是，我们不能因此简单地认为他的写作真正的无关于他者。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塔夫里的《球与迷宫》一书具有某种价值的话，那么这一价值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认定：一个相对于整个思想史（而不仅仅相对于建筑学）；另一个相对于塔夫里个体。

第一个方面的价值认证，需要做的铺垫性工作当然是回到文本自身。这是不二之途。比如《历史“计划”》一文。我们必须深入这一文本的每一细胞和间质，将它们剥离开，再现每一阐述的背景空间——这是一件极为巨大和恐怖的工程。然后，我们再重新将这些拆散的零件组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使之进入思想史空间，将其彻底历史化（这也是塔夫里历史方法论的命题之一）。我想，其中的每一项具体的分析步骤，都在为塔夫里的这一文本做价值认定，因为，它辨析的是联系和差异（而不是单纯地下结论）——文本的价值无疑产生于此。当然，被分解开的文本最终再度统一在一起，并不是简单的统一为一个新文本，而是统一到塔夫里主体之上。这样，第二个方面的价值认证就可以开始进行了。它首先要讨论的是文本和主体之间的关系。

我在文章的开头就试图通过拉康的观点来阐明，文本对于写作主体的意义何在。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是塔夫里个人建筑史的一次新的实践——不是重复性的实践，而是在质疑且颠覆了自己的研究基础之后所进行的实践。它不具有教育功能，因为它只是个体的一次越界的实验。它不具有史学典范作用，因为它没有成功与否的标准。它没有为我们开辟出新的道路，因为这条道路在他走过之后便被关闭。塔夫里在《历史“计划”》最后一段的阐述，清晰地表露出他对这一问题的自我看法。写作就是一种“越界”，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实现主体的自由。

在“越界”和“主体的自由”两个概念的指引下，被分解开的《历史“计划”》自然汇聚到了一个终点（文本的拆解和重组画出一个完整的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无法真实地还原这一再生的统一体。因为，我

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还原个体和集体的危机的历史，但对还原个体经验则束手无策——我们成为不了那个永不停止变化的塔夫里。（有些研究者正在致力于局部地还原这一个体经验和集体危机的历史的综合，比如丘奇的《性格成形的时期》。）但是，事情不是就此陷入绝境，我们发现，塔夫里在两者之间所打下的那个“结”，就是带领我们进入这一新的统一体之中的阿里阿德涅线团。塔夫里曾经在1976年说到，他在《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中，在个体经验与个体和集体危机的历史之间打下一个“复杂的结”[8](p.37)。这个结或许在1977年解开了——我们比较它与《历史“计划”》的差异时能够感受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在《历史“计划”》中新的“结”又被打上了呢？

可见，对于塔夫里的无法接近的主体经验，我们并非真的束手无策。这一阿里阿德涅线团式的“结”，就是我们可以探询和追踪的线索。那么，这一（些）“复杂的结”隐藏在何处呢？我们怎样才能找到它呢？

我们不得不再度回到文本自身。那些潜藏在文本中的矛盾，那些我们在深度剖析、反复解析的过程中出现的难解之处，就是“复杂的结”的藏身之所。如果用塔夫里自己的话说，就是“癫狂的表征”。实际上，我们在文本分析过程中多次产生的困惑，已经在悄悄提示着“复杂的结”的存在：还是以《历史“计划”》为例，文中“历史空间”的含义的差异性、三大历史危局的悬而未决、权力概念的闪烁不定、三部分格局的理论坐标的无声转换、“集体知识分子”和重构的学科之间虚构的辩证交换、快感的理论位置……有些是塔夫里自己有所感觉，有些则在塔夫里的意识之外。对这些“症状”的研究，也就是对“复杂的结”的研究。换句话说，就是对塔夫里所进行的精神分析。因为这已经不是在分析语言，而是在分析言语（文本之下的低语）。这一分析虽然仍然难以帮助我们复原塔夫里的主观经验，但是它可以向我们凸现出，在这一特定文本中，塔夫里的主观经验所遭遇的困境。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一困境甚至是文本的一个真正出发点。它被掩盖在文本中所宣称的那些目标、目的、期望、针对点之下。

平心而论，找到这些“复杂的结”虽说不易，但在我们经过详尽的地毯式的文本分析之后，已经或多或少发现了它们的位置。可是，如果要对这些“结”进行深入分析，却还是困难重重。这已经不是锚定一个文本就能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研究这一文本写作周期中，塔夫里的所有写作和与之有所关联的写作。显而易见，这是一件极为庞大的工作。

所以，对塔夫里文本的价值的认定，依然难以最终完成。也就是，相对于整个思想史，塔夫里的个人建筑史所具有的价值，能够在关于其文的具体分析中得到体现。另一半价值——相对于塔夫里的主体而言的价值——则暂时无法确定。我们在文本分析过程中发现和梳理出那些“复杂的结”的若干位置。我们也发现，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些结也无须解开，它们是文本的魅力之源，它表明了个体经验的冲突与和谐，表明了这一经验与“悲剧性的当下环境”之间一触即发的碰撞和随之而来的“符号僵局”，表明了历史写作自身的艰巨和痛苦，也表明了理论话语的真实形态——矛盾与冲突，以及修辞和装饰。但是，追踪这些“结”的来龙去脉，却是文本分析自身已不能停止的工作，就像一个已经启动的程序。这里，喊一声暂停是必要的。不是因为它的运转将有可能使塔夫里的写作价值消解为零（这是深入研究的必然结果之一），而是因为这已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分析工作——文本在此变为一个症候，而不是一个历史事件。

参考文献：

[1] 路易-让·卡尔韦，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M］，车槿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 E. 葛朗乍文，不可能有精神分析学的危机——1974 年拉康访谈录［M］，黄作译，世界哲学，2006（2）

[3] 塔夫里、达尔科，现代建筑［M］，刘先觉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4] Tafuri，“The Historical ‘Project’”［J］

[5] M. 加尔加诺、M. 塔夫里，弗朗切斯科·迪乔治·马丁尼：伟大的展示［J］，Domus 中文版，1993

[6] James S. Ackerman，“The lesson of Manfredo Tafuri”，*Casabella*，619—620（1995），p. 165

[7] Massimo Cacciari，Quid tum［J］，*Casabella*，1995（619-620）

[8] Françoise，Very interviews Manfredo Tafuri：The culture markets［J］，*Casabella*，1995（619-620）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建筑学院）

历史的废墟："计划"危机

［日］田中纯

柏林的市中心、安哈尔特火车站（Anhalter Station）附近的马丁－格鲁皮乌斯大楼（Martin－Gropius－Bau）的一旁，保存并展示着纳粹（Nazi）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总部地牢的"遗迹"。犹如四周被堆积如山的瓦砾和野草围着的一块空地，经过战争和战后破坏的建筑物的地下部分被展示在露天，周围星星点点地插着一些解说牌。与被挖掘出的盖世太保总部地牢相邻的是名为"恐怖地形图（Topographie des Terrors）"的临时展馆。其中，将再发掘出的保存食物用的地下室作为展厅，以照片展的形式展示了地牢的历史、盖世太保的组织和活动、他们的种种暴行以及被害者的生平等等。由瑞士建筑学家彼得·卒姆托计划建造的展览·资料中心于1996年起动工。

某个建筑物成为遗迹的必备条件是什么呢？是建筑物本身，或者说是建筑物所象征的某种概念，尽管它们不存在于现在，但仍对当今具有决定性意义吧。50年前在这个恐怖的地方发生的事早已成为历史，使人们产生了时间上的隔阂感。这反映了战后德国人与纳粹党决裂的意识，或者说清楚地意识到与纳粹党决裂必要性的自我意识是如此的强烈。这里虽然是个不祥之地，但是正因如此，才更不容人们忘却。战后数十年中，由于这里接近东西柏林的边界，与"柏林墙"相邻，因此在这片土地上既没有新建房屋，也没有被彻底地发掘。现在的展览于80年代初着手计划，终于在1987年向世人公开。

能在这片土地上新建建筑物吗？建筑能让人们不用假装这座城市什么

都没有发生过，就能从在这片土地上深刻烙印的恐怖的伤疤中解脱出来吗？新建固然困难，但是，一味地保存那些“遗迹”难道就好吗？这里的确是个珍贵的历史遗迹，也许是应该被保存到遥远将来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在柏林类似的让人难以忘却的历史遗迹过多，要全部都保存下来是不可能的。而且，要保存过去的遗迹并不一定要通过维持对它的记忆来实现。

另一方面，德国统一之后，街上大部分的“柏林墙”被拆除了。虽然如此，但据说至今仍有一道看不见的“柏林墙”分割着东西柏林，人们每天要穿越那道透明的障壁。虽然物理意义上的墙消失了，但是人心中的记忆之墙却不容易消除。无论是通过保留遗迹而存留下来的记忆，还是即使破坏、拆除建筑物仍能残存下来的记忆，与保存建筑物从而留住记忆一样，要毫无痕迹地让记忆消失仍旧是很困难的。

在这个记忆的空间、意象的空间里建造保存“建筑”，或者将占据这个空间的“建筑”破坏、拆除掉——如果说这两者对建筑史的论述起着某些作用的话，那也许正是作用于这个表象空间的系统化这一点上。建筑的语言用沃尔特·本雅明的话来说，就是“译者的使命”。本雅明说，翻译就是作品“死后生命仍然延续”的表现。如此一来，建筑史讲述的总是“废墟”的故事吧。然而，建筑史的译者们的工作并不是致力于再现、传达建筑物崩塌之前完好的面貌，而是通过将废墟上的瓦砾逐个地翻译，去探寻尚未存在于原建筑里的某些东西。翻译的对象不如说是那些无法表达、无法再现的内涵。“因此，翻译自然必须具有显然的合理性，但其深层次的逐语性的要求则必须从更有说服力的相关性上来理解。也就是说，要把一个器皿的碎片黏合到一起，就必须做到连最小的碎片也能够互相吻合一致，但碎片的形状并不一定要都是一样的。翻译也是如此，与其完全按照原著的意思来翻，倒不如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用心把原作的遣词造句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通过这个方式，原作和译文就如同器皿的碎片一般，成为一个更大的语言片断，这样就能被人们所理解了。”[1]译者为了达到逐语性的目的，就算是破坏掉作品外在的统一性也是必要的吧。原著和译文说到底就是用破碎的片断联系在一起的。

曼弗雷多·塔夫里在其著作《球与迷宫》的绪论《历史“计划”》中围绕建筑史展开的思考，似乎可以认为正是这种翻译理论。那么，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批判式的写作方法”、历史的语言，宛如为了使人们联想

到组合器皿碎片时的手势。塔夫里在绪论的开头，引用了把分析历史比喻为玩单人纸牌游戏的作家卡罗·金兹伯格的话："探索历史的结果，使手头的各个片断完美地契合从而构筑起理论，只不过是个无法辨别到底是对是错的、有双重性质的概念而已"。其原因是在探究历史的过程中，"手头上只有各个片段的一部分，能够配对的'纸牌'在理论上也不止一对。"[2](p.8)那只是一个不确定的理论构筑。牌可以重洗，游戏可以接着玩，有耐心的话就一定可以把游戏玩到结束。然而，在探究历史的过程中却无法知晓何时才能结束，就好比是"不可终止的分析"（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认为很难确定精神分析治疗的终止，正如心理治疗师把对病人的自我分析作为"不可终止的课题"伴随在治疗过程中。那样，"所谓历史——正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中最深层的核心部分那样——不仅仅是疗法。不仅要对掌握的素材提出疑问，在对他们进行再构造的过程中，也应该不断地对自己进行再构造。"[2](p.21)对历史，我们必须要回味手中握着的"纸牌"，偶尔在将它进一步变形、片段化的同时，将自己的语言随之变形、片段化；必须将"怀疑的手术刀"对准自己的肉体，不断地将自己放置在危险之中。"所谓'真正的历史，'不是熟知毫无争议的'文献考证的证据'，而是认识到了自身随意性的历史，是将自身当作'不安定的建筑'来认识的历史。"[2](p.21)

然而，为什么这种认识是必要的呢？弗洛伊德在《可终止与不可终止的分析》中，用各种心理防御机制之间的关系以及歪曲历史为例作了说明。其中弗洛伊德提到了古代犹太对罗马的战争中幸存下来的指挥官同时也是历史学家的弗莱维乌斯·约瑟斯，"虽然在他的著作里的确是含有伤害基督教徒感情的言词，但这些言词要不就是在审查中被删除，要不就是被毫无痕迹地曲解了"，弗洛伊德用如此篡改文献作比来说明由"压抑"而产生的防御机制。[3](p.376)精神分析法的目的，就是要发现类似的通过曲解文本而隐藏起来的压抑着的、被否定的事物的痕迹。而且，在历史上不仅有像约瑟斯这种事后才追加审阅的情况发生，有的甚至还从结构上加以了掩盖。原因如塔夫里所说："在表象化这一点上，历史也成了压抑和否定的产物。"[2](p.18)如果压抑和否定作用于历史文本本身的话，那么作用于其中的防御机制也就不得不成为精神分析的对象了。历史的自我分析是重要原因。

历史位于现实的外部，对现实的客观分析叙述是有限的。既然历史本

身是言论上的构成，在理论上“不可终止分析”也可有一定的“终止”，并介入到实际的社会生产中去。也就是说在将自己置身于危机中的同时，也在计划危机。所谓的“历史计划”也就是“计划危机”；所谓用文字记述的历史就是直接地实践危机。历史的语言不是社会生产的超语言，而是包含了制造现实的各种语言和各种技术，以语言和技术为前提，而且，“它‘污染’这些语言和技术并被语言和技术所‘污染’”。[2](p.19)所谓历史是一种批判，事实上早已存在于许多语言、技术和意识形态的间隙之中。作为“不安定构成”的历史文字包含了语言的多样性、权力和制度内在的多样性的同时，也不断地转化为将自身多样化的运动。正因为此，作为统一体的历史这一形象存在于危机之中。

一、“历史的侵蚀”与建筑的“起源”

正如塔夫里所指出的，历史具有单一性和统一性的观念，是与将历史问题视作认识建筑起源这一点密切相关的。勒·柯布西耶发起的“走向新建筑”的探索运动、罗马城的教益（Vers une architecture）——例如，向着某一建筑，以其为目标开展的运动，就是这种追溯起源的尝试。“两千年来，参观帕特农神庙的人们在这里感受到了建筑所具有的决定性的瞬间。如今我们面对着这一决定性的瞬间。”[4](p.167)这样的瞬间不是指在过去的某一时刻发生的事件，也就是说，不是由实际发生的事件所引起的。这里的问题是起源的重复。勒·柯布西耶在帕特农神庙中重复着“一个建筑物”的诞生的瞬间，由此能够回味建筑的历史或传统。建筑物无论呈现怎样的变化，其作为“建筑”被继续研究下去的意义的统一性保证了建筑传统的一致性，正因为此，这一“建筑”的生成开辟了一代建筑历史[5]。以勒·柯布西耶为首的先锋派的反历史主义（塔夫里称“历史的侵蚀”）中存在着这样的固有的历史性。“这种历史性是在不受外界心理状态的影响下成立的，无论受到过去怎样的阻碍都能自我支配的历史性。”（塔夫里）[6](p.77)要恢复真正的历史，就必须远离历史。勒·柯布西耶试图通过与先行传统分离追溯、重复起源来恢复真正的历史的持续性。

这与胡塞尔在《几何学的起源》中对研究几何学历史可能性，即“溯行的问题”的尝试性研究是大致相同的。“溯行的问题”并不是“最早的几何学家是谁”或“最早的几何学命题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几何学这种

即使通过各种语言感性地表达/重复多少次仍是相同的（在胡塞尔看来的）“理念的对象”，只有在从前科学文化世界中产生的根本意义形成的情况下才被研究。这里的根本性意义在历史意义沉淀的过程中被人忘却了。胡塞尔在这种忘却中发现了欧洲近代的“危机”的征兆。正因如此，再次认证这种根本意义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使几何学历史的统一性成为可能。这样，所谓真正的几何学的历史，就是“沿着一系列追溯被记录的历史的指示，将现有的历史的意义形态以及它的明证拉回到最基础的、原始的明证这个隐蔽的空间”[7](p.294)。

另外，勒·柯布西耶为了应对近代建筑史的“危机”，也进行了起源的追溯。与传统的分离正是建筑史的一大归宿。塔夫里指出先锋派的反历史主义并不是随意选择的结果，而是布鲁内莱斯基的革命产生的存在于欧洲建筑文化中的理论的最终发展，其自身就是历史遗产[6](p.87)。这种反历史主义的历史构成遍布于塔夫里称之为“操作性批判”的事物中。例如吉狄翁写的《时空与建筑》为世人所知的“操作性批判”，就是指对应具体的未来方案而受到歪曲的历史分析的计划。这是歪曲过去，因为其本身承担着“意识形态的负荷”，因此不能够接受历史造成的不贯彻性和失败。另一方面，它发挥着预言的作用，即使是对未来也计划着“一个历史”的连续性。[6](p.297)马赛·布鲁尔把这种“一个历史”的时间性称作“即成的虚无主义”的时间，他说：“没有比建筑更能明确表达这种‘即成的虚无主义’的精神的‘技术’领域了。”[8]这里所说的虚无主义，是在具有现代特征的“克服”观念下不断地面向新事物的运动，它的时间性与“历史主义的连续”的时间性相似。

胡塞尔认为必须把语言视作理念对象客观化和历史产生的必要条件。雅克·德里达着眼于经由语言的传达过程，特别是基于文字符号的定论，指出“形迹”先行于“理念对象”的同一性和作为起源的根本意义的相一性，换言之，起源就是差异①。另一方面，我们能够认识到即使是在勒·柯布西耶发起的以“建筑”为目标的“溯行的问题”中，根本意义上的“建筑”在差异之中。“建筑”只存在于同自身的差异中，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早已不是“一个建筑”，起源与其仿造物无限地互相反射，“建筑”最终

① 参见德里达翻译胡塞尔的短文《几何学的起源》时配的长篇导言。

自己迷失了自我。“建筑”不是因极不同的语言感性表达了其具有相同的意义而存在的，而是因这些语言间的本雅明式的翻译的可能性（这在通常的理解里是不可能翻译的）而存在的。这样的“建筑”的历史，分析的不是在不同语言间传达的“同样的事物”，而是那些语言间的不可传达性或者说是他们之间的差异。塔夫里说，“历史的空间，与其去构筑各种不同的语言之间、技术之间不该有的桥梁，倒不如去探究一下产生这种隔阂的原因。总之，就是要让呈现出‘空虚’的事物在不觉时说话”，这是“把自身往技术、语言的裂缝中下降的操作”，是“要让与语言的境界相抵触的事物爆炸”。

建筑作品的失败正是失去古典规范效力的“近代”的标志，特别是围绕建筑的技术、制度、城市行政、建筑理念及其象征性等等，在这样的时代里是不可能在一个作品里和谐地共存的。原因在于其中的“和谐”的理念自身失去了效力。这时，探究历史空间的课题被作品外表的统一性所掩盖，只是说明了被压抑被否定的失败和矛盾的“裂缝”。正因如此，其中最具有建设性的研究，是以失败告终的作品和不能实现的尝试这类不完整的片段，或者说分析因过剩而畸形的建筑制图。

二、历史的转变和他者

历史分析本身会因存在着否定和压抑而分裂，没有要到达的终点。塔夫里说，“转变”掩盖了叙述历史的文字的实际存在，具有起点和终点的完整的进化和发展的历史的形象、历史的统一性的观点，“历史呈现出的确定性”都应该视作这种“转变”的表现。这里所说的“转变”的意义是什么呢？“转变是因一种错觉产生的。这种错觉是指（通过占支配地位的语言符号的介入而被溯行固定的）某要素，其意义最初便作为内在的本质存在于该要素中。”（斯拉沃热·齐泽克）[9](p.102)阿尔都塞指出了把“个人”构成“主体”的意识形态上的“再确认”作为这种“转变”的功能。受到意识形态的号召的“个人”，本身早已一直作为“主体”进行“再确认”。但是，他的明证性不是在意识形态的功效和这种“转变”的功效之外的。以30年代的围绕现代主义建筑的意识形态为例，在意识形态空间里飘游的“合理性”、“机能主义”、“民族”或是“平屋顶”、“斜屋顶”等各种各样的语言符号，因某个占支配地位的语音符号（例如“法西斯主

义”、“纳粹主义”）的介入而决定了其追溯的意义，形成了一种主张，如认为真正的法西斯主义的建筑就其本质来看是符合理性的，平屋顶在本质上是反法西斯的等等。

当局限于转变的时候，我们相信这种明证性。转变的错觉中，我们会认定事态“早就一直是这样的了”。于是，人们便忘却了追溯性意义的产生在根本上是偶然的这件事。虽然历史是表象化的，是在“象征性机制”（拉康）的系统化意义上的象征化，但不存在以此为对象的状况的自身中使其一定的象征化成为必然的契机。无论是怎样的历史情况，都能用各种各样的形态使其象征化。反过来说，无论怎样的历史最终都是偶然的产物。但是，问题是在象征性机制建立以后，偶然的象征化过程的痕迹就会消失，好像历史总是早就是一定是那样存在着的。设想从最初的核心开始，必然发展的历史前进过程取代了语言符号所在的空间。“一个历史”在此产生，各种历史研究只不过按照历史的形成满足“一般史”巨大、性质相同的作品中的一部分而已。“一般史要用性质相等的作品来填满空虚的时间，就需要集聚大量的事实。”（本雅明）[10](p.702)这是溯向性地消除自身的偶然性的痕迹，是历史的转变的归宿。历史在其给予的确切存在的过去表象依靠于永恒不变的过去表象之上时，才能够将自身看作是纯粹的记叙式的，即不压抑也不否定的透明的文字。由此，历史最终将自身规定为科学论述就变得有可能了。

在与一般史对立的本雅明的历史唯物论中，过去表象不是稳定不动的。那是“突然之间掠过的”一瞬间的闪念。“将逝去的历史明确地用语言表达，不是指把它认知为‘像是实际发生过似的’，而是说去抓住那像是在危机的瞬间闪现出的记忆”。[10](p.695)过去是会丢失的。本雅明发起的“虎跃”般的革命是对丢失的过去的救助。如同齐泽克所说[9](p.104)，在本雅明的时间观念里历史就好比是语言符号的共时，在历史文本中，能够与历史轴无关地直接地判断过去和现在。“过去的表象”是“既在（das Gewesene）”和“当下（das jetzt）”之间碰撞出的火花，这种碰撞赋予了过去“现实性”。本雅明的“星座”的“静止状态辩证法”特有的历史表象由此而生①。

---

① 关于这一点，参见沃尔特·本雅明著，今村仁司、三岛宪一译的《单行道4方法的乌托邦》（岩波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中收录的片段，编号No.3，1）。

本雅明所说的“过去的表象”犹如外伤造成的后遗症，大概是通过构造与现在逆向的象征化（例如革命）所存在的语言符号的共时而产生的某种概念。为此，历史失去了一般史具有的固定性，基于占支配地位的语言符号的结构化不得不暂时地解体。所谓“危机的瞬间”就是这种浮游的语言符号的时间、空间。历史就是在这“危机的空间”里成为现实性的批判的。塔夫里写道：“把历史和批判等而视之意味着要接受‘尚未解决的各种问题共存于历史本身之中’这个事实”。[6](p.439)在这“危机的瞬间”，人们发现历史是延续至今的“问题”——或者说是失败的尝试的积聚，从哥特式艺术末期在试验性尝试中提出的各种问题到20世纪先锋派艺术和革命具有双重意义的关系性都在其内。卡奇里把碰上“危机的瞬间”的事物称为与“完成的虚无主义”的时间性相对立的“终结（Vollendung）”的时间性。终结的时间反映了过程的不连续性。“这是本雅明所谓的在天使的眼前展开的一系列的失败。终结的时间就是构成这些单一性的文脉，就是单一性的‘作文’”[11](p.210)。终结（Vollendung = zu vollem Ende Bridge）也就是“带来完美的结局”。这意味着打破“最后的审判”的透视法回顾的逆向的历史连续性，从中提取出各个单一的历史事项的“单一体”。“当历史对象成为单一体、与历史唯物主义论面对面时，只有在这个时候，他就接近历史对象。在这个结构中，他认知了如同救世主般的事物的禁止标志，换言之，就是在欲解放被压抑的过去的战斗中象征革命契机的标志。”[10](p.703)

例如尼采或福柯的系谱学，那是针对意义的产生和历史起源的偶然性分析历史的连续性的学科。但是，塔夫里指出了这样一种危险：连系谱学或者被德里达说成的零散的各种历史最终也会把被分析的片断推崇为全新的统一体。另一方面，如果说整个历史的事像认可言论、历史是各种各样的叙述、历史的多样性只不过是在解释情节时构思上的差异的话，那么区分历史和虚构的基准早已消失不见了①。那么，从“多样的历史”到“对多样性自身提出的问题”，历史的研究无论如何都会将自身置于危机之中。

---

① 一直留意着海顿·怀特的历史理论和对其理论的批判。关于这个问题参看以下的研讨会记录。参见索罗·弗里德兰德编写，上村志男、小泽弘明、岩崎念译的《奥斯威辛和表象的界限》（未来社，1994年）。

反过来说，这需要经历转变。历史研究如果不假设历史的意义、历史中存在着一定的秩序就无法开始研究了。单人纸牌游戏正是由于假设了纸牌全部配对后游戏便结束，才得以成立。历史研究无法有意地使他者出现在自己的文本中。然而，只要是表象化的，历史就只是压抑和否定的产物，里面只剩下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无法表象的、被歪曲了的概念。历史研究本身就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在历史分析中构成语意的叙述被分成段落，而历史不能回避这种“段落”。这是因为表象的历史有挥之不去的结构上的不足之处。历史正在被撕碎。只有通过语言的丧失和失言才能表现的事物，才能听到这一历史的他者在那里正诉说着什么。把自己置身于危机的历史为的是让他者诉说而接受转变。说历史有意义也许就是转变的幻想，通过经历这样的转变，才能听懂那些他者的无意义的述说。历史的研究为了发现隐藏在自身中的他者的痕迹，不得不进行不可终止的自我分析。

不，倒不如这样说，历史正因为将不能表象的事物融入自身，才能一直置身于压抑造成的反复逼迫的威胁之下。历史分析伴随着象征顺序无法统一的一些造成外伤的冲击，重复着无止境的纸牌游戏。这是来自历史的他者（已是无言的死者们）的嘱托，是偿还欠它们的债。

三、对建筑的“欲望”和近代

压抑的痕迹并非一定深埋于不易被发现的地方。不仅如此，正是因为它太过明显的外在才不容易确认。齐泽克这样写道：“因为‘现实的事物’本身不支撑直接的象征化，即不论怎样的象征化的结果都是偶然的，所以某史实的经验要获取其统一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语言符号作为媒介，即依靠向‘纯粹的’语言符号发出指令。现实的客体并非保证作为参照点的某种意识形态的经验的统一和自我同一性。相反，对‘纯粹的’语言符号的指令赋予了我们的史实经验以统一和自我同一性。”[9](p.97)

支撑建筑史的统一和自我同一性的纯粹的语言符号和“无概念的语言符号”正是“建筑”本身。至少在失去了古典规范效力的18世纪末期以后的近代，还不能以列举“建筑”的积极属性来将其确认和叙述。换言之，“建筑”在近代成为了纯粹的语言符号。在这个时期中，关于“建筑”所得出的唯一的定义是“‘建筑’是所有被称为建筑的东西”这种赘述的

命题。“建筑”不仅是“根源性意义”的，也是彻底失去意义的语言符号。然而，支撑起建筑史的话语统一性的就是这种虚无的语言符号。多种具体属性完全不同的产物基于“建筑”的语言符号而产生，并不是因为它们都具有相同的意义，而是“建筑”的语言符号从一开始就不带有积极的内容。

“建筑”的语言符号可谓是“表象代表（Vorstellungsre präsentanz）”（弗洛伊德）。所谓“表象代表”，是指用来填补没有显现在表象空间里的事物或从表象空间里欠漏的事物造成的空虚的要素。拉普朗虚举出的某种不合逻辑的状况，“人们忘记了象征背后的国家、贵妇人的存在；战士只为国旗而死，骑士为手套而牺牲生命。”形象鲜明地说明了“表象代表”[12](pp.49-50)的情状，国旗和手套已失去了任何意义。尽管如此，致命的欲望却仍然这么强烈。不如这么说，正因为国旗和手套是虚无的表象才存在着这么强烈的欲望。作为“表象代表”的“建筑”显示着早已被人们忘却的事物的虚无。

如勒·柯布西耶所见，“建筑”通过转变反向构成其“根本意义”。这在近代代表“建筑”正变为主体欲望的客体。“走向新建筑”的研究对象虽然是这种成为欲望客体的“建筑”，但其实并不是指早已现行存在的这一类“建筑”，而是指仅仅通过转变生成的某些不确定的因素。这不是附上注解、解释围绕建筑的议论就可以变得明朗起来的坚定的“平地”，只不过是主体的欲望在空无上的投影而已。近代的“建筑师”就是对这些将“建筑”作为欲望客体的主体的称呼。

在“建筑”化为虚无的语言符号的现代，“建筑师”如果不依靠学习各种技术是无法满足制度上的要求的，不存在为某种主体提供处在诸多社会关系中的“建筑师”这一空间的具有象征性委托色彩的根据，这与占据这一空间的主体的属性、能力毫无关系。“我为什么是个建筑师？”是因为“他者”（大写的他者）选择了你，如同上帝选择了犹太人一样。但是“他者”绝对不会说出选择你的理由。丹尼尔·李布斯金说这种“摩西意识”正是先锋派的意识。“先锋派没有环境媒介地、不解释原由地、无法摆脱地且直接从属于上帝。我觉得与其说这是一个概念，倒不如说是先锋派的一种意识，不管人们有没有这样的意识。而且，如果说人们已经有这样的意识，那要摆脱这种意识就为时已晚了。人是无

法改变信仰的。”①

突然，犹太人开始知道（通过摩西），上帝这个“他者”选定了他们。事实上犹太人将自己看成是“上帝选民”和他们坚信自己是优越人种毫无关系。他们并不拥有任何特质。他们不知道上帝有何用意。齐泽克说：“不正是犹太教的上帝，那恐怖深渊中他者欲望的最纯粹化身（中略）用神圣的幻想场景来填补着‘他者’潜藏的无法抑制的欲望沟壑？犹太教的所有冒渎中浮现出他者欲望的深渊——也就是说，犹太教徒的根本处境是种困惑感..... 上帝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9](p.115)

直面“他者”内部的沟壑和浮现出的欲望的深渊的先锋派们早已不知如何回答自己为什么信奉先锋派了。近代成为“建筑师”道路上的艰难由此而来。例如“建筑师”的诞生之路，他们是通过想象把自己与历史上的建筑师同一化（对他们的建筑风格、生活方式的模仿）才摸索出来的。但是，在近代这种同一化极具讽刺意义，使“建筑师”成为“不可能”。

与此相反，密斯·范·德·罗、勒·柯布西耶通过反抗——对象征性地在社会网络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歇斯底里的反抗才成为建筑师。改名是其表现之一②。或者应该说他们从事的是不断反复自问“建筑师究竟是什么”的工作吧。摩登时代先锋派采用了提问的形式来探究“他者”选择了“建筑师”的根本欲望是什么。先锋派“建筑师”们不能接受自身是“建筑师”的身份，因为那只在象征性委托和主体的切变之中。这意味着“建筑师”的支柱不可能存在于象征秩序之中。这种无根据性掩盖了“他者”内部的欲望的深渊，“建筑师”的欲望是“建筑”。作为欲望客体的“建筑”

---

① 芝加哥的圣保罗大学1991年召开的以“不祥之物”为主题的会议中，雅克·德里达就李布斯金设计的犹太博物馆发表了演说，他的发言把犹太博物馆的“空洞”同皮得·埃森曼的“空虚”的概念联系起来。李布斯金的演说是对德里达的演讲的回应。李布斯金说自己的理论与皮得·埃森曼的“空虚”表象没有共同点。他说皮得·埃森曼的理论是基本的柏拉图主义的产物，是关于围绕空虚的希腊式的表象。关于这点，对李布斯金来说，空虚与摩西式的先锋派更密切相关。参见 Jacques Derride zu “Between the lines” Anlablicb den Tagung mit den Titel “Das Unbeimlicbe” an der St. - Paul - University, Chicago 1991. In; Alois Martin Muller (Hrsg.); Daniel Libeskind; Radix - Matrix. Munchen 1994, S. 115 - 8。

② 关于密斯·范·德·罗，详见拙作《谎言的闹剧建筑学家密斯·范·德·罗的诞生》，收录于《残像中的建筑》第173—208页。

的作用是掩盖了“建筑师”的不可能性。现代建筑师规划着空想的蓝图。这种规划存在着不可能实现的倾向。正是因为有技术、制度、资金和客户的要求等等实际的限制，“建筑师”才能最终避开潜藏于自身中致命的不可能性。如果围绕“建筑”的言论是由虚无的语言符号构成的意识形态的文字，那么危机分析是始于叙述分析了文字背后隐藏的重叠的决定性的关系网和解释如“功能主义”、“象征性”、“技术”、“民族（日本）”等概念中“建筑”是以怎样的组织结构来构成的①。但是，危机分析在其他方面必须更进一步向主体“建筑师”及其对“建筑”各个欲望之间的关系转移，浮现于被空想的蓝图掩盖的“无”的空间发展。历史这个“危机的计划”通过明确“建筑”计划没有根据这一点，把“计划”的概念本身置于危机之中。“计划”来源于现代的“克服”观念，如果说“建筑”是“克服”运动的归宿——“完成的虚无主义”精神的最显著的“技术”的话，建筑史就是对建筑中虚无主义的根源的再思考，承担使其朝向过去的“克服（Verwindung）”（海德格尔）② 的重要义务。

四、历史的天使

历史并非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既定世界，它所展现的接近于一个寓言。本雅明认为，寓言不是“有生命的意义”的具体表现，它和象征不同。寓言欠缺符号与含义间的有机结合。就好比说，如果象征是神的语言，是净化了的自然的语言的话，那么寓言就是神为死亡和崩溃而创造的语言，是历史的语言。“于象征意，自然的面貌在走向没落的同时变得神圣，救赎的光辉中一瞬间启示自我。相对的，于寓言，历史的死相（facies hipocratica‘希波克拉底的脸’）已凝结的原始风景的面貌展现在研究者们的面前。历史透过所有的一开始便存在于历史中的不适时的、令人痛心的、失败的

① 参见拙作《美术史模糊的对象现代主义的终结》第33页。

② “克服（Verwindung）”是强尼·凡蒂莫对海德格尔的“克服”概念的展开。Verwindung的动词形式是verwinden，除了有克服痛苦、打击的意思之外，也含有“治愈疾病”、“扭转事物”的意思。不是指“克服（Uberwindung）”形而上学主义，而是在“克服（Verwindung）”的转变中领会强尼·凡蒂莫所说的从现代“强思考”向后现代“弱思考”的扭转的意思。参见 Gianni Vattimo, Ninbiliamus und Postmoderne, In; ders Das Endeder Moderne. Stuttgart 1990, S. 178 - 198。

事物展现出了一种面貌，不，应该说是饱经侵蚀后所剩的骨架。”[13](p.343) 寓意是自然和历史奇妙的交叉点，在那里，自然腐朽成为历史，历史成为死自然。这种历史的寓意就是历史废墟的寓意。“理念世界中的寓意便相当于物质的世界的废墟。”[13](p.354)

寓言的观点粉碎了虚假事物的统一性，并牢牢盯住它们的碎片。这种观点把那些碎片变成死物并且不厌其烦地反复将他们拼起、再粉碎。这种行为普遍存在于批判的观点中。“批判使作品坏死。……作品主张‘在哲学批判中’失去了所有的稍瞬即逝的脆弱之美而变成一堆废墟。”[13](p.357)

研究历史的作品《危机的计划》，正是瓦解作品将其带往废墟的批判。然而，与此同时也不得不将置身危机中的历史本身也化为废墟。“历史的死相”中称为历史学家的寓言家们，通过“所有不适时的、令人痛心的、失败的事物”发现历史“他者”的痕迹。本雅明收藏着保罗·克利的画作《新天使》(Angelue Novus)，画中历史的天使也许就是寓言家自身的写照。本雅明觉得，“睁大眼睛注视着过去、伸展着翅膀的天使，被人们称为进步的飓风鼓动她的翅膀，把她吹向未来。”

参考文献：

[1] Walter Benjamin, Die Aufgabe des Ubersetzers [M], In ders: Gesammelte Scbriften (Abk.: GS), hrsg. von Rolf tiedemann und Hermann Schweppenhauser, Bd. IV

[2] 曼弗雷多·塔夫里，球与迷宫——从皮拉内西到20世纪70年代的先锋派和建筑 [M]，东京：PARCO出版社，1992

[3] Sigmund Freud, Die endliche und die unendilebe Analyse [M], Frankfurt: Studienausgabe Erganzungsband: Scbriften zur Bebandlungstecbnik, 1982

[4] 勒·柯布西耶，走向新建筑 [M]，吉板隆正译，东京：鹿岛出版社，1967

[5] 田中纯，近代那喀索斯、勒·柯布西耶的反向质疑 [J]，建筑文化，1996 (10)

[6] 曼弗雷多·塔夫里，建筑学理论和历史 [M]，八束はじめ译，东京：朝日出版社，1985

[7] 爱德蒙多·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M］，田岛节夫译，东京：青土社，1992

[8] Massimo Cacciari, Nibilsmus und Projekt［J］, In ders: Grobstadt Baukunst, Nibilismus: Essays, Klagenfurt 1995

[9] Slavoj Zzizek, Tb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M］, London: Verso, 1989

[10] Walter Benjamin, Uber den Begriff den Gescbicbte［M］, In GS, Bd. I, Frankfurt a. M, 1974

[11] Massimo Cacciari, Arcbitecture and Nibilism: On tbe Pbilosopby of Modern Arcbitecture［M］,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1993

[12] 杰弗里·梅尔曼，革命与反复：马克思、雨果与巴尔扎克［M］，上村志男、山本申一译，东京：太田出版社，1996

[13] Walter Benjamin, Ursprung deg deutscben Trauerspiels［M］, In: GS, Bd. I

（作者单位：东京大学教养学部）

（孙兢　译）

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

［意］曼弗雷多·塔夫里

看起来，资产阶级艺术的首要伦理任务之一就是通过解读和消化焦虑产生的起因来化解焦虑。至于说导致焦虑产生的冲突、矛盾和分裂是否属于更大的综合机制的一部分，或者对相关问题的思考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一切都不重要。然而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命不凡的“社会”责任中辨别出这类知识分子的某种“必然性”。换言之，在资本先锋（the avant - gardes of capital）和知识先锋（the intellectual avant - gardes）之间存在着某种默契，而且这一默契又是如此心照不宣，以致任何揭露其真实面目的企图都会引发众怒。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发挥的是一种中介作用，它不仅高调宣称自己的意识形态内容，而且也自作聪明地——或者说始料不及地——引火烧身。冲突升华的形式层次越高，导致这一升华的结构便隐藏得越深。

如果我们从这一点着手进行建筑的意识形态研究，那么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的就是，资本重组中最有效的组织计划是如何彻底愚弄了大众，以致直到今天，人们还认为它是客观中立的，超越了阶级的内涵，甚至还成为处理知识分子与资本关系的一种选择。

我必须直言不讳地说明，我从来都不认为当代建筑思想中有如此多的文化理论都在现代艺术的起源问题上大做文章是一种巧合。对于我们来说，作为一种彻头彻尾地关注着自身利益的焦虑的表征，建筑文化对启蒙运动的兴趣与日俱增，其意义已经不限于它自己宣称的神话方式，而是有着特定的内涵。通过追溯现代建筑的起源——准确地说，这一起源正是资

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激进知识分子不谋而合的时期——人们才有可能将现代建筑的全部进程作为一种整体发展来认识。

运用这些方法，我们就可以全面理解建筑意识形态的形成，尤其是理解这些建筑意识形态与城市的关系。

此外，关于启蒙运动问题的系统研究也将使我们有可能在纯意识形态层面上理解伴随现代艺术发展的诸多矛盾。

一、理性的历险：启蒙运动时期的自然主义与城市

建筑师的“社会”意识形态家地位的形成、城市改造范围的个性化、形式的教化作用和自我批评作用、建筑“客体”与城市组织在形式层面上的辩证关系、现代视觉手段中的这些抽象内容究竟是在什么层面上，凭借何种意识体现在启蒙运动的思想潮流中的？

1765 年，洛吉耶（Laugier）提出了他的城市设计理论，同时也正式开启了启蒙运动的建筑理论。该理论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主张将城市简化为一种自然现象；另一方面，它试图通过将“如画”（the Picturesque）美学的形式元素扩展到城市结构中，超越固有的城市组织观念。

在《建筑观察》（*Observations*）中，洛吉耶写道：“任何一个懂公园设计的人大概都能根据城市与地形和环境应有的关系设计城市平面图。这里必定有广场、交叉路口、街道，也必定有归整性和随意性，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的关系和偶然元素，以及精确的细部秩序和整体的混乱、无序和骚动，一切应有尽有。”[1](pp. 312 - 313)

洛吉耶敏锐地捕捉到了 18 世纪城市形式的真实状况。在这里，秩序的经典原型已经不复存在，而违反透视理念的城市空间则是司空见惯。即使洛吉耶用来作为新的参照点的公园也具有新的含义：与整个 17 世纪和 18 世纪上半叶的巴洛克城市规划的宏大叙事（episodic narrativity）不同，城市结构中的自然元素已经用多样性取代了温文尔雅的修辞手法和程式化的自然主义（didactic naturalism）。

因此，洛吉耶的自然主义诉求也就是对环境设计原始纯洁性的追求，它要求理解城市特有的极端反有机性（eminently anti - organic character）。但这还不是它的全部意义。将城市简化为一种自然现象，这与英国经验主义（English Empiricism）在 18 世纪最初数十年中倡导的“如画”美学可

谓一脉相承。亚历山大·柯岑斯（Alexander Cozens）曾在1759年为这一美学提供了非常丰富和重要的理论依据。

我们还不清楚柯岑斯的“污点”（blots）理论对洛吉耶的城市观念有多大程度的影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位法国长老的城市理论与上述英国画家的自然景观理论采用的方法如出一辙，都将“选择”（selection）作为对“自然”现实进行批判性干预的工具①。

既然对于18世纪的理论家来说，城市与绘画属于同一种形式领域，那么选择（selectivity）和批评（criticism）就意味着将片断式方法（fragmentary approach）引入城市规划，这一方法不仅将**自然**和**理性**置于同一层面，而且也将自然片断（natural fragment）与城市片断（urban fragment）一视同仁。

作为一种人类创造，城市逐步趋向自然状态，就如同画家独具慧眼的选择必然赋予自然景观某种社会道德的含义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洛吉耶和英国启蒙运动的理论家敏锐地把握住城市语言的人工特征的同时，勒杜（Ledoux）和布雷（Boullée）都还不愿放弃他们在**自然**及其有机本质问题上所持的神秘和抽象的观点，尽管他们的作品更具独创性。在这方面，布雷对佩罗（Perrault）有关建筑语言具有人为特性的观点的攻击就很能说明问题。

或许，洛吉耶的**城市森林说**（*city as forest*）是以帕特（Patte）规划的巴黎空间序列为模式而提出来的，在该规划中，帕特把一系列新皇家广场设计融合在一个统一的综合体系之中。因此，我们将专注于讨论洛吉耶的理论立场，尤其在我们回顾勒·柯布西耶光明城市（Ville Radieuse）理论的时候，这一理论立场就变得更为重要了②。

把城市比拟为一个**自然客体**（a *natural* object），这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究竟意味着什么？一方面，我们在这一设想中可以发现某种重农主义

---

① Alexander Cozens, *A New Method of Assisting the Invention Drawing Original Compositions of Landscape* (London, 1786)。Cozens在其论文开头所引用的Alexander Pope的话在本文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那些被发现，而非被发明的规则／仍然是自然，但是，它是条理化的自然：／自然，像君主制一样，仅仅受限于／她自己最初规定的法则。”参见G. C. Argan, *La pittura dell 'Illuinismo in Inghilterra da Reynolds a Constable* (Rome: Bulzoni, 1965), pp. 153 ff.。归源于自然的城市的意义——伦理及教育活动的主体和客体——最终取代了理性主义与感性主义正在被破坏的传统权威法则。

② 参见Le Corbusier, *Urbanisme* (Paris: Crès, 1925)。

（physiocratic）理论的升华。城市不再是一种通过积累机制改变土地开发和农业财产税收的结构。而且，作为一种比拟为“自然”过程的现象，并且由于其普遍特质而具有的非历史性，城市也不再是结构性思考的对象。起先，形式化“自然主义”被用来证明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启动的社会进程的客观必要性；很快，它却被用来巩固这些成果，阻止它们进一步变革下去。

另一方面，自然主义具有自身的功能，它在严格意义上确保了艺术活动的意识形态角色。不无奇怪的是，如果说通过将新的生产和交换方式所规定的标准进行衡量的内容赋予“价值”，资产阶级经济开始发现并建立自身的行为和判断逻辑的话，那么新的升华随即就将原有“价值”体系的危机掩盖起来，同时也在对自然普遍性的追求中人为地被客观化了。

这就是理性和自然必须统一的原因。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无法完成它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只好对自己的前提避而不谈。

很明显，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这种意识形态烟幕利用的正是旧制度（ancient régime）的种种矛盾。在这里，新兴的城市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土地开发的经济结构彼此撞击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理论家非但没有重视这一矛盾，反而试图将它掩盖起来。更有甚者，他们还想一方面通过将城市溶入浩瀚的自然之海，另一方面通过专注城市的上层建筑来化解这一矛盾。

城市自然主义、强加在城市和建筑上的“如画美学”以及自然景观在艺术意识形态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所有这一切都试图否定城市和乡村这两种现实之间的差异，从而可以心安理得地对自然的价值估量与城市的价值估量之间的差异视而不见。在这里，城市已经成为一部制造新的经济积累形式的机器。

17世纪文化中那种矫揉造作的、田园牧歌式的自然主义，现在被一种完全不同的、却同样具有诱惑力的自然主义所取代。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启蒙运动处心积虑地抽象出的城市理论所摧毁的首先是巴洛克城市的规划和发展模式；随后，它又成为一种阻碍（而非规定）新的持续发展模式的方式。

如此说来，相对于整个启蒙运动批评思想的主流而言，18世纪和19世纪的建筑文化扮演的主要是一种破坏性角色。由于尚不具备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等新的条件相一致的成熟的生产技术，建筑学被迫将自我批判的努力限定在两个方向的发展之中：

首先，作为一种斗争的策略，它对一切具有反欧洲主流思想的事物都情有独钟。比如，皮拉内西（Piranesi）的碎片主义就是新的资产阶级历史批评学的产物，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它同时也是关于批评的批评。在这里，哥特式的、中国式的和印度式的建筑、罗曼蒂克式的自然主义园林景观充斥着异国情调的幻想和煞有介事的人造废墟。在理论层面上，它们都与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Letters persanes*）、伏尔泰的《天真汉》（*Ingénu*）、莱布尼茨尖刻的反西方立场的总体思想氛围相一致。为了把理性主义和批判哲学结合起来，人们将欧洲的神话与一切有助于证实其有效性的事物进行对照。在英国园林中，正统的历史观念被放弃了。随着小教堂、亭台楼阁和人造假山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人类历史的丰富多样性似乎得到充分展现。但是，这一切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仅仅是在追求世外桃源。事实上，布朗（Brown）、肯特（Kent）和伍德（Wood）的“如画风格”，或者勒柯（Lequeu）的“恐怖之物”（horrid），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当建筑学已经失去创造“物体”的能力、正在沦为一种玩弄历史素材的技巧的时候，如何才能为建筑学寻求外在的基础？

如同所有无所畏惧的伟大的启蒙主义批评家一样，这些建筑师开始对建筑学及其全部规则进行系统的解剖。

其次，即使撇开它在城市中的形式作用不谈，建筑学仍然可以成为虚无主义之外的另一种选择，这种虚无主义曾经清晰地表现在勒柯、贝朗热（Bélange）或皮拉内西等人疯狂的想象之中。

为了避免自身的毁灭，建筑学在放弃传统的象征角色的同时，也发现了自己的科学职能。一方面，它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一种社会平衡器，因此必须全然面对建筑类型（building types）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迪朗（Durand）和迪布（Dubut）所做的。另一方面，它又认为自己能够成为一种感性的科学（a science of sensations）；勒杜走的是这条路，而梅泽尔（Le Camus de Mézières）则做得更为系统化。因此，一方面是类型学，另一方面则是**表现性的建筑**（*architecture parlante*），二者在皮拉内西那里激烈地冲突起来。但是，这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越发加剧了19世纪中建筑文化的内在危机。

于是，建筑学转而接受“政治化”的任务。作为政治的马前卒，建筑师不得不在最具有广泛应用意义的层面上不断寻找技高一筹的方案。对于这样的任务来说，意识形态的作用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应当重新认识现代史学所关注的启蒙运动乌托邦思想的确切意义。事实上，18 世纪欧洲的建筑命题并非由一些匪夷所思的空想组成。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当时所有建筑哲人的理论当中，都找不到支持在纯形式层面上进行城市变革的社会乌托邦设想的原因。

加特梅尔·德·昆西（Quatremère de Quincy）为第二版《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méthodique*）的“建筑”词条所写的导言，实际上是一篇现实主义的杰作，尽管这篇文章是用抽象的术语来表达的。

加特梅尔写道：“艺术是快感和需求的产物。因为有了艺术，人类才能承受生活的磨难，将记忆传给后代。不可否认的是，在所有艺术中，**建筑**占据着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即使只从实用的观点来看，它也比其他一切艺术更胜一筹。它滋养城市的肌体，守护人类的健康，保卫他们的财产，兢兢业业地为安全宁静和秩序井然的市民生活服务。”[2](p. 109)

同样，启蒙运动的现实主义也没有因为布雷这类学院院士们的超大尺度的建筑构想而改变。尽管这类方案有着辉煌的尺度、纯净的几何形体和夸张的原始主义特征，但是如果从它们的意图来看，其实际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与其说是不着边际的幻想，倒不如说是在新的建筑设计方法上进行的一种探索。

无论是勒杜和勒丘等人肆无忌惮的象征主义，还是迪朗类型学沉默的几何语言，启蒙运动的建筑之路完全符合它应当承担的意识形态角色。建筑学必须重新界定自身，因为它正在成为资产阶级城市结构的组成部分，并且完全融合在预先设定的类型学形式的统一体之中了。

但是，这一融合不是没有代价的。将洛吉耶的理论直觉推向极致的正是皮拉内西。如同他的《建筑学之我见》（*Parere sull'architettura*）是一篇一针见血的文学宣言一样，他的《罗马行军场组画》（*Iconographia Campo Marzio*）尽管意义晦涩，却是一座图形化的丰碑，它表明晚期巴洛克文化已经为大革命晚期的意识形态敞开了大门。①

皮拉内西的《罗马行军场》已经彻底摆脱了晚期巴洛克的**变化**（*varie-*

① 参见 G. B. Piranesi, *Iconographia Campi Martii*（1761－1762）；同作者，*Parere su l'architettura*，见 *Osservazioni*（Rome, 1765）；Werner Körte, “G. B. Piranesi als praktischer Architekt”, *Zeitschrift für kunstgeschichte*（1933）；R. Wittkower, “Piranesi's *Parere su l'architettura*”, *Journal of the Warburg Institute* 3（1938）, p. 2。

ty）原则。在这里，罗马古迹不仅作为一种被赋予意识形态怀旧和革命期望的参照物，而且还作为一种有待检验的神话。一切古典的派生形式都在皮拉内西手下变成了纯粹的片断、扭曲的符号、对大势已去的“秩序”所作的支离破碎的幻想。

尽管各自为阵的秩序并未直接产生“整体的骚乱”（tumulte dans l'ensemble），但却无疑导致了无意义符号的疯狂繁殖。与皮拉内西《监狱组画》（*Carceri*）中的施虐气氛一样，《罗马行军场》中的“建筑森林”表明，不是只有“沉睡的理性”才会导致妖魔鬼怪，“苏醒的理性”同样也会制造扭曲变态，尽管它的最终目标是崇高（Sublime）。

《罗马行军场》的批判思维具有一种先知先觉的品质。登峰造极的启蒙主义想象似乎是在悲哀而又郑重地警告：既然有机形式已经不复存在，整体性和普遍性的观念也将岌岌可危。

本来，建筑学还想极力维持它的完整性，避免彻底的分崩离析。然而，城市中支离破碎的建筑片断却令一切努力付之东流。这些片断宛如掉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完全丧失了自制力，尽管它们仍然有着看似连贯和完整的布局形式。在《罗马行军场组画》中，我们目睹的是建筑学向自我开战的史诗般的范例。一方面，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组织原则，建筑类型学的地位似乎确定无疑；但是另一方面，每一种建筑类型的构成往往又都在诋毁类型学概念本身。一方面，历史的固有“价值”跃然纸上；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全然不顾真正的考古学事实，令人对它的学术价值产生怀疑。一方面，形式创造可以唯我独尊；但是另一方面，整个城市肌体却在毫无节制的重复创造中转化为一个巨大的“瘫痪的机器”。

就此而言，理性主义揭示的似乎正是它自身的非理性特质。为化解自身的种种矛盾，建筑“理性”将震惊技术（technique of *shock*）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建筑片断各自为阵，如入无人之境，而它们的总体关系则表明，导致这些建筑片断的所有创造性努力其实都是徒劳无益的。

这里，城市的本质依然还是一个未知数。不过，皮拉内西的《罗马行军场》也休想愚弄我们：透过它的考古学假象，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实验性设计。它表明，运用设计手段创造新的秩序恒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个巨大的建筑拼贴（bricolage）还说明，理性与非理性并非势不

两立。诚然，皮拉内西并不具备将矛盾的辩证关系转换为形式的能力，因此他只能强调，在新的情况下，重要的是取得对立面的平衡。只有这样，建筑学才能幸免于难。

实质上，皮拉内西《罗马行军场》的主题正是建筑与城市的博弈。在这里，“启蒙运动的辩证法”对建筑学的影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辩证张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完全超越了它那个时代建筑同仁的理解能力。和无拘无束的启蒙运动文学一样，皮拉内西的放荡不羁乃是一种真理的揭示，而这个真理则是启蒙运动的建筑和城市规划在它们的发展进程中极力掩盖的。

尽管如此，洛吉耶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提出的城市分裂主义还是在米利萨（Milizia）的折中理论中得到再现。在《民用建筑的原理》（*Principi di architettura civile*）中，米利萨写道：

> 城市就像森林，而城市的组织与公园的组织也不无共同之处。城市必须有广场、十字路口、宽阔笔直的道路。但这还不够；平面必须设计得高雅有趣、韵味十足。在这里，井然有序与奇思异想、抑扬顿挫与变化无常应当和平共处。这边的道路宛如星光四射，那边的道路则酷似鹅掌；一边是鱼骨形，另一边则是扇形；还应该有平行的道路，随处可见三岔和四岔路口，以及大量的形状、尺度和装饰都完全不同的广场。[3](pp. 26-27)

通过下面一段文字，人们不难看出优雅的感觉主义论对米利萨的影响：

> 不懂如何将快感多样化的人绝不可能给我们带来快乐。简言之，（城市）应该是一幅由无穷无尽的偶发事件组成的变化万千的图画，局部秩序井然，整体则充满混乱、无序和喧嚣。[3](p. 28)

米利萨接着写道：

> 城市的平面应该这样来布局：辉煌的整体中充满无数美妙的局部，它们形态各异，彼此不会重复；并且，从街区的一侧到另一侧，

永远会有新奇独特和意想不到的东西出现。秩序必须统领全局，但是秩序中又充满混乱……大量各自为阵的局部必然导致整体的无序和非规整性，这就是大城市的真实写照。[3](p.29)

有序与无序、规则与不规则、有机整体与无机断裂，这一切都与晚期巴洛克城市崇尚的**变化统一**（*unity in variety*）原则相去甚远，该法则曾经在夏夫斯伯里（Shaftsbury）的作品中被赋予一种神秘的色彩。

如何对缺乏有机结构的整体进行控制？这样的问题正是洛吉耶、皮拉内西和米利萨——以及后来加特梅尔·德·昆西相对温和的观点——对建筑思想的贡献。换言之，这一控制必须以有机结构的缺失为前提，其目的不是去改变城市的结构，而是揭示多元意义的复杂性。但是，因循守旧的反对意见很快接踵而至。为捍卫维特鲁威（Vitruvius）的权威性和加利亚尼（Galiani）诠释维特鲁威的理想案例，乔瓦尼·安托里尼（Giovanni Antolini）对米利萨的《原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与此同时，与伍茨（Woods）、帕尔马（Palmer）主政下的巴思城（Bath）、爱丁堡的半圆形广场以及1803年的米兰规划中洋溢的经验主义和“如画风格”截然不同，默拉蒂（Muratti）的巴里（Bari）规划以及新的圣彼得堡、赫尔辛基和土尔库（Turku）规划则表现出一种严格的理性主义。

对于我们的分析来说，安托里尼与拿破仑统治时期的米兰规划委员会成员之间的思想斗争特别值得关注。

米兰规委会成员赞成在城市已有的结构基础上进行新的规划，因为米兰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问题只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委员会已经为它预设了特定的价值判断。米兰是众多力量和事件的产物，其中成见、神话、封建主义结构以及反改革势力都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因此，在规委会看来，这座伦巴第首府城市复杂的历史肌理必须从功能和形式上进行清理，以期更加合理化。与此同时，对米兰规划的评判还必须考虑新旧之间的碰撞：一方面，早先存在的部分构成了一系列蒙昧主义的中心；另一方面，大规模拆迁和改造后形成的新城区则是清晰明亮的新中心。在这样的碰撞中，一种显而易见而又富有价值的选择油然而生，清晰而又无可争辩地表达了某种有关城市未来和物质结构的观点。

因此，安托里尼等人的观点与拿破仑时期的规划立场相左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如果说拿破仑规划委员会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接受与城

市历史的对话、并且设法在城市肌理中弱化城市改造的意识形态含义的话，那么安托里尼则反对这种对话。他的波拿巴广场（Foro Bonaparte）设计不仅完全无视城市的历史，而且以绝对的意识形态价值为特征，它试图通过一体化的规划创造一个城市的中心，改变整个城市结构，重新赋予建筑不容置疑的思想传递功能（a communicative role）。①

立场的对立并不偶然：事实上，它与城市作为思想传递者的所有内容有关。在1803年委员会看来，传递新的思想和功能信息并不需要别的什么，只要有城市结构本身就行。

但是对于安托里尼来说，城市的重构必须依托一个独特的城市中心才能完成。这个中心威力四射，毫不妥协地将完全不同的价值强加在城市肌理之中。安托里尼认为，作为一种普遍话语和传递体系，城市需要一种绝对的强制性“信息”。

由此我们可以辨别现代艺术和现代建筑发展的**两条不同的道路**。这两条道路曾经在现代艺术发展的历程中反复出现：一方面，艺术力求深入现实，了解和表现现实的价值和弊端；另一方面，艺术则试图超越现实，希望在一张白纸上建构新的现实、新的价值和新的公共符号。

安托里尼和拿破仑委员会之间的对立也就是后来莫奈（Monet）与塞尚（Cézanne）、蒙克（Munch）与布拉克（Braque）、斯威特斯（Schwitters）与蒙德里安（Mondrian）、哈林（Häring）与格罗庇乌斯（Gropius）、劳森伯格（Rauschenberg）与瓦萨莱里（Vasarely）差异的本质所在。

然而，在洛吉耶的“城市森林”和安托里尼的贵族领地之间，还存在着第三条路。它注定成为运作和控制城市形态的新的方法基础。比如，朗方（L'Enfant）的华盛顿规划和威廉·潘（William Penn）的费城规划都运用了有别于欧洲模式的新方法。

这种实用主义的发展模式与美国社会与生俱来的价值结构之间的关

---

① 参见 G. Antolini, *Descrizione del Foro Bonaparte, presentato coi disegni al comitato di governo della Repubblica Cisalpina...* (Milan, 1802); A. Rossi, “Il concetto di tradizione nell'architettura neoclassica milanese”, *Società* 12, no. 2 (1956), pp. 474-493; G. Mezzanotte, *L'architettura neoclassica in Lombardia* (Naples: Esi, 1966)。

系，我们已经在别的地方多次阐述过，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重申这个主题①。

18世纪中期以来美国城市规划的巨大历史价值就在于，它总是努力与决定城市形态变化的力量保持一致，同时运用与欧洲模式完全不同的实用主义方式来控制这些力量。

美国城市善于运用规则的道路网格，将它作为支撑城市结构的简单而又灵活的方法。正是由于持续不断的可变性，美国城市才取得了欧洲城市望尘莫及的成就。在美国城市中，建筑单体拥有绝对的自由，这种自由并不会在形式上对它的语境产生太大的影响。美国城市注重表现构成城市形象的次要元素，而且为这些元素制定了严格的整体法规。

在这里，城市规划与建筑最终各司其职。在华盛顿规划、费城规划以及稍后的纽约规划中，规划设计的几何特征并没有反映在单体建筑的形式之中。与圣彼得堡或柏林的情况不一样，这里的建筑可以千姿百态，表现完全不同的思想内容。城市系统的任务只有一个：通过一个在形式上严格而又稳定的参照体系，确保单体建筑的形式自由。这样，到19世纪中期之后，蕴含着无限表现可能的城市结构终于演变成一种开放的网格系统。自由贸易伦理与开拓者神话在这里不期而遇。

二、形式回归乌托邦

至此，我们对18世纪建筑文化经验和期待所作的简短分析已经清晰地表明，传统的形式概念已经危机四伏。导致这一状况的根源在于人们已经意识到，将城市视为传递思想的自主领域是完全不够的。

---

① 参见 L. Benevolo, *Storia dell'architettura moderna* (Bari: Laterza, 1960); M. Manieri-Elia, *L'architettura del dopoguerra in U. S. A.* (Bologna: Cappelli, 1966)。“在城市规划的层面上”，Manieri 就1807年的纽约城市规划写到，“清教徒的、‘反建筑的’态度显然正好符合于杰弗逊式的、自由的个人主义，其中，制度就正如《(美国)独立宣言》中清晰表明的一样……包括了某种有可能最易应对的功能支持：如果政府在涉及不可剥夺的人权时始终都只是一种灵活可变通的工具的话，那么，这就更证明了，城市规划应该提供最大限度的弹性保证，并且对生产的主动权显示出最低程度的抵抗”(pp. 64—65)。另参见美国城市形成的杰出文献，J. W. Reps, *The Making of Urba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从一开始，启蒙运动的建筑就形成了现代艺术道路的一个基本原则：形式的不连贯性和结构的非有机性。不无意义的是，这种全新的形式价值从一开始就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赖以生存的新型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

但是，理论家们对形式原则进行重构的诉求与其说导致了真正意义的革命，还不如说引发了一场尖锐的价值危机。整个19世纪，工业城市表现出来的新问题和新维度都在加深这一危机。在顺应城市现实的发展过程中，艺术艰难地寻找着适合自己的道路。

另一方面，有机形式的分崩离析主要还是在建筑领域，没有对城市产生太大的影响。通常，人们在观察维多利亚建筑的时候，很容易被这些怪异的“庞然大物”所震惊。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19世纪的建筑师来说，折中主义和建筑语言的多元化正是对技术的“精确世界”及其新的物质环境所诱发的多重性和分裂性的恰当回应。

但是，除了用一种“似是而非”的方式应对之外，建筑师们对“精确世界”的要求其实是一筹莫展。这并不奇怪，因为只有城市结构本身才能见证技术进步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冲突。技术的进步彻底改变了事物的维度，使之成为一个开放的结构，其中一切寻求平衡的努力都注定要成为一种乌托邦的立场。

然而，按照传统的观念，建筑学仍然是一个稳固的结构，它可以强化城市形态，表达某种永恒的价值。

对于那些希望放弃这一传统观念、将建筑与城市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人来说，唯一的选择只有将城市看成是技术生产的特定场所和技术产品本身，这就将建筑简化为生产链中的一个环节。皮拉内西就曾预言，资产阶级城市必将成为一个“荒诞的机器”。事实上，皮拉内西的预言在19世纪的大都市中终于变成现实：城市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结构。

起先，控制大都市发展的“分区制”（zoning）并不试图掩盖自己的阶级特征。这样，激进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也就确实很好地揭示工业城市的非理性特征。然而人道主义者忘记了（这一点绝非偶然），这种非理性特征只有在人们对现实缺乏深入了解的时候（au dessus de la réalité）才成立。人道主义的乌托邦和激进的批判立场最终导致的结果多少有些匪夷所思：他们相信，可以借助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将理性与非理性统一起来。

由此看来，问题已经盘根错节地隐含在城市意识形态的构成之中。在抽象的层面上来说，这一问题也是19世纪的造型艺术（figurative arts）十

分熟悉的，因为浪漫折中主义的真正起源就是重新肯定暧昧（ambiguity）的批判价值，这种暧昧曾经在皮拉内西那里达到极致。

穿着尚古怀旧和追求崇高的外衣，皮拉内西成为亵渎建筑神灵的第一人，就像充斥着陈词滥调的浪漫折中主义成为人类环境无情商品化的代言人一样。一切都寄予在无声的虚妄和暧昧之中，就好像是为了表明，真实性（authenticity）已经一去不复返，任何主体力量都无法将它挽回。

19世纪的暧昧性就在于这样一种放荡不羁的虚假意识（a false conscience），它试图通过展示自身的非真实性来寻求最终的伦理救赎。如果说考古成果的肆意堆砌只是这一模糊性的标志和工具的话，那么城市则为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用武之地：在印象主义绘画中，当人们不得不置身于城市结构之中进行观察的同时，又通过客观和科学的分解手段，成功地游离于城市的真实含义之外。

对于这一状况，如果说最初的政治反响带有强烈的传统乌托邦色彩的话（尽管启蒙运动似乎已经抛弃了这一理想），那么视觉交流方式的独特回应则导致了一种新型乌托邦，它暗含在现实活动之中，或者说暗含在可见“事物”的具体性之中。出于这样的原因，尽管19世纪乌托邦的政治立场与“现代运动”思想的关联看起来很多，但都不是十分直接。确实，我们必须思考现代史学家们通常建立的某些史学关联，其中不仅涉及傅立叶（Fourier）、欧文（Owen）、卡贝特（Cabet）的乌托邦理念与昂温（Unwin）、格迪斯（Geddes）、霍华德（Howard）、斯坦恩（Stein）的理论模式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应该涵盖前者与戛涅-柯布西耶流派（Garnier-Le Corbusier current）的关系。这些关联都还尚待仔细考察。很有可能，它们最终都取决于这些关联原本应该阐释的一系列现象本身。①

无论如何，有一点很清楚：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乌托邦问题上的独特见解，对新的城市意识形态的形成产生了两个直接影响：

（1）通过严格的结构思考，揭示乌托邦思想的错误所在，同时也揭示

① 不能以同样的标准，将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及其为城市重组所做的提案，统统视为现代运动的意识形态的构成。这里，我们只能暗示，由乌托邦浪漫主义所扮演的角色——它和各种意识形态完全不同。但是，这一角色的发展，尤其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规划实践中的发展，应当同（美国）新政所制订的模式进行比较。然而，这一分析将大大超出当前文章的界限。

了乌托邦观念与生俱来的渴望走向自我毁灭的内心世界。

（2）通过对浪漫主义梦想的批判——这种浪漫主义认为主观行为能够对社会命运产生直接影响，它清楚地表明，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所谓的命运（destiny）原来只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物。作为一个从真实现象中提炼出来的概念，命运问题的阐述不仅构成了资产阶级伦理价值的基础，而且也有助于医治“命运”在所有社会生活层面上导致的痛苦和贫瘠。后面这一点在城市这个社会生活的典型形式上表现得尤为显著。

在“现代运动”的意识形态的发展中，乌托邦思想的终结与现实主义的诞生并非毫无关系。相反，大约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理想（realistic utopianism）与乌托邦思想中的现实主义（utopian realism）就已经开始相互重叠和补充。社会乌托邦理想的破灭加速了意识形态向利润规律主导下的**物体政治**（*politics of things*）的过渡。无论在艺术层面还是在城市形态的层面，建筑的意识形态注定只能成为一种形式的乌托邦，因为它试图通过理想化的形式综合，重建人类的整体世界，用秩序征服混乱。

因此，鉴于它与生产现实的直接关系，建筑就成为第一个义无反顾地接受自身的商品化发展的文化种类。就其总体而言，早在掌握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机制之前，现代建筑就已经从自身特有的问题开始，营造出一种意识形态氛围，将设计与旨在重组资本主义城市生产、分配和消费方式的全盘计划全方位地融合在一起。

如果将现代运动的进程作为资本的意识形态工具来分析的话［这个进程大约始于1901年，也就是东尼·戛涅（Tony Garnier）完成“工业城市”的那一年，到1939年左右为止，那时现代运动的危机开始在所有层面和区域呈现出来］，那么我们的历史追溯就可以分三个前后相互关联的阶段来进行：

（1）在第一阶段中，城市意识形态构成了克服建筑浪漫主义的一种途径。

（2）在第二阶段中，作为一系列意识形态计划，艺术先锋派试图通过建筑和城市规划完成绘画、诗歌、音乐、雕塑等艺术形式无能为力的任务，因为绘画、诗歌、音乐、雕塑只能在理想层面上谈论问题，而建筑和城市规划是唯一有望将理想转化为现实形式的艺术种类。

（3）然后是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建筑意识形态（architectural

ideology）转化为一种规划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f the Plan）。但是在1929年的大萧条之后，随着反循环理论的出现和国际资本的重组，这一阶段也开始危机四伏。最终，当建筑的意识形态功能时过境迁，或者说无足轻重的时候，这一阶段便只能面临全面终结。

在后文中，我无意对这一过程进行面面俱到的阐述；我的目的仅限于勾画其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关键点，希望能够对后继研究和更为细致的分析提供方法上的框架。

三、先锋派的辩证法

非常需要强调的是，当本雅明（Benjamin）对他所谓的恩格斯在都市大众问题上的“道德立场”（moral reaction）进行批判的时候，他也借助恩格斯的观察引入这样一个主题：工人阶级的状况已经成为都市结构中的普遍状况①。

我们不一定要认同本雅明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的偏见。我们感兴趣的是，本雅明是如何从恩格斯对大众的描述，走向对波德莱尔（Baudelaire）与大众关系的思考。在本雅明看来，恩格斯和黑格尔对都市大众的看法都没有注意到都市现实中蕴含的新的品质和量化内涵；相比之下，巴黎式闲者（Parisian flaneur）在都市人群中悠然自得的漫步方式才是都市生活的自然状态。

不管（波德莱尔）与人群保持多大距离，不管他想在人群中获得怎样的自我空间，他总是会被它侵染，因为他无法像恩格斯那样将自己置之度外。……人群已经注入在波德莱尔的血液之中，以至他的作品很少专门描述人群……波德莱尔既不专门描写巴黎人，也不专门描写巴黎，而是借此说彼。他的大众总是这座大都市中的大众，他的巴黎也总是人群嘈杂的巴

---

① Walter Benjamin, “On Some Motifs in Baudelaire”, *Illuminations*, edited by Hannah Arendt, translated by Harry Zohn, New York: Brace and World, 1968。“恩格斯被大众弄得灰心丧气，”Benjamin写到，“他以一种道德反应和一种美学反应，作出回复；人们彼此匆匆而过的速度使他感到不安。他描述的魅力在于不可动摇的批评完整性与一种旧式态度的交织。作者来自一个仍算外省的德国；他可能从未面对过让自己迷失在人流之中的诱惑”（p. 169）。

黎。这一点使他比巴尔比耶（Barbier）更胜一筹，因为后者的描述方法往往导致了大众与城市的分离。在（波德莱尔的）《巴黎风光》（*Tableaux parisiens*）中，若隐若现的大众几乎无处不在。[4](pp. 169-170)

城市的使用者不知不觉地被城市利用，在他们的“公众”行为中呈现出——或者说无所不在地体现出——一种真正的生产关系。人们可以在波德莱尔这类观察者的存在中看到这层关系。作为一名观察者，诗人不情愿地看到，在日益广泛的商品化进程中，他的参与地位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与此同时，他发现诗人的最终命运就是自甘堕落①。

波德莱尔的诗，就像是世界博览会上的展品；或者说如同奥斯曼（Haussmann）推行的城市改造中的形态变革，体现着对同一性与差异性不可分解的、动态的辩证关系的全新认识。当然，对于新的资产阶级城市结构而言，谈论规则与例外（the rule and the exception）之间的张力还为时过早。但是，客体的强制性商品化与恢复客体的真实性的主观努力之间的张力已经存在，尽管这是一种虚妄的主观努力。

问题是，寻求真实性的唯一途径只能是离经叛道。这不仅因为波德莱尔这样的诗人已经不得不接受自己的小丑命运——这也恰好说明为什么同时代的艺术在表达“豪情壮志”的时候，又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过是虚张声势的把戏而已——而且也因为城市已经在客观上成为一部榨取社会剩余价值的机器，它通过自己的调节机制，对现实的工业生产方式进行着再生产。

本雅明认识到，在工业劳动者那里，手工艺生产者的生产**技巧**和**经验**已经不复存在，而这种情况又与都市状况中特有的**震惊**（*shock*）体验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写道：

> 非熟练工人是机器训练出来的，他们是受凌辱最厉害的那一部分人。他的工作与经验毫不相干，练习在这里变得一文不值。游乐场的碰碰车以及其他类似的逗人玩意儿为人提供的不过是一种品尝接受训练的滋味而已，这与非熟练工人在工厂里接受的训练别无二致——而

① “随着大城市的出现，卖淫拥有了新的秘密。其中之一即城市自身的迷宫式特征。迷宫的图像已经溶入*flaneur*［闲逛的人］的血肉之躯，而迷宫同时被卖淫活动生动地建构起来。”Walter Benjamin，“Central Park”，*New German Critique* 34（1985），p. 53。

且他们常常别无选择，因为游离在边缘世界的小人物们要么接受游乐场式的训练，要么失业。坡（Poe）的作品［本雅明在这里谈到了波德莱尔翻译的《茫茫人群》（The Man of the Crowd）］使人们看清了离经叛道与循规蹈矩之间的真正关系。他描述的行人仿佛已经适应了自动化机器，只能机械地表达自己。他们的行为是一种对震惊的反应。“如果被人撞了，他就谦恭地向撞他的人鞠躬”。[4](p.178)

可以说，震惊体验的行为密码与赌博的技巧并无太大的区别。“由于在机械化生产流水线中，每一个工人的操作都与前一个毫不相干，就像赌博中骰子的每一掷都与前一掷没有任何关联一样。在某种意义上，工作的单调性和赌博的单调性简直就是如出一辙，两者都缺乏实质内容。”[4](p.179)

尽管本雅明的观察可谓一针见血，但是，无论在对波德莱尔的论述中，还是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他都没有将生产方式对城市形态的影响与先锋派运动在城市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联系起来。

巴黎的拱廊街和大型百货商店就像一个巨大的世界博览会。在资本看来，它是大众自我教化在空间和视觉上的一面镜子。但是，必须看到，在整个19世纪，这种以特殊建筑类型为集中体现的娱乐式教化体验仍然有着强烈的局限性。事实上，公众的意识形态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城市意识形态的一个侧面。在这里，作为名副其实的生产单元，城市成为一种协调生产——分配——消费环节的工具。

这就是消费的意识形态非但不是孤立的和后续的生产组织环节，反而必须将自己作为一种**正确的**城市生活的意识形态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原因之所在。［这里，或许应该回顾一下生活方式对欧洲先锋派尤其是路斯的重要性。1903年从美国回来以后，路斯出版了两期《他者》（*Das Andere*）杂志，它们用反讽的方式争辩道，应该在维也纳中产阶级中推广一种新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

就像波德莱尔的诗中表明的那样，一旦大众的体验转化为持久的参与意识，可操作现实（operative reality）的观念就被推而广之，尽管还没有达到一统天下的程度。正是在这个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现代艺术的语言学革命粉墨登场了。

20世纪先锋派有太多的使命需要承担：他们要将震惊体验从一切自动化（automatism）中解救出来，并且以此体验为基础，找到资本主义大都

会的视觉和行为密码（其特征就是快速的变化和重组、应接不暇的交流、与日俱增的使用频率、折中主义等等）；他们要将艺术经验的结构浓缩到纯粹的物体之中（一种物化的隐喻）；他们还要让公众作为一个整体加入意识形态的战斗，并且声称自己是超阶级的，因而也是反资产阶级的。

必须重申，就其总体而言，也就是说如果一视同仁地看待构成派（Constructivism）和反抗艺术（the art of protest）的话，那么就应该说，历史先锋派的诸多流派如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风格派等，都是随着工业生产的典型法则应运而生的，这些法则的本质就是持续不断的技术革命。所有先锋运动（这不只指绘画方面的）的基础都是组合法则（the law of assemblage）。既然组合物体与真实世界别无二致，那么绘画就成了一个投射城市**震惊体验**的中性地带（neutral field）。现在，关键的问题不再是如何“忍受”震惊，而是要对震惊进行充分的化解和吸收，将其转化为存在的必要条件。

因而，生产规律成了新的文化习俗的一部分，俨然是一副“自然而然”的模样。这就是为什么先锋派对处理与公众的关系问题不屑一顾的原因。事实上，在先锋派看来，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既然先锋派是在对某种必然和普遍的事物进行诠释，那么，暂时不被大众理解就是情有可原了。而且它非常清楚，自己的行动模式和价值前提就是与历史一刀两断。

艺术，就是一种行动模式。这是现代资产阶级艺术救赎的最重要的主导原则。但是另一方面，绝对化也产生了新的、不可抑制的矛盾。在这里，生活和艺术相对立，人们不得不选择要么协调这一矛盾，要么促使艺术进入生活。前者的危险是使整个艺术生产将艺术与生活的矛盾视为新的道德准线；而后者的代价则有可能是黑格尔有关艺术死亡的论断不幸言中。

正是在这里，将资本主义艺术的伟大传统聚集成一个单一整体的种种关系得到了具体的呈现。我们曾经谈到，作为一位理论家和批评家，皮拉内西对不再具有普遍化意义、但又未资产阶级化的艺术状况进行了思考；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对皮拉内西的这一分析是如何有助于澄清我们的问题了。批评、矛盾（problematics）、构想（programmatics）：这些都是支撑“现代运动”的基本要素。作为一场试图将“资产阶级者”（bourgeois man）塑造成一种绝对“类型”（type）的运动，它无疑有其自身内在的一致性，尽管这种一致性还没有被当前的史学家们充分认识。

无论皮拉内西的《罗马行军场》，还是毕加索的《女人与小提琴》

(Dame au violon)，它们都是彻头彻尾的计划（programs），尽管前者涉及的是建筑问题，而后者则是以人体行为模式的面貌出现。他们都运用了震惊技术，差别在于，皮拉内西的蚀刻画借用的是已有的历史素材，而毕加索的油画则完全是人工素材的运用（后来的杜尚也这样做，方法更为严格）。两者都发现了一个机械世界的现实，尽管皮拉内西的18世纪城市规划把世界转化为一个抽象的恐怖怪物，而毕加索的作品完全融合在这一现实之中。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皮拉内西和毕加索都试图将某种当时仍是特殊案例的事物普遍化。他们所用的方法也完全一样，都是首先对形式进行深刻的批判性思考，然后将这一思考获取的认识大量释放出来。然而，立体主义绘画中蕴含的“计划”已经不满足仅仅以油布作为载体。波拉克（Braque）和毕加索从1912年开始探索现成品（“ready - made” objects）艺术，后经杜尚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全新的表现形式，它不仅充分认可了现实的自足性，而且也宣判了一切再现形式的死刑。画家能做的只是分析现实。他宣称控制着形式，这只不过是在掩盖某种他不愿接受的事实：如今，正是形式控制着画家。

除此之外，现在还必须将“形式”理解为一种主体反映的逻辑，一种对客体的生产世界进行主体反应的逻辑。作为一个整体，立体主义力图对这些反应的法则作出限定。在这一点上，立体主义的特征就是从主体出发，最终走向对主体的彻底否定（正如阿波里奈尔不无忧虑地领悟到的那样）。作为一种“计划”，立体主义力求实现的就是一种行为模式。然而，它的反自然主义对公众却没有任何说服力，因为只有当我们觉得说服的内容不仅外在于、而且也施加于被说服者的时候，我们才会去说服某人。确实，立体主义的意图就是揭示资本创造的“新自然”（new nature）的现实面貌、必然性和普遍的特征。在此现实中，必然性和自由完全重合在一起。

这就是为什么波拉克、毕加索，甚至还有朱安·格里斯（June Gris）都在画布上采用组合技术（the technique of assemblage）的原因，目的就是赋予**机械文明**(*civilisation machiniste*）的语言世界一种绝对形式。原始主义和反历史主义都只是这些基本选择的结果，而非原因。

作为对总体化世界进行分析的不同技术，立体主义和风格派都明确要求行动。在对这些艺术产品进行论述的时候，人们很容易过分**夸大艺术作品的作用，或者将其神秘化。**

必须挑战公众的精神状态。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积极地进入由生产规

律控制的**精确世界**（*universe of precision*）。换言之，必须克服波德莱尔式“游手好闲者”的被动性，使之积极地投身到城市生活中去。诚然，无论是立体主义的绘画，还是未来主义的“亵渎”，甚或是达达派的虚无主义，都不是特别针对城市本身的，但是先锋派似乎一直认为城市是自己的价值基准点。蒙德里安后来勇敢地将城市“命名”为新塑性主义构图的最终对象，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一旦被解释为都市结构，已经简化成一种纯粹的行为方式的绘画艺术必将是死路一条。

波德莱尔发现，诗人总是试图将自己从客观条件中解放出来，这也进一步加剧了诗歌产品的商品化：在艺术家极致的人性真诚之后接踵而至的就是他的堕落。正是风格派，或者在更大程度上是达达主义发现了通向艺术自杀的两条路。一个是由于过分理想化而被充满矛盾的城市结构所吞噬；另一个是在艺术活动的结构中过多地加入非理性因素，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理想化和对城市的逃避。

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说风格派最终演变成对艺术产品进行形式控制的一种方法的话，那么达达主义则是在揭示自身内在的荒谬性。但是，达达主义的虚无主义批评最终也沦为一种控制设计的工具。因此，即使在文献学的语境（philological context）之内，人们发现20世纪中最具“建构”（constructive）倾向的先锋派与最具破坏性（destructive）的先锋派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确实，达达派曾经对语言素材进行粗暴的肢解，也对任何预设的程序持一种反对态度，如果不说这种反对态度归根结底是对机械化和商业化“价值”的艺术升华的话。但是，当问题已经扩展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所有层面时，究竟还有什么达达精神可言呢？风格派和包豪斯，前者以宗派的态度，后者则以折中主义的方式将**规划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f the plan*）引入到他们的**设计**方法之中，而这种设计方法又是与作为生产结构的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尽管从未公开宣称过，达达主义却以一种荒谬的方法证实了规划的必要性（the necessity of the plan）。

此外，所有历史先锋派都将政治党派的行为模式据为己有。如果说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可以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精神的特殊体现的话，那么风格派和包豪斯则毫不犹豫地力求表明，自己可以成为政治实践的一种普遍适用的选择。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选择无不具有道德抉择的种种特征。

风格派的**形式**原则与混乱（Chaos）、经验主义以及与日常生活背道而

驰，它关注的是如何处理那些使现实变得杂乱无章、混沌不清而又索然无味的事物。风格派拒绝接受工业生产的全部价值体系，认为它导致了精神世界的极度匮乏，但随后又在艺术升华中将它转化为一种新的价值。借助于基元形式（elementary forms）的新塑性主义分解技术，风格派发现精神世界的“新财富”并不能完全脱离机械文明的“新贫困”来获得，而拆开重组的基元形式就是对机器世界的艺术升华。它同时也说明，不再有什么形式可以重温整体性（存在的整体性、艺术的整体性）的旧梦。除非，这种整体性涉及的只是形式自身的问题。

与之不同的是，达达派积极拥抱混乱。在达达派看来，表现混乱就是肯定现实，同时也是反讽现实。这是一种诉求，一种以往从未得到满足的诉求。但是，这种诉求与风格派对混乱的形式控制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欧洲构成主义潮流、甚至可以追溯到从清澈性（Sichtbarkeit）开始的整个19世纪形式主义美学，都试图在这种形式控制中寻求视觉交流的新视界。换言之，达达派的无序（Anarchy）和风格派的秩序（Order）其实是殊途同归。因此毫不奇怪，在理论层面上它们可以在《机械》（*Mécano*）杂志的评论中合而为一，而在操作层面上它们又可以共同融合在一个新的语法工具的系统陈述之中。

确切地说，对于历史先锋派来说，混乱与有序已经顺理成章地成为新资本城市的两种“价值”。

当然，**混乱**属于既有现实，而**秩序**则是目标。但是从现在开始，**形式**的寻求不再独立于**混乱**之外，相反应该存在于**混乱**之中：正是秩序为混乱提供了意义，将其转换成价值，转换成“自由”。为克服消费性城市固有的杂乱无章，人们必须依靠城市的一切进步价值。规划，就这样成为先锋派履行其助产术式职责的工具，尽管他们后来发现自己其实无力赋予规划任何具体形式。

正是在这一点上，建筑介入进来了。它吸收和克服了历史先锋派的一切诉求，或者说，使这些诉求相形见绌，因为建筑可以提供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风格派以及各种构成主义与产品主义诉求的真正答案。

作为各路先锋派汇聚一堂的地方，包豪斯履行的是这样一种历史职责：它按照社会生产的现实需要来检验先锋派，并对之进行筛选。在这里，设计与其说是一种构造物体的方法，不如说是一种组织生产的方法。它一扫先锋派诗性幻想中固有的乌托邦色彩，使意识形态不再是行动之外

的夸夸其谈，而是成为行为自身的内在成分，因为意识形态已经与真正的生产环节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更加具体化了。

然而，尽管具有种种现实主义特点，设计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事实上，就其在企业和生产组织上的抱负而言，设计仍然带有乌托邦主义的色彩。（这种乌托邦主义的目标是社会生产的重组，而且它的倡导者也曾信誓旦旦，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主流建筑运动对之无不趋之若鹜（“先锋派”一词在此已经不再适用）。但是，从勒·柯布西耶1925年的伏瓦生规划（Plan Voisin）和包豪斯1921年前后的创立时期开始，规划就包含了以下矛盾：既然一切都始于建造行业（building sector），那么建筑文化就只有将建造行业与城市的重组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既定的目标。换言之，如同先锋派的诸多诉求最终演变成那些与经济过程直接相关的视觉艺术行业（如建筑与工业设计等）一样，建筑和城市理论家的规划理想的最终指向也超越了自身的范围：它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和消费重组，而且也成为一种**资本规划**(*plan for capital*)。就此而言，建筑学变成了现实与乌托邦的调节工具，尽管它最初的出发点只是建筑自身。乌托邦一直都在掩盖这样一个事实：要想在建筑生产中实现规划的意识形态，真正的规划就必须在建造行业之外才能形成；而且，一旦规划进入了生产重组的普遍领域，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就转化为它的客体，而不是主体。

20世纪20年代的建筑学还没有作好接受这一结果的准备。它只是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政治”角色。要么走建筑之路（在此，建筑的意思应该是指建筑生产的有计划重组和作为生产有肌体的城市的重组），要么革命。勒·柯布西耶非常清楚地提出了这一选择，它同样也若隐若现地体现在蒙得里安、格罗比乌斯等人的思想之中。

与此同时，从那些最有政治参与意识的艺术派别开始，比如十一月集团（Novembergruppe）、G评论或者柏林小组（Berlin Ring）等，建筑文化都是从技术的角度来定位自己的。对于在中欧国家兴起的新客观派（Neue Sachlichkeit）来说，先锋派的至理名言，如“艺术的死亡”等，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知识分子的作用则纯粹是“技术性”的。他们甚至认为可以通过某种设计方法来取得装配线的理想结构。工业劳动的形式和方法就这样成为设计的一部分。相应的，这些形式和方法也在设计产品的使用功能之中充分体现出来。

从标准化的工业部件，到单体建筑，再到整个居住区（the siedlung），

最后到城市，这是两次大战之间的建筑文化清晰展现的一条发展道路。在这个进程中，每一个“环节”（piece）都被充分化解，最终趋向于消失，或者更准确地说，它的形式完全融合到整体之中。

这一切的结果就是美学体验的彻底革命。现在，审美不再仅仅局限于**客体**（*objects*）本身，而是扩展到整个过程的体验和使用之中。密斯和格罗比乌斯的“通用”空间需要使用者，这就使后者成为整个过程的中心要素。建筑需要公众的参与，因为新形式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们绝对的单体本身，而是社区生活组织的一系列构想。就像格罗比乌斯的**一体化建筑**（*integrated architecture*）提出的那样，它最终将推动公众意识形态的发展。但是，即使莫里斯所谓的艺术源自大众又服务于大众的浪漫社会主义梦想，最终也不得不将它的意识形态屈从于利润法则的硬道理。就此而言，理论假设的最终检验必定是城市。

四、“激进的”建筑与城市

路德维希·希尔伯塞姆（Ludwig Hilberseimer），在他的经典著作《大都市建筑》（*Grossstadtarchitektur*）中这样写道：

> 就其本质而言，大都市建筑是两种要素作用的结果：居住单元（cell）和整体的都市机体。作为构成住所的要素，单个房间的形式必将影响住宅的外貌；同样，由于街区是由住宅形成的，所以房间必然成为都市构成中的一个要素，它代表了建筑的真正目的。反过来，城市的平面结构也将对居住与房间的设计产生实质性的影响。[5](p.100)

按照上述观点，大都市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统一体。撇开作者的真实意图不谈，我们也许可以用以下的一句话来诠释他的主张：在结构层面的意义来说，整个现代城市就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机器”（social machine）。如同二、三十年代的大多数德国理论家一样，希尔伯塞姆将城市经济学的这一特殊内容单独提炼出来，对其组成部分进行彻底的分析和分解。希尔伯塞姆关于建筑单元和城市有机体关系的论述很能说明问题，清晰而且巧妙地将问题简化到最本质的内容。在这里，居住单元不仅是城市生产链中的第一要素，而且还决定着整个城市建筑群体的活力。同时，作为一种建

筑**类型**(*type*)，它又特别适合抽象的化解和分析。就此而言，建筑单元代表的是城市生产计划的基本结构；有了这一基本结构，一切其他类型元素都变得无足轻重了。单体建筑物（unità edilizia）就不再是一种“客体”，而是一个场所，一个让个体单元进行基本组合、并最终获得物质形式的场所。由于这些单元可以无限制地进行复制和生产，构成城市生产链的基本结构，它们在本质上与传统建筑学的“场所”（place）和“空间”（space）等概念就是迥然不同的。由此出发，希尔伯塞姆将整个城市有机体归结为他的理论定律中的第二个要素，从而使对城市规划具有决定意义的居住单元与城市整体相辅相成。通过改变居住单元的组合原则，城市的整体结构甚至可以反过来改变单元的类型①。

在严格的生产计划系统中，传统建筑学的特定维度不复存在了。建筑物原本还可以为千篇一律的城市提供局部的亮点，但是现在这一“点缀”功能也被彻底瓦解了。希尔伯塞姆写道：

> 如果说传统城市是按照多样性的普遍规律来塑造建筑群体的话，……那么现代城市则更加强调普遍原则，更加无视特殊性和细微的差异。数量化标准压倒一切，迫使混乱具有形式，而且是符合逻辑的、意义明确的数学形式。[5](p. 103)

此外，他还再次写道：

> 如果将不同种类的、通常是体量巨大的物质按照普遍有效的形式法则进行塑造的话，就必须把建筑简化为最规范、最必需、最符合普遍需要的形式，也就是能够代表一切基本建筑元素的立体几何形式。[5](p. 103)

---

① 从此得出了“竖向城市”的模式，按照 Grassi 的说法（Un ídea di piano 的导言，关于 Hilberseimer 的 *Entfaltung einer Planungsidee* 的翻译［Padua: Marsilio, 1967］, p. 10），“竖向城市”被表现为 Le Corbusier 在 1922 年的秋季沙龙（Salon d'Automne）上所提交的“3 百万居民的城市”的理论替代物。还应注意的是，尽管他有着超然的严格，Hilberseimer——并不相符的是，他是“1919 年 9 月小组”（1919 Novembergruppe）的成员，也是之后所有“激进的”知识分子团体的成员——还是在他迁至美国并进行了自我批判后，有所接近那些共产主义社会提倡者和自然主义神话。它们在新政的意识形态因素中逐渐成形。

这可不是一个“纯粹主义”的宣言，而是一个以科学方法为思想前提的理论观念所能得出的逻辑性结论。它并没有提出什么设计的“模式”，而是试图在最为抽象的（也是在最为普遍的）的层面上为设计建立一种坐标和纬度。与同时期的格罗皮斯、密斯、布鲁诺·陶特等人相比，希尔伯塞姆更加彻底地揭示了欧洲的资本重组对建筑师们提出的全新任务。

面对现代化的生产技术以及市场的极度扩张和理性化，作为“客体”创造者的建筑师实际上已经无能为力了。现在，问题不再是为城市的个体元素创造形式，甚至也不再是寻找简单的原型形式。因为一旦真正统一的生产过程成为城市的主要生产过程的话，那么建筑师唯一能做的工作就是去组织这个过程。在这里，希尔伯塞姆把他的命题推向了极致，坚持不懈地探讨建筑师的“组织者模式”，因为这是唯一能够满足泰勒式建筑生产需要的模式，也是唯一能够反映与生产过程完全融为一体的技术人员所承担的新的历史角色的模式。

基于上述立场，希尔伯塞姆成功地化解了建筑的“客体危机”的问题，这一问题曾经深深困扰着路斯和陶特等建筑师。在希尔伯塞姆看来，并不存在什么“客体”的危机，因为“客体”的创造已经无关紧要。真正重要的问题来自于组织法则——应该说，这是希尔伯塞姆对现代建筑思想的最大贡献。

此外，人们一直没有充分认识到，希尔伯塞姆完全拒绝将建筑作为一种知识工具来看待。即使是密斯，也曾经在这个问题上动摇不定。在柏林的非洲大街（Afrikanische Strasse）住宅中，密斯还比较接近希尔伯塞姆的观点；但是到斯图加特的维森霍夫住宅实验展（Weissenhofsiedlung）的时候，他的立场开始发生动摇。尽管如此，密斯的曲线形玻璃摩天大楼方案、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纪念碑、1935年的住宅设计以及图根哈特住宅（Tugendhat house）还是展现了一个具有反思精神的建筑师仍然拥有的可能性。

这里，我们无意深究这一辩证关系（dialectic）的内在运作，尽管它曾经贯穿了现代运动的整个历史。我们应该指出的是，现代运动道路上出现过许多矛盾和障碍，而这些矛盾和障碍都与技术命题与认识目的的断层息息相关。

恩斯特·梅（Ernst May）的法兰克福规划、马丁·瓦格纳（Martin

Wagner）的柏林规划、弗里茨·舒马赫（Fritz Schumacher）的汉堡规划，以及康乃利斯·范伊斯特伦（Cornelis van Eesteren）的阿姆斯特丹规划都是现代城市规划史中里程碑式的作品。无一例外，它们都包含了沙漠绿洲般的住宅小区（Siedlungen），一些位于城市边缘、对城市现实无足轻重的名副其实的**构建的乌托邦**（*constructed utopias*）。但是，旧城仍然矛盾重重，而且大部分矛盾很快比试图控制它们的建筑环境更具活力。

正是表现主义建筑成功地吸收了这些矛盾中蕴含的活力。从维也纳住宅大院（Höfe）到波尔泽西（Poezig）和门德尔松（Mendelson）的公共建筑，表现主义建筑显然与先锋运动的城市干预方法格格不入。在许多方面，这些建筑拒绝接受现代主义的艺术观点。按照这一观点，艺术自身的“机械复制”可以作为承载人类行为的手段。尽管如此，表现主义建筑仍然与现代主义艺术一样具有某种批判价值，尤其在现代工业城市发展的意义上来说，意义更加重大。

诚然，无论是波尔齐西设计的柏林剧场（Schauspieltheater），还是以赫格尔（Fritz Höger）的智利大厦（Chilehaus）为代表的汉堡建筑，或者汉斯·赫尔特莱因（Hans Hertlein）和帕卢斯兄弟（Ernst and Günther Paulus）设计的一系列柏林建筑，都没有能够创造一种新的都市现实。但是，他们似乎是在以一种情感四溢的方式激活那些已经存在的形式，从而对可操作的现实作出某种诠释。

表现主义和新客观性（Neue Sachlichkeit），这是现代欧洲文化内在矛盾的两极。

看起来，两者可谓背道而驰：前者试图用**过程**本身来填补客体危机带来的真空（这一倾向深受包豪斯和构成派艺术革命的影响），而后者则求助于夸张的形式（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表现主义者充满矛盾和分裂的折中主义建筑）。

但是，让我们切莫被外在的表象所欺骗。上述差异的本质是两种知识分子之间的论争，其中一方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功能大大简化，心甘情愿地为资本再组过程所需的生产体系编绘最新的蓝图，而另一方则潜心挖掘欧洲资本主义的负面内容。就此而言，哈林（Häring）和门德尔松的主观主义是对希尔伯塞姆和格罗比乌斯的泰勒主义的一种批判。然而客观地说，这是一种舍本求末式的批评，它无法为现代建筑提供一条不同的、更为普遍有效的道路。

如果说门德尔松自我炫耀式的作品是一种为商业资本摇旗呐喊的“纪念碑”式建筑的话，那么哈林建筑中的细腻情感表达的则是德国资产阶级的后浪漫主义倾向。不过，我们仍有可能将20世纪建筑的辩证关系归结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尽管这种观点只有从这一整体内部来看才有意义。

为追求客观性和理性化而对矛盾视而不见，加之建筑与政治权力的结合，规划的价值取向已经不言而喻。在中欧国家，社会民主主义建筑师的目标就是实现政治权力与知识构想的统一。因此，梅、瓦格纳和陶特等人都曾经在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城市中担当行政职务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如果说整个城市宛如一个巨大的工业机械结构的话，那么，不同类型的问题都应该在这样的城市中寻找答案，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应该是土地拥有机制与城市机器（machine - city）彻底重组之间的矛盾，前者无疑是建筑市场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障碍，而后者的实现则取决于城市自我功能的加强。

社会民主主义的建筑项目、特定的城市模式，以及作为其经济和技术前提的土地公有制和符合城市生产环节的工业化建造体系，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换言之，建筑学完全成为规划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尽管形式选择本身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有所不同。梅在法兰克福的全部作品就是建筑学“政治化”的具体表现。在这里，建筑的工业化程度与住宅小区中满足最低使用要求的居住单元保持一致，其核心就是法兰克福式厨房（Frankfurter Küche），它构成了住宅工业化体系的基础要素。借助于特定的城市政策，“小区”（Siedlung）成为一种模式，并且在市政当局直接控制的土地上遍地开花。在这一过程中，居住小区不仅形式灵活，而且为建筑师提供了某种文化上的支持，使他们信奉的政治目标得以“实现”。

纳粹的宣传机构后来把这类法兰克福居住小区称为**合成的社会主义**（*constructed socialism*）。我们倒更愿意将它们视为实现了的社会民主主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权力与知识权力的一致只是在协调城市结构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方面发挥着作用。这一点清晰地反映在城市自身的组织结构之中：模范式住宅小区封闭的经济结构折射的是城市改造支离破碎的状况，它对城市的矛盾束手无策，无法将城市作为一个真正的有机体进行改造。

19 世纪 20 年代，中欧建筑文化中出现的乌托邦主义是左翼知识分子与领先的资本力量和政治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一三角关系中，每一个与特定地点相关的项目都想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普遍意义的模式。但是，无论这种意义体现在政策操作的层面还是在技术实验的层面，或者是居住小区类型的形式层面，一旦把这样的模式在现实中推而广之，它们的有效性马上就暴露出问题。

确实，梅的法兰克福，就像马希勒（Mächler）和瓦格纳的柏林一样，都试图在社会层面推广工厂式的重复生产模式，赋予城市一副机械化生产的“模样”，表达城市结构及其分配和消费中的世界无产阶级面貌。（中欧城市规划项目的跨阶级性一直都是理论家们不懈追求的目标。）

但是，德国和荷兰的知识分子从未能够将统一的城市形象付诸实施。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统一的城市形象不仅是“全新综合”（new synthesis）思想的代表，而且也将表明集体力量可以战胜自然，是新型人类乌托邦生产手段的象征。这些建筑师在严格控制的都市和区域规划的政策中进行工作，借助于特定的城市和区域规划政策，他们试图创造出一种可广泛应用的模式。居住小区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之一。但是，理论上的不懈追求最终导致的还是早期技术生产路线统治下支离破碎的城市。换言之，城市只在最低层面上达到局部之间的整合和功能的统一。但是，即使在一个单一的“片断”之中，比如一个工人阶级居住小区，方法的统一也很快被证明是一种相当不确定的工具。

在这方面，30 年代的柏林西门子城区（Siemcensstadt）项目就只是众多昙花一现的案例中的冰山一角。事实上，除了康乃利斯·范伊斯特伦的阿姆斯特丹规划之外，进入 30 和 40 年代之后，欧洲构成主义运动及其单向城市（a city of a single tendency）的理想已经危机四伏了。

看起来，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的一切矛盾因素，包括它的无或然性、多功能性、非有机结构性，都未能在中欧建筑师们理性分析的范围内占据应有的地位。

五、勒·柯布西耶在阿尔及尔：乌托邦的危机

作为欧洲进步建筑文化的中坚人物，柯布西耶清楚地意识到现代建筑必须在三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他的目标是，彻底化解多样性，用确定的规

划来弥补事实上的不切实际，在强化辩证性的过程中调和有机结构与无序状态的关系，努力展现最高水准的生产规划与最大化的“精神生产”（productivity of spirit）其实可以相辅相成。如果建筑可以等同于生产组织的话，那么不容置疑的是，如同生产本身一样，分配与消费也是整个环节中的决定因素。建筑师已经不再是客体的设计者，而是生产的组织者。柯布的论断绝非空洞的口号，而是一种决心，旨在将知识分子的主动性与机器文明（la civilization machiniste）结合起来。作为机械文明的倡导者，建筑师在展望和决定规划的过程中（无论这样的过程有多么局限在某个特定的领域），必须在三个不同的方向展开自己的行动。首先，响应工业的呼唤（appel aux industriels），为商业和工业选择恰当的建筑类型。其次，通过国际建筑师代表大会（CIAM）寻求能够协调建筑和城市规划与社会改造计划的权利。第三，必须在最高层面上挖掘形式的力量，促使公众积极而又自觉地使用建筑产品。

更准确地说，形式的任务就是赋予技术性的人工世界某种原真性和自然特征。而且，既然这一世界总是在持续不断的变革进程中趋向于征服自然，那么对于柯布而言，建筑生产的重组环节就必须将重点放在整体人文地理环境这个活生生的对象上面。

但是柯布同样发现，资金短缺和企业的个人主义倾向、自古以来一直延续不断的金融体制（比如房产制度），极大地阻碍了文明的发展，同时也阻碍了生产的表现性和“人类”成长的需求。

1919—1929年间，柯布西耶“潜心”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其中包括多米诺单元（Domino unit）的类型学研究、产权式独幢住宅（the Immeuble - Villa）、三百万人口居住的城市、巴黎伏瓦生规划（the Plan Voisin）等。通过这些探索，柯布对规划设计的尺度和手段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在少数建成的实验性作品中，柯布尝试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检验，它完全超越了德国的“理性主义”模式，更加准确地提出了城市问题必须思考的内容。

从1929年到1931年，柯布的城市项目遍及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和巴西的圣保罗（Sao Paulo）等城市，最后又完成了阿尔及尔（Algiers）的奥勃斯规划（Obus plan）。在这些规划设计中，柯布系统阐述了他在现代城市问题上最前沿的理论观点。直到今天，无论是在意识形态层面还是在形式层面上，这些观点仍然是首屈一指的。

与陶特、梅和格罗比乌斯不同，柯布完全打破了建筑—街区—城市（architecture - quarter - city）的链条模式。对于他来说，作为一个物质和功能的整体，城市结构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全新的价值尺度，只有在城市的整体景观中才能充分体现这一价值的意义。

因此，在柯布的阿尔及尔规划中，现有的卡斯巴老城（old Casbah）、帝王堡山（hills of Fort - l'Empéreur）、蜿蜒的海湾都成了可利用的原始素材。在全新的城市结构的作用下，这些巨大的**现成品**（*ready - made objects*）的原有意义不复存在了，随之产生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整体。但是，这种极端的设计必须以极端的自由和灵活性为前提。换言之，奥勃斯规划整体操作的经济前提不言而喻：它需要一个全新的“土地法”（territorial statute）做支撑。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早期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式的土地使用，为城市的统一规划创造条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体系的有机重组。

事实上，工业化并不意味着城市空间的简单化。诚然，批量生产的观念必然导致空间等级体系的颠覆。技术世界是没有地区概念的，它的操作范围涉及整个人类领域。它是一种纯粹的拓扑学空间（也是立体主义、未来主义、基元主义意义上的空间）。但是，对于城市的重组而言，仅仅考虑如何充分利用地面还远远不够。技术性的城市规划必须考虑三维空间的问题。此外，统一的城市规划还必须区分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这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因此，城市空间及其周围环境的整体重构是与城市机器的理性化和整体组织相一致的。技术结构和交通系统必须在巨大的尺度上构成一体的“形象”。在这里，反自然主义的人工地形（terrains artificiels）高低错落，高速公路蜿蜒曲折地盘旋在工人住宅上方，极具象征意义。坐落在帝王堡山上的住宅建筑形式自由奔放，宛如超现实主义的先锋派作品。如同萨伏伊别墅内部的自由形式或者位于巴黎香榭丽舍田园大道的贝斯特居伊公寓的顶部阁楼（the Beistegui attic）滑稽的集合形式一样，这些曲线形的建筑

好似巨大而又抽象的物体，在翩翩起舞中表现着矛盾的艺术升华①。

即使在统一的结构层面上，矛盾的积极意义也有充分表现。它是理智与矛盾的和谐统一，“史诗般地”展现着冲突的魅力。换言之，只有通过这样的形象结构（舍此似乎别无他法），才能将必然与自由融为一体，前者以严格的规划为载体，而后者则必须在规划中彰显人类意识的更高层次。

震惊也是柯布西耶的手法之一。但是，柯布所谓的“激发诗意情感的客体”（objets à réaction poétique）是在辩证有机的整体中彼此关联的。形式与功能必然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它在使用和意义的每一个层面为公众提供参与的可能。当然，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参与要求一种批判性反思，它是一种思想层面的参与。实际上，任何对柯布阿尔及尔城市形象的“漫不经心的解读”都会导致意义的混乱，尽管我们不能排除，柯布完全有可能将这样的混乱视为一种必要的间接刺激②。

但是，“通过吸收焦虑的起因来化解焦虑”，这并不是柯布阿尔及尔方

---

① Poème de l'ângle droit（Paris：Verve Editions，1955）中的画，清晰地阐明了 Le Corbusier 为知识分子穿越迷宫之旅所赋予的意义。正如对 Klee 来说——这些绘画非常接近于他的图解风格——秩序，并不是一种外在于人类创造活动的完整性，正是这些活动创造了秩序。可以说，对综合的寻求，一直在加入这样一些元素：记忆的不确定性、疑惑的张力、甚至是导向他途而非最终目的地的路径；事实上，这个目的地只有在切实经验的完满性中才能到达。同样，对 Le Corbusier 来说，形式的绝对性，在于充分实现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连续克服，它的方法是将问题式的立场假设为集体救赎的唯一保证。

② 在 Le Corbusier 所写的许多宣言中，建筑干预显然是一种最重要的阶级同化的工具，其中，他在荷兰的 Van Nelle 工厂的旅程尤其有启迪作用：“鹿特丹的 Van Nelle 烟厂，”Le Corbusier 写到，“这一种现代创作，补偿了 proletarian［无产者］一词所具有的绝望含义。在人类奋斗史的每个阶段，自我本位特性的情感向集体行动的情感的转变，都会把我们导向个人干预的幸福（felicitous）现象。作品依然处于物质状态，但精神照亮了它。我复述说：一切尽在‘爱的考验’（*proof of love*）这句话之中”。

“关键在于，通过一种新的管理形式，我们应当引导、净化并扩大当代事件。告诉我们自己是什么身份，可以采用什么方法，为什么要工作。为我们提供规划，展示规划，解释你的规划。让我们团结起来……如果你为我们展示并解释规划，那么，有产阶级和没有希望的无产者将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有信仰和行动的社会。在当前这个严格理性主义的时刻，问题，就是对问题的意识。”Le Corbusier，*Spectacle de la vie moderne*，收录在 *La ville radieuse*（Paris：Vincent Fréal，1933），p. 177。

案的全部意义。相反，在生产的最低层面上（也就是单个居住单元的层面上），柯布的目标在于如何获得最大程度的灵活性和可互换性，满足快速的都市生活的需求。巨大的结构框架坐落在人工地形上面，借助于这些框架，柯布将预制的居住单元设计为可插入式的。他希望通过这种方法使公众成为城市设计的积极参与者。在一幅设计草图中，柯布西耶甚至还考虑了在结构框架中插入更为怪异和更具有弹性的元素的可能性。向公众许诺参与的自由，就必须允许他们表达自己，即使这种表达蕴含着“低级趣味”的可能。但是，这里的公众有两种：海边的巨型建筑中居住的无产阶级，和帝王堡山上居住的中产阶级。就此而言，建筑不仅具有教化意义，而且也是一种集体整合的工具。

另一方面，自由对工业的意义更大。与恩斯特·梅的“法兰克福厨房”不同，柯布西耶并没有对最小的居住单元进行具体的标准设计。在单体建筑层面上，柯布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利用资本扩张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技术革命、新的样式和快速消费等问题。从理论上说，他设想的居住单元的使用功能应该是灵活多变的，可以根据个体的需要不断更新。当然，建筑生产中创新的居住模式和标准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更多需求的变化①。

现在，柯布阿尔及尔规划的意义已经昭然若揭。作为城市重组的主体，公众的参与应当是批判性的和创造性的。理论上简单划一的功能设计要求技术先进的工业企业与政府部门和城市使用者的积极配合，在持续的发展和变化中形成热烈的、“振奋人心的”的互动过程。可以说，从生产现实到城市形象以及形象的运用，柯布设想的城市机器已经将**机械文明**（*civilisation machiniste*）的“社会”潜能推到了极致。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出现了。为什么柯布的阿尔及尔规划以及后来他

---

① 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反驳 Banham 的论点，他以技术发展为基础的观点，批评“现代运动”大师们在类型学上的停滞。他写到，“在选择稳定的类型或规范时，一旦正常的技术发展过程被打断，建筑师就会选择暂停。正如我们所能看到的一样，要中断这些技术的变化和革新过程，唯一的途径就是放弃技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也同时将研究和大规模生产终止下来。” Reyner Banham, *Theory and Design in the First Machine Age* (London: The Architectural Press, 1962), p. 325。或许没必要指出，从 1960 年到现在大幅度激增的所有建筑科学幻想（它们想弥补技术发展的“图像”维度），同 Le Corbusier 的 Obus 规划相比，都相当令人不安地倒退了。

的欧洲和非洲城市规划和小型设计项目最终都胎死腹中了呢？我们已经说过，即使在今天，柯布的这些规划设计也是资本主义文化中首屈一指、形式上最具创造力的成果之一。这一说法与柯布的失败不是自相矛盾了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多种多样，各自都有道理，而且相辅相成。然而，无论哪一种答案，我们首先不应该忘记的是，柯布西耶是在以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身份来进行他的规划设计的。与陶特、梅、瓦格纳等人不同，他很少与地方政府合作。他的思想通常都是从某种特殊的现实出发（在这一点上，阿尔及尔的特殊地形和历史沉淀无疑是独一无二的，而建立在这些要素之上的规划形式也是不可重复的），但是他的方法却具有广泛的有效性。换言之，从特殊到一般，这正好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秉持的方法截然相反。因此，在阿尔及尔四年多的时间里，柯布一直是在没有正式委托和经费支持的情况下进行他的规划设计。他为自己“杜撰”了一个设计委托，设想它是普遍有效的，而且心甘情愿地为它承担一切费用。

这一切，无疑使得他的工作模式具有实验室试验的种种特征。诚然，一个实验室试验是无法轻易转化为现实的。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在柯布的阿尔及尔规划中，理论设想的初衷是促进当地落后的社会结构的变革，然而两者之间的矛盾却可谓根深蒂固。在柯布看来，建筑革命完全可以与社会经济技术的崇高目标协调一致。但是，既然社会的经济技术现实本身还不具备内在的有机形式，那么柯布的现实主义理想只能被视为一个巨大的乌托邦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

不过，只有当我们将柯布阿尔及尔规划的失败——以及柯布的全部失败——与国际范围内的现代建筑的危机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的时候，我们才能认识真正的问题所在。

六、资本主义发展与意识形态的冲突

现代史学研究是如何诠释现代建筑的危机的？这无疑是一个相当有趣的问题。通常的看法是，现代建筑的危机始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此后，这种危机愈演愈烈，至今依然方兴未艾。最初，几乎所有的人都将责难的目标指向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然而，人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常常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整个世界在经历了1929年的巨大经济危机之后不久，一

个新的决定性因素出现了，这就是国际资本的重组和反周期规划体系（anti－cyclical planning systems）的确立。

不无意义的是，凯恩斯（Keynes）《通论》（*General Theory*）中阐述的经济学目标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以纯粹的意识形态形式出现在现代建筑之中。凯恩斯干涉主义的基础与所有现代艺术的基础如出一辙。它们都试图“通过将未来看作现在来摆脱对未来的恐惧”［奈格里（Negri）语］。在严格的政治意义上来说，这同样也是柯布西耶城市规划理论的基础。凯恩斯对他所谓的“灾难性的执政党”（party of catastrophe）的政策进行了反思，以便在新的层面上化解这些政策的灾难性后果。[6]同样，柯布也意识到现代城市的阶级现状，并尝试在更高的层面上化解阶级的冲突。他试图为社会大众的整合描绘最新最美的蓝图，从而使作为城市发展机制的运作者和积极使用者的社会大众更加具有“人”的价值。

这样，我们最初的理论假设就已经得到了验证。一旦规划从乌托邦走向一种操作机制，那么作为规划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the Plan）的建筑学就不得不让位于规划现实（the reality of the Plan）的建筑学了。

应该说，大工业资本才是现代建筑真正的受益者。但是，一旦大资本工业抛弃上层建筑，将建筑背后的意识形态变成自己的一部分，现代建筑就陷入一场空前绝后的危机。至此，建筑的意识形态已经无所适从。它曾经固执地期待自己的假设变为现实，但是现在它真正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建筑学要么对落后的现实无能为力，要么只是乱搅一气。

因此，1935 年以来围绕现代运动的种种焦虑和纷争多少可以理解了。理性主义的城市和地域规划宛如竹篮打水，因为它一直都在隔靴搔痒，即使局部的目标也无法真正实现。

这样一来，乍看起来多少有些匪夷所思的情况出现了：形式的意识形态似乎放弃了自己的现实主义诉求，转而将“混乱”这个资产阶级文化中固有的辩证文化关系的另一极视为新的救命稻草。换言之，尽管“设计的乌托邦”（utopia of design）还没有完全寿终正寝，“混乱”已经作为意识形态层面上具有制衡作用的力量再次受到重视。人们开始重新思考那些曾经被构成主义认为已经一劳永逸地化解了的问题，重新寻求混乱的艺术升华。

另一方面，由于在资本主义发展内在矛盾的作用下已经丧失了生产结构变革推动者的作用，建筑的意识形态只能在“技术文明”的空泛口号中聊以自慰。

当代建筑批评缺少对设计危机产生的真正原因的认识，因此只能在一些设计自身的内部问题上纠缠不清。近来，它又试图通过视觉技术与工业生产新的结合来挖掘建筑的意识形态含义。绝非偶然的是，这种“新人文主义”（neo - humanism）的结合涉及的正是城市形象本身。与20年代的新客观派（Neue Sachlichkeik）相比，它更加巧妙地掩盖了乌托邦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

在这里，城市俨然成为一种上层建筑。事实上，艺术的当务之急就是构建城市的上层建筑面貌。波普艺术（pop art）、光效应艺术（op art）都致力于分析城市的“成像能力”（imageability）和“展望美学”（ésthétique prospective）。它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通过眼花缭乱的形式，化解当代城市的矛盾。但是，如果正确地对之进行解读的话，那么这些眼花缭乱的形式折射的正是先进的资本主义计划本身都无法解决的矛盾。因此，艺术概念的重新建立反而有助于掩饰的目的。如果说工业设计在技术生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它对产品质量和增加消费都有决定性的影响，那么利用社会生产废料进行艺术创作的波普艺术就可以说是一种后卫性的艺术。然而，这正好应对了视觉交流技术的双重要求。一旦艺术拒绝将自己置于生产周期的先锋位置，那么它反倒验证了消费过程的无限性，因为它表明，即使是废品垃圾，经过艺术的转变成为无用和虚无的艺术客体之后，又获得了一种价值，可以重新进入（即使是从后门进入）生产—消费的循环之中。

但是，这种后卫艺术同样也表明，资本主义计划并不愿意——也许只是暂时地——解决城市的矛盾，也不打算将城市转变成一个具有整体组织的机器，改变自古以来城市就有的铺张形式和随处可见的功能障碍。

这样一来，艺术就必须向大众表明，矛盾、不平衡、混乱都是当代城市不可避免的特征。它必须让大众看到，混乱包含超乎想象的丰富性和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可以为新的社会拜物教提供鲜活的价值之源。

因此，卡尔纳比大街（Carnaby Street）和新乌托邦主义只不过是同一现象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城市的意识形态已经改头换面，高技主义的建筑乌托邦、公众参与必须遵循的**游戏**规则的重新发现、关于“美学社会”（aesthetic societies）的展望、**想象的首要性原则**（*primacy of the imagination*）

等等都是它的新内容。①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特别提及皮埃尔·瑞斯坦尼（Pierre Restany）的“总体艺术白皮书”（Livre blanc de L'art total）。它主张对艺术的所有诉求进行综合和平衡，以便突破操作主义的桎梏，赋予艺术新的教化意义。该文将目标的失缺而产生的忧患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它提出一系列拯救艺术的“全新”方案，但是这些方案的内涵与历史先锋派的观点并无太大的区别，却没有后者的清晰和自信。瑞斯坦尼写道：

> 语言的变化折射的不是别的，而是社会结构的变化。通过不断减少艺术（一种新的语言综合）和自然（一种现代技术意义上的城市现实）之间的鸿沟，技术正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催化着一个必然而又充分的进程。
>
> 技术不仅创造了巨大和无限的可能，而且也显示出转型时期必不可少的灵活性。它增强了艺术家的意识，不再拘泥于操作的形式效果，而是更加注重人类想象力的发挥。**简言之，当代的技术已经为想象力的充分发挥创造了条件**。一旦摆脱了标准化的束缚，摆脱了现实和生产的问题，创造的想象力就成为人类的一种普遍意识。**展望美学是人类伟大希望的载体，引导我们走向人类的集体自由**。艺术的社会化就是创造力和生产力合而为一，走向动态综合和技术变革的目标。正是这样的重构将人类和现实真实的现代面貌表现出来，使他们回归自然，远离一切异化。[7](p.50)（黑体为引者加）

这样，一切就都自圆其说了。马尔库塞式的神话似乎是在说明，即使在当前的生产关系之中，也有可能获得人类的“集体自由”，尽管这一自由的意义远远不够明确。人们需要做的只是将“艺术社会化”，将其置于

---

① 参见作为现象之征兆的文本：G. C. Argan, *Relazione introduttiva al convegno sulle "strutture ambientali"*（Rimini, 1968 年 9 月）；L. Quaroni, *La Torre di Babele*（Padua: Marsilio, 1967）；M. Ragon, *Les visionnaires de l'architecture*（Paris, 1965）；A. Boatto, *Pop Art in U. S. A.*（Milan: Lerici, 1967）；F. Menna, *Profezia di una società estetica*（Milan: Lerici, 1968）。顺带指出，这些文本的归类，与它们固有的严密性，或者说它们各自贡献的特质无关。

技术“进步”的最前沿。至于说现代艺术的整个进程是否与乌托邦有关已经不重要。事实上，人们已经顺理成章地接过了法国1968年5月风暴提出的最为模棱两可的口号。在这里，“想象的力量”（L'imagination au pouvoir）俨然成为一种调和矛盾的工具，把激进与保守、象征意义与生产过程、逃避现实与强权政治（realpolitik）统统混为一谈。

但是，问题还远非仅此而已。重申艺术的中介角色就是重蹈启蒙运动赋予艺术**自然主义**属性的覆辙。这样一来，艺术批评也就将自己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意识形态工具的角色暴露无遗。事实上，称之为“批评”都有些勉为其难，因为它的功能已经不言而喻：鼓吹艺术的模糊和含混——就其一切语义分析的意义而言——就是对当代城市的危机和含混进行艺术的再加工。因此，它自然也就无法使自己置身于循环往复的规划—生产—消费过程之外。瑞斯坦尼继续写道：

> 批评方法必须致力于美学的普及化。换言之，它必须致力于超越个体劳动和多重生产，从根本上区分创造和生产这两种相辅相成的秩序之间的差异，系统处理所有综合性试验领域的操作研究和技术合作，用知觉心理学的方法整理游戏和景象的观念，从集体交流的角度组织环境空间，使个体环境融合在安居乐业的城市集体空间之中。[7](p.50)①

按照这种观点，批评必须在生产的循环过程中发挥作用。它必须是**操作性**的（*operative*），必须将资本主义规划不断提升到新的水平。

但是，与历史先锋派的立场相比，上述主张中到底有多少创新可言呢？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就不难看出，除了重蹈意识形态的覆辙之外，这种思想可谓是换汤不换药。事实上，如果不考虑马尔库塞的乌托邦思想——他认为人类的未来取决于人们是否能够依靠想象的力量对一切虚假的需求**大拒绝**（*the Great Refusal*），那么与历史先锋运动一以贯之的立场相比，当代的新先锋主义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

① 显然，我是以Restany的文本为例介绍在新先锋派主要人物当中广泛流传的神话。而且，我的许多断言也可能适用于那些意在通过乌托邦进行救赎的更为严肃的“学科”尝试。

那么，既然形式思考与生产过程已经越来越不可避免地融合在一起了，人们为什么还要如此执著地坚持夸张的形式和追求特定艺术向度的重建呢？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正面临着两个同时存在的现象。一方面，在受制于总体社会关系的建筑生产的作用下，建筑的意识形态作用已经日薄西山；另一方面，城市中愈演愈烈的经济和社会矛盾似乎正在阻碍资本重组计划的脚步。面对城市秩序的理性化这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心议题，资本的力量眼下似乎还不足以实现现代运动的意识形态提出的任务。

这迫使部分知识分子反对派、甚至也包括部分阶级组织重新回到挑衅、批判、斗争的激进主义策略上来。直到现在，这一激进主义都在为解决这些问题和冲突而战。斗争的内容涉及（意大利和美国的）城市规划立法、建筑工业的重组以及城市改造等等。它给许多人制造出一个假象，以为围绕规划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的组成部分。

今天，建筑师们倍感焦虑，这是因为他们感觉到建筑的意识形态地位岌岌可危，技术的各种潜能正在转化为现实，推动着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理性化进程。此外，技术日新月异，这使得任何一种特殊的设计方法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尝试就几乎已经成明日黄花。一切都表明，建筑学正面临它最不愿意看到的发展，这就是，建筑师的“职业”地位正在日益边缘化，而且不容有什么新人文主义的迟疑，就被吞噬在社会生产计划的滚滚浪潮之中了。

这种新的职业状况在美国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苏联这样的社会化资本国家已经成为现实。这使建筑师们感到畏惧，并且试图通过最为神经质的形式和意识形态扭曲来化解这种畏惧。这只能说明这群特殊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倒退。

建筑师们曾经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呼吁严厉的规划法则，但是现在却因为无法理解整个问题的历史进程，又对自己曾经致力于推动的发展过程的最终结果感到不满。更糟糕的是，他们还感情用事地试图重蹈现代建筑的“伦理”覆辙，为现代建筑设定一系列政治任务，满足一时的、但却是抽象而又不合理的狂热。

我们必须认识的是：现代建筑和新的视觉交流体系从诞生、发展到陷入危机的整个进程就是一个巨大的尝试，也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最后一次尝

试，它试图在一种意识形态层面上解决诸如不平衡、矛盾、停滞等全球市场和生产发展中资本重组的一系列问题。显然，这种意识形态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因为它本身就是具体生产环节和活动的一部分。

就此而言，有序和无序不再是矛盾的对立。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其历史意义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明白，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的建设性与抵抗艺术（“art of protest”）的破坏性实乃殊途同归，就如理性化的建筑生产与主观化的抽象表现主义和反讽的波普艺术之间、资本主义规划与都市混乱之间、或者说在规划的意识形态与“诗意的客体”（the poetics of the object）之间并无本质的矛盾一样。

如此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命运并非与建筑设计毫不相干。现代资本主义需要借助设计的意识形态深入人类存在的一切结构和上层建筑层面，而且这种需求也绝不会因不同的设计或者“反设计”（antidesign）而改变。

也许，建筑还有许多特别的任务有待完成。但是，我们更有兴趣探究的问题却是，为什么直至今日马克思主义文化都在小心翼翼而又始终如一地试图否认和掩盖一个简单的道理，这就是，正如不可能存在阶级的政治经济学（a class political economy），而只存在针对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批判（a class criticism of political economy）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建立一种阶级的美学、阶级的艺术、或者阶级的建筑，而只能建立一种针对美学、艺术、建筑和城市的阶级批判。

对建筑和城市的意识形态进行一种具有内在统一性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就是去揭示隐藏在“艺术”、“建筑”、“城市”等统一范畴背后的偶然的、既不客观也不普遍的历史现实。作为一种历史和客观的阶级批评，建筑批评必须成为关于城市意识形态的批判，并想尽一切办法避免陷入与处理资本矛盾的理性技术进行“进步”对话（“progressive”dialogue）的危险之中。

首先需要破除一种不切实际的知识分子幻想，即认为可以通过图像来勾勒“无压迫社会”（a liberated society）的建筑条件。抛开其中显而易见的乌托邦性质不谈，该思想的提倡者们显然也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除了在超越简单的主体意志和句法更新的基础上进行语言、方法和结构的革命，这样的目标有否还有其他可能？

现代建筑努力使自己成为进步和理性思想的载体，它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一脉相承，只是在间接的层面上涉及工人阶级的利益。这就决定了现

代建筑的命运。认识这一现象的历史必然性并不困难，但是一旦认识到这一点，人们也就不再能够无视那个令“左翼”建筑师陷入徒劳的痛苦选择的最终现实。

之所以说“徒劳的痛苦”（uselessly painful），是因为在完全没有出路的禁闭空间中不停地挣扎实在是徒劳无益。事实上，现代建筑的危机并不在于它已经“精疲力竭”或者“纵欲过度”。反之，它是建筑的意识形态功能危机的表现。现代艺术的“衰落”最终验证了资产阶级的双重性，它试图在调和矛盾的“积极”目标和无情地挖掘自身的商业化目标之间寻求平衡。艺术的拯救之路已经无法从它的内部找到。换言之，我们既不能再沉湎于意象的迷宫之中，因为这些意象的极端多义性最终就是无意义，也不能将自己封闭在完美静止的几何学形式中聊以自慰。

这也就是为什么“反空间”（counterspaces）的建筑概念最终只能是一种奢谈的原因①：在既定的结构中寻求另一种结构无疑是自相矛盾。

反思建筑就是对具体的由建筑“付诸实施”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因此它必须在更为具体的特殊领域中才能走得更远。在这样的领域中，揭示建筑发展的本来面目只是建筑反思的目标之一。但是，只有未来的阶级斗争状况才能告诉我们，我们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先锋性的还是后卫性的。

参考文献：

[1] M. A. Laugier, Observations sur l'architecture [M], The Hague, 1765

[2] M. Quatremère de Quincy, “Archetecture”, Encyclopédie méthodique, vol. I

[3] Francesco Milizia, Principj di architettura civile, vol. II [M], Bassano, 1813

[4] Walter Benjamin, “On Some Motifs in Baudelaire” [M], edited by Hannah Arendt, translated by Harry Zohn, New York: Brace and World, 1968

① 这里的意大利文词是 *controspazi*——在原文中显然是当代的辩论性建筑杂志 *Controspazio* 的一个辩论参照。——译者注

[5] Ludwig Hilberseimer, Grossstadtarchitektur [M], Stuttgart: Julius Hoffmann Verlag, 1927

[6] A. Negri, "La teoria capitalista dello stato nel29; John Keynes" [J], *Contropiano*, 1968 (1)

[7] Pierre Restany, "Le livre blanc de l'art total; pour une esthétique prospective" [J], *Domus*, 1968 (269)

(王群、胡恒 译)

《建筑与乌托邦》序言

［意］曼弗雷多·塔夫里

这本书是对我的《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Per una critica dell'ideologia architettonica）的重写，当然，它也增加了一些内容。这篇旧文曾经在1969年发表在《反设计》（*Contropiano*）杂志第1期上。

文章发表不久，关于其主题出现了很多看法，激烈程度各有不同。一直以来，我都在避免直接的回应。与其说我不够尊重那些批评家，还不如说现在才有坚决、彻底澄清的必要。在 *Contropiano* 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一个特意安排的概要，其形式也较为粗糙。它引发了一些激烈的结果，但是其中的前提在我的《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Teorie e storia dell'architettura*）一书中已有所表达。在6年前，用意识形态批评（ideological criticism）所提供的方法，来重读现代建筑史，用最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同的术语，来理解现代建筑史，只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参照体系，以便进行深一层的检验。并且，它也只能对单独的问题提供一种局部性的、只具时效性的分析。但是，由于这一杂志在政治史中的位置很明确，其思想和兴趣的特殊轨线也很清楚，所以大家应该看得出来，一些意义不确定的、或许是**先验性的**（*a priori*）解释，已经被我们避开了。并且，杂志上的文章都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完成的，我们处在相同的阵线上。

如果将那些我处理过的建筑问题从杂志的理论语境中隔离出来，那么，我的文章自然就会被大家看作是一个启示录式的预言，看作是“对表达的放弃”（the expression of renunciation），看作是一个终极声明——“建筑死亡”（death of architecture）。事情当然不是这样的。

然而，在1968—1969年间，一种有效的假设（a working hypothesis），在其诸项基础原则中被强化、被界定为某种特殊的要素。对此，威尼斯大学建筑学院历史研究室（Historical Institute of the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of the University of Venice）的探索尤为重要。我们以20世纪早期德国社会学、苏维埃的意识形态和规划实践、城市的社会民主管理、美国建筑与城市、建筑周期为基础，来研究历史先锋派运动和大都市之间的关系、知识分子工作和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已经成为我们一起合作的研究内容。确确实实，我们和那些伪称自己已经获得某些不可动摇的、教条式的结论的做法已无任何瓜葛。

现在，1975年，我的这本书的英译本出版了，它以1969年的那篇文章为基础。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认识到从前被遮蔽的区域（ground），认识到判断必须发生变化（因为精确的研究越来越多），认识到最初的那些前提假设的脆弱不堪。尽管如此，对于我来说，那些前提假设大体上已经站住脚了，而且我们现在能够以分析和文献为基础进一步谈论它们。原则，已经不再是我们研究的基础。

但是，要想讨论这些原则，我们就必须进入到政治理论的领域之中。从60年代到现在，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高层次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发展。我们不可能将意识形态批评从这一领域分离出来。它是其内在的、必须的组成部分。当它意识到自身的界限和作用范围时，尤其如此。

此刻要言明的是，我们对当代建筑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所进行的批判式分析，并不抱有任何虚设的“革命”目标。这里，我们关心的是对于某些工作的精确界定——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将它们从建筑中剔除掉了。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些工作身上的意识形态有色外衣（ideological prefiguration）给剥离掉。因为这个原因（资本主义的发展），某些人几乎自动地趋向于探索今日之建筑“戏剧”的未知模样。可以这样说，他们都开始关注被迫返回到**纯建筑**（*pure architecture*）状态，返回到不带乌托邦气息的形式的建筑。在某些极端的案例中，这些建筑甚至返回到崇高的无用状态（sublime uselessness）。那些试图给建筑披上意识形态外衣的行为如此之虚伪，一直以来，我更愿意关注勇于沉默，或者表达出过时的“纯净性”的那些人，相信他们的真诚。即使他们的做法依然含有某种意识形态的鼓动成分，并且由于其时代错误而令人同情。

荒谬的是，建筑要做的新工作并不属于建筑自身，或者说远超出建筑范围之外。在认识这一处境的过程中（我的意思是经过历史意义上的确证之后），我没有表示忏悔，也没有作什么启示录式的预言。没有忏悔，是因为在学科角色消弭无形之时试图阻止事情的发展进程，就只是一种倒退的乌托邦，而且是最糟糕的那种。不作预言，是因为事物每天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发展着。关于这一点，观察一下建筑系毕业生的就业比率就足已说明问题——他们真正检验着这一职业。

同样，由于技术人员承担着建筑行为，所以职业中的彻底腐化，还没有使它最终沦落为一个制度所界定的对应物。这已是事实。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所能做的就是在一个空荡荡的空间内游弋。在这个空间中，没有什么是决定性的，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须理会当下的处境。但是，将虚假的、幻象般的希望呈现出来，并不能帮助我们抵达目的地，即找到制度所界定的职业角色。当然，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一目标自身依然是含糊不清的。不清除掉过时的神话，人们在建筑的视域内，自然就看不到另一种可能性在闪烁，它就是“工人阶级”的技术。

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意识形态是有用的东西。就像在工人阶级的眼里，它是害人的坏东西一样。在弗蒂尼（Fortini）的《权力的检验》（*Verifica dei poteri*），以及托隆蒂（Tronti）、罗萨（Asor Rosa）、卡西亚里（Cacciari）的研究出现之后，我觉得，反复再三地回到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来证明这一点，未免显得有些多余。当然，一旦意识形态批判完成，那么还有一个决定性的问题悬而未决，也即，知识手段如何才能马上对政治斗争提供帮助。言及于此，毫无疑问，只能立即打住。当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们必须从意识形态批评过渡到对规划技术的分析，过渡到对技术用以真正影响（关键）生产关系的诸种方式的分析。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继续分析，在建筑活动领域中只在当下大家才会尝试去做的那些事。这些事情显然具有某种精确性和连贯性。对于那些焦虑地寻找着某种操作式批评（an operative criticism）的人，我能回应的就是，希望他们可以把自己转变成分析者——分析那些有着精确定义的经济要素，并且着眼于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对工人阶级的重组、巩固过程合并在一起。

相对于这些目标而言，这本书只是一个序言而已。尽管我赋予它一种

概述性的研究方式（我们通过它来谨慎处理那些问题），它也不过是一条历史轮廓线，其中某些部分才被研究过、验证过。我们有必要更上一层楼，但是，与此同时，我发觉，如果我们没法赋予某一前提假设（hypothesis）自身形式以完整性的话，那么，将其框架结构呈现出来，并无什么特别意义。但是，如果这一前提假设有助于更为自觉、激进地（同时）表示出认同和争论两个对立面，那么，可以说，它就起到了作用。

（胡恒　译）

意识形态批判与历史实践

［意］阿尔贝托·罗萨

我第一次遇到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是在其《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1968 年）在 Laterza 出版社出版的前后。更有可能是在稍后，我记得我们第一次遇上时谈起了这本书。如果大家将这一时间只看作是我们私人友谊的见证，这显然有所不当。因为核实这一准确日期，对于我们在历史层面上确定塔夫里在那段时期的工作路线是相当重要的。实际上，就是在那几个月中，我和马西莫·卡西亚里（Massimo Cacciari）及托尼·奈格里（Toni Negri）一起筹备 *Contropiano* 杂志的出版，第 1 期于 1968 年 7 月问世。

塔夫里并没有在杂志工作的前期阶段出现，但不久他便加入进来。如果我没有被卡西亚里和弗朗切斯科·达尔科（Francesco Dal Co）误导的话，应该可以说埃夫里是被这一杂志深深吸引。那时，达尔科非常年轻，并且是埃夫里这位年轻但已名声显赫的教授的学生。由此可见，塔夫里并未卷入 *Contropiano* 杂志出版之后接踵而来的那些纷争。该杂志最初被构想为长期辩论的工具，但是，它似乎很快就陷入一场巨大的震荡之中。在 1968 年和 1969 年，这一震荡使整个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所产生的第一个后果就是，第 1 期杂志出版之后三位编辑就少了一位——托尼·奈格里。表面上的原因是，第 2 期杂志上发表了马里奥·托隆蒂（Mario Tronti）的《作为问题的政党》（*The Party as a Problem*［Il partito come problema］）一文。奈格里提出，不要刊登这篇文章，否则他就离开编辑组。当另外两个编辑为这篇文章辩护并强行刊载了它时，他自然就离开了。尽管如此，还

是应该看到，观点的差异在早些时候——几个月之前——就已经出现，并已深置到许多本质问题之中。使我们产生分裂的，主要是我们对于学生及工人斗争所做的解释的不同。这些斗争是从意大利和欧洲开始的。奈格里明确地将这些斗争视为革命前奏的开端。而另外两人有其自己的看法。我们承认了这些斗争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还认为，瓦解资产阶级的堡垒和资本主义的防御，需要一个更加长远且有所组织的过程。我们可以用理论争鸣的方式（加上战斗组织的方式）来建构这一过程。

Contropiano 杂志具有该运动所包含的特质：暴烈且振奋人心。这场运动如火如荼，它是自反法西斯和解放战争以来真正独一无二的运动。从那时起，在杂志整整4年的生命里（它一直持续到1971年，是创办者们主动停刊），它一直坚持着两条基本的研究路线：一方面是对阶级斗争问题展开分析，这一分析既是在历史与理论层面上，也是在当前的阶级斗争层面上（所以我们称之为“工人的科学”（workers´science））；另一方面则是对大众资本主义社会中观念的和文化的上层建筑进行分析（用马克思的术语，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批判”）。

关于该杂志的历史与特质的这一**补充说明**（*excursus*），并非和塔夫里的这一段智性历史（intellectual history）毫无关系。我的这篇文章本就打算探讨其中的那些知识。事实上，塔夫里**全然**（*toto corde*）接受了该杂志的最终结构。他在两条先定的研究路线上，怀着极大的热忱，并且运用了这一学科的特定手段，参与到杂志之中。而且，我可以说，他与 *Contropiano* 杂志这几年的合作，成了他工作中最有特色的部分。人们也许还会说，与这一合作相平行的（或许更早些），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建筑学生小组的工作。在卡西亚里细心监督之下，这些学生在 *Angelus Novus* 上开始了他们的理论的和政治的首次实践。当时，这个小组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学生是达尔科。他在 *Contropiano* 杂志（1968年，第1期）上发表了一则笔记（或者说是一份“资料”，如果按照该杂志的索引所作的分类的话），题为《捍卫现代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从魏玛到德骚》（Per la critica della ideologia dell'architettura moderna; da Weimar a Dessau）。（这个标题是有特别意义的，应当引起注意。）

在1969到1971年间，塔夫里与 *Contropiano* 杂志的合作是连续、热情且声息与共的。合作，不只是写作和交稿，还包含他对编辑工作及讨论的宝贵参与。塔夫里为杂志总共提供了四篇质量非凡的文章：《走向建筑的

意识形态批判》（Per una critica dell'ideologia architettonica）（1969 年，第 1 期）；《脑力劳动和资本主义发展》（Lavoro intellettuale e sviluppo capitalistico）（1970 年，第 2 期）；《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社会民主政治和城市》（Socialdemocrazia e città nella Repubblica di Weimar）（1971 年，第 1 期）；《南方马克思主义和城市，"*Das rote Wien*"》（Austromarxismo e città. 'Das rote Wien'）。考虑到书目的完整性，我们还应记得，在这段时期里，塔夫里还在威尼斯建筑史研究室（Venice Istituto di Storia dell'Architettura）组织了一次重要的研讨会（1970 年 6 月）。研讨会的稿件成了《社会主义、城市、建筑、苏联 1917—1937 年》（*Socialismo*, *città*, *architettura*, *URSS 1917 - 1937*，罗马，Officina，1971 年）一书的主要内容。塔夫里的文章似乎名为《社会主义现实与先锋派的危机》（Il socialismo realizzato e la crisi delle avanguardie），它和 *Contropiano* 杂志所讨论的问题密切相关。我现在正试图对这些讨论进行简略的重构。

当然，这里并不适合于仔细考查塔夫里的话语模式。我想强调的只是其话语模式所具有的理论重要性。一方面，它和该杂志对于脑力劳动主题的全面兴趣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在我看来，它为解释塔夫里的整个科学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塔夫里的论文的出发点是，他确信，从启蒙运动到现在，与现代建筑相伴的是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生产。这和当时对不同领域的人文主义知识的一些看法是一样的。并且，通过这种方式，专家式的知识分子打算——或多或少是有意识的——填满一个鸿沟。一边是把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法则之上的学科戒律**富有成效的**（*effective*）功能化；另一边是对自律和创造力所抱有的永恒**幻想**（*illusion*）。某些时候，这一幻想也是"有选择性的"（alternativistic）。

这一立场的意义清晰地出现在《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Per una critica della ideologia architettonica）的开篇之中。这篇文章除了开创了他与 *Contropiano* 杂志的合作之外，我们似乎还可以将它当作一项明确的计划性宣言。所以，我完整地引用了这一段，也是作为其写作风格的一个**例子**（*exemplum*）。他这个时期的写作风格强硬而精确，却也不失热情和雄辩：

> 看起来，资产阶级艺术的首要伦理标准之一就是，只要能够通过解读焦虑产生的种种起因并将之完全吸收来化解焦虑就已经达到目的

了。对它而言，引发焦虑的冲突、矛盾和断裂是否属于能够化解那些差异的综合机制的一部分，或者情感是否能够通过沉思的升华（contemplative sublimation）而获得宣泄，这些都不重要。然而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可以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命不凡的“社会”责任中辨别出这类知识分子的某种“必然性”。换言之，在资本先锋派（the avant-gardes of capital）和知识分子先锋派（the intellectual avant-gardes）之间存在着某种默契，而这一默契又是如此心照不宣，以致任何揭露其真面目的企图都会引发众怒。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发挥的是一种中介作用，它不仅高调宣称自己的意识形态内容，而且也自作聪明地——或者说始料不及地——引火烧身。冲突升华的形式层次越高，肯定和确认这一升华的结构隐藏得就越深。

如果我们从这一点着手建筑的意识形态研究，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首先弄清楚资本重组中最有效的组织计划是如何愚弄了人们，以致直至今天，许多人还认为它是客观中立的，超越阶级的内涵，甚至还成为处理知识分子与资本关系的一种选择。

应当注意的是，在理论层面上，这篇极端的论文是如何建立在原始文献和文本知识的基础上的。塔夫里对这些文献和知识都进行了极度精确的检验——这几乎可算是“科学式的”工作。所以，理所当然地，塔夫里将现代建筑的“悲剧性命运”同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尤其是他的阿尔及尔城市规划联系起来，而不是同包豪斯和格罗庇乌斯（Gropius）联系起来——我们很自然会想到这一点，并且达尔科在他的早期文章中也是这样做的。这一“悲剧性命运”，也来源于现代建筑所固有的复杂的道德观，以及乌托邦和启蒙之间的张力。对塔夫里而言，阿尔及尔城市规划这项计划，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说，**从一种形式角度来看**（*from a formal point of view*），它表现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中最先进的理论假设。柯布西耶在这里表现得像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pure intellectual*）。他既不与团体合作，也不与社会机构合作。但是，这项计划的**全盘失败**（*the total failure*）最终表明了经济发展中粗暴赤裸的物质性同柯布的理论假设的“现实主义”之间的水火不容。最终，此理论假设也由于实质上的不现实，而被批评家和诽谤者看作是“乌托邦”。

所以，塔夫里的立场非常清楚。如果用图示来表达的话，它就是一个

战场同时面向两条战线。第一条战线是，它反对这样一种建筑态度，它将建筑自身表现为一种市民居住（civil cohabitation）的手段和意识形态，最终，建筑就变成资本主义手中的世俗武器。第二条战线是，它反对这样一种建筑态度，它站在城市无产阶级组织（尤其是战争期间的欧洲中部）的角度，详细阐述了“另一种意识形态”（alternative ideology），这也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的发展方针。在第二种看法中，对建筑的错误解释是不可避免的，它也因此被错误地管理。

和我们的意图一样，“意识形态批判”的典型特征之一，是它试图全方位地对所有知性的、政治的示威运动（和工人运动传统相关的）进行去神秘化。这一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并且通过各种方法，来试图与资本主义社会领域确定一个相结合的层面。对塔夫里而言，贯彻这一意图显然是毫无妥协的。并且，这一意图开启了两个可行的后继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对奥地利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实验进行批判。塔夫里的研究案例是二、三十年代的“红色维也纳”（Red Vienna）和卡尔·马克思大院（*Karl Marx - Hof*）（它的形式特质得到塔夫里的高度赞赏）。第二个方向是，对欧洲建筑先锋派的幻想进行批判，这些幻想的要旨在于民主和反法西斯。当社会民主的幻想衰落之时，这些先锋派寄希望于苏联——在那里，将**社会价值**和**形式**紧密联系起来的乌托邦梦想会出现。但是，这一梦想最终仍以一种灾难性的冲突告终。其中的原因在于，规划（Plan）在经济上的必要性。同样，他们也对苏联能够“（在一个国家中）完成社会主义”寄予狂热的期望。

当然，我很清楚，塔夫里的立场，像那个时期其他人的立场一样，是可以批评的，因为他无法完成某些事情，也根本没有尝试看去开创“第三条道路”。这“第三条道路”，介于前面所谈到的两个方向之间，并且，出于不同的原因，它们都被塔夫里坚决地摈弃。在《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这篇长文的尖锐结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前面我们已经摘引过这篇文章：“由于这个原因，提出建筑的‘反空间’（counterspaces）概念是没有用处的：在控制设计之神秘特征的那些结构中寻找另一种选择，这无疑是个矛盾。对建筑的反思，成为一种对具体的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批判。这一意识形态由建筑自身所‘实现’。反思建筑，必须超越‘寻找另一种选择’之类的活动，而走向一种特定的政治维度。其目的之一，就是系统地摧毁那些维持建筑发展的神话。只有未来的阶级斗争状况才能告诉

我们，我们设法实现的未来，是先锋派的任务，还是后卫派（the rear-guarde）的任务。”（*Contropiano* 杂志，1969 年第 1 期，第 79 页。）

显然，这一态度本该让塔夫里和他的朋友显得冷漠无情。因为，当时，对**建筑意识形态的破坏**（*de - structuring*）（我认为这是一个正确叫法），再现出一个初始的、不可避免的处境。这里，**建筑意识形态被看作资产阶级知识学科**（*bourgeois intellectual discipline*）。随后，这一处境发展到**未来设计**（*future design*）阶段。我们可以在一种既是社会的、又是政治的**不同秩序**（*different order*）中看到这一阶段。建筑师当然不可能对这一秩序进行提前描绘。因此，意识形态批判发现其指涉的对象，不在当前可作不同选择的文化话语（discourse）之中，而在阶级决裂中，在反资本主义的普遍斗争中（大众的立场都指向这一斗争）。这就是我为塔夫里知识分子生涯的这一阶段所做的简短解释。这一解释是未完成的。荒谬的是，最重要的东西我依然未能触及。对此，我只是略言几句，因为它在我需要遵循的时间顺序之外，也因为对它的验证所需要的努力和能力都超出了我的界限。

我的论点是，读者一旦忽略了我所描述的这个阶段的成果和工作的话，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塔夫里伟大的“科学性”作品——像《球与迷宫》（1980 年）以及《威尼斯和文艺复兴》（1985 年）这样精彩的书。当然，我并不是说，塔夫里从“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中提取方法和程序，以之来研究建筑史的重要阶段。相反，我的意思是，一旦“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阶段结束，理论家就会完全清醒过来。所有学科（它具有学院身份）中根深蒂固的价值体制（mechanisms）、程序和默认之规，对他们而言，似乎都成了全新的东西。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说，我也愿意以一种更实质化的方式来这样做。其中原因也在于，我认为塔夫里的方法是一种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包括他的朋友和他的追随者。他们在别的地方同样运用了“意识形态批判”。对塔夫里来说，把“意识形态批判”搁下，并不意味着使建筑的意识形态回归，更不意味着返回到与建筑史学密切相关的学科规则。相反，这意味着他理解了，在这个领域，人们也应当尽可能地保证**数据的准确性**（*certainty of the datum*）。同时，大家要抵制一切意识形态的诱惑（无论是现在的还是过去的）——即使是 16 世纪早期那些启蒙了的威尼斯贵族所创造的蛊惑人心的意识形态也不例外。

对意识形态（以及其所有政治母体）进行批判，无情地破坏了古往今来的自我幻想和自我神秘化的一切结构。我想，许多人都会觉得难以理

解，在这一行为和充分展现某种深刻、权威以及非凡的**政治职业**(*political vocation*）之间，却存在着精确的联系。但是，我真正想要说的是，“意识形态批判”先于对“文献学”的探索，并且对它起决定作用。“意识形态批判”使探索“文献学”成为可能和必要。想想吧：如果面纱不再存在，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去了解、理解和再现现实的机制（*mechanisms*）。对此，人们应当精练地使用**客观**(*objective*）探询的手段（当然，在某些限制范围内）。彻底的清醒产生伟大的历史学家。曼弗雷多·塔夫里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

（胡恒　译）

论批判性历史

［希腊］德米特里·波菲里奥斯

作为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的建筑，其连贯性和尊崇地位得益于社会的神话化体系（a system of social mythification）。换言之，既定的建筑话语（a given architectural discourse）仅仅是一种再现形式，它为了霸权（hegemonical）利益，而将某些特定意义自然化（naturalizes），并使世界的当前状态永恒化。就这个意义来看，建筑话语和意识形态完全合为一体。建筑话语作为意识形态的身份来自以下事实：即它反映出，在作为生产的建筑（architecture as production）和作为制度的建筑（architecture as institution）（制度，在这里指的是社会所认可的规范或法则体系）二者之中，建筑文化的代理人（agent）以何种方式生存于其中。这意味着建筑话语作为意识形态，归根结底是与生产体系和制度的日常经验有关，但是，它也并没有因而被简化为主体意识的理论。

因此，作为意识形态的建筑具有一种社会功能，即将建筑文化的代理人安置到（以不同程度）支持或推翻霸权的实践活动和美学活动中。这里，“权力”与“霸权”用的是普兰查斯（N. Poulantzas）所提出的含义：权力是指“社会群体实现其特殊的客观利益的能力”；霸权指的是，实现利益的那种过程所需要的，“不是被简化为纯粹使用武力或暴力的控制，而是包含一种领导权和意识形态的功能，社会关系藉此建立在积极认同的基础上”。就这个意思而言，建筑作为意识形态，其组成不仅是零星的营建知识和设计概念，还包括整个符号化的过程、神话的转换、趣味、风格和时尚。因此，现实赋予建筑一套规则和生产技术；但反过来，建筑归还

给现实一种想象的连贯性——它使现实看上去自然而又恒久不变。

因此，批判性历史（同史学相比，它只是一种试图“找到凶手”的幼稚愿望）关注的是建构这种想象的连贯性的计划（project）。作为意识形态的建筑将历史所创造的现实自然化和去历史化。在研究其中的运作方式的过程中，批判性历史正是在神话发挥最大效应的地方来直面之。也就是说，正是在这个时候，“它（神话）以毋庸置疑的姿态昂首向前”；它捍卫着既有地位以免遭怀疑和攻击；它还通过宣称“这是其必定的方式（that is the way it must be）”，来将历史普遍化。也就是说，批判性的历史检验着建筑意识形态成为神话的这一自然化过程。

这就是批判性历史的任务。批判性历史的目的，就是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建构一种处在研究之中的建筑学话语（the discourse of the architecture under study）——建筑是在制度和历史所决定的神话之间所蕴含的关系中构成起来的。

在此必须强调的是：建构一种处在研究之中的建筑学话语的计划，并不（*not*）意味着它是一种主体活动。相反，它指明了特定规则的物质性存在，主体一旦进入话语，就会受这些规则支配。

如今，在进行这种建构计划的过程中，批判性的历史学家必须遵循若干步骤。首先，他必须描述他所研究的建筑的分类法则（classification）、秩序法则（ordering）和符号（semiosis）法则。换言之，他必须描述某些传统和思维习惯（mental habits）（通常是不知名的、由历史所决定的），其中，处在研究之中的建筑学处理以下问题：（a）计划与形式的分类，（b）平面、剖面与立面的构图语法（compositional syntax），（c）使用象征的技巧（the techniques of symbolization）。其次，他必须去问：这些分类、秩序和符号法则的内在系统（internal economy）是什么样的？它们又是如何在选定的设计法则中彰显自己的呢？而且，从属和等级（subordination and hierarchy）将这些设计法则组织进一种看似连贯的美学法则中，这种从属和等级的相对关系又是什么呢？第三，他必须去问：这些设计法则具有什么样的工具性意义（instrumental significance）？亦即：为什么它们会最先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用？它们是在什么样的语义学语境（semantic context）中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用的呢？反过来说，为什么它们被公认为是操作性真理（operative truths），亦即，被公认为是享有“与生俱来的”事实性的、普通的、日常的陈述？这些发生在什么样的语义学语境之中？

在我的《现代折中主义的起源》（*Sources of Modern Eclecticism*）一书中，我曾试图对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的作品进行具体的历史研究，并以此来着手这一计划。在此书中，我首先考查了阿尔托运用的设计方法，他试图用它来“超越”（transcend）建造程序（building program）和工业生产本身所具有的纯粹的真实性。一开始，我描述了他关于分类和排序的思考（classificatory and ordering thinking）——这是他的特殊技术，他用来组织建造过程，建筑平面、剖面，以及令人愉悦的建筑图像。在考查阿尔托构想建筑元素及这些元素的组合法则所运用的方式时，我探讨了他的意指性思考（significatory thinking）；亦即他在探索有意味的设计姿态时，所运用的特殊技巧。这样来分析的话，一些设计类型（design categories）表现为阿尔托作品的特征：**异位移植**（*heterotopia*）、**特殊化**（*particularization*）、**类型学**（*typology*）和**隐喻**（*metaphor*）。然后，我试图去揭示这些设计类型的意识形态功能。我问道，**为什么**，和**在什么样的**语义学语境中，它们被公认为是操作性真理（operative truths）？例如，我考察了工业化的欧洲围绕自然观念所编织的神话，以及阿尔托的自然主义在这一意识形态的**先验**逻辑（an ideological a priori）中发挥作用的方式。我还考察了有关城乡之争（country - city debate）的神话，以及阿尔托试图缓和此冲突的方法。但总的来说，我考察的是，异位移植、特殊化、类型和隐喻这些设计类型，在自然化的神话和制度的调解下，以何种方式在政治经济生活中联结为一体。换言之，我试着去揭露在20世纪的50到60年代，**唯生活哲学**（*lebensphilosophie*）、聚集的和差异的规划（agglutinative and heterotopic planning），以及引用性的和历史主义的评论等神话（这些都会逐步导向现代折中主义的霸权风潮），如何被人们用于建筑文化，进而来恢复**灵韵**（*aura*）——它已被现代主义从建筑中彻底清除掉。但是，我在此书中所分析的这一特定历史争论以及权力关系的结构，并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问题。

如今在我看来，批判性的历史似乎存在着一种政治维度：**它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是将建筑建构为话语，并且在此过程中，揭开在任何时间与地点上发生神话化过程（the process of mythification）的假面具。但是，这种把历史建构视为一种去神秘化（demythification）计划的看法，也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批判性历史揭示出了意识形态的谬误吗？第二，批判性历史只要控制住自己不去建构选择性（alternative）观点，它就能避免谬误吗？

批判性历史在揭开去神秘化过程的假面具之时，能否揭示出意识形态的谬误？当然不能，因为，根本就没有所谓源头的意识形态错误。意识形态无关真理或错误。把意识形态同科学的对立——亦即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同客观真理的对立——运用到建筑史中，只是在做徒劳无功的道德操练罢了！

我们都知道（我希望是这样）自尼采以来，虚假意识同客观真理的对立，只是众多僵化的经验主义思想的例证之一。我们可能会偶然碰到，但最终还是会将它驱除掉。建筑学的意识形态不（not）是错误的例证，而是自然化修辞（naturalized rhetoric）的例证。这里，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作为神话建构过程的建筑的意识形态概念。它（建筑的意识形态）致力于权力关系再生产。神话为两种欲望所驱动。一个指向自然化进程，也即操控规范行为的无限权力。另一个指向理想性（ideality），也即建构出一个领域，在其中，意识能将自身视为一种主体性的建构（subject - constituting）。建筑的意识形态戴上假面具，并不是因为它出了错，而是因为其角色就是要去证明，作为黏合剂和营养品的社会现实是合理的。

因此，由于建筑的意识形态问题并不在于它持对或错的观点，而在于它持的是“必要性”观点，所以，我们只能设定批判性历史的目标不（*not*）是去揭露意识形态的错误。它仅仅是要描述神话采取自然态度（natural attitude）的方式。自然的态度，既是规范化行为（normative behavior）的态度，也是理想性的态度。换句话说，批判性历史，描述了规范化行为结构的生产，以及建构意识的那些主体体系（systems of subject - constituting consciousness）的生产。

第二个问题涉及历史学家所假设的历史客观性——它是介入（engagement）的问题，也是**立场**（*prise de position*）的问题。批判性历史作为去神秘化的计划，是否只要它不建构选择性（alternative）观点，就能避免谬误呢？这样来看，这一问题显然意味着，如果我们从观点出发，亦即**从某一立场**（*from a prise de position*）出发，来对去神秘化进行实践的话，去神秘化就是错误的。

在我看来，这一点触及了讨论的核心。因为，根据其确切定义，如果批判性历史——我们在此将其理解为持续不断的去神秘化计划——着手考虑的是社会所建构的建筑语言中的自然化过程，那么，它必须要做的就只是在历史中设定某种姿态。换句话说，批判性历史为了揭示出一切自然化

过程（也即规范化行为的权力操作过程和主体建构意识的权力操作过程），就必须把建筑话语看成是存在于生产的建筑、制度的建筑，以及意识形态的建筑之间的一个建构过程。

这一建构过程不是，也不可能是客观、善意的，因为它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再生产。这正是建筑的意义系统会被掩盖的原因：不是因为它们是错误的，而是因为它们**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是为了衔接不同的权力关系，将它们表现成一种自然的，且有如事实一般（matter - of - fact）的常识。反过来，任何试图揭露在建筑的生产、体制和意识形态层面之间的正在进行的建构过程的行为，都不是，且不可能是客观的、善意的。批判性历史从其主题所界定的话语场所的外围来进行分析。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说，批判性历史进行着客观的分析。客观，是因为历史学家身处他所分析的话语之外。“处于话语之外”（lying outside）的意思是，批判性的历史学家处于实践的、工具式的维度之外。这些维度和他所分析的建筑有所牵连。同样，他也处于建筑的某些观念、表征、意象、行为方式、姿势、态度和实践规范之外。这些东西控制着他所研究的建筑。在此意义上，他站在虚构的“现实”之外：因为这种虚构的“现实”所起的作用，就是将权力关系自然化，其成功之处在于，在很大程度上，它作为虚构形式一直不为人知。

但是，这种去神秘化的计划，并不允许批判性的历史学家具有先验意义上的客观性。这里，客观性**不是**获得绝对真理的方式。这不是因为绝对真理不存在，而是因为绝对真理作为历史范畴，它涉及的不是作为主体的历史学家的客观性，而是意识形态的客观的决定特征（objective determination）——也即客观的、历史的决定特征（objective，historical determination）。这种决定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单个主体，并且，我们只能在历史性的具体分析中才可以对其进行说明。（顺便说一句，此概念出现在马克思之前，可以追溯到爱尔维修，甚至培根。）

然而，话虽如此，我们也不应该将批判性历史理解成对飞掠而过的影子所进行的无尽追逐。批判性历史不是一种历史相对主义的理论。它是把去神秘化当作知识学（Gnoseological）工具的一种计划。当然，知识学对批判性历史的贡献（gnoseological contribution）与知识学对经验科学的贡献是不相同的。在此，批判性历史的目的不是要去证明、解释、确证、创造那些想要进行预测（prognosticate）的模型。相反，其目的是要让人们看到

这个顽固的“市场假相”（the petrified“idols of the market”）（用法兰西斯·培根的话来说）。换言之，其目的就是要让人们看到禁区，听到那些“被隔音的话语”，那些责难（同时也把乌托邦视为一个物化过程）；从而使人们达到——哎，纵然只是转瞬即逝的——一种意识自由的状态。也就是说，既不是一种权力的状态，也不是一种困惑或乌托邦的状态，而是一种理解的状态。

但是，由于对这一去神秘化计划的运作通常是站在历史性的具体立场上（*prise de position*）（也即，其姿态不是主体性，而是历史性），所以，结果（findings）则是其自身最终也难逃成为“被隔音的话语”（deafened words）的厄运。这就是说，批判性历史自身通常暗藏在另一话语之中。正是通过这一话语，它来实施其去神秘化的计划。

反过来，由于去神秘化计划被锚固在意识形态被社会自然化（当然，这是假定的）的层面上，所以，它经常冒有这样一种危险——也就是它被诠释为价值自由之相对主义的普遍性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value - free relativism），而这种价值自由的相对主义最终会导致知识的形式主义（intellectual formalism）。

结构主义在过去20年所采取的分析，危险存在于何处，如今或许已很清楚。这并不是说结构主义思想应当被抛弃，因为，它依然是我们所拥有的最为有效的分析方式。这仅仅意味着，结构主义思想应当被限制的，不是它去神秘化技术的本质和角色，而是它滋生出的双重幻觉：去神秘化计划产生出的权力幻觉和价值自由（value - freedom）的幻觉。当批判性历史学家揭示出建筑话语自然化过程之时，他可能不自觉地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真理。它现在可以成为未来行为的规范性向导。或者反过来，意识到批判性历史的结果（findings）本身是“被隔音的话语”，可能会将我们导向庸俗相对主义（vulgar relativism）的空洞观点。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阻止批判性历史成为这种双重幻觉——也即权力幻觉，及其自相矛盾的对立面，价值自由的幻觉——的囚徒呢？在走过结构主义之路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如何建构一种历史，使其在清除掉隐藏着权力结构的意识形态障碍的同时，能够避免转化为治疗术，或转化为价值自由的形式主义（value - free formalism）。这是一种双重诱惑。而与之相反的是，批判性的历史怎样才能通过强迫现实重组自身，而设法有效地作用于现实呢？

在此应谨记的是，我所讨论的当然是现实（亦即历史上的具体现实），而不是现实的特定个体——也即那些构成性的主体性（constitutive subjectivities）。

因此，批判性历史不应仅仅被理解为一种有趣的、和政治相关的去神秘化策略，也不应仅仅被理解为一种对疾病的驱邪仪式，更不仅仅是一种修辞理论。这些普遍性的怀疑，不断反作用到批判性的历史学家自己身上。

批判性的历史应当在一开始就被理解为一场深刻斗争。其目的在于获得意识的自由。也就是说，批判性历史最终所达到的意识状态，要能够瞥见历史与主体之间的联结，并瞥见主体与尚未成为主体之物之间的关系。

（胡恒　译）

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

[美]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

现代主义的大罪就在于它区分（或混合）政治与审美，在于它预见到日后与建筑生产本身的形式过程相一致的政治社会变革。

空间怎么可能是“意识形态的”呢？只有当这类问题是可能的，有意义的——且不论这些问题是否是有意义的答案，任何有关非意识形态的、美化了的、乌托邦式的空间的构想或理想才能得以发展。此问题本身往往被自然主义观点或人类学观点所吸收，而这些观点通常是建基于关于人类身体的观念，尤其是体现在现象学中。因此，人们就会诉诸身体的局限及其需要，使之成为终极的标准，据此衡量旧时商业空间或工业空间、或国际风格的那些气势雄伟的、雕刻般的①纪念碑、或后现代主义的“超建筑”（megastructure）等的相对异化程度。然而，建立在人类身体之上的说法根本上是非历史性的，它涉及一些有关某种永恒的“人类本性”的前提，而这“人类本性”隐藏在表面上“可证实的”、科学的生理学分析数据之中。如果说身体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性的身体，因此并不存在什么前定的人类身体本身，而只存在着身体的全部历史性社会体验，只存在着由一系列独特的历史“生产方式”或社会构成所投射出来的全部身体性规范，那么，“回归”到某种存在于由现象学投射出来的空间中的更“自然的”身体图

---

① International styles；国际风格，一种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于欧洲和美国的建筑方面有影响的现代主义风格，主要以均匀的未经装饰的几何图形、宽敞的内室，以及使用玻璃、钢铁和钢筋混凝土为特征。——译者注

景，在不是怀旧性的时候，就似乎变得具有意识形态性了。但这是否就意味着，身体在社会上及历史上能够成为一切，没有任何限制；或者，身体所能“适应”的空间也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没有任何限制？

然而，如果身体不再是空间分析的基本单位，那么空间概念本身马上就成问题了：什么空间？各间房屋的空间还是个别建筑物的空间？或者是那些建筑物分布于其中的城市结构本身（根据这一城市结构的感知背景，人们对这个或那个局部区域的体验得以被组织）的空间？不过，城市是一种总体性空间（space - in - totality），无论它是如何构想而成的；它并不是作为研究或分析的对象、按照已落成的建筑物的样式而被预先给定的。（或许就连后者也并非是这样被给定的，除非是对已然抽象的视觉而言：各建筑物只有在摄影中才是“客体”。）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或承认），第二类问题根本上具有现象学倾向：的确，我们最初的问题的缺陷就很可能存在于那里，即它可能依然坚持提出有关个别主体的关系问题，以及主体之“实际体验”与建筑客体或城市空间客体（无论人们会怎么看待该客体）之间关系的问题。人们松散地称之为“结构主义”的东西如今常常被理解为是对现象学“问题意识”（诸如“体验”之类的预设）的拒斥：它引发了自己的新的反问题意识（counterproblematic），其中，空间——个别建筑物或城市本身——被看作一种文本，在这个文本中，整套“符号”或“符码”要么在共有符码的有机统一性中组合在一起，要么在各种各样的“拼贴”体系中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些结构，这些结构要么是对过去进行影射征引，要么是对当前进行反讽评论，要么就是极端的分裂结构，其中某些全新的符号（纽约西格拉姆大厦或光明城市①）对旧时的符号体系进行批判，而这些新的符号就是从这些旧符号中戏剧性地爆发而来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恰恰是这最后一种可能性遭到重新质疑，被人们看作是对我们最初的问题以更加现代的“结构主义”语言而进行的复制。在一切艺术中，新的“文本”策略顽固地将更早些的政治问题的坐标，以及更早些的“原真”/“非原真”之间的未经检验的二元对立的坐标偷偷搬运回它们的新的问题意识中：通过“颠覆”概念、符码的断裂、它们的激烈的停顿或争吵（以及其可预料的辩证对立面，即选举［co - optation］

① Radiant City：光明城市，是现代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间所提出的构想，集中体现了他的高楼旷地、立交穿梭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译者注

概念），更新的中介一度产生了旧（假?）问题的似乎是新的版本。如今，通常有问题的，恰恰就是这些新的解决方案的可行性：人们感觉到它们更加具有乌托邦性质，虽然这种乌托邦是否定性的，或者说是批判性的。它们似乎从一开始就已经拒斥了新的乌托邦的——原真的、非异化的——空间或艺术所具有的老式的明确而又怀旧的理想，然而它们对精确的否定性的主张（乍看之下，更显谦逊）如今在一种坏的意义上同样是乌托邦的。这是因为，即使是那对压迫性的社会空间秩序中已有符码进行批判、颠覆、去合法化、策略性地打断等的工程，最终也被认为是诉诸某种今天看来成问题的批判性"自我意识"的概念，即批判距离的概念；而在一个更加经验性的层面上，人们注意到，最具颠覆性的姿态其本身就会僵化成另一种存在形式或实证性形式（正如最具否定性的批判立场最终也会丧失其治疗性的、毁灭性的震惊价值，从而慢慢地自行演变回另一种批判性意识形态）。

在这两种因素——现象学的及结构性的——之外，是否可以构想出什么其他因素？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其《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中明确地尝试了这么一种超越于上述两种"因素"之外的辩证行动。对于他而言，这两种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又是不充分的：这种"实践"概念——即空间文本对社会身体的系统规划，如今被看作是日常体验的"底线"，也是社会结构本身的合法化的"底线"——虽然被作为这么一种解决方案而提出，不过它只是在阿尔及利亚卡比尔村庄中的前资本主义空间的那些简单得多的材料和问题上得到了"验证"。与此同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èbvre）将空间看作是政治及辩证法的基本范畴。这是近几年失望与放弃之中产生的一个伟大的预言性图景。他的这种观点尚有待在其开拓性启示中加以把握，还谈不上去探索和实现，尽管人们必须注意并思考列斐伏尔作为一个思想家、法国建筑的批评家而具有的影响作用。

恰恰就是这种作用，遭到了另一种立场的公开拒绝：这正是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的立场。面对前面所勾勒的两难困境，他的立场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他的立场的优点在于其十足的、绝对的简单性，至少在其更自信的表达中是这样。在《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Theories an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意大利第2版中有一个注脚非常坦率地宣称："人们无法'预见'到一种阶级性建筑（即'为解放的社会'的建筑）；人们能做的，是将阶级批判引入建筑之中"[1](p. iii)。虽然在多年来的各种文本中，塔夫里的初

步判断实际上远比以上立场更加微妙，更加含混，但我们依然能够一眼看出一些关键的因素来：（1）建筑批评家不必做“意识形态家”（ideologist）所要做的事情，不必不切实际地倡导什么未来的、“革命性的”建筑之类的建筑风格；他所要做的，就是坚决否定、清醒揭露当前的或历史的建筑意识形态。这一立场往往会滑向另一种稍微不同的立场，即（2）处在这个社会里，处在资本主义这个封闭体系中，职业建筑师不能指望设计出一种截然不同的、革命的、或“乌托邦”的建筑或空间。（3）由于没有任何关涉建筑空间或与之截然不同的空间的可以构想的规范性观念，因此，对建筑物的批评往往会和对这些建筑物的意识形态的批评相混淆；建筑史及建筑批评因此往往囊括有关各种建筑意识形态、宣言及伟大建筑师本人的语言表述等的历史和批评。（4）在这种立场中，政治行动未被放弃，或者说未必然地被放弃（虽然我们可以对塔夫里进行更“悲观”的解读）。然而，在这里得到肯定的东西，与阿尔都塞所说的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各种实践的“半自律性”传统是一致的，即政治彻底脱离于审美实践（在此为建筑实践）。前者依然可能，但唯有在其自身层面上才是可能的；而建筑生产或审美生产从不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而只能在别处。因此，正如其他人，建筑师可能关涉政治，但他们的建筑如今却不可能关涉政治（即对前面第二个命题的重述）。所以，（5）只有当未来到来之际，就是说，只有在总体社会革命之后，只有在生产方式得到系统的变革之后，未来的建筑才是实实在在的可能。

上述立场有着不可妥协的强硬性及一切绝对性，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魅力。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我们必须将它理解为对阿尔都塞主义者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具体包括其“乌托邦”因素，如马尔库塞或列斐伏尔所象征性地代表的那样）的拒斥。下面我将更详细地证明这点。这种立场拒绝迎合某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可能性（这种意识形态力图构想另一种未来），但是，由于它只谴责过去的意识形态及已结束的现在的意识形态，所以它同时也致力于一种极具批判性和分析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所有这些特征都透露出，它与阿多诺晚期的纯粹“否定的辩证法”的激进概念有着某种亲缘关系。这种立场的含混性，在于其极度的不稳定性，在于其不知不觉变成一种后马克思主义，即法国新哲学（nouveaux philosophes）或塔夫里的合作者马西莫·卡西亚里（Massimo Cacciari）所支持的那种后马克思主义。这表明，塔夫里的立场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拒绝意识形态或投身于否定的、批判的“意识形态分析”并不能使人们摆脱意识形态。

不过这么一种评价在此依然停留在纯粹个人看法的层面，因此即便有意义，那也是微乎其微的。下面我将分析塔夫里的著作，以使这一评价更加丰富。我将尤其关注他的《建筑与乌托邦》。这是一篇短小精悍、广为流行，然而又晦涩难懂、极具挑战性的文章。我将从三种不同的角度来进行阅读。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语境，因为该文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就的。非马克思主义者或美国读者由于缺乏恰当的背景知识，因此可能会忽视其中许多意义深远但却又含蓄不明的举动。第二个角度（这里没有什么特殊的顺序）则是塔夫里进行写作的话语形式，即历史编纂形式，尤其是叙事性历史。如今看来，这种话语的形式困境和问题决定了（至少是多元地决定了）塔夫里的某些组织性概念。最后，有必要在更广阔的当代事件的语境下重新思考这部重要的著作（现有大量的英文版）。我所说的这个当代事件，有着其特别美国化的对应物（完全没有局限在建筑领域中，虽然在这个领域中，相比在任何其他艺术中，其战线更具戏剧性）——即对盛期现代主义的批判。这是一种日益普遍的感受，即认为现代主义运动本身从此灭亡了。这种感受常常伴随着另一种感觉，即我们如今可能因此而进入某种别的运动。有时这个别的运动被称为后现代主义。顺便说一下，对塔夫里本人而言，这第二个主题——即某种新的后现代主义时刻或甚至是“时代”的降临——是完全陌生的，在他的时代划分架构中，在他的历史叙述中，起不到任何作用。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事情。我们回头还要再作讨论。

我想先处理上述所列的第二个角度，即与历史编纂有关、与历史书写问题有关的话题。这里指的是对一门学科、一种艺术、一个媒介等的历史的撰写。众所周知，自19世纪末以来，叙事性历史或故事性历史存在着一种危机。这一危机与现实主义小说的其他危机之间的关系也是为人所熟知的：叙事性历史与现实主义小说的确紧密相关。事实上，在最伟大的19世纪文本中，它们可以相互替代。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发展着的危机再次得到人们的重视，被看作是对再现的批判。这正是后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口号：简单而言，历史的叙事性再现往往会表明，历史是某种你能看到、目击到、亲历到的东西——这显然是一种难以接受的命题。另一方面，正如术语本身所表明的，历史本质上总是在讲故事，因此其结构本身始终是叙事性的。

对于那些不把历史书写当作基本任务的人来说，这种困境并不会让他们烦恼；如果你满足于对个别文本或建筑物进行小小的符号学分析，那么历史书写的问题、历史故事的讲述问题大概并不会过多占用你的注意力。

我说“大概”，是因为我认为这个问题也在这类静态分析上面留下痕迹，而且的确，如今历史问题不仅仅重现于符号学之中（符号学的历史，符号学分析之转向到类型问题，历史再现的符号学问题），而且出现在所有的地方。这好像是一个经验事实。

不过，暂且让别人去管他们自己的事吧。很清楚，对于那些多少投身于辩证法传统的人来说，没有什么问题会比它更加重要、更加关键，因为，无论好坏，辩证法总是关涉这种或那种历史图景。就我本人而言，路易·阿尔都塞的解决方案对我影响至深。他坚持认为，在历史再现及叙事性历史的危机之中，历史学家应该视历史的**概念**的生产为己任，而不是对历史进行再现。这两者截然不同。

但如何去完成这件事？或说得谦逊点，这在实践中如何才能实现？从这个角度来看，阅读《建筑与乌托邦》是非常有趣的，可以明确该书是如何发人深思地“生产”辩证的建筑史的“概念”。但是，对于一个想先将塔夫里的文本与其他罕见的同种类型或形式的实现并列起来的人而言，这是远远不够的。我所能想到的，是两部和该文本有着相似强度和知识能量的当代辩证史，即阿多诺的《现代音乐哲学》（*Philosophy of Modern Music*）（影响深远的文本，托马斯·曼从中为自己《浮士德博士》吸取到音乐材料）以及文学史领域中的罗兰·巴特早期无与伦比的《零度写作》（*Writing Degree Zero*）。你会明白，这一有限的选择并不表明我们对卢卡奇、萨特、阿瑟·罗萨（Asor Rosa）、或雷蒙德·威廉斯等人为重构传统的文学史范式而作的贡献不感兴趣。我所说的这三部著作，其共同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对文学的全新辩证洞见，而在于它们都是一种独特的、浓缩的、引经据典的话语形式的实践或文本类型。迄今为止，依然罕见类似作品。我将称之为辩证的历史。

请允许我首先指出这三部著作所共有的一个根本的组织特征。我有意将这个特征视为实践辩证思维所必须痛苦地服从的终极前提：即必然性、必然的失败、封闭、最终无可解决的矛盾、未来的不可能性的感觉。它必然会影响到这些文本的所有读者，尤其是那些企图从中获得有关未来文化生产的可能性方面的建议和鼓舞的读者，他们是实践中的艺术家——无论是建筑师、作曲家，还是作家。

比如，阿多诺对音乐史所作的讨论，在论及勋伯格的卓越的“解决方案”即十二音制时达到顶峰。这种十二音制如此彻底地解决了所有在此前音乐史上极为突出的困境，以至于在阿多诺看来，勋伯格之后的所有音乐作曲

都是多余的（或至少是倒退的）。然而与此同时，它的结局就成了专制性社会经济制度的邪恶的复制或镜像。然而它本来所要逃避的就是这种制度。在巴特的《零度写作》中，著名的“白色书写”理想在其最初的历史语境与情景中同样是一种不可能的方案，就是说，它无法破解这种使所有先前书写实践或风格都成为意识形态的、不可忍受的东西的困境。与今天常常看起来的那样全然不同的是，这种理想并非是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颇为自得的描述。最后，塔夫里描绘了晚期资本主义（始于1931年，二战后得到辩证的加强）不断发展的封闭性。通过不断系统地破坏各种审美可能性，晚期资本主义最终传达了一种让人瘫痪的、叫人窒息的感觉：在同样不可思议的分水岭即总体社会革命的这一端，一切建筑创新或都市设计创新都是徒劳无功的。

争论这些立场究竟是乐观还是悲观，是愚蠢的，甚至是无聊的。接下来我将评说一下那些导致（或至少多元地决定）塔夫里某些态度的政治预设。不过目前我更想强调的，是这些关于总体系统的严峻图景的形式起源。这个比马克斯·韦伯所谓的铁笼还更糟糕的总体系统如今降临到人类生活和人类创造实践之上了。阿多诺、巴特、塔夫里等人在这些著作中的读解和洞见的力量首先与他们的历史观有着不可避免的联系。这种观点认为，历史是一个日益总体化或日益封闭的系统。换句话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将某一部艺术作品阐释为暂时性的“解决方案”，绝对是因为他们是在一种被重构或重写为情境或矛盾的语境背景下，来进行艺术作品的阅读的。

此外我还发现，我在别处表达的一种直觉也在这些著作中得到证实，即辩证的历史，或者说强大的辩证的历史，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关涉一种必然性图景，或者，你喜欢的话，它总是在讲述失败的历史。“密涅瓦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中起飞”：辩证阐释总是回顾性的，总是在讲述一个事件的必然性，讲述为什么它必得按其发生的方式发生；而要想这样做，那么该事件就必须已然发生，故事必须已然结束。不过，由于这听起来好像是在指控辩证法（或者还只是作为其无可回复的黑格尔特征的又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证据”），因此有必要补充一句，这类必然性的历史及明确的失败同样与某种终极性历史观密不可分，这种历史观信奉调和、实现了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所说的“史前史的终结”。

从一系列的事态、困境、矛盾的角度出发重构一种艺术的历史，个别作品、风格、形式就可以看作是如此众多的反应或明确的象征性举动，这就是辩证编史的第一个关键特征。但此时（至少当人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

来进行思考的时候）亦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特征浮现在脑海，即逆转（the reversal）。它关联着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本身、关联着反唯心主义冲动，也关系到意识的拒斥和治疗性羞辱。意识被迫重新扎根于一种痛苦的感知，即对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决定”的感知。这第二个特征，当然就是那使当前这些本文与旧式的黑格尔精神编史学鲜明地区分开来的东西。但它反过来又威胁着要颠覆所有的编史工程，一如马克思在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我们所作的阴郁提醒一样：

> 我们并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和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表象。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pp. 14-15)

如今，“唯物主义”这个口号重又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极为流行的委婉说法。我自有理由来反对当前左派的这个特别的意识形态时尚：作为一种解决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非常真实的紧张关系的流行前线方案，在我看来，这个显得浅薄虚伪的口号似乎也特别容易让人误解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同义词，因为“唯物主义”这个概念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后来则是实证主义）的概念，它宿命般地传达出“身体决定论”这么一种印象，而不是真正的辩证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论”。无论如何，在这个与我们有关的语境中——即对“辩证的编史”的描述——“唯物主义”一词的缺点在于，它往往使人们以为，在这类著作中起作用的只有一种辩证性逆转：即唯物主义推翻唯心主义，或召回物质。

然而事实上，辩证休克，即我们的唯心主义习惯的逆转，可以有许多种形式；而且很显然，一种艺术的辩证史，其专有的目标将会是我们的唯

心主义习惯：在思考这类事情时，尤其是在思考黑格尔关于形式与风格的历史的观念以及经验主义或结构主义关于孤立文本的观念时，我们继承了这些习惯。不过，最好还是看看，这些逆转效果是如何在实践中实现的，而不是从某种教条方式先验地演绎出来的。由于这些著作全都没有提出过今天每个人都关心的核心问题，因此在讨论之前，我们可以先简单说明一下当代“逆转”的一个基本形式——此“逆转”或许也不会让这些问题全身而退：这个形式指的是当代女性主义批判穿越我们所继承的整个艺术史和文化史体系的方式。通过证明女性在这些历史中的耀眼的缺席，而且在建筑领域中，任何关于女性劳作与室内空间之间、女性的宰制与城市规划本身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也缺席，女性主义批判刺穿了这个体系。对于男性知识分子而言，这就是最令人震惊的唯物主义逆转，因为在其让人不安地羞辱这些学科的基础及制度性预设的同时，它也有效地使**我们**也成为问题。

的确，这类批评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唯物主义的或辩证的历史编纂最终是通过瓦解各种专业化学科本身的基础、架构和构成性预设而发生作用的。这种瓦解，是经由出其不意地展示一种存在而得到实现的，——这个存在不一定就是那个有限意义上的“物质”的存在，而通常是一种学科它者的存在，是一种外部，一种界限，是外在之物的显形。人们觉得，将这个存在引入严格操控的传统论证之中，是可耻的，不是学者所为。

在这个问题上，阿多诺的著作可能做得最好：《现代音乐哲学》的独特逆转是通过从主体（伟大的作曲家及其风格与作品）转向客体，即原始素材、音调体系本身等而实现的。作为一种独特的“内容逻辑”，音调体系有着自己的动力学，随着每一个新的解决方案而产生新的问题，从而在一切历史时刻中都绝对地限制着作曲家的自由。它的客观矛盾在强度上、在复杂性上随着所有这些新的时刻而不断增加，直到勋伯格的“最终解决方案”——即横轴与竖轴、和声与对位的统一——好像产生出一种绝对物，即句号，即作曲无法超越的点，一种成功。而从真正的辩证法方式角度来看，这种成功也是一种绝对的失败。

巴特的逆转非常有用，因为他的问题意识（实际上也是《何为文学?》的作者萨特的问题意识）最远离唯物主义与物质性的修辞。实际上，这个问题意识坚持将历史梦魇看作是血腥的罪孽，看作是一个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关系的必要而又不可避免的暴力，即我们所说的阶级斗争。通过揭示每一篇文本如何借助其制度化的信号必然地为自己选择一个独特的读者群并因此象

征性地支持了该群体或阶级的不可避免的血腥罪孽，萨特和巴特这两位作者逆转了我们的宁静的文学史观念。只不过，在萨特提出一种文学实践的彻底乌托邦的解决方案，即投身于一个无阶级的社会的文学实践的时候，巴特聪明地想象出另一种逃离“历史梦魇”的方法，一种中性的或零度的条件，一种所有群体或阶级都已经被从中取消的作品的投射：即一种白色的或漂白了的写作，它从群体的血腥罪孽逃逸到群体构成的另一面（后来巴特根据接受而非生产来重新调整这一群体构成，从而变成了从阶级斗争逃逸到同样非个体的快感、或精确的精神分裂、或有悖常情的狂喜。见《文本的快乐》）。

此时我们可以观察塔夫里本人那里的“零度”解决方案的诱惑。这种方案构成了塔夫里作品中极难发觉的临时的运作可能性之一，但就是其中之一而已。对塔夫里关于密斯①和纽约西格拉姆大厦的描述进行巴特式解读，似乎比进行海德格尔式解读更加可行，也更具历史性，尤其是当我们关注塔夫里对这个建筑的冰冷的沉默所作的亲马拉美式的赞美的内容，而不是关注其相当德语化的语言时，更是如此：“‘几乎一无所有’已经成了一块‘大玻璃’……反射出城市混乱的镜像。这一片混乱包围了密斯式建筑的永恒纯净……它接受了［现象的改变与流动］，按一种反常的多重复制而将它们吸纳进自身，正如一件流行艺术雕像，迫使美国大都市看到自己被映照……在打破了城市网络的中性镜子中。这样，建筑就达到了自身各种可能性的最终极限。正如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所发出的最后的音符，异化在成为绝对之后，以独特的方式证实了自己的在场，将自己与世界隔绝，从而宣称世界的无药可救的疾病”[3](p.342)。然而，这与其说是对密斯的美学风格的支持，还不如说是一种结束历史叙事的方式。我们一会儿将看到，它也可能赋予那无法平息的、矛盾重重的历史情景以绝对的权力。巴特式“漂白了的写作”或密斯式的沉默之类铤而走险的非解决方案只会加强这种权力。

我们先暂时回到唯物主义逆转的策略来。塔夫里对这类策略的运用独具匠心，因为这种运用还为建筑（因此也包括建筑理论与批评）相对于其

---

① 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1886—1969）：现代主义建筑的奠基者之一，包豪斯第三任校长。纳粹时期流亡到美国，任伊利诺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西格拉姆大楼为世界上第一栋高层玻璃帷幕大楼，体现了密斯所提出的“少即是多”的原则。由于形式上的精简，容易模仿，因此很快影响到世界各地，被称为“国际风格”。——译者注

他一切艺术的优先性作了辩护：但这种辩护绝对是非传统性的，人们也可以认为，对于那些职业性地投身于这一专门领域的人们而言，它并不格外令人安心。对于塔夫里来说，在各类艺术中，建筑拥有极高的地位，因为它的他者或外在与历史和社会本身同在，因此易受最根本的唯物主义或辩证法逆转的影响。更具戏剧性地说，如果个别建筑的外部界限是物质城市本身，有着不透明性、复杂性和抵抗性，那么包括都市化和城市规划在内的某种扩大了的建筑行业概念，其外在界限就是经济本身，或者是最公开、最赤裸裸地表达着自己的无法压抑的权力的资本主义。这样，19 世纪 20 年代伟大的中欧城市工程（柏林、法兰克福和维也纳的工人住宅区）一些看似“外在的”障碍中，即在金融投机和土地与所有权价格上涨中，碰触到了他者。这种障碍导致了这些工程的彻底失败，也宣告了它们的乌托邦使命的终结。不过，对于某些传统的形式史来说，这只是一种外在的、有些偶然的、无关紧要的尝试，本质上与这些设计的纯粹形式价值毫无关系。然而，在塔夫里的辩证实践中，这种看似外在的困境却被重新引入到辩证的螺旋过程本身，对这些乌托邦形式进行绝对的历史判断。

这两种辩证逆转——即根据城市原有的现实本身而进行的针对某一个建筑、文本、或“艺术品”等工程所作的判断，以及随之而来的根据资本主义这个更加广阔的“总体性”来进行的对城市规划与城市整体美学所作的判断——只是塔夫里小书中许多逆转模式中的两种而已：恰恰就是这种反唯心主义转向的形式丰富性以及塔夫里对各种主题性对立的运用的辩证灵活性，使得他的文本既引人入胜、值得仿效，又扑朔迷离、晦涩难懂。其他逆转模式可以列举如下：尤为显著的是那让人不愉快的、提醒人们关注知识分子本身的职业地位以及这种地位所引发的意识形态扭曲和理想主义扭曲的东西；还有对“未来”所作的凯恩斯式管理——人类生活的一种信誉与规划体系——的论题。后者是这部著作的众多更为新奇的副主题之一，是针对现代主义的乌托邦主义所作的批判操演。

然而，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这类辩证史的主要“事件”——即矛盾本身，这个或那个美学解决方案在面临其自身物质阴暗面的不幸时发生的致命逆转——是如何必然地决定着叙事结尾的形式以及那种由于它们而投射出来的“终结”。在这三者中，当前时刻最终都被投射为最后的、最绝对的矛盾或困境，就是说，成了历史无法超越的一堵白墙。这种“历史的终结”，或者说未来的取消，在阿多诺那里最为明显。在他那里，它得到了

哲学家—作曲家的悲剧性的“盲点”的补偿。哲学家—作曲家一方面必须富有同情心地拒绝其文化“他者”（包括流行或大众文化的运动——被阿多诺冠以一个通用的术语“爵士乐”或“轻松音乐”而轻蔑地打发；也包括被其欧洲中心主义所“压制”的第三世界历史与文化的全部运动）；另一方面，他甚至拒绝认为发达音乐在其“最后阶段”之外还能发展，拒绝接受斯托克豪森式的电子音乐，拒绝50、60年代的一切发展。同样的固执情绪也使得他将《否定的辩证法》中一切能够想象到的政治未来用括号括起来。

我们已经分析了巴特的零度写作理想中的或塔夫里对密斯的匆匆敬意中体现出来的更率真的“否定方式”概念。现在要强调的是塔夫里建构辩证史的可能性与其在《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中对所谓“操作性批评”（operative criticism）的系统拒绝这两者之间的建构性关系。这种“操作性批评”［尤其是在诸如吉狄翁①的《时空、时间与建筑》（Sigfried Giedion's *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之类的古典作品中］有选择地阅读过去，它要求虚幻的历史分析（即某种“客观”历史叙述的表象）服务于一种实乃建筑宣言的东西，即某种新风格的“规范性”设计、未来作品与未来可能性的方案：“一种极具诗意倾向的规划，在其结构中得到预示，起源于被系统地扭曲和终结的历史分析”[1](p.141)；简言之，就是一种“用现成的价值判断（为当下使用而准备）来取代分析之精确性的意识形态批判”[1](p.153)。但是，这个关于虚假地挪用过去以支持当前审美行动的判断意味着，要达到“严格的”分析史，必须反过来禁欲般地放弃行动与价值。这种放弃是对一切可能的未来的放弃，颇具黑格尔色彩，其目的是要让密涅瓦的猫头鹰飞到过去时光。塔夫里的“悲观主义”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种其文本（即辩证的历史编纂）的种属结构的形式必然性，而不是一种“舆论”或“立场”本身。

不幸的是，人们还是不得不将它当作舆论或立场来阅读；在此，一种纯粹形式的和文本的必然性与意识形态相交叉，并为后者所多元决定，成为一整套意识形态信息和信号的载体。这种信息和信号有着真实的内容，最适于用马克思主义传统方式来评价。事实上，它就源自于马克思主义。

---

① Siegfried Giedion（1893—1956）：瑞士建筑评论家，现代建筑理论的开山宗匠，其经典名著《时空、时间与建筑：一种新传统的成长》明确地指出，现代建筑的核心问题就是空间问题，从而确立了空间在现代建筑中的崇高地位，奠定了以空间创造为中心的现代建筑学传统。——译者注

在我看来，要破解这些信号，最好还是将它们放置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语境中。当时盛行对老右派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进行通常是偏左的挪用。在艾森豪威尔时代，在美国鼎盛的时代，“意识形态终结”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灭亡，还意味着其他好消息：如被马克思剖析过的古典资本主义业已终结、某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幽灵开始出现等等。这种幽灵的动力不再建基于生产，不再关涉阶级及其斗争，而是建基于一种新的、被认为彻底“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原则。因此，根据一些坚持“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前马克思主义右派理论家，尤其是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意见，这种新的社会制度被命名为“后工业社会”①（其他人则称之为消费社会、媒体社会、消费资本主义等等），其动力特征是：知识优先，科学技术优先，以及新兴的社会群体即技术官僚（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优先。

由于一些明显的原因，左派多年来始终拒绝这种分析。他们矢志于证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经典分析与概念依然适用于贝尔等人极力描述为“后工业社会”的这个辩证突变时期。显然，贝尔理论的某些力量来自于艾森豪威尔时代的乐观主义精神。这是一个美利坚帝国的时代，是美国强权下的全球和平。对“意识形态终结”、“后工业社会”等论调做出宣判，将会是历史本身，而非任何左派反叙事或批判。在我们这个回归更经典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世界性大萧条、失业等的时代里，历史会埋葬这种论调。

然而，悖谬的是，正是在这两者之间的日子里，左派本身赶上了新历史时期的命题，即激烈的历史断裂的命题，也产生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这与社会环境和气温有关，与发达世界生活质量的变化有关；就是说，与社会生活的表层或表象的改变有关。换句话说，大家都很清楚，随着消费主义的出现，随着传媒工具的庞大渗透与殖民，随着60年代新的非阶级性社会力量的涌现——这些力量与种族和性别有关，与民族主义和宗教有关，与边缘性（如学生或永久失业者）有关——某种具有决定性的东西改变了资本主义的“表象现实”（reality of appearance）本身。这种新

① 参见他的两部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种社会预测》（*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of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以及《资本主义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的、马克思版本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所能做的，就是解释所谓后工业社会作为资本主义新阶段的特征而具有的新异性。在这个新的阶段里，资本的原有矛盾依然存在，但却以一种预想不到的新方式运作。贝尔等人所列举出来的特征——如科学的优先性，官僚的作用等等——依然存在，不过会得到另一种全然不同的、根据一个新的契机而作的解释。这个新契机就是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或跨国世界体系（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分期中，这是继古典市场资本主义、帝国与垄断时期之后的资本主义第三阶段，在美国，这个阶段可以追溯至战后那些年月，而在欧洲则是20世纪50年代末）①。本文在此来不及深入讨论这一极为重要的新马克思主义当代世界理论。不过，在转而讨论塔夫里之前，我们必须强调这一理论的两个重要特征。

首先，这种理论关涉某种类似总体性体系的东西。此体系以资本在世界各地的全球性部署为特征（在许多描述中，它甚至深入到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那些根本还谈不上自治的经济力量之中）。资本有效地摧毁了各种国家形势的传统一致性。它的另一个特征是该体系的推动力，即当前使它渗透并殖民旧时资本主义内部的太自然的两个最后幸存的飞地的推动力。这两块飞地即无意识和第三世界的前资本主义农业——目前，后者已经遭到绿色革命的系统性破坏与重组，而前者则被以前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文化工业”所有效地掌控。“文化工业”指的是传媒、大众文化以及对思维进行商品化操作的其他各种技术。我还要补充的是：资本的这种新巨变如今威胁到旧时资本主义内部的另一个前资本主义飞地，即从前的内部或家族或家庭的无偿劳动，因此它以一种矛盾的方式解放了女性所具有的巨大的新社会力量。这些女性于是迅速对新的社会秩序提出了令人不快的新威胁。

另一方面，如果可以说跨国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新扩张马上触发了新的斗争与抵抗，如20世纪60年代的伟大的反叛运动，那么，伴随着它的，往往也有悲观和绝望的情绪。很自然，这种情绪也必然让人感觉到存在着一种总体性体系，一切也逃不出它掌心。如今，在这个体系中，局部的反叛与抵抗也被人们视为体系内部的倒腾而已，是这种或那种系统性特征的精确的颠倒逆转而已。人们不会将这些反叛与抵抗看作是崭新力量的出现，或是一个焕然一新的未来的新逻辑。它们不再是辩证的，而只是结构

① 关于这一理论的最系统、最有力的说明，参见 Ernest Mandel, *Late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5)。本文从中受益甚深。

（主义）的。对于体系的这种日益密不透风的封闭性，马克思主义的反应是不同的：它可以是一种取代，即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中预言的时刻表来取代更加紧迫的资本的时刻表①。事实上，相比在《资本论》，马克思似乎在该书中赋予了资本主义以更大的弹性，更能适应战后社会制度所未曾预料到的新生机和活力。这一立场的关键特征，就是坚持马克思的经典观点，即要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社会，只有等到资本主义以某种方式耗尽了一切可能性之后，等到资本主义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全球性的事实之后，才是可能的。在这样的事实中，与普遍商品化并肩而来的，是劳动力的全球性无产阶级化，即全人类（包括第三世界的农民）都被改造为工资劳动者。这样，实现社会主义的机遇就被推到某个遥远的未来，而当前“总体性体系”的威胁性则在此活跃起来，因为它所标示的，恰恰就是社会朝向最终的全球状态的飞跃发展。但此外，这就又意味着，不仅一个国家中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即便在一个国家集团中，也不可能有任何类似社会主义的东西：在此，社会主义革命按其定义而言只可能是一种全球性的革命。同样明显的是，在旧制度的缝隙之中，在资本主义本身的这个或那个部门之中，也无法产生一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现在，我想读者已经辨认出塔夫里著作特有的观点：即如果不是先有一场总体的革命和系统的改造的话，那么在过去资本主义制度的任何因素中——比如说在建筑或都市生活中——都不可能会发生质的变化。（当然，我们同样能从前面所谈到的文本决定论的角度来解释总体性体系：理论家的目的就是要建设一种尽可能强大、尽可能涵盖一切、尽可能系统的、天衣无缝的、自我永存的资本模式。因此，如果理论家成功了，那么他就是失败的；因为建构的模式越是强大，人们在其中就越难预见到任何形式的人类抵抗的可能性，越难预见到任何结构性转型的机会。）

然而，要想充分理解这种僵硬而又绝对的立场、这种对晚期或跨国资本的总体性制度的诊断的意义，就必须思考它所象征性拒斥的相反立场，这种立场可以称为新葛兰西主义。它是对某种可能的“经由制度而进行的长征”的更加“乐观的”看法，是针对经典的列宁式“机动战”（war of maneuver）模式——即不成功则成仁的权力争夺——提出了对立的新观念，

---

① 参见 Martin Nicolaus, “The Unknown Marx,” in Klare and Howard, *The Hidden Dimension*。

即某种渐进主义式的“阵地战”（war of position）。悖谬的是，就在葛兰西的远见开始使其他欧洲国家乃至世界其余各地的左派重新振作起来的时候，今天的意大利激进知识分子却对它感到厌倦。这当然是有许多理由的：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葛兰西思想在意大利共产党内部的30年的制度化（以及在意大利语境下葛兰西思想之被吸收进经典的辩证思想中——这种辩证思想在所有地方都遭到尼采式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拒斥）。我们也不能忘记强调葛兰西基本文本的结构含混性或多义性。这些在法西斯主义审查员的眼皮底下用经过编码的语言撰写的文本，可以“转译回”经典的列宁主义。相反，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从另一个的方向对列宁主义作的新颖的**偏离**，或理解为后列宁主义，即认为它激发了新式的**新**马克思主义。因此，“客观地”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葛兰西，想要确定其中何者为真，其实并不重要。然而，我想要说的是，既然存在着某种葛兰西式的替代性选择，那么，今天同样也可能存在一种非常不同的关于建筑与城市生活的看法：这样，这一段更加离题的话所蕴涵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教条学究的事情，也并不仅仅局限于纯粹政治性的后果之中。

在此，对于葛兰西所提出的为“霸权”（hegemony）而斗争的口号，我们至少必须提出两种迥然不同的、然而又都成立的理解。问题在于“反霸权”的意义。人们号召在资本“霸权”的现行统治之中构建反霸权（counterhegemony）的反抗力量。这里，阐释难题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假）问题：是唯物主义解读还是唯心主义解读。换句话说，如果葛兰西式的斗争根本的目标是要使劳动阶级作好准备去最终夺取政权，那么，我们就应该纯粹地从上层建筑的角度出发，把“反霸权”理解为是苦心经营一套观念、反价值、文化风格。就其相对于尚未被政治革命所“真正”夺取的物质性、制度性的基础而言，这些观念是虚拟的，或者说是**预期**的。

因此，这里有诱惑力的是，人们可以根据经典马克思文本中的某些关键形象或比喻来支持对葛兰西进行“唯物主义式的”解读。比如，人们可以想起《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的序言中的“有机的”表达：“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所有以前的历史的、作为阶级冲突的］对抗的物质条件”[4](p.21)。同样必须注意的是，马克思《资本论》在描述“商业”在“古代”生产模式之不同逻辑中的地位时顺便使用的一个著名比喻：“存在于古代世界

的空隙中，就像伊壁鸠鲁这样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5](p.172)

这类比喻暗示了某种有关社会过渡的**飞地**理论（enclave theory of social transition）。根据这种理论，我们可以从旧体系中的细小而又关键的角落或滩头堡等的角度出发来系统阐释萌芽中的未来，即宣告了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诞生的新的、初生的社会关系。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最终将取代和统摄尚处于支配地位的生产模式。这一概括说法本质上所具有的空间性质并不是偶然的，它传达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空间类型之间的某种历史紧张关系。在这两种空间里，新兴的、然而又更加强大的空间类型将逐渐把自己的影响力和活力扩展到旧的类型之上，从其最初的培植弥散开来，逐渐“拓殖于”周围顽固存在的东西。这也并非是一种纯粹诗意的图景：——被视为“飞地理论”在当代社会里的“证明”和具体体现的政治现实，乃是当今传说中的意大利“红色公社”，尤其是博洛尼亚市。共产党的管理似乎已经在它们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腐败与低效之间划清了鲜明的界线。然而，正如众多的异体一样，这些公社其实就存在于后者内部。塔夫里对这种公社的评判尤其有启发意义：

> 有关博洛尼亚的历史核心与经验的争论已经表明，我们不能把建筑与城市的方案放在明确的政治情境之外来检测，之后只将它置于改善了的公共机构中来进行控制。这导致了建筑行业的作用发生根本的变化，甚至被进一步裁定为、描述为传统的惠顾与委托形式的不断发展的变化……虽然［新左派的市行管理部门］接手了一个烂摊子，虽然金融难题则让人束手无策，但是人们会希望，这个新的局面能够使人们几十年来一直在追寻着的改革获得实现。意大利工人运动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受到历史的检验，其反响将证明是巨大的，甚至波及意大利以外。[3](p.322)

这些话语（当然，它们写于1976年，当时形势更加有利）让我们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塔夫里，迥异于那个笼罩在该书前面部分中的、持某种“历史终结论”的忧郁的历史编撰者。

然而，使得这一情形复杂起来的是，我们发现，在塔夫里的分析中，正是某种类似的“飞地理论”构成了当代建筑运动的乌托邦主义。就是

说，塔夫里所有著作的核心主题，即他对国际风格的批判，首先是对后者的飞地理论的批判。比如，勒·柯布西耶[1]说过要避讳政治革命，但原因并非是他不致力于“革命”，而是因为，在他看来，新空间的构筑与建立本身就是最革命的行为，可以“取代”狭隘的单纯夺权的政治革命（如果对新空间的体验关涉日常生活本身的整体改造，那么勒·柯布西耶表面上的反政治姿态就可以重新解读为政治概念本身的扩大。这与符合当代左派精神的“文化革命”观念有着可以预料的亲缘关系）。不过，盛期现代主义的造物主般的傲慢自负，被宿命般戏剧化为伏瓦生规划平面（Plan Voisin）的塔楼景象[2]中、或诸如公寓大楼（Unités d'habitation）、阿尔及尔规划或印度的昌迪加尔[3]等等的庞大的象征性建筑。正如科幻小说家威尔斯（H. G. Wells）笔下的胜利的火星人一样，这些塔楼阔步跨过一片堕落的风景。局促而不健康的陋屋被笼罩在这些建筑先知般的阴影下，后者天启般为其奏响丧钟。我们很快将涉及塔夫里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不过此刻我们可以说，现代主义的大罪就在于它区分（或混合）政治与审美，在于它预见到日后与建筑生产本身的形式过程相一致的政治社会变革。这一切，在经验历史的层面上更容易看清：国际风格的新飞地显然未能使周遭一切得到重生；或者，即便这些飞地的确产生了大师们预言的动态的、辐射性的影响，那么，如果有什么结果的话，这些结果也就只是更加让人觉得阴郁，因为它在其形象中制造了大量乏味凄凉的玻璃盒，或者是耸立在公园的废墟中的许多假勒·柯布西耶式的塔楼。它们成了种族与阶级之间无穷无尽的日常战争的战场。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便是“红色公社”的伟大标志也可以得到不同的解读：因为人们完全可以认为，这些公社根本就不是什么飞地——不是新颖的未来社会关系从中得到勾画的实验室，而就仅仅是继承下来的对资本主义关系的管理，尽管这种管理是根据一种与基督教民主主义者有所不同的社会奉献精神来进行的。

---

① Le Corbusier：原名查尔斯·爱多艾德·让纳雷（Charles édouard Jeanneret，1887—1965），瑞士裔法国建筑学家和作家，现代主义学派最有力的倡导者，以其大量的功能主义混凝土建筑和高楼住宅区设计而闻名。——译者注

② 在1922年，勒·柯布西耶画出了Le Plan Voisin设计图：18幢摩天大楼排成十字造型，目的是改变巴黎的面貌。——译者注

③ Chandigarh：印度北部一城市，位于德里以北，由科比西埃领导的一组欧洲建筑师设计规划。人口约373000。

如果“飞地理论”是葛兰西式替代方案的唯一解释，那么这一并不鼓舞人心的资产负债表将决定它的命运。然而，人们可以将“飞地理论”看作是对空间政治的一种公然化约性的、相当具有防御性的“唯物主义”的概念。但人们同样可以认为，葛兰西的霸权观念（及其后期的相关文化革命观念）更多的是要试图取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全部区别（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类的传统概念的区别）。因此，当人们说反霸权意味着生产并维持某种有关空间、城市、日常生活等的替代性“观念”时，这不再是那种糟糕的、过时的意义上的“唯心主义”。这样，它将不再那么直接地具有意义（或那么实际地、历史地接近极限），以至于西方的建筑师——由于私人财产制度——没有机会去设计和建构一种表达、言说了新颖的集体性社会关系（及需要和要求）的集体大合唱；相反，最根本的是，他们可以构筑有关这些设计的观念及乌托邦形象，在这个背景下，他们能够发展出关于他们在这个社会中的具体活动的自我意识（根据塔夫里的精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类集体性设计只有在社会得到系统的改造之后才在实际上、在物质上成为可能）。但这类乌托邦思想与物质性建筑具有同样的客观性：它们的可能性——即构想这类新空间的可能性，与任何物质性制品一样，受到严格的条件制约。首先，这些制约将出现在世界历史的不平衡发展之中：在第二第三世界里的条件制约，不可能出现在第一世界的设计和建构物的存在之中；为“反霸权价值”的出现与发展所客观地开拓出可能性的，就是这些迥异的空间在别处的具体存在（不管是怎样不平等地实现的）。因此，更加“积极的”、葛兰西式的建筑批评因此获得了牢固的地位，不同于塔夫里的极端的（疗效性的）否定批评，即他对乌托邦思考的批判性拒绝。这种乌托邦思考讨论的是在跨国体系的封闭性中什么东西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要么根据情景，要么根据意识形态批评对之进行陈说的公众，这两种批判策略各有其积极意义；我们没有特别的理由来抛弃其中任何一种有用的武器。不管怎么说，在此值得引述塔夫里的另一段评论——让人意外的是，这是关于斯大林大街的评论——以便证明，他的批评实践常常比他的理论口号更加模棱两可（这也是为了进一步打消这么一种感觉，即前引他对密斯的否定性神秘主义的歌颂就是某种确定无疑的立场）：

然而，就［东柏林的斯大林大街］而言，如果我们将最后的结果

看作是纯粹意识形态的或政治宣传的东西，那么这是错误的；事实上，斯大林大街是一个城市重建工程的支点，它影响了整个地区，构成了一种不同于历史上开发出来的、走向蒂尔加藤公园（Tiergarten）的发展的轴心。此外，这一规划颠倒了资产阶级城市扩张的逻辑方式，因为它将居住区引入了都市中心，以此作为一种决定性的因素。斯大林大街——如今被重新命名为卡尔·马克思大街——的极度浮华被认为是给那从一开始就不同凡响的城市工程打上了英雄的光彩。事实上，它完全成功地表达了新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前提预设，即这种建设拒绝区分建筑与城市生活，并致力于将自己确立为一种整体性结构。

显然，这样一段话既可以用来支持塔夫里的否定性立场，也可以用来支持前面所勾勒的葛兰西式的立场。前者认为，这样一种集体性工程只有在全部社会关系得到了革命性的变革之后才会成为可能，因为它超越了建筑/城市之间的二元对立。而葛兰西式的立场则认为，这样一种整体在世界上的某个空间中的存在，其本身就造成了一种新的立场，而即便那些认为这种工程几乎不可能有“现实的”可能性的工程师，也必定会受这种立场的影响。

不过，迄今我们尚未讨论过，制约着我们时代的实际的空间改造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总体性制度”；我们也没有勾画马克思主义对“消费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新阶段的理论概括的另一个明显的后果，即很可能会有一种新的文化或文化态势对应于这么一种新的时期。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讨论第三个主题或问题了。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或者说是对经典或盛期现代主义本身的批判。因为，将资本的经济学分期划为三个而不是两个阶段（即在传统的“经典”资本主义及“垄断阶段”或“帝国主义阶段”之后再增加一个“晚期”或跨国资本主义时期），意味着在文化层面也有一个新的分期：从这个角度来看，“盛期”现代主义时期，即国际风格和所有艺术门类中的经典现代运动的时期——以及它们的伟大作者及其乌托邦杰作，即马拉美式的“世界之书”（Books of the World），与勒·柯布西耶的辐射状城市一样——“对应”着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阶段，即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起结束的垄断与帝国主义时期。这样，与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同时发生的，有现代主义之消亡、湮没于历史之中，有“消费资本”的第三阶段，以及某种纯粹后现代主义的拼贴实践、一种新的对各种风格的自由

嬉戏和如今乐于“向拉斯维加斯学习”的历史主义引用、老的个体主体或资产阶级自我的“死亡”、对形象商品拜物教的精神分裂式歌颂、如今“发狂的纽约”和反文化的加州。在这个时期，传媒资本主义的逻辑渗透到发达文化生产本身的逻辑之中，使之得到改造，从而导致诸如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之类的区别失去了意义（也导致一些更旧的观念如发达或现代主义艺术的“批判性”或“否定性”价值不再恰当或不再有效）。

正如我所说的，塔夫里拒绝这种分期，我们也将观察到他是如何将自己对后现代的批判归置于更高的现代主义乌托邦主义（modernist utopianism）这个一般范畴之下。后现代主义者只不过被视为这种现代主义乌托邦主义的众多追随者而已。不过，在这个国家，为了这个公众，他对乌托邦式的建筑的批判所具有的推动力，不可避免地关联到针对国际风格的旧式霸权价值与规范的一般化反动。对于国际风格的价值和规范，我们必须努力采取一种含糊而又微妙的立场。比如——像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的近著《从包豪斯到我们的房子》（From Bauhaus to Our House）所乐意地证明的那样，可以肯定的是，对盛期现代主义的批判既可能起源于（既在美学意义上也在政治意义上）反动的、庸俗的冲动，也可以得到现代运动尚在新鲜期时遇到并激起的所有老式中产阶级反抗的迟到的滋养。在某些民族情境中，尤其是在那些原来是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如哈贝马斯所认为，反现代主义的立场依然在根本上与政治反动有着明确的一致性——这同样不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将可以解释塔夫里为什么要将针对现代主义的理由充分的批判与针对任何更加“积极的”美学意识形态的采纳和阐释区分开来。然而，在美国，无论利用类似策略的最终智慧是什么，后现代主义概念的文化吸引力显然以各种方式将情况复杂化了。这些方式需要得到澄清。

因此，无论多么简单，我们此刻都有必要重新回顾一下我们的脚步，重温塔夫里在《建筑与乌托邦》中为我们勾勒的现代主义批判的各种术语。我们在《建筑与乌托邦》中所遭遇到的，是左派版本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这与刚刚描绘过的某种新的资本阶段的分期大体一致。根据这种看法，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中，观念本身——即在所有合法化信念体系的更加形式化的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不再是有意义的因素。这与之前的阶段显然是不一样的。因此，“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在确保各种社会阶级普遍接受新的政治经济秩序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种意识形态因此也是塔夫里所说的乌托邦，或

者说，它的意识形态化和合法化作用被掩盖在一种普遍化和乌托邦的修辞背后。在19世纪后期——尤其是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教授共和国）中——实证主义及其好战的反教权主义和平民或世俗教育的理想都向我们表明，官方哲学在什么程度上依然被认为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平台、取得国家统一的至高武器。在我们这个时代，直到最近，被普遍称为新政自由主义（New Deal liberalism）（或者，在欧洲，则被称为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的观念，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今天，这一切似乎都成了问题。阿多诺曾经说过，我们应该思考这么一种可能性，即在我们的时代里，商品有着自身的意识形态：按照这种观点，消费实践与消费主义本身就足以再生产出一种制度并使之合法化，无论你碰巧信奉什么“意识形态”。那样的话，如今取得了在其他更大的系统性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功能位置的，不是什么抽象的观念、信仰、意识形态或哲学体系，而是内在的日常生活实践。而且，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一发展显然也能够用来解释盛期现代主义的乌托邦意识形态日渐衰落的力量。的确，塔夫里明确地将现代大师建筑规划中造物主般的价值与凯恩斯关于控制未来的理想联系起来。乌托邦在这两种版本中都是关于“对未来的‘合理性’的宰制，以及对随着而来的风险的消除”[6](p.52)的梦想：“即使对于柯布西耶而言，形式的绝对性也是针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一种持续胜利的彻底实现”[6](p.129)。因此，非常合乎逻辑的是，这两种终极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或乌托邦都应该彻底消失，它们的具体的“批判”应该更多的是历史本身的结果，而不是知识的自我意识。

但是“意识形态”在塔夫里对资产阶级建筑思想的图解性综述中有着一些不同的焦点。塔夫里的综述涵括从巴洛克风格的解体到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这些不同的审美乌托邦是从某种更为接近黑格尔的“理性的诡计”或历史本身的角度来得到分析的。它们的乌托邦形式因此证明是一种工具，服务于商业体系的启迪以及资本的新动力。无论它们宣称有着什么样的内容，它们的具体效果、它们的更为基本的功能，都在于对过去制度的摧毁。因此，18世纪有关城市的世俗观念的出现首先可以解读为一种消除旧时文化的方法：“启蒙运动的城市理论之谨慎的抽象有助于……摧毁巴洛克风格的城市规划与发展”[6](p.8)。同样，现代主义本身的降临——在这个时刻，意识形态被公然转化为乌托邦，其中“意识形态必须否定自身，打碎自身的具体化形式，整个地投身到‘未来的建筑’

中”[6](p.50)。这是一个至高的时刻，是弗洛伊德和尼采的，是韦伯和西美尔的，是盛期现代主义在一切艺术中的诞生——对于塔夫里而言，现代主义的降临事实上是一种纯粹毁灭性的举动，其中残余的意识形态和古旧的社会形式全都有系统地解体了。因此，盛期现代主义的新乌托邦主义不知不觉地、与其革命的和乌托邦的断言的精神背道而驰地为完全“合理性化了的”技术统治规划的无处不在、为将要到来的跨国资本的总体系统的普遍规划化而准备好一个平台：“揭露那些阻碍了生产世界及其社会领土的整体合理性化的偶像的真面目，成了知识分子的新的历史任务”[6](p.51)。这也是各种文化先锋们的历史使命。事实上，对于他们来说，虽然并非根据他们本身的宣言，“形式建构的自律性”，作为其最深刻的实际功能，必须“规划主体的消失、驱散因个体对逼近他或她周遭的宰制结构的可怜的（或可笑的）抵制而产生的焦虑”[6](p.73)。因此，无论他们试图达致何种先锋或建筑的审美乌托邦思想，在资本的真实世界里，在他们有效的实践中，那些目的都被辩证地逆转了，且从实质上有助于强化对资产阶级有规划的消费的新体系的技术性总体控制。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塔夫里所讲的18世纪的故事的开端。启蒙运动试图以某种新的、更加合理的方式来构想城市生活。这种努力产生了两种无法调和的选择：一条路是建筑作为“维持社会平衡的工具”，“迪朗的形式上得到系统化的建筑类型的几何学沉默”，“前定的形式体系所保证的一致性”[6](p.13)。另一条路则是“感觉科学”[6](p.11)的路，一种“过量的象征主义”，我们可以将之解释为制度内部的利比多抵制概念，即欲望在权力与控制网络中的突破。因此，这两种对立的伟大的乌托邦，圣西门对傅立叶，或者说，列宁对马尔库塞，对于塔夫里来说，就是被囚禁在资本主义关系中的思想的意识形态双重约束。所以，它们在皮拉内西①对罗马的行军场（Campo Marzio）的当代梦魇般的综合中得到揭露，同时也出人意料地在新世界中被赋予了更长的寿命。在后者那里，由于封建主义的缺席和广阔的边疆的存在，华盛顿特区的新城市综合有着一种欧洲努力所禁止的活力。

有意思的是，在我们当前的语境中，这两种选择也大致分别对应于阿多诺和巴特的分析。第一种乌托邦选择，即合理化，将按照克服整体与部

① 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1720—1778）：意大利建筑师、艺术家，他的罗马及其废墟的版画为新古典主义复兴作出了贡献。——译者注

分之间、城市规划与个体建筑典范之间、“作为整体的城市有机体”与“基本单元”或个别建筑的街区之间的对立的方式，逐步构成自己的规划。但是，在阿多诺的著作里，恰恰是这种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场域理论”，即柯布西耶作品所力图达到的境界，投射在勋伯格的十二音阶体系中，成了对位与和声之间、总体形式与个别音乐主题的动力之间鸿沟的最终泯灭。但是勋伯格的超凡的综合是贫瘠枯燥的，而在建筑中，“统一场域理论”摧毁了个体作品或建筑本身：“单一建筑不再是一种‘客体’；它只是单个细胞的基本集合在其中获得物理形式的地方；由于这些细胞是可无穷复制的单元，因此它们在概念上体现了生产线的基本结构，排除了‘地方’或‘空间’等旧式的概念”[6](p.105)。因此，这种乌托邦冲动的最终结果，就是客观世界被彻底合理化，其发展远比福特或泰勒依照自己的势头所能做到的更加广泛、更加凶猛。

然而，第二种策略，即利比多策略，就其最终结果而言，也同样是“意识形态的”：巴特的知识轨迹非常复杂，我在此不想花时间将他干净利索地植入这个方案中来（虽然我认为还是可以做做某种类似的事情）。这里只需说的是，循着本雅明，塔夫里将这第二种的、在波德莱尔那里浮现出来的利比多策略视为有着不可预料的、与前面所达致的客观的外在规划化相一致的主观后果：“波德莱尔发现，诗歌产品的商业化能够因诗人摆脱客观困境的努力而得到加强”[6](p.92)。换句话说，新的先锋主体性的结果，是将消费者训练得适应于工业城市的生活，是传授“城市的正确用途的意识形态”[6](p.84)，是使审美消费者放弃“那些献给判断力的物体”，且替换掉“一种如此生活与使用的过程”[6](p.104)。这种特殊的策略如今蔓延到当前的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学，并从中获得了新生。塔夫里在下面这段引人注目的话中对之进行谴责：

> 因此城市被当作上层建筑而得到思考。事实上，人们如今要求艺术赋予城市一种上层建筑的外衣。波普艺术①、欧普艺术②、对城市

① Pop art：波普艺术，或通俗艺术，即以商业艺术及通俗插图艺术之技巧来描绘来自日常生活的物体或景观的一种艺术形式。——译者注

② Op art：欧普艺术，即光效应艺术，一种抽象艺术形式，其特征是利用几何图形或色彩对比产生各种形与光色的运动来造成视错觉的艺术。——译者注

"可形象性"的分析，以及"未来审美"全都汇聚在这个目标当中。当代城市的种种矛盾被消解于多价的形象中，通过比喻性地提升那种形式复杂性，它们被伪装起来。如果根据充足的判断标准来解读，那么这种形式复杂性实际只是那些逃避了发达资本的规划的、无可救药的不谐和音的爆炸性激增。艺术概念的重获因此服务于这种新的掩饰功能。的确，工业设计在技术生产中处于领先位置，此外，从消费增长的角度看，也制约着它的质量，然而，波普艺术通过重新利用技术生产的残羹剩饭而找到了殿后的位置。但是，这只是那如今被改造成视觉交流技术的双重要求的精确反映而已。拒绝担当生产循环中的先锋的艺术实际上证明了消费过程走向无限。的确，甚至那些被弃之物都进入了生产—消费循环，即便是通过后门而进入的。这些被弃之物被升华为有着一种新的使用价值的无用物体或虚无主义物体。这种有意识地将自己置于殿后位置的艺术也明确拒绝与城市矛盾作妥协，拒绝彻底解决这些矛盾，拒绝将城市改造为一种被完全组织的、但却没有老式的无用的挥霍或一般化的机能障碍的机器。在这个阶段，有必要使公众相信，当代城市所特有的矛盾、失衡、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人们必须说服公众，让他们相信这种混乱包含着一种未经探讨的丰富性、无限可利用的可能性，以及如今被改变为社会新物神的大量"游戏"。

这种否定性的意识形态批判（它完全将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的力量就在于，它认为一切没有有效地破坏社会制度再生产的事物都可以看作是该体系的再生产的一个部分。这么一种不容妥协的、绝对的立场在几乎所有人那里所激起的焦虑，很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是健康的，有疗效的。不过，正如我前面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分析的真正问题在另外一些地方，在这么一种假设中，晚期资本主义中的"社会再生产"与早些时候的盛期现代主义有着相当类似的形式。我们有些人所谓的"后现代"只是在较低强度和创新性的层面上复制了现代主义的旧式解决方案。因此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的"模棱两可的折中主义仅仅以杂耍而告终"[3](p.397)；"路易·康（Louis Kahn）和英国建筑师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irling）的作品代表着拯救似乎是垂死的艺术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努力"[3](p.400)；罗伯特·文丘里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Robert Venturi

's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将诸如含混和矛盾之类的新批评概念展平，将之去历史化，清空其中所有的悲剧性（就是盛期现代主义的）张力，以图“证明私人规划选择与其说是含糊其辞，不如说是歧义丛生”[1](p.213)。

然而，在这种责备中似乎有某种不一致性，更年轻的建筑师甚至未能达到那种悲剧性的张力。而在大师们那里，这种张力本身被看作是乌托邦的、意识形态的。因此，我们可以在塔夫里现代主义分析与后现代主义的攻击之间的和谐与深刻的历史亲缘关系中洞察到这种不一致性的另一面。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攻击，尤其是文丘里本人的，指的是一种远远超越了诸如集中规划的傲慢自大①、单一功能的空间概念、对修饰的简单化憎恶的清教主义等等常见的主题的批判。文丘里的分析，尤其是在他的《向拉斯维加斯学习》中，尤其围绕着建筑物与城市之间、建筑与城市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矛盾关系）。这种关系也构成意大利理论家的历史编纂的一

① 正如在彼特·布莱克（Peter Blake）那里，对集中规划的批判虽然强大且有说服力，在我看来却是极为含糊的。有以下一些理由。像这一类的论题，完全正确、有充分理由的说法也可以是一种完整的意识形态或形而上学的生产或投资的场合，尤其是在意图或规划与传统或有机增长之间的二元对立之中。（这种意识形态已经体现在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的《城市不是一棵树》中，但其充分转化为形而上学则可以在德鲁兹和瓜塔里所著《千高原》中的“块茎”中最为清楚地观察到）。当然，在这种形式中，它概括了最古老的反革命立场，即埃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反思法国大革命》中的立场。在该书中，雅各宾的自负与社会生活的缓慢而又有机的成长相对立。在政治层面上，左派传统涵括了许多反抗立场，这些立场抵制着这么一种彻底的意识形态对立的出现，尤其体现在结盟（federation）概念和“国家的枯萎”（巴黎公社）中，在工人自治（*autogestion* or workers' self - management）中，在理事会共产主义（council communism）中。但是，在建筑或城市生活的领域中，很难看到这类反抗立场会采取什么形式。在我看来，最不具说服力的是这么一种观点，即人们将在发展中重建自己的居所（如菲力浦·波顿的《人居建筑》[Philippe Boudon's *Lived - in Architecture*, Cambridge; MIT Press, 1972]，在该书中，这种观点——即勒·柯布西耶会同意这一切，更不用说希望它那样发生——似乎最为不诚实）。我被维姆·库哈斯的《癫狂的纽约》（Rem Koolhaas's Delirious New York）所吸引，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极为不同的（极具特性的）刺穿这种意识形态双重约束的方法：他通过将“规划”改造为一种1811年的将“网格”施加于曼哈顿之上的独特的历史决定而将这种两难困境历史化。因此，从这一单个的“集中化”决定出发，同时发展出了无政府状态和城市古典主义（街道与街区）。

个主要潮流。我们可以回想，国际风格的纪念碑式作品——如马拉美，如德国的拜伊罗特市，如《芬尼根守灵夜》或康定斯基的神秘绘画——将自己看作为我们前面所说过的极为不同的、革命的、或颠覆性的飞地，从这种飞地出发，周遭整个堕落的社会关系的结构逐渐被再重构、被改造。然而，为了将自身表现为这类**前厅**(*foyer*)，这类作品必须首先与其周围环境彻底脱离出来。因此，借助那最初的分离，即构成性的自我界定与分隔，它慢慢地成为一种**雕塑品**，而不是建筑物。根据巴特的言外之意概念，它最终只是指定自身、表述自身，将自身的脱离歌颂为一种有着自身价值的信息，而绝非表达出一个有着全新内容的信息。

关于后现代主义建筑，无论还能说些什么——无论它如何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得到判断——似乎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它并不要力图那样做，而是要追求某种非常不同的东西。它或许不再体现盛期现代主义的乌托邦意识形态，或许在那种意义上的确是没有任何乌托邦的或政治第一的冲动。不过在此同时，正如“后”这一可疑的前缀所表明的，它依然存在于其本身与其所拒斥的死去了的盛期现代主义之间的某种寄生性关系之中。然而，必须得到探讨的是这么一种可能性，即随着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一种全新的审美物正在悄然出现，它与之前的时代截然不同。

后者或许可以有效地概括为［根据阿尔都塞的“表达的因果性”（expressive causality）］同一性美学或有机同一美学。为了区别于后现代主义美学，有两种类似的主题可以充当参照点：内在与外在的辩证关系，以及修饰或装饰的问题。对于柯布西耶来说，正如人们所熟知的，“规划从内部走向外部，室外是室内的结果”，其方式是，建筑物的外部表达了它的内部，因此在这里通过统一这两个对立面，或更佳的是将其中之一——外部——吸收到另一个之中，从而获得风格上的同质性。至于修饰与墙壁的现实性之间的“矛盾”，则通过将令人不愉快的条件干净地**排除在外**而得到了克服①。此刻需要简单地说说的是，文丘里的“装饰过的棚屋”的概念反而寻求加强这些对立面，并因此而巩固**矛盾**本身（比更早期的“复杂性”或“含混性”等术语具有更加强烈的意义）。这一迥然有别的审美行

① 这类同质化压制的一个稍有不同之处的例子是文丘里关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对对角线的排斥的描述。见《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1977），第52页。

动的哲学说法，可以在“差异建立联系”之类的（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中发现。在这里，一种同质性美学被移置了，不过不是以随机的异质性即一系列共存的惰性差异的名义来进行，而是服务于一种新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张力、矛盾、不可兼容及相互冲突的存在等本身就是将两种不可通约的因素、现实或两极联系起来的强大方式。我相信，如果某种类似的东西表现了后现代主义特有的内在逻辑，那么它至少必须看作是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学，这种美学与盛期现代主义判然有别，而它也力图摆脱后者。

无疑，我们可以注意到，盛期现代主义的象征性行动试图通过风格性命令来解决矛盾（即使这种解决只是一种象征性的），与后现代主义相比，这种行动属于完全不同的秩序和质量。通过一种强化了的理解，或通过对那些矛盾的狂热的、几乎是幻觉性的着迷（满足于消除哀婉、悲剧、焦虑等情感冲击的现代运动的特征），后现代主义简单地承认矛盾及碎片化的混乱。无疑，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早期对黑格尔宗教理论的批判对于后现代主义来说也同样有力：“就其认识到并接替了精神世界而言，有自我意识的人……于是在这种异化了的形式中证实了它，并将它呈现为其真正的存在；他重构了它，并宣称在其另一存在中悠游轻松自在，如在家中”[7](p.210)。

在这一并列中，我必须补上我的感觉，即这两种美学的道德化判断始终都不是获得某种最终评价的最令人满意的方法；在此，我本人的看法是历史主义的。我认为，任何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必须从自我批判出发，从对自身的判断出发，因为在这一时刻中，我们发现了自身，而且无论是否喜欢，这种美学都是我们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在当前语境中，这并非是最重要的。辩证思想的更让人烦恼、更让人反感的习惯之一，就是它与对立面的同一化，以及它将似乎对立的立场背靠背地打发走的倾向。它这么做的理由是，这些对立的立场都有着一个共同的问题意识，也同样受后者的决定与局限。或者，用更加熟悉的说法，它们代表着一个双重约束的两个不可容忍的选择。人们从中往往会看到某种类似的东西在这里发生，在塔夫里的文化悲观主义（及其一切严格性和意识形态禁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自满的自由嬉戏之间的对立中发生。这种后现代主义内容戏耍着当代社会现实的预先给定标记，即便是早期对激进变革献身的怀旧性记忆都在此消失得无踪无影。

这两种立场是否真的完全相同，即便起初看上去是迥然不同，它们是否都建基于这么一种信念之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庞大存在中，根本无法做什么新的事情，根本无法进行任何基本的变革？不同的是，塔夫里的思想以一种严格的、有自我意识的斯多葛主义而经历这一情景，相比之下，后现代主义的实践者和理论家则在其中悠然自得，发明着许多新的认识方式，以图在同样不可能的极端中“悠游自在，如在家中”：在同一等式上价的改变、或加号取代减号。

如果是那样，我们最终必须说些什么，以支持列斐伏尔发出的关于空间政治的召唤，以寻找一种真正葛兰西式的建筑。

参考文献：

[1] Manfredo Tafuri, Theories an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0

[2]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47

[3] Manfredo Tafuri and Francesco Dal Co, Modern Architecture [M], New York: Abrams,, 1979

[4] Karl Marx, Contribution to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70

[5]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M], London: Penguin, 1976

[6] Manfredo Tafuri, Architecture and Utopia [M], Cambridge: MIT Press, 1980

[7] Karl Mar, Early Writings [M],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凌海衡　译）

文化市场

——瓦里采访塔夫里①

瓦　里

瓦里（以下简称为“瓦”）：我们从法语版的《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的前言的注释中得知，该书在你文化上的发展变化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你可以说明一下该书的文化前提吗？你写作此书是为了反对当时意大利普遍存在的建筑生产吗？

塔夫里（以下简称为“塔”）：首先，这本书和我的其他书不太一样。我花了好几年时间对它深入思考（从1964年开始）。可以说，它恢复了一个老式的观点。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在生命中某些时候为自己而创作。这就是为什么它塞满了自传性的注释，没人注意到这些……但它们确实存在。

瓦：最后一页的最后一行无疑暴露出来这一点……

塔：当然是这样。现在，我们必须问自己，那些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所有巨型神话都已逐一瓦解。这里出现了两类剧变，都极其让人担忧。第一个剧变后来被称为“6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这是由当时引起震惊的两本书所激发的：罗萨（Asor Rosa）的《作家与人民》（Scrittori e popolo），以及弗蒂尼（Franco Fortini）的《权力的检验》（Verifica dei poteri）。后一本书给我印象甚至更为深刻，尤其是其中著名的文章《像鸽子一样聪明》（Astuti come colombe），其内容相当清晰。弗蒂尼对整个学

---

① 发表于《建筑、运动、连续性》（*Architecture – Movement – Continuité*）杂志，第39期，1976年6月。Kenneth Hylton由法文翻译成英文。

术工作的未来提出了质疑。

在那时，我们进行哪一种分析，才可以阐述清楚所有方面的发展呢？《理论与历史》——至少在意大利文化中——是第一本在先锋派艺术史和当代建筑史之间画出平行线的书。这是因为，我追求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目的。其一，利用学科来检验其工具；其二，对自身腐烂至内核的学科进行研究，并以此为出发点往下走。我们并没有过于陷入危机之中，但是，一切历史都必须从头开始重新估价，这样就可以发现其理论基础。我们发现——就个人而言，我大感骇然——这些基础也已经腐烂透了，皮拉内西（Piranesi）就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已经不可能原路退回，然后带着这些基础继续前进……这就是先锋派的语言真相，就是一般而言的建筑史和现代艺术史的理论框架……我们锁在一座被符咒镇住的城堡之中。钥匙丢失了，我们陷进语言的迷津——我们越是寻找方向，就越深入进魔幻大厅。这些大厅充斥着令人痛苦的梦境。我认为，我必须将这一事实同某些新的实验联系起来。例如，“新视角”（nouveau regard）学派，布托（Butor）的小说，诸如戈达尔（Godard）的《女人就是女人》这样的“前革命”电影，或者诸如韦斯（Peter Weiss）的文本，他对所有战后左派运动都提出质疑。这些新实验，在启蒙运动的两大人物马拉（Marat）和萨德（Sade）之间，制造出一种完全相反的对立。皮拉内西书中 Didascalo 和 Protopiro 之间的对话，也是这种辩证的对立。它的传记特征到现在才开始为人所知。对我来说，这一辩证关系正好就是马拉和萨德之间的辩证关系，现在仍然也是。萨德是折中的自由论者皮拉内西，而马拉则是 Priorato 祭坛的隐藏面。我试图说明的是，这两个面不可分离。阿多诺（Adorno）的《理性辩证法》（*Dialectics of Reason*）尚未对这一问题有什么洞见，它过于简单了。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事情对我的启示是，一旦你进入了迷宫，阿里阿德涅之线就已断掉。你必须完全忘掉阿里阿德涅之线，才可以继续往下走。我是在写完《理论与历史》之后，才这样做的。这本书出版于 1968 年，当时的情况相当有趣。因为，尤其在意大利，只有那些视建筑为绝对事实的人才有读者。人们把建筑当作是一种自治的、特有的事实。当时的谈论方式比起现在来要专制得多。

瓦：这是一种意大利式的专属特征……

塔：是的，但这些书讲到了许多正在发生的事情。年轻的法国建筑和美国建筑（纽约五，Grumbach，等等）是怎么一回事？在它的这种总结式

的分析中，事情并没有得到任何进展（it doesnt take things any further）。它只是某种方法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该种方法在1968年与其说是建筑师的方法，不如说是意大利建筑系学生的方法。他们（绝非偶然地）抛弃了建筑，而支持“分裂团体”（splinter groups）。这显然很有问题。这里存在两个选择。一个被极端主义的创伤性体验（the childhood sickness of extremism）所影响；而另一个则被一种显然很狡猾的、特殊的症候群（the apparently astute syndrome of specificity）所影响。但它们会把所有意图和目的都等同起来：两种选择都被激进主义破坏和湮灭掉了。我认为，当批评囊括了自传性数据，并且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从那一刻起，批评就变得科学了。在我看来，《理论与历史》比我的所有其他书都更重要，因为它将我的个人经验同个体和集体危机的历史打成一个复杂的结。

瓦：一种历史的断裂和一个新的开端，它标志了威尼斯历史学院的开始……

塔：威尼斯一直都不是我唯一的工作。我一直都在独立研究《理论与历史》中涉及的那些主题。

瓦：在《建筑与乌托邦》中，你不再讨论皮拉内西之前的历史。为什么？

塔：呃，为了有一个写作开端。因为，这里存在着尺度问题。这本书要限制在120页之内……

瓦：尽管如此……

塔：……而且，这本书里不需要（对《理论与历史》）进一步解释。对于《理论与历史》，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我仍然这么认为。但我觉得，如果我们想再次讨论这一时期的话，我们就必须使用不同的工具——高度精确的研究，而非概括性的文章。我在集体研究刊物《朱莉娅大道》（Via Giulia）中，尝试了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个杂志在法国或许不太有名，但它对于16世纪（Cinquecento）的城市研究来说，是很重要的。在5年的工作中，我比较吸引大家注意的是我的那些辩论（polemics）。整个朱莉娅大道被一块块地分析。一切纠结在一起：当时总的政治和经济因素、16和17世纪的土地政策、建筑的语言……

瓦：这种研究真的不为人所知吗？

塔：只有专门研究16世纪的历史学家才熟悉这些。

瓦：你期待《理论与历史》带来什么样的结果（consequence）？

塔：我认为它根本不会有任何结果。我写这本书只是为了我自己的目的。我认为它不会成功。这是一本奇怪的书，不是为公众而写的。有一个很清楚的原因：那几年里，我不得不在米兰和巴勒莫之间来回颠簸，我没有扎根的地方。我在意大利大学圈子中是“被拒绝”的一类。书的理想参考资料是历史，完全停止下来的（full stop）的历史。这不是一本为公众而写的书，但它在整个意大利都销量很大，尤其是第一版和第三版。

瓦：但是，历史问题在意大利的建筑实践中相当受关注。

塔：是的，现在也是这样。《理论与历史》在西班牙语国家也卖得很好：阿根廷、阿连德的智利①……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看这本书……有可能是为了资料的目的而对这本书进行糟糕的误用……也有可能是关注这本书的结构主义话语和符号学话语……但是，书中的分析所涉及的范围是相当特别的……我还想说的是，这本书的结构是迷宫式的……

瓦：或许这些都是理解这本书的角度。问题在于这本书“结合”（knots）了三个矢量：批评、历史和建筑。论述主体要么是批评家，要么是建筑师，要么是历史学家。但是，它能从一个角色过渡到另一个角色——在主体层面上，这里有一种变化和距离感（distancing）……

塔：或许是有距离感，但实际上，它也没我想要暗示的那么厉害。那个时候，我不觉得我的那些研究怎么让人振奋。我觉得我们踏上的这条路不是那么让人特别踏实。今天是对的——但接下来又是错的。

瓦：这个对是从何说起？

塔：因为当时我所说的比现在要更真实。现在我很平和，我觉得自己离那些建筑问题很遥远。

瓦：你现在在建筑领域之外吗？

塔：我在1962年就将其抛在身后了。这已经是旧事一件。

瓦：但人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建筑师打算逃离……

塔：嗯，也不完全是这样……或许这是最终的结果。但对我来说，问题不在于建筑师试图逃掉，而在于学科的未来。我想知道，建筑学是否还有意义……小丑建筑师（clown - architect）的杂耍以前让我很恼火。现在

---

① 阿连德（Allende）（1908—1973）：智利总统（1970—1973），智利社会党创建人和领袖，在1973年9月军事政变中殉职。

我倒觉得他们很逗乐。

瓦：杂耍？

塔：是的，但那些游戏现在却让我很着迷。现在我明白，那种游戏是建筑生产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进入到文化生产的领域，它有其内在价值。就拿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来说吧。因为罗西不进行建筑生产。如果以一种过分简单化的方式来看，人们或许会认为他处于生产世界之外。这当然是不对的，因为他为其他信息领域提供了原料。印刷品的量这么大，它毕竟也算一种生产形式。现在我们再也不能对一个（one）公众讲话，而要对不同层次或领域的公众讲话，并且让每一个人满意，这完全是一个回路（circuit）。

瓦：这些层次或领域是自律的吗？

塔：完全如此。不再存在一个文化市场，而是好几个，它们都需要被满足。每个人都参与进某一特定的市场或层次，或其他的市场。而我们要径直穿过它们的全部。显然，径直穿越市场的唯一方式，就是某种类型的政治义务，亦即政治活动。

瓦：这意味着当前学术工作的生产性（the current productivity of intellectual work）和那些自律层次有所抵触吗？只有政治才能够刺穿各层次，并在它们之间创造联系吗？

塔：当然是这样。我们前面提到的娱乐是一个例子。大众娱乐（mass entertainment）的提法是没有意义的。大众已经不存在了。公众已经被分割成大量互不相扰的口袋。分类打包的程序已经非常先进了。这完全没什么意义。双年展（*Biennale*）的错误在于，为上流社会的资产阶级制作作品，却将作品放在车间中——不知所谓。爱森斯坦（Eisenstein）之前就这样做过，但被证明是一个错误……因此，问题不在于把文化“引进来”，而在于在回路（circuit）中认识到自己的位置。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正如有为大众提供的普通冰箱和高品质的冰箱一样，同样也有不同层次的文化。在某些层次的文化中，知识分子必须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生产者。这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上。当我写《朱莉娅大道》时，我是在为美国或德国的少数专家而工作。当我为《地方晚报》（Paese Sera）写作时，我是在为意大利左派——总共二三十万读者——而写作。显然，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不会唠唠叨叨那些旧观念。我必须在另一种层面上发明一些东西，提出一些新主题，消除中心意识（decentralization），例如，在文化、行政上消

除中心意识（decentralization）……并且，警告那些煽动的危险，民粹主义的危险——去谈论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谈论形成大众斗争之基础的那些主题。但是，为了回到《理论与历史》的状态，而寻找政治信息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本书所瞄准的公众是我自己，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尽管它确实包括有某种含蓄的政治信息。事实上，《建筑与乌托邦》以及《理论与历史》彼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某些主题以同样的方式展开，另一些则被推翻，但它们通常都传达着同样的含义。

瓦：电影也是以这种方式运转的吗？

塔：有一天，我去看了一部斯特劳布（Straub）的电影，它深深地打动了我［《摩西和亚伦》（*Moses and Aaron*）］。这是一部美丽的电影。要理解那部电影，必须相当熟悉德国哲学中的辩证法，熟悉里面提到的历史情节——勋伯格（Schoenberg）的十二音音乐在那里达到高潮，或者熟悉摩西和亚伦所说的那些话的象征意义。这些东西完全符合我们正在讨论的主题。摩西掌握着话语（Word）——或者说是真理（Truth），但却无法将其解释给他的人民。亚伦的成功正在于摩西失败之处，但是，为了能这样做，他不得不使真理降格。摩西没有发现他的话语和亚伦所说的东西之间有任何关系；他理解不了他们唯一的机会是合作。这正是黑格尔的辩证法。

斯特劳布完全任由勋伯格的音乐在电影中流淌。而勋伯格的音乐也恰恰正好符合这一辩证转换——交流的可能性，以及意识到交流不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阿多诺是对的。斯特劳布用摩西和亚伦来讨论当代艺术的问题。他的讨论方式是将一种彻底的古典形式强加在勋伯格的十二音音乐身上。摄影机永远不动；它一直是固定着的，静态的。角色不动；没有人群的运动。这里就是一系列的静止之物，它几乎就是一幅令人神迷的静物画（tableaux）。这部电影也引发了有趣的讨论，因为，人们指责斯特劳布自闭，不同观众交流，等等。而他的回答很直言不讳，“我不同公众交流——公众是什么（what public）？如果有一百或两百个人，那我就得和两百个人交流。你理解了没有呢？如果你没理解，那么，再见。”

说起斯特劳布，我想到了我的朋友罗西。他对建筑学的意义就是斯特劳布对电影的意义。除了现存的知性电影市场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the intellectual market for cinema）之外，像罗西这样的唯我论者的电影实验，也还是有观众的，因为它们易于吸收。显然是这样。

瓦：10年后，《理论与历史》就……

塔：10年，不。

瓦：这本书的写作是一个重要事件，不是吗？

塔：1966年？应该是1967年。

瓦：有一件事情一直让我有点奇怪。《理论与历史》不断提到客体的危机，但没对它进行分析。

塔：客体的危机？我认为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已经分析过了。

瓦：那么……

塔：当然，我高估了公众对本雅明的认识和理解。他的东西不过刚刚出了意大利文版。我假想本雅明的书已经被大家吸收。事实上，要重新解释他的那些东西，需要做大量艰难的工作……或许人们应当记住，《理论与历史》，包括其结构，针对的不仅仅是建筑师，还有艺术史学家。并且，这些讨论也不只限于客体的危机，在那些年里，欧普艺术（Op Art）和波普艺术（Pop Art）的拥护者之间的争论——阿尔甘（Argan）是一边，卡尔维斯（Calvesi）这类批评家则是另一边——更容易被艺术史家所理解，而不是建筑师。必须说明的是，我的职业是不精确的。更确切地说，它是精确的，但我总是同时开几条战线。当时，人们最感兴趣的是艺术史家。像这样的建筑史的研究在意大利是不流行的，所以没有太多的建筑史家……

瓦：阿尔甘非常重要……

塔：当然，他是位大师……

瓦：那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呢？

塔：?????

瓦：他在《理论与历史》里很重要，你不断引证到他……

塔：勒·柯布西耶？我不确定当时我对他的理解到了什么程度。对我来说，他再现了本雅明和超现实主义者之间的某种汇集。在我看来，他似乎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人——对“灵韵的丧失”（death of the aura）进行越界（transgressed），并且在主体的迷宫中设置话语（discourse）。我不相信勒·柯布西耶攻击超现实主义者这一说法。我更感兴趣的是勒·柯布西耶的阿尔及尔（Algiers）和他在1935—1940年间的绘画。这些画里门是半开的……为什么我对这些感兴趣，为什么我不再谈论他，这是很好理解的。我认为，如果存在一个揭示意义的形象，那它就是军营的帐篷（Bat´a pa-

vilion）。我试图将这一问题客观化，但这就会带来一些非常主观化的问题，因为我们谈论的勒·柯布西耶，他探索了无意识、抒情、想象，并且亲自对客体危机的危机进行了探索。

瓦：或许这个问题有点突然，但他实际上的确是本书中被引用最多的人，尽管你对此没做任何解释。而且，后来在《建筑与乌托邦》中有一整章……

塔：这个你已经谈过了。

瓦：我们已经澄清了那个问题。

塔：但它花了我大概9年时间来向我自己澄清。

瓦：或许我们可以谈谈威尼斯建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工作。

塔：威尼斯是一次实验，它试图驱除掉批评家工作的个人化特征。我们这代人需要自我教育，学院表现了对这一事实的理解。在意大利，大家都会有导向多少有点苦涩的结论：无论人们接受与否，从客观上来讲，最伟大的那些大师一直都是大师。他们一直都在伪造着和公众之间的某种个人关系。当我来到威尼斯时，我有幸遇到了愿意在某个方向上工作的人。我想，我们真的可以创办一个学院。毫无疑问，这和意大利人性格中某种典型的缺点相冲突，比如个人主义等……无论如何，这个学院实在是太棒了。

我们忽略掉了一件事：教学和研究之间的两重性（duplicity）。最主要的是，最好的研究者不是最好的教育者。但我们必须面对170名一年级学生，以及同样数目的二年级生。除了这些小的内部难题之外，我们在威尼斯所做的工作，还承受着持续的自我批评，这在意大利是很少见的。总的来说，有着革新需要的“学院”都要面对这些东西。不可思议的是，现在历史研究所所做的那些已被国际承认的工作，从未收到过一点意大利政府的项目津贴。

瓦：那政治态度呢？

塔：政治态度？

瓦：你的，你同事的政治态度。你们的工作具有精确的政治定位。

塔：是的，我们的工作有非常精确的定位。人们首先要说，研究所的许多重要人物在地域上持有肩负责任的立场，比如共产党制下的城镇和地区的议员，比如政党的官员，比如联合政府的官员……显然，这关系到我们所做过的事情，关系到政党的改革，关系到我们将历史学家的职业看作

是政治理论家职业的一部分。这需要我们扎根于实践，不断进行。我们倒不认为，理论和实践必须完全一致或彼此相符仅仅只是一个形式问题。但是，我们和共产党的相遇确实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我们来说，在研究的东西——例如，作为自在和自为的历史（history in and for itself）——和它在公共领域历史中的运用之间，显然不存在根本的差别。如果历史没有实际用处的话，那它就属于个人游戏的范畴。

瓦：我们可以谈谈“建筑的贫困”（poverty of Architecture）吗？

塔：可以，人们可以说建筑的贫困，尤其是当它是为了让人逗乐的时候。当建筑展现出极度奢华的样子时，它是那么可怜……当建筑的第一个字母拼成大写的A时，建筑是贫困的，当然，它也或多或少地成为我们最喜欢的那些经验中的一部分。

瓦：那没有大写字母A的建筑是什么样的呢？

塔：那我根本就不会把它称作建筑。并且，某种意义上，它或许是最让我们感兴趣的东西。这样的话，我们也不一定非得去谈论它的危机、它的问题。它不啰嗦什么废话，取而代之的是，它行动。从实践来说，我们可以举这样一些例子，比如，意大利的红色市政当局的合作盖房计划，或者那些并不指向空间现实化的活动（例如，区域委员会和罗马选区的区域委员会的需求量），或者与博洛尼亚（Bologna）和佩扎罗（Pesaro）的历史中心规划相平行的运动。该运动本身比它最终获得的结果更重要。这或许是近年来我们所学到的东西：即，结果是不重要的。当你致力于一个结果的时候，你就会想，你必须解决某些问题。“解决”这个词本身就暗示着，你希望平息矛盾，希望坚决的控制主题。如果我们认为某件事是重要的，那么，这件事就是运动。它有所**趋向**（*tends to*），并且趋向于包容（and this *tends to* contains）。阐述真理，我不会用理想主义术语，而会动用所有公正的政治活动。这样的话，你就会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事物。

我现在要提出的另一种方法是：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合作运动（co-operative movement）就其本质而言是不可能解决工人阶级运动的问题。我们非常了解合作运动对于解决住宅问题的努力是何等的不足，但是，毫无疑问，它重组并形成了一种现在反而被分离开的工人阶级运动。所以，与其说它做过的事重要，还不如说它在其过程中产生的某些不能被看到和触及的东西更为重要一些。建筑工人在其公司内并不是孤立的、各自为政的，相反，你拥有连成一体的、协调共济的工人阶级。于是，判断标准改

变了：这种协调共济的大众，在其斗争中是起帮助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这就是问题所在。历史经验能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但这决不意味着历史必须永远都在重复自己。显然，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德国，或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维也纳，合作运动对于斗争就毫无助益，相反它只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幻觉。

瓦：我们稍微谈谈未来建筑师的数量，以及建筑工作的真正可能性吧。

塔：我认为，要解决这种问题，我们就必须为职业的彻底重组而奋力斗争。正是在这里，理论最终能够被转化成实践。表现出有大写字母 A 的建筑的贫困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要寻找方法。这些方法反过来能够主动激活建筑（building）、规划（planning）或计划（programming）的新维度，或者是所有一切可以没有资本的东西，而这正是真正让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即，具体劳动（concrete work）向抽象劳动（abstract work）的转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当然可以向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学习：我的意思是，向那些公共机构学习。建筑师通常都很畏惧公共机构，因为它对其作为“专业人员”的自由活动构成威胁，也因为它支持了官僚主义决策制定和规划的结构。害怕不可避免之事是没有用处的，尤其是自这些巨型结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创造出以来。在意大利，存在着混合资本，私人资本，国家资本，IRI ENI，等等多种资本形式。一开始的时候，这些资本以一种顾问的身份，来处理区域性问题，有时甚至还提出一些可供执行的计划。诸如鲍格才家族（Borghese）别墅（Villa Borghese）的竞赛场下的停车场这类工程，已经被这类大规模的公司所执行。诸如那不勒斯（Naples）那种南方城市的高速公路、立交桥、意大利面式交汇口（spaghetti junction），从头到尾都由这些公司计划和执行。在做最后的装饰时，他们甚至炫耀性地在建筑中粗雕上巨大的名字。这种尺度的计划，只算是城郊规模的装饰物——它们是完全无用的。事情的关键是，我们要马上重组这些公共结构，无论是国家的、地区的、省级的，还是市级的……，同时还要为它们提供分析人员、盘存人员和设计者。谁说专业人士就应该拟订我们的文化品清单呢？为什么会这样？如今在意大利，他们甚至根据公共投标来组织文化品的清单，这吸引了那些偶尔串串分析者、历史学家、批评家场子的建筑师，甚至吸引了艺术学学生和建筑学学生。不！我们必须创造出国有的和地区性的结构。这件事将会变得有趣起来，因为往后将有可

能对学校入学人数进行规划。当然，我反对一切形式的限制性招收，但我不反对有所规划的职业市场。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实际上需要多少建筑师。而学校招生的人都知道，如果需要一万名建筑师，就得有三万名学生。那么，其中有两万将不得不干其他工作，做电影、舞美，以及诸如此类的行当……但我们知道，有些工作是已经被安顿好的。事情在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发展，至少，我们需要对公共规划和设计部门进行重新定义，在意大利和在法国都是这样……

想想看，对职业市场来说，这意味着多大的转变啊。例如，作家巴尔扎克（Balzac）变成了记者，这可是最伟大的革命。巴尔扎克是不可能自己一个人搞罢工的，但是《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或《信使》（Messaggero）的记者们却能有效地影响他们工作的政治环境。所以，在另一方面，你也得到了一个分解为碎片的（atomized）作家，无论如何他是没什么用了。分析到最后，重新团结起来的建筑师令我们很感兴趣，因为他们与抽象劳动的大众化（this massification of abstract labour）协调一致，并且成为一种政治武器。我认为这些建筑师不会构成非生产性的第三部分（an unproductive tertiary sector），而会构成一个生产性的部分。

瓦：是的，但是在精确的、严格界定的条件下。

塔：当然，说起来这些条件是唯一值得考虑的。想想新镇（New Town）……

瓦：这会在建筑事务所内导致（劳动的）分工吗？

塔：当然会，这已经发生在大型的美国实践中了，它们的劳动分工特别发达。

瓦：建筑工作还是相对落后于建筑的组织。

塔：落后？但在有些美国事务所，建筑师的工作正在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他们恰恰记住了，形式并不一定是商品循环的障碍，相反，它能刺激商品循环。你只需看看凯文·罗奇（Kevin Roche）的建筑，就能了解形式话语是如何被直接吸收，它是多么的有效。

瓦：它是很有用，但在某一层面上它却是消失无影——它只在宣传（publicity）的层面上有效。

塔：当然，但是这就是它在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合法层面。

瓦：那未来建筑师数量呢？这很让人担忧。

塔：我们只有考察了建筑学工作的一切新的可能性，才能知道究竟需要

多少建筑师。我认为，当一名建筑师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就必须盖房子。像博洛尼亚的工程或巴黎的历史中心重建这样的大规模工程，要占用成百名的建筑师、类型的分类者（classifiers of typologies），当然还有策划者（planners）。

瓦：但是，怎样才能对这种需求作出决议呢？

塔：当然，如何决策是不能个人说了算的。规划机构的重组需要政治斗争。但分析和理论能够显示出要求的层面，并且进一步显示出决策的过程。

瓦：这就是如今的工作必须开始的地方吗？

塔：我愿意说它已经开始了。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如今有些极有学识的意大利建筑师是威尼斯、都灵等城市的规划顾问……但我们仍然停留在个体和城市的层面上。我们要的是一些器械和城市，那么我们就能开战了。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停止做关于意识形态的废话演讲，我们可以说，好吧，现在……

（胡恒　译）

《德意志意识形态》
文本学研究的再思考

文献学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科学立场*

——答鲁克俭先生和大村等日本学者

张一兵

2005年初，我所主持编译的日本当代思想大师广松涉的《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译本，终于在长时间的严谨斟酌之下译毕出版了。作为编译者，我们自己固然也的确对此书的译介寄予了厚望，然这么厚的一本大部头，能够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售罄加印，并且一经问世立即引发了国内外学界如此广泛而深入的关注，却是我们始料未及的。2005年至今时日其实尚短，但已经出现了一大批与这部译著相关的文献和研究性的讨论文章，甚至可以说是围绕该书出现了一种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鲜见的、令人振奋的深度研究态势。① 对此，我们深以为幸，并且由衷希望以此发端的这场热烈讨论能够真正以一种更加深入而务实的姿态延展下去，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使中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哲学的文献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学术水平。也是因此目的，我们于2005年4月同日本

---

* 此文为教育部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是提交于2007年4月在东京举行的第三届广松涉哲学国际研讨会的论文。

① 此处还应该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魏小萍博士和清华大学哲学系韩立新博士的研究工作，前者已经与国际MEGA编辑机构和相关马克思文献机构建立了直接的关系，正在开展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学研究；后者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民间读书会，译介了相关的日本研究文献，并开始形成一些基于德文文献的研究成果。此外，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也已经在前期充分的文本学研究基础上，正式启动了基于原文的MEGA研究工程。我认为，以上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科学研究的开端。

学者一起，在南京大学举办了“《文献学的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暨第二届广松涉哲学国际研讨会”，研讨会的主要论文会后不久即在日本《情况》杂志分两期发表，并在日本学界引发了较大的反响。2005年冬，英国著名西方马克思学专家卡弗专程赶赴南大，和我们一起集中讨论了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汉译工作，双方从此建立了重要的学术合作关系。当然，在如此高度的关注之下，此书的出版，尤其是我为这部中译本写下的代译序同样很快就遭遇了国内外学者的不少质疑和批评，其中最激烈的当属国内的鲁克俭先生与日本的三位马克思学专家大村泉、涩谷正和平子友长。① 鲁克俭先生在《“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一文中对我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我撰写的《代译序》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研究所持观点的历史“陈旧性”上；而大村等日本学者在《新MEGA〈德意志意识形态〉之编辑与广松涉版的根本问题》一文中对我的批评，则更多侧重于我对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评价。这些批评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敦促我自己对相关问题作了冷静的反思和重考，从中也得到不少重要的启示，因此对国内外学界的关注与批评，我内心十分感激。一般情况下，我不太写商榷性的文章，不过在这一次的争鸣当中，我发现自己与当前国内外部分学者在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整理、特别是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地位和研究方法的问题上有非常重要的原则性分歧，其中也包括对广松哲学的理论定位和译介意义的认识。如果再延伸下去看，这种分歧还直接涉及了文献学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要关系。而我以为，上述问题对国内学界今后的研究其实是非常紧要和关键的，所以不妨再深入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与各位同仁探讨。

一、西方马克思学：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文本研究的基础？

鲁克俭先生特别不高兴的地方，是我在2005年出版广松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时，竟然“无视”德国西方马克思学专家陶伯特的“版本研

① 鲁克俭：《“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1期。［日］大村泉、涩谷正、平子友长：《新MEGA〈德意志意识形态〉之编辑与广松涉版的根本问题》，日本《经济》杂志2006年第10期。

究的新成果”。陶伯特原为前东德的研究人员，现为德国西方马克思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主持 MEGA2 第一部分第五卷《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工作。藉此原因，鲁克俭告诉我们，中国的“‘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要走向深入，就不能无视国外‘马克思学’研究（包括版本）的新成果”。[1]对这种简单的带有意识形态意味的批评，坦率地说，我显然不能接受。我先不说鲁克俭先生的政治立场中的**非马克思主义**观念，因为他已经站在了西方马克思学的立场上，这一点我们后面会专门讨论。

先说一个有趣的文本事件吧，鲁克俭先生由于过于熟悉西方马克思学的“最新成果”，结果把由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新译手稿中的编译说明，说成了是“错误”和“以讹传讹”。在这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他批评我在《代译序》中提供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的生成过程的错误信息。说实话，我真是感到冤枉，因为自己关于手稿第一章写作的基本信息，基本上是从 1988 年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新译《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费尔巴哈》的编者说明中获得的。这里包括：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开始设想在第一章中同时批判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第二，关于第一卷前三章写作的结构和时间；第三，第一章第一部分的内容是删除了关于鲍威尔和施蒂纳相关段落后的结果。被鲁克俭先生指责为我的错误和“以讹传讹”的这三个主要问题，均来自中央编译局写下的编者说明。[2](pp.1-2)并且，在 2003 年中央编译局重新编译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中，也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信息。[3]于是，一个不禁让我内心产生恐慌感的更重要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今后正式发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其文献根据到底应该是什么？是西方马克思学的所谓“最新成果”吗？

说完这个由于鲁克俭先生不小心而造成的文本事件之后，我现在的心情是十分沉重和复杂的。因为除去鲁克俭先生的这个文本事件之外，还有他所持有的内在逻辑构架，即**以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立场和结论**作为今天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事学术的**标准**。他的这种立场并不是没有背景的，近期以来，国内的确有一些所谓马克思文本的研究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倒向西方马克思学。这是值得引起我们严重关注的理论倾向。

再回到鲁克俭先生对我的批评上来。说实话，在写这篇《代译序》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了陶伯特女士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两篇论文以及国内学者介绍性的文章，但是，在是否按照西方马克思学的学术观点来

改变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相关信息，我是犹豫再三的。因为我已经意识到，我们与西方马克思学在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问题上，有着**根本性的原则差别**。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学（Marxologie）是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学术思潮。这一术语是由法国著名学者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Maximiliem Rubel）首创。在1959年，他用这个术语作为自己倡议创办并出任主编的刊物命名，这就是后来在西方享有盛誉的《马克思学研究》。这一术语，旨在倡导一种研究立场，它强调把马克思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以所谓**中性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的著作。因此，它被理解为在马克思研究中一种“超党派”或“超意识形态”的学术态度。西方的“马克思学”，是随着上一世纪中叶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的出版而兴起的马克思重新解释的热潮而诞生的，它甚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起源、政治立场、学术立场、理论旨趣等基本方面有着重大的差异。其中最根本的异质性，就是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前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崩溃之后，西方马克思学的阵营中又接纳了一大批新成员，其中，前东德的陶伯特、前苏联的巴加图利亚等人都是著名的几位转型专家。这里所讲的转型，即是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转变为一个“客观”研究马克思文本的学者。

鲁克俭先生看不到的东西正在于此。我们研究马克思，主要不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著作为已经死去的文本，只需要客观地“不加外来主观意愿”地对待它，以得到历史的“真实”，相反，我们精研马克思的初衷首先因为我们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认真面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恰是因为我们意图通过对他们的科学理解来真正地**信仰**马克思主义，进而以之为武器，解决我们的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与困惑。以上，是为我们与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第一个区别。故而，对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其他科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于我们来说并不只是意味着简单地用所谓历史证据来对经典文本进行僵化和冰冷的客观处理，而是应当通过正确的解读使之成为一种具有重要质性内容的科学方法和思想理论系统，指导我们的理论和实践。因此，毋庸置疑，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1845年以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及其中所体现的科学思想应当被视为**走向人类解放的科学思想武器**。此为我们与西方马克思学者之间横亘的第二个根本立场上的区别。其实，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西方马克思学与**自指马克思主义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水岭也正是在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否

这个问题上。我注意到，在鲁克俭先生新近出版的《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就公开提出要将原本具有明确价值取向的“马克思学”变成一个彻底的“中性词”，甚至将前苏东马克思主义学者和一部分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如卢卡奇和阿尔都塞）混同于西方马克思学。[4](pp. 导论2-3)鲁先生在该书中得出的最后结论与鲁文的论调是一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依据应当建立在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成果之上。可见，鲁克俭正努力试图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为西方马克思学争取某种不恰当的更加重要的学术地位。

鲁克俭先生，到底是谁错了呢？正确的说法无疑是，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何研究，都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指导下，建立在我们自己独立的思考和研究基础之上，对任何国外的研究性文献，都必须在进行了认真的理论鉴别之后，才可能作为我们研究的一种参考文献。更不要说是西方马克思学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结果**(不是成果!)。对于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我们当然要关注他们的研究进展，但也不得不警惕他们简单随意地处理文献的做法。因为，许多马克思主义重要经典文本的理解和基本编排方式，对于西方马克思学者来说，可能只是文献的结构问题，可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在刚刚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年鉴2003》中，我们终于看到了鲁克俭先生所崇拜的陶伯特端出了她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的“新成果”，然而人们发现，她的理论目的却是要“在意识形态时代终结之后能够重新**对马克思进行哲学的解构**”（黑体为引者加——作者注）。[5]这难道就是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基础吗?!

二、什么是西方马克思学视域中看不见的东西?

站在西方马克思学立场上的鲁克俭先生批评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仍然坚持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在理论关联。具体说，他将我主张的“《提纲》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入口”的观点，说成是无视西方马克思学最新成果后不“可靠和令人信服”的解读。[1]我甚至觉得，可能中国任何一个认真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公共课的普通大学生都会知道，这个观点并非我的发明，而首先是恩格斯生前公开确认的既有事实。

他老人家在110多年前（1888年）将《提纲》直接说成是“包含着新世界观萌芽的天才提纲”，而马克思恩格斯都明确指认《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是这个新世界观的真正诞生地。《提纲》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提纲（不是**写作**提纲！）①，这是马克思恩格斯那里顺理成章的结论。

那么，鲁克俭先生的批评源头究竟又来自何方呢？窃以为，在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上，鲁先生的观点与我、或者说与恩格斯直接指认的结论之间之所以有如此根本的分歧，根源还是在于他心里的西方马克思学情结。陶伯特等人的确曾经指认，《提纲》**只是与《神圣家族》的写作有关**，然而问题是，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所下的结论就一定是不折不扣的真理，人人必须遵循吗？我想，这未免过于霸道了。

陶伯特为什么这样说呢？鲁克俭告诉我们，陶伯特等人的依据是：“在写有《提纲》的笔记本中，在《提纲》第一条前面有四行文字”。[1]鲁克俭先生，这真是什么新发现吗？这不叫“四行文字”，在197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273页上，这一文献叫《笔记本中的札记》。它也不是什么新发现新发表的文献，它最早刊登在1932年出版的MEGA1第一部分第5卷上。大约30年前，就已经是我们读研究生时熟知的文献。鲁克俭先生还告诉我们，陶伯特等人对这“四行文字”有了新的解读，证明它的内容主要与《神圣家族》几节相关。由此确认马克思的《提纲》**“只是《神圣家族》中唯物主义思想的延续”**。这一句话的黑体是我加上的，因为这一句话是至关重要的东西。我们后面会专门讨论。鲁克俭先生很生气，因为他觉得“陶伯特等人的研究成果发表于1997年，对该成果的中文介绍发表于2003年。几年过去了，但张一兵仍然无视这一研究成果，仍然说‘《提纲》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提纲’，并在此基础上作出自己的文本解读结论，这样的解读会是可靠和令人信服的吗”？问题相当严重呢。

首先，必须说明，我并没有像鲁克俭所说的那般，完全无视陶伯特等人的高见，同时故意回避2003年相关的中文介绍，在耳不聪、目不明的情形之下狭隘地得出自己的结论。早在我那部出版于1999年的《回到马克思》第348—353页上，我就已经讨论过鲁文告诉我们的所谓“新事实”，

① 鲁克俭先生可能太粗心了，连中文里的“写作提纲”与作为有理论逻辑关联的“思想提纲”的差别都区分不了。

即马克思写在《1843—1847年笔记本》第51页上的《笔记本中的札记》（“四行文字”），当时我已明确表示自己并不同意将这一文本“简单地指认为其他思想运演的重复”。在书中，为了使说明更具针对性，我还专门用一个括号标注出巴加图利亚和这个鲁克俭先生倍加推崇的陶伯特。[6](p.349)鲁克俭自己说，陶伯特的研究成果发表于1997年，中文介绍则出现在2003年，而在我的记忆当中，自己写下这段文字并专门标注出陶伯特的时间是在1998年。可见，我不仅不是无视陶伯特，甚至可以说在相当早的时期就主动遭遇了她，问题只是我不主张完全被动而不加思考地接受这些所谓的“研究成果”，相反，每每当我拿到新东西，我更愿意选择在独立考量之后形成自己的态度与立场，在此基础上再加以运用，让别人的研究成果以更科学的姿态介入我自己的研究。因此，我十分希望与鲁先生商榷的是，我认为在具体批评我的观点之前，鲁先生似乎应当认真读一读我的相关文献，至少是看过相关的最重要的文献，对我的观点形成一个大体准确的了解，而后才具备讨论的基础。对学者而言，争鸣固然相当可贵、也极其有益，但无疑只有在真知对象观点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批评才能实现与对方在同一个层面上的实质而有真正意义的争鸣与碰撞，从而促进学术发展，否则，只能够是一种断章取义的欲加之罪，不是我们应当提倡之风。

其实，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关于《笔记本中的札记》的解读，正是批评和拒绝陶伯特一类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观点的。在这一分析中，我不是像陶伯特等人那样仅仅从文献的一般历史文献线索出发，而是**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我的研究成果与陶伯特等人的观点显然是不一致的。所以，不像陶伯特只能看到文字中与《神圣家族》相近的东西，而我会看到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在此文本中看不到的新的思想内容，即**历史性、现实性和具体性**的全新思考点。[6](p.351)而这一新的思想质点，将是《提纲》中思想革命的爆发之点。奇怪的是，站在自己的独立思考的立场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自己的研究成果竟然不是最新成果，用鲁克俭的话说，叫“明显低于陶伯特研究水平或者把已被陶伯特明确否定了的说法当作基本事实”，[1]而西方马克思学者陶伯特在此之前发表的观点就叫“最新成果”，不同质于他们的东西，就叫做“无视”新成果和只能是不可靠和不能令人信服的解读，这是什么逻辑？

其次，在陶伯特等人的最新成果中，《提纲》的写作时间被推延至

1845年7月以后，并被判定为“《神圣家族》唯物主义思想的延续”。我们都知道，《神圣家族》中的唯物主义思想可以精确地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出现在具体讨论中的关于欧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研究；二是马克思恩格斯此时仍然运用的费尔巴哈式的哲学唯物主义立场和隐性逻辑构架。说《提纲》仅仅是《神圣家族》中唯物主义思想的延续，实际上也就否定了马克思在《提纲》中开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革命**，这直接抹杀了《提纲》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原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这不但不是什么新成果，而且是我们绝不可能接受的天大的错误观点！我想，这恐怕不是鲁克俭先生的真正用意吧。

在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论视域中，他们看不见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形成的特殊历史意义，看不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武器的批判意义，看不见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共产主义解放理论和科学思想的信仰和热爱。他们不能理解，马克思的《提纲》和其与恩格斯合作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绝不是可以一般“中性”处理的历史文献，而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事科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法论依据。所以，我再次向鲁克俭先生说明，他的那种让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基于西方马克思学的“成果”的观点才是真正错误的，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错误理论倾向。我坚信，这一定也会是大多数中国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赞同的东西。

当然，鲁克俭先生的文章也不是完全没有正确的东西。比如他所指出的陶伯特等人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的编号问题。这应该是我注意的细节。也是在此文的最后，鲁克俭先生还提到了我有“拔高广松涉的倾向”，这正好与最近刚刚收到的三位日本学者的批评文章中的意见一致。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日本学者的批评。

三、对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评价高了吗？

2006年9月，我收到朋友转来的日本学者大村泉、涩谷正、平子友长的一篇长文，标题为《新MEGA〈德意志意识形态〉之编辑与广松涉版的根本问题》（下），此文也是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基础研究A以及同基础研究B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大约相当于我国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

项目。[1] 在这一论文中，日本学者对我的批评集中在关于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评价上。当然，批判的矛头主要是指向广松涉版和小林昌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方式的。概括一下，大约有以下几点：

第一，1974 年出版的广松涉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即我们已经在南京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中文译本），“完全没有理解”上一世纪 70 年代相关研究的水平，即 1972 出版的新 MEGA2 试编本（Probeband）的标注，从而使《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的研究水平“倒退了 40 多年”。请注意，这里所说的“倒退 40 年”，不是从现在倒退至上一世纪 70 年代，而是指从上一世纪 70 年代倒退到 30 年代。具体说，是前苏联学者阿多拉茨基版的水平。[2] 这一点，既否定了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学术价值，又批评了没有学术眼力的我。

第二，广松涉的编辑方式“其实很简单，并不需要特别的专业知识。在只能用手动式打字机的当时姑且不谈，在个人电脑得以普及的现在，只要会一点点德语，谁都能进行编辑”。为什么呢？因为，广松涉的工作只是将阿多拉茨基版中的“异文一览”中的草稿修改过程信息原封不动地移入文本正文，只是将马克思的修改用粗体标出，仅此而已。所以，广松涉“没有将阿多拉茨基版以后的 40 年的草稿解读，特别是关于改稿过程的研究的核心部分吸收到河出书房版之中”。这样，广松涉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在出版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它的学术生命”。这是死罪之宣判。言下之意，我们是在中国出版了一本已经死亡的书。

第三，代表今天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最高水平的版本，是日本学者涩谷正先生（此文三位作者之一）1998 年在新日本出版社出版的新书《草稿完全复原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据此篇论文的作者自己说，这一版本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东西。它与广松涉版等日本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各种版本的决定性

---

① 此文已经发表于日本《经济》杂志 2006 年第 10 期。并且，日本学者明确提出，希望此文能够译成中文，尽快在中国公开发表。现在，此文已经由彭曦博士全部译成中文，这一次与本文一同全文发表。

② 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阿多拉茨基版和其他版次的文献情况，可参见我为广松涉版《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所写的代译序，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不同点在于："涩谷版是涩谷自身对草稿进行调查，在对记载状态进行确认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从字面来看，似乎是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区别就在于广松涉没有看到真迹，而涩谷则**在现场**（阿姆斯特丹）看到了文本的真面目。

第四，是对广松涉的学生小林昌人2000年岩波文库出版的《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批评。主要批评小林没有改正广松涉版的错误，反而"留下了很多遗漏和错误"。为此，此文作者们甚至还直接指责出版此书的岩波书店是"可耻的"，并且在广松涉版的中译问题上，小林的正确做法"应该是奉劝南京大学以及中央编译局的相关人员放弃该计划"。他们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试想一下，在21世纪的今天，在文本本身的核心部分即改稿过程的标注上照抄斯大林时代研究成果的广松河出书房版，有翻译的必要吗？"

第五，批评我在涩谷正那本划时代的"伟大著作"出版之后，竟然还向中国学界推荐广松涉的学术水平倒退到上一世纪30年代的、没有了生命的版本。并认为我对广松涉版进行了"无条件的赞扬"，评价"过高"。所以，他们"有必要向中国的相关机构以及研究者尽早告知问题的本质"。这很像是在举报伪劣产品的正义行为。

这就是三位日本学者在这篇图文并茂的万言书中告诉我们的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东西。拜读之后，我相当吃惊，坦白地说，这项日本国家级研究项目成果令我十分失望。

事实上，译介广松涉这部文献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我的研究计划当中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是我向中国学界系统推荐广松涉学术思想的组成部分。至于推荐和研究广松涉思想的原因和意义，我曾经多次阐述，在此不想再赘言。但是我想，作为中国学者，我既应当谦虚谨慎，但也不至妄自菲薄，经过20多年开放求索，中国学者应当已经**有能力自主地辨别什么是值得我们介绍和研究的东西**，我非常主张与国外学界的交流与探讨，包括与日本学者的知会，但应当是一种客观、平等，互相尊重的对话。

广松涉的思想，至少是目前我看到的当代日本哲学发展史中真正值得认真对待的东西之一。从他一生留给后世的大量论著和极有深度的学术观念上看，从他创立的一个极富东方精神个性、又能与现代西方文化对话的思想体系来看，广松涉无愧于当代东方思想大师的称号。当然，我喜欢广

松涉，还因为他与我一样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是始终将马克思的精神遗产作为自己学术理念的重要方法论基础。早在10年前，我就指出过广松涉思想方式的重要性："他开始是一个熟知自然科学的学者，后来在关心日本左派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实践中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在7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学式的解读仍然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术高点。后来，他以日本民族文化为基底，以马克思为逻辑中轴，广收当代自然科学和西方哲学的成果，创立了一个很具东方（大和）特色的广松哲学"。① 我认为，这是非常值得中国学者借鉴学习的治学道路。也是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在我主编的旨在向中国学术界介绍有价值的世界学术思想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的广松哲学系列里，作为广松涉的第四本经典之作，我选择了广松涉出版于1974年的文献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

应该指出，与三位日本学者不同，我不是一位文献学专家，而是中国的一名普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其实，在自己的手中已经有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阿多拉茨基版、巴加图利亚版之后，看到广松版是最能让我激动的事情了。这一版本的特点，我在《代译序》中已经非常清楚地加以说明："一是首次采用双联页排印的方式（**手稿正文印在左页，相关文本印在右页**），将手稿中新旧文本（原稿与誊写稿以及部分重要的增写内容）以左右两页并排的形式展示给读者；二是用**不同字体**将恩格斯与马克思所写的内容区别开来（中译本中马克思的文字用楷体字，恩格斯的文字用宋体字），这使读者能更直观地了解原手稿在文本写作上的真实情况；三是将被删除的内容用**小号字**体排出，并直接存留在原删除的文本位置上，并且标注了马克思恩格斯用横线与竖线删除的差异；四是用**不同标记**明确注明马克思恩格斯增写与改写的文字；五是关于**不同版本的各种信息**，被如实反映在手稿的排印中（我们的中译本又增加了日本学者小林先生和涩谷先生的两个最新版本的信息）；六是广松涉在自己的日文版后，以独立成书的形式排印了按照他自己的理解结构的**德文原稿**，这就提供了文本研究上的一个直接来自于母语文本的比较参照系。"[7](p.11) 其中，除去第三点与梁赞诺夫版的编排方式相似以外（在删除记号上还是有

① 参见中国《哲学动态》1995年第9期。

一定差别），其余五点均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内在逻辑有着深刻理解**的广松涉之独创，与所有其他版本相比，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出版史上至今不可替代的**结构性变革**。我自己今天还认为，这个版本在基本逻辑思路上要优于2004年由陶伯特所编排出版的MEGA2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2篇的“先行本”①。

在这里，我再对上述特点作一些进一步的说明。第一，广松涉采用双联页排印的方式，是想直观地映现手稿的原始状况。当然，这个所谓的“原始”中已经含有广松涉对手稿逻辑结构的主观猜测。本来，他希望按手稿相同页码的全部内容排印，因为印刷排版问题而放弃。在中译本排印时，我也曾经提出实现广松涉的设想，后来还是失败了。第二，区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中马克思与恩格斯不同文字，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不同的删除和改写的信息，意味着科学世界观最初形成过程的**历史性构境**之可能，特别是中国学者可以从中了解到两位思想家在其中的不同作用，这一点，对于中国学界尤其重要。在这一方面，涩谷版基本上沿用了广松涉的这些做法。不过更加准确和细致了。第三，广松版汇集了在他之前主要版次相关的文献信息，并且第一次完整地在手稿排印中直观地呈现出来，这也让中国学者第一次直接了解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版本研究的历史线索。

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大村等人要执意贬低广松涉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呢？他们所说的“倒退40年”到底是说什么呢？

四、是谁的编辑水平“倒退40年”？

现在我们来看大村等人的“40年倒退说”的基本内容。

第一，大村等人认为广松版（包括小林版）的编辑过程并不复杂，在有电脑的情况下，懂一点点德文，谁都能做，因为广松涉只是将40年前的阿多拉茨基版的“异文一览”中草稿修改过程的信息“原封不动地用小号字置于〈〉内，将马克思的插入用粗体表现”。[8]此言真是离奇得过分。首先，谁都知道，1932年的阿多拉茨基版最重要的排版方式，是将马克思恩

① 2004年，《马克思恩格斯年鉴2003》出版了由陶伯特等人编辑的MEGA2第一部分第5卷《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1、2篇的“先行本”。

格斯的补入部分直接排印到正文中，更重要的是阿多拉茨基以自己的主观理解重新分割和拼合了手稿的文本，完全破坏了原稿的理论逻辑。广松涉对阿多拉茨基版是基本否定的，每个看过两个版本的人都不可能得出大村等人的这种误识。其次，广松版上的版本信息从头到尾都清楚地标注着梁赞诺夫版、阿多拉茨基版、新德文版和 MEGA2 试编本的四个版本的文献信息，大村等人为什么会看不见呢？其三，“懂一点德文”就能做广松涉的工作，这是一句不负责任的空话，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至少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就不可能有人（即使懂不少德文）能够做好广松涉已经完成的事情。我想，日本的大村等人大概不止“懂一点德文”，可是你们在此的作为同样令人失望。

第二，大村等人认为，广松涉在编辑过程中根本没有理解 MEGA2 先行本中“异文一览”的核心部分，即改稿过程中的异文标注。虽然中译本也附排了这个“异文一览”的样稿，但我和译者都因没有对此发表评论受到了责问。大村等人告诉我们，这个“异文一览”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进行极为简单的编辑整理的方法”。这是所谓二战以后“编纂学的成果”，也是 MEGA2 编辑体制转换的结果。广松涉没有按照这一新的方式来做，也使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倒退 40 年”。很有意思，我怎么看都觉得这段话与前面中国的鲁克俭先生的腔调相似。怎么 MEGA2 编辑人员制定的编辑要点就成了硬性标准了呢？我承认，在过去 MEGA2 编辑工作仍然由前苏东当局控制的时候，它的编辑工作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儿子党”、“兄弟党”马列主义文献编译工作的**天然准则**，可是这种老子党的“王法”不是已经成为历史遗迹了吗？如果 MEGA 版的编辑工作及其编辑标准就是阻止所有其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独立性，我以为它真的可以休矣。事实上，我知道这绝不是 MEGA 编辑专家们的意志，而是少数根本不理解 MEGA 事业真谛的人在拉着虎皮做大旗。据我的了解，目前 MEGA 编辑机构的专家们与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保持有良好的相互尊重的建设性关系，他们十分注意听取各国学者的不同意见，他们之所以不断地出版“试编本”、“先行本”，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为什么要编辑 MEGA！更何况，我们任何一个看到过 1972 年出版的 MEGA2《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试编本的研究者，都不会觉得这个所谓的“异文一览”是**科学的**文献编排方式和**便于研究者使用**的做法。

第三，大村等人认为，涩谷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完全复原版），

是作为消除和校正了学术水平倒退40年的广松涉版以及所有“至今为止的日译本的共通的致命缺陷的版本出现的”，可是，张一兵是在涩谷版出版之后，却无视这一划时代的新成果，反倒跑去出版早就**过时的**广松版，误导中国学界。这样，中国学者“在依据有缺陷的版本进行研究的时候，成果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客观地说，涩谷版的确是在广松涉版基础上取得一定进展的成果。也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出版广松版中译本的翻译和研讨工作刚刚开始时，我们就专程从日本购买了涩谷正的“完全复原版”。在多次译文研讨会中，我们已经觉察到涩谷先生的研究在文献学的意义上已经取得了不少新的细节上的新认识，特别是从德文原文的考据和第一手的信息上，都使《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的研究登上了一个新的学术水平。也因此，我们在第一时间就专门邀请了涩谷先生前来参加南京会议。后来只是因国际旅费问题，涩谷先生赴会之事未果。同时，我们在中文译本中加注了涩谷版的近40条信息，以表示对涩谷版的必要尊重。当然，我们也加注了小林版提供的100余条新的文献信息。这恐怕不能叫“无视”涩谷版的成果吧？

首先，我们是在编译广松涉哲学系列中出版这本书，并非是打算出版日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研究领域中**最新**研究成果，所以，我们不会因为有了日本的涩谷版、小林版、服部版和德国陶伯特2004年的试行新版，就放弃出版广松版；其次，广松版所依据的主要文本信息并非如大村等人所说是倒退30年的过时的东西，而是自1920年以来，列宁亲自建立的前苏联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机构中一大批马克思主义文献专家近半个世纪精心研究的成果，这里包括梁赞诺夫、阿多拉茨基领导下的文献辨识专家（如保尔·韦勒尔、弗兰茨、尼娜·伊尔伊尼奇娜·涅波姆尼亚夏亚）默默无闻的工作，以及后来前苏联巴加图利亚、东德一批文献专家的努力结果。我认为，这些原文辨识专家和研究者才真正提供了马克思大量手稿中复杂手写体原文基本信息，这些厚重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基本文献成果，绝不是在阿姆斯特丹待上一年“对草稿进行调查，再对记载状态进行确认”就可以动摇和改写的。其三，我仍然认为，广松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时至今日也有它极为重要的文献学价值。在我看来，广松版的价值是一种重要的**文献结构的变革**，而不仅仅是文本细节的精确性。还应该指出的一点是，涩谷版的基本编排逻辑就是广松涉版的进一步完善。你们的“划时代”不正是因为广松涉先行走出的道路吗？

令我最为不忿的一点在于，三位大学教授对小林昌一这样一位工人出身的自学者的傲慢态度。在译介广松涉的著作之前，我并不认识小林先生。但在此后的三次接触中（两次在南京，一次在东京），通过交谈，我能感觉得到这位非专业的学者对学术的敬业精神和对自己老师的敬重之情。这即使在我们自己的身边，也是不多见的令人顿生敬意的学者。然而三位研究马克思思想和文献的专家对小林先生和他所编著的“文库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和贬斥却失之于厚道和尊重——我自己始终觉得，学问之道，也应当是一种敦实宽厚的为人之道，而后才能有治学宽阔的眼界和胸怀。任何学者，无论水平有多高，成果多么卓越，若要批判别人，都应当出于一种宽厚真诚的善意，应当善意地指出问题，建设性地帮助别人共同提高研究水平，而不是一种铺天盖地的横加指责和全盘否定，甚至将这种否定穷追猛打地延伸到他国学界来，甚至试图彻底取消别人的话语权。

我以为，对于任何学者来讲，即使自己的学术水平再高，研究成果真的比他人更好，也应该更善意地指出问题，建设性地帮助他人共同提高研究水平。不能简单地对他人横加指责，全盘否定，况且是跑到他国学术界来发表观点。我想，真正使马克思文献研究水平倒退40年的，绝不是天上的广松涉先生和还在努力工作的小林先生，而正是日本的大村泉、涩谷正、平子友长这三位学者，因为，用一种自我标榜的绝对正确来同一性地强暴学术，那是半个多世纪以前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这种东西，在中国已经失去了市场。

五、文献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理论研究

说到这里，我觉得有一些问题不得不认真严肃地讨论一下，即如何正确看待文献研究的方法以及文献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特别是文献学与文本学研究的关系问题。近年来，中国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已经越来越背离了那种假、大、空的叙事模式，重读马克思经典文本已成为中国年青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共同学术旨趣。于是，基于对第一手文本原始信息和原初逻辑结构的文献学考证研究，也开始逐步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们马列主义编译机构没有拥有足够多的**第一手的经典文献原稿**，也没有培养出专业的**文献**

辨识专家，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段中，我们的马列主义文献编译和出版工作主要依据了前苏东学界的现成成果。这使我们在经典文献整理和编译工作上始终不可能有太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特别是在前苏东社会主义垮台之后，国际马列主义文献整理的主体已经**从国家意识形态机构转型为民间的基金组织，从马克思主义者的专家队伍转向西方马克思学的专家群体。**我个人觉得，至少目前我们还没能找到应对这种新情况、新状态的路向。这的确是值得我们有关部门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

上述问题的出现，自然使得我国学术界的马列主义文献整理和考据水平与当下的国际水平有一定的差距，这是一个不争的客观现实。更重要的是，这种情况也使我们自己的一部分青年学者在遭遇西方马克思学的文献学研究时容易迷失行进的方向，出现随波逐流的现象。前述鲁克俭先生的思考方式就是一个当下的典型。然而，是不是在这种时候，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就只能跟在西方马克思学的后面人云亦云呢？对此，我不以为然。

我认为，一方面，我们应该像十月革命刚刚胜利时的列宁那样①，高度重视马列主义基本文献的专业研究队伍的建设，立即着手建设马列主义文献原文（拷贝）的基本数据库，积极培养自己的原文辨识专家，哪怕是从零开始，也要独立自主地开展真正意义上的文献学研究，而不是在二手文献上做所谓的**伪文献考据**。说到底，这种不是基于原文辨识和原始信息的文献考据和版本研究是一种变形的抄袭和非法挪用。另一方面，积极关注西方学者、俄罗斯以及日本等国学者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献学上的重要研究进展，谨慎小心地辨识其中的积极内容，特别是客观考据中的新发现，但必须要批判性地思考他们处理文献中的基本结论和所谓“新观念”。这只有一个目的，即真正使这种研究结果**有益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和当代发展，而绝不是破坏和损害这种学术事业的进程。

我还觉得，要正确处理好**文献学**研究与当前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理论研究的关系。文献学研究，特别是基于经典文献原稿的历史考证研究，的确是我们开展学术研究的一般基础，但是在基本文献信息准确的情况下，在

---

① 早在上一世纪前期，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列宁就立即指示阿多拉茨基和梁赞诺夫等人调用一切可能的资金和人力全面收集和整理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第一手的文献，着手建立马克思主义文献档案馆和编译机构。这奠定了后来整个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编译事业的重要基础。

如何理解文本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学术关系中，我们还是有很大的能动性空间，这个空间就是文本学理论研究的领域。这里我所讲的文本学，就是对文本思想内容的学术理解和深层逻辑结构的认识，这是**基于文献学又超越文献学**的一种科学努力。文本学不同于文献学的本质性差异，就在于文本学的基础是从主要文献事实出发的**创造性的独立思考**。当然，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有其自身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也因此，我们的基本立场、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的本质都会根本异质于西方马克思学。这里，我们可以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根据德国学者陶伯特的文献学研究，新编 MEGA2 第一部分第 5 卷中，《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再是一本马克思恩格斯**独立撰写的**论著，而变成了一部由多人参加撰写的**论文集**，这部文集由马克思、恩格斯、赫斯等人共同撰写，在编排上也按合作文集的编排方式将独立成篇的 19 篇文献汇集在一起，并以《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1845 年 11 月至 1846 年 6 月）》为名出版。据说，陶伯特等人认为，自梁赞诺夫 1926 年第一次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以来，一直都是按照传统的编排方式将全部手稿作为“一部著作加以编辑、评述”，而陶伯特等人在上述新的编排方式中，“将力图避免将自己的诠释抬高为绝对真理，并因此排除其他有道理的观点”。[9](p.7) 因为如果我们要将此手稿“编成一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那就意味着要去完成马克思恩格斯所没有完成的工作。由于缺少足够的线索和根据，这样做的结果将是一种随意编成的结构”。[10](p.35) 听了这番话，会让人觉得，陶伯特等人的方案似乎是一种**排除了任何主观猜测**的**纯客观的**文献处理方式，就像鲁克俭先生所欢呼的那样，是一项文献学的最新成果。果真如此吗？

据我知道，这一方案一出台，就遭到了部分韩国学者、日本学者以及俄国学者特别是巴加图利亚的坚决反对。为什么？我们仔细看陶伯特的编辑方案所依从的新的客观依据，无非有三：一是以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或相关当事人在其他论著、信件和回忆文献中的直接指认；二是文本当时所处社会中的出版物、出版日期以及相关信件提供的评论信息；三是手稿留下的各种文献信息，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及他人的页码编号、题名、调序、修改、删除、笔迹、纸张、墨迹重新辨识等等。这些信息对于文本结构的重新认证的确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依据这些信息，当然也可以对过去 80 多年**马克思主义**文献专家们的基本认识提出一定的修订，但是这些修

订必须是在**不破坏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内在逻辑**的前提下才是可行的。因为我们不难发现，陶伯特等人的文字在最新文本信息收集的工作上几乎是无可指责的，可是，唯独我们看不到他们对**文本思想内容即历史唯物主义生成过程**的理解线索！因为他们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们不会觉得《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前述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形成中的关键性文本，这些文本结构和基本逻辑的变化可能直接影响到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形成和发展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理解。这是我们与他们研究立场之间的根本区别。

在陶伯特等人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新处理方案中，《德意志意识形态》不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部独立的著作，基本理论逻辑结构也不再是他们最后确定的用新世界观全面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科学著作，而是一部马克思、恩格斯、赫斯三人仅仅为了反击在报刊上攻击了他们的鲍威尔、施蒂纳而出版的论文集。他们完全根据《维干德季刊》第3卷的出版日期来确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时间，以鲍威尔、施蒂纳的论文内容来确认马克思恩格斯的写作意图，他们根本看不到马克思从1844年“巴黎笔记”就开始的经济学研究的深刻学术影响，看不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思想逻辑的内在矛盾运动，看不到马克思在《评李斯特》一文中的思想变化，看不到《提纲》中的思想革命以及这一革命与《神圣家族》之间的实质性逻辑差异，看不到“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实质性影响，看不到现实工人运动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思想的深刻作用，也因此，《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才成了可以随意处置的历史文献，马克思恩格斯与赫斯等人成了同等地位的独立论文的作者。

更致命的问题还在于：第一，据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写下的《答布鲁诺·鲍威尔》[11](pp.364-367)成了开篇之作，显然，这篇东西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内容。从这篇文献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竟然还在维护《神圣家族》中在人本主义话语框架中对鲍威尔等人的批判。*我个人对这篇没有署名的文献是否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写深表怀疑*。如果这一编排方案得到普遍确认，那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逻辑起点**将被改写，因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起点竟然是以肯定《神圣家族》的理论逻辑为前提的。**这一点，倒是与前面我们已经看到的，陶伯特等人贬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想法一致，如果《德意志意识形态》都与《神圣家**

族》同质，那么何况《提纲》呢？第二，把马克思恩格斯最终确定为批判对象的赫斯放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之中，这就等于承认了马克思恩格斯理论逻辑的混乱，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这种新世界观对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以及对费尔巴哈式人本主义话语的批判当然包括了对赫斯哲学的直接否定。这种根本性的思想决裂从马克思与赫斯的最终分手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把赫斯的文本（哪怕是经过马克思修改的东西）再放进《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将是可怕的**引起内部爆炸的逻辑炸弹**。这些问题，都是作为西方马克思学者的陶伯特等人看不到或者在他们看来根本无足轻重的东西。我以为，在西方马克思学的文献专家那里，这只是文献处理的一种方式，可是，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将是一件大事。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对此方案，我坚决反对！并且，对中国编译机构采用这种编排方案，我是不赞同的。①

所以，文献学研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学的文献学研究与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者研究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是我们必须认真谨慎处理的问题。这个关系，既是学术关系也是重要的政治立场关系。西方马克思学的文献专家们不了解的是，他们所关心的文字辨识、版本细节、字母后缀和版本差别，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东西，但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解读文本来说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内容。我们关心的东西，是影响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发展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本质的思想内容。我们在当代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除去新的文献信息，更重要的是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理论逻辑的认识，以及用当代中国改革的新现实、自然科学实践的新进展以及社会实践新发展中最重要的实践成果推进这一科学思想运动。这一事业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 鲁克俭，“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1）

① 目前肯定性介绍和评介陶伯特这些“新成果”的国内学者大多为编译系统专家学者。

[2]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3]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 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5] 马克思恩格斯年鉴2003 [A]，柏林：柏林学术出版社（Akademie Verlag），2004
[6]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 [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7] 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 [日] 大村泉、涩谷正、平子友长，新MEGA《德意志意识形态》之编辑与广松涉版的根本问题 [J]，经济，2006（10）
[9] [德] 赫尔穆特·埃斯纳特，特里尔马克思故居研究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纂工作 [J]，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0] [德] 陶伯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问题和结果 [J]，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2）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资本论》形成史上的意义

［日］内田弘

序——“广松冲击”与长久的深刻沉默

1965年，围绕着日韩条约政治形势变得十分严峻，此时，我在北关东的某书店里发现了《唯物论研究季刊》第21期，其中刊载了一篇题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的问题点”的论文。由于数年之前在与上级生的共同学习讨论会上读到过古在由重翻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因而对广松的这篇论文发生了兴趣，翻开一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开头的一句话：“现行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事实上等于一部伪书。”[1](p.148)“他在说些什么?”我感到非常惊讶，当即将杂志买了下来，一头钻了进去。但是，广松的论文迎来了社会的沉默。“广松冲击”的沉默。9年之后，广松根据该论文中所提出的《德意志形态》的编辑方案，出版了他自己编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也因我很偶然地担任了《图书新闻》中的“思想时评”栏目编辑的关系，因此在不是“思想时评”的栏目上评价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划时代意义。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广松版、涩谷版、陶伯特版的比较

近年来，值得广泛注目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版本基本上都面世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广松编辑、涩谷编辑、陶伯特编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版本（参照“参考文献”）。本论文首先对笔者所关心的

《资本论》的形成史的问题到有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进行考察，接着，将这一考察在《资本论》形成史中的物化论中进行定位。

众所周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要手稿基本上由“大束”和“小束”构成。

大束：第1块　{6} {7} {8} {9} {10} {11}

第2块　{20} {21}　[简写为W]

第3块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简写为X]

小束：{1?} {2?} {5} {1} {2}

小束：{3} {4} [略为Y]

除此之外，广松版、涩谷版、陶伯特版，适当地排列着标有下列题目的手稿：

Bahne [1] - [2]　[简写为B]

Gegen Bruno Bauer　[简写为G]

Feuerbach, a) -f)　[简写为F]

Das Leibziger Konzil　[简写为L]

Ⅱ. Sankt Bruno　[简写为S]

Bruno Bauer und sein Apologet　[简写为BA]

使用上述的简略标记来记录广松版（马克思、恩格斯1974）、涩谷版（马克思、恩格斯1998）、陶伯特版（Marx/Engels/Weydemeyer2004）的话，则可以看到如下结果。

本论文只限定于与论述有关的手稿，纸张的页码简略地标为a、b、c、d。

广松版：[偶数页] {1} {2} →V [{6} {7} {8} {9} {10} {11}] →W →Y [{3} {4}] →X→B→F

[奇数页]　{1?} {2?} {5}

涩谷版：{1} → {1?} → {2?} → {2} →Y [{3} {4} {5}] →B→V [{6} {7} {8} {9} {10} {11}] →W→X

陶伯特版：G→B→V [{6} {7} {8} {9} {10} {11}] →W→X→F→ {2} → {1?} → {2?} → {1} →Y [{3} {4} {5}] →L→S →BA

本稿从《资本论》形成史的观点出发来探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

辑问题，从我的问题意识出发，重要的是下面两部分在编辑上的定位问题，即关于共同体论的最初的正式论述部分，即“小束”的Y［｛3｝a－d，｛4｝a－b］；以及正式论述本源性剩余原始积累的部分，即大束的3块X［｛84｝｛85｝｛86｝｛87｝｛88｝｛89｝｛90｝｛91｝｛92｝］。之后详细论述的“共同体与近代市民社会的对比论”是在X的开头的｛84｝a处。

按照上面所说的，广松版是按照Y［｛3｝｛4｝］→X［｛84｝｛85｝｛86｝｛87｝｛88｝｛89｝｛90｝｛91｝｛92｝］顺序，即共同体论［｛3｝｛4｝］→共同体与近代市民社会的对比论［｛84｝a］→原始积累［从｛84｝b到｛92｝b］的顺序来编辑的［详细请参照本稿（2）］。根据广松的论述，“小束”中的｛3｝、｛4｝和｛5｝在内容上是不连续的。“小束”中的｛5｝应该是“一般性、序论性的对历史观的叙述”，是连接在｛1?｝｛2?｝之后的。｛5｝是对之后将要论述的相当于｛3｝和｛4｝内容做出的预告文，同时，又是对应“大束”中｛6｝的［11］页之后的内容的。从上述的意义出发，“小束”中的｛5｝用于对应“大束”中的｛6｝的[11]页之后的内容而应该排列在奇数栏（右栏）的｛1?｝｛2?｝的之后，广松版也是按照这一判断对｛5｝进行编排的（马克思、恩格斯1974：27）。岩波文库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是将“小束”的｛1?｝｛2?｝｛5｝进行连续编排，作为“序论的第1草案”[2](pp.20-33)。

负责岩波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小林昌人在该版本的“解说”中就｛5｝abcd的问题谈到：“恩格斯所标页码；d面中留有空白而文章是完结的；内容对应‘大束’中[11]页之后的部分；可以接在｛［1?］｝、｛［2?］｝之后继续阅读。”[2](p.308)“可以接在｛［1?］｝、｛［2?］｝之后继续阅读”指的是｛［1?］｝d中的文：“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由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和｛5｝a开头的文“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和政治关系”（岩波，28）在内容上是连续的。小林在“解说”中还针对涩谷版等不仅视“小束”的｛3｝和｛4｝是连续的，而且将｛3｝和｛4｝与｛5｝视为连续的手稿所进行的编辑写了下面这段话。

“｛5｝作为对后面要论述的关于具体历史的主要内容所做的预告，只停留在对一般的、序论性的历史观的叙述。与此相对，｛3｝｛4｝则显然是对历史的具体论述——即被｛5｝所预告的正文的一部分。进而，｛3｝和｛5｝的恩格斯的页码也不保证是连续的，即不保证是同一系列上的序数。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其他版本也有在各纸张的a面用恩格斯所标的1、5、9……的号码，这不是纸张的页码，而是记载省略b转向d面的页码”[2](pp.310-311)。

还需进一步对下面的事项进行确认。即｛3｝和｛4｝的文章与“所有制，在这里主要在于每一个人的劳动（［以下3字在｛3｝d的末尾］Das Eigentum bestand／｛4｝a/ hier hauptsächlich in der Arbeit jedes einzelnen.）”连续。与此相对，｛4｝b的末尾无论是从行文上还是从内容上都与｛5｝的内容不连续。由此，｛3｝和｛4｝的内容上的连续性、｛3｝｛4｝和｛5｝在内容上的不连续性都切实地证明了广松版在该三个“小束”编辑上的正确性。

正如上面所说的，｛3｝｛4｝和｛5｝无论在文献史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不能断定其连续性。而广松版按照Y［｛3｝｛4｝］→X［｛84｝｛85｝｛86｝｛87｝｛88｝｛89｝｛90｝｛91｝｛92｝］的顺序，即共同体论［｛3｝｛4｝］→共同体与近代市民社会的对比论［｛84｝a］→原始积累［｛84｝至｛92｝b］的编排顺序是十分妥当的，我将在本稿的下面一节中进行详细论述。

另一方面，涩谷版并没有讨论如小林所指出的那样恩格斯固有的页码标记（1→5→9）的可能性是否存在于一眼看来似乎与｛3｝｛4｝连续的｛5｝中这一问题，而只是单纯地依据｛3｝｛4｝和｛5｝这一表面上连续的页码对手稿进行排列。因此导致了3个手稿在内容上的不连续性的结果。不仅如此，而且将［｛5｝→B→V→W］这一庞大的手稿插入《资本论》形成史上作为一体而生成的共同体论［Y｛3｝｛4｝］和对比论、原始积累理论［X］之间。因此，在编辑上使得共同体论与对比论、原始积累理论这一《资本论》形成史上紧密结合的内容完全不能为读者所了解。过去的巴加图利亚版也是如此。完全无批判地追随这种编辑方法的编辑者不是完全无视了共同体论与对比论、原始积累理论的关联，就是无视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资本论》形成史上的决定性意义。这一点上陶伯特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陶伯特版是按照这样的顺序编排的：X［｛84｝｛85｝｛86｝｛87｝｛88｝｛89｝｛90｝｛91｝｛92｝］→F→｛2｝a～d→｛1?｝a～d→｛2?｝→｛1｝a～b→Y［｛3｝｛4｝］，正好与涩谷版相反，在对比论、原始积累理论与共同体论之间插入了庞大的手稿。陶伯特版完全没有涉及《德意志

意识形态》的内容，而是根据陶伯特推定的执笔顺序将手稿机械地排列，这一称为“时系列”的原则是在广松版的强烈冲击以及影响下的产物，广松屡屡地批评旧 MEGA 的阿多拉茨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残存状态的过多干涉”。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中，原本就不存在可以彻底贯彻“时系列”式的文献学主义的文献学的事实。事实上，陶伯特版一眼看去似乎完全贯彻了“时系列”式的文献学主义，但正如在“誊清稿”中关于“认识水准的进展”中所说的（Marx/Engels/Weydemeyer，2004，Text，Einfuehrung，S. 21 *），文献学考察不是仅有文献的事实就能完结的，必须用理论性的考察来加以补充，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并在无意识中发生。这种无意识，是机械的文献主义者共同的问题，笔者曾经提出过这一点[3](p.76)。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共同体论、对比论、原始积累理论

广松版对手稿的编排方式在内容上具有合理性这一点可以通过｛3｝・｛4｝共同体三形态论经过前近代的所有制形态（共同体三形态）与近代的所有制形态的对比论，与近代所有制形态的生成期的本源性的积累的相连接，这在文献上得到了十分明确的证实并由编辑加以确认。上述广松版标记为 Y［｛3｝・｛4｝］→X［｛84｝｛85｝｛86｝｛87｝｛88｝｛89｝｛90｝｛91｝｛92｝］的地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写的是：

（1）各种所有制形态［｛3｝a－d，｛4｝a－b］（岩波，129—137）

（2）前近代的所有制形态与近代的所有制形态的对比［｛84｝a］（岩波，138—140）

（3）本源性的积累（原始积累）［从｛84｝b 到｛92｝b］（岩波，140—212）

对上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三个版本加以比较的话，只有广松版是将（1）（2）（3）作为连续的历史理论在加以编辑的这一点一目了然。而与此相对，无论是涩谷版还是陶伯特版都将（1）各所有制形态、（2）区分指标、（3）原始积累分割开来排列。因此，涩谷版和陶伯特版都割断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理论。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唯物史观（die materialistische Auffassung der Geschichite）”（恩格斯对马克

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做书评时的用词）进行了确认，而涩谷版和陶伯特版都割断了作为出典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历史理论，因此无法对此进行再追述和确认。如涩谷版，只是根据手稿上的页码按其数字顺序进行机械的排列，这种做法无法追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们所写就的唯物史观。无论是涩谷版还是陶伯特版，是不是过于轻视了通过能对唯物史观进行再确认的方法来排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这一编辑上的核心问题？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德意志意识形态》所确立的历史理论内容的基本结构。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共同体论｛3｝｛4｝的一开头说“他们中的每一个区分都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这是由农业、工业、商业的经营方式（父系家长制、奴隶制、身份、阶级）所决定的”[4](p.130)。这段文字之后，首先，作为“所有制的第一形态”提出了“部族所有制”，指出那是在“父系家长的族长制”的条件下所构成的。接着，作为“所有制的第二形态”提出了“古代的共同体（Gemeinde）所有制以及国家所有制”，得出了“奴隶制”在征服中得以确立的结论。进而，作为“第三所有制形态”提出了“封建以至身份的所有制”[4](pp.131-136)。

关于这一点，在原始积累的最后部分说到：“因此，与上述所说的形态的数量相同，劳动组织的形态有着所有制的多形态”[4](p.166)，这里所写的是与共同体论的开头部分相呼应而做的结语。共同体论的开头部分写道：“分工的各种（形态）发展阶段的数量相同，因此有着所有制的各种形态”[4](p.130)。

手稿｛84｝a的“前近代的所有制形态与近代市民社会的对比论是由下列一系列的对比构成的，即［（a）：（a′）～（f）：（f′）］”。

（a）局部性、个人与生产工具的并存：（a′）经过陶冶的分工与扩大的商业、个人的集合。

（b）个人的家庭、部族、与大地的纽带、劳动力与大地、土地的自然统一：（b′）自立的以个人的交换为媒介的结合（商品＝货币关系）。

（c）使用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个人对自然的臣服：（c′）对文明所创造的生产工具的个人的臣服。

（d）人与自然的交换、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自然统一：（d′）人类相互的交换、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

（e）由土地所有制而自然产生的统治：（e′）作为积累劳动的资本的统治。

（f）由人的关系所产生的统治：（f′）货币的统治。

这一系列的对比显示了“近代私有财产的生成”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支配的近代市民社会的历史起源”，即表明了试图分析原始积累的问题意识。这一对比论是从《经济学哲学（1）手稿》前段“人的所有制”向“物象的、物质的富裕”世界做历史性转变的历史观发展中而来的。正如上面（e）·（e′）和（f）·（f′）所表明的那样，传统共同体是由以人的关系、身份关系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来实施对劳动力的统治的，而近代市民社会是以货币关系为基础的“生产手段所有制”来实施对劳动力的统治的，两者是不同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统治劳动力的手段是“从土地向生产手段”的转变，《德意志意识形态》也坚定地坚持了这一立场。

确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历史过程＝原始积累过程，包括直到产业革命的认识第一次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始积累理论的形式被显示了出来。因为正是机器制造大工业为基础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阶段的生产方式的确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有了再生产可能的生产方式的独立。通过这一过程，赚取工资的劳动者成为作为一个市民的自由主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要素是被商品化（物件化＝物象化）了的土地（土地的价格就是使用费）、劳动力（劳动力的价格就是工资）、技术（技术的价格就是专利使用费）、资金（其价格就是利息）。关于“原始积累要素”及其调控这些要素的“国家原始积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做下面几点论述：

（1）土地原始积累：农田改良（岩波，153）、牧羊圈地运动（同前）、殖民（土地的“追加原始积累”）（望月，1982）（岩波，155）。

（2）劳动力原始积累：牧羊圈地运动（岩波，153）、流血立法（同前）、农民向手工业生产的逃亡（岩波，152）。

（3）技术原始积累：自然科学（岩波，163）、大工业（同前）、自动机械装置（岩波，164）、自然力的应用（岩波，169）。

（4）资金原始积累：商人资金（岩波，150）、新大陆的金银［资金的“追加原始积累”（望月，1982）］（岩波，154）。

（5）国家原始积累：国库（Fiskus）（岩波，157—158）、关税（岩波，157）、金银的出口禁止（岩波，157）、航海条例（岩波，159）、殖民地独占（同前）、发展产业（同前）、货币制度（岩波，1962）。

依靠原始积累的近代土地所有制的（广义的）农业部门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它是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条件，即

劳动力、粮食、（包括原油、天然气在内的）工业原料、（包括生产技术的开发、导入资金在内的）产业资金、（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控制技术在内的）基础建设资金、对官僚和士兵的供给等。《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于国家的原始积累做了引人注目的论述。“关照近代私有制度的是国家”。即，其结果是，从传统共同体中解放出来的近几年的法国和英国，私有制与市民社会并存于市民社会的外部。与此相对，像德国那样的国家，还没有从传统的共同体中解放出来，身份制度和阶级制度处于混合的状态，正是前者开始弱化而后者开始强化的时期（岩波，203）。因此，“国家的自立性”还继续存在。在这样的状况下，身份制度还扮演着特定的角色。德国必须在陈旧的（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东西（资本主义的工业），因此出现了复古与革新的新旧两种要素既混合又对抗的浪漫主义。

从《资本论》形成史这一视点出发，《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出自于土地的所有制形态的共同体论（部族所有制、古代的共同体所有制以及国家所有制、封建性所有制乃至身份所有制）》→《对比论》→《从生产工具的所有制形态所见到的原始积累理论》这一顺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共同体论（亚洲式的、罗马式的、日耳曼式的共同体）→原始积累理论”中得以再现。从更宽的视野上来看，再生产论（《经济学哲学手稿》）→“共同体论→对比论→原始积累理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顺序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所统一起来的“再生产论→共同体论→原始积累理论”顺序的再现。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再生产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共同体论、对比论、原始积累理论的继承关系呈现如下状况：

（1）共同体论：亚洲式的共同体、罗马式的共同体、日耳曼式的共同体→

（2）对比论：单纯的交换→前布尔乔亚的关系的解体→自由劳动者与货币的交换→赚取工资的劳动（自由的工资劳动者与资本家的交换）的前提［劳动力与生产手段（生产工具与土地）的分离］→小规模的自由的土地所有制与东方式共同体（commune）的解体（大地 Erde 向土地 Grund 的转化、土地与劳动力的分离）→所有制是什么（人对自然的关系 zur Natur 与人的对他关系 zueinander 与意识关系行为 Verhalten）→［本源的共同体的解体→亚洲式的共同体→罗马式的形态→日耳曼式的形态］→

（3）原始积累理论：从“历史的状态 NO. 1”与“历史的状态 NO.

2”向“第三种东西”（转变的形态）→自由的劳动的交换→自由的赚取工资的劳动的交换＝手工业生产→机器制造大工业[15](pp.451-510)。

三、广松涉毕业论文中的真伪论的物象化论的意义

对于广松涉来说，《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仅是文献学编辑的研究对象，它也是广松固有的物象化论的来源。广松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物象化论奠定了基础。即，在下面的｛8｝c＝［18］文中马克思发生了从《经济学哲学手稿》实在论的观点向物象化论的方法论转换以及向克服近代的世界观的转换。

“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Sichfestsetzen），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4](p.69)。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这一转换，一直贯穿到《资本论》，广松涉在他的《资本论》的哲学以及《物象化论的构图》[5]中屡屡强调这一点。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直到这里可以说我完全没有提及的广松涉的物象化论是如何在他的毕业论文“关于认识论的主观的考论”（广松1997）中被确立下来的。广松的毕业论文是从“真伪问题”来立意的。他从真理应该被赋予什么样的根据这一权利赋予问题开始入手。他提出这一权利的赋予在于分析康德以及新康德派是如何发展“认识论的主观”、分析“认识论的主观”的独特的结构。广松认为，所有制的主张，正由于主张成其为主张才有了真理的存在，同时，只有在强调主张为真之处的“假定”中才有真理的存在。这样一来权利问题被替换成了事实问题。这一替换不就是混淆以及偷换问题吗？[6](p.503)。广松本身就是这样写的，但是，如康德的“规定的判断力”和“反思的判断力是相互前提＝相互规定”那样，从行为事实的循环往复生成权利赋予的根据，广松不是没有加以考察吗。第二次不是第一次单纯地在同一层面上的循环，而是以第一次为前提与之进行相互对照＝综合。进而，正如三木清所论述的那样，“也只有生活与经历中包含了思维的形式、原理以及范畴中显现的整体关联，只有这一整体关联在生活与经验的分析中获得显现，现实的认识才是存在的”。广松认为这一“假定”得以成立的条件是：（1）在完全真实的情况下；（2）在与

客观一致、依从于规范与习惯的情况下。(2) 的“规范与习惯”来自于经验的反复。(1) 即便“与客观一致”，在反思的判断力的作用下规范和习惯从经验中抽象出来，与作为以此为基准的主观与认识对象的客观的一致是否是可能的呢?

结果，广松涉所考虑的是：“Sachverhalt（引用者注：关系行为 verhalten 所带来的事态 Sache）其本身必须具有真伪的价值对立。在真作为真、伪作为伪处，真（乃至正确）的判断，反之伪（乃至不正确）的判断得以成立。”[6](p.91) 广松得出的结论是，真伪问题不是在客观这一侧，而是从“认识论的主观”这一侧才能发现价值对立性。实际上，三木在海德堡留学时（1922—1923）从李凯尔特（Heinrich John Rickert）那里借来了波尔察诺（Bolzano）的《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研究真伪问题，他得出了下面这个结论：结果，作为一种反价值，“对真理本身不正确的接受”以及“对虚伪的正确接受”这一具有真和伪双重性的矛盾，只能将舍弃的判断主体作为前提。并且，三木认为，只要真理自身、虚伪自身这一逻辑的可能性具有普遍性，那么只有转而移向追究造出虚伪这一事实根据的人的行为这一层面。进而，他在“事实问题”的背后，追溯造出该事实的“行为”，将决定该行为所包含的“目的”的“构想力”以及赋予该“构想力”的自由使用权利的“价值”作为问题来加以探讨。三木清在留学期间论述了“真伪问题”，归国后开始研究马克思，参考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等，开始论述“物象化”。三木清从研究“真伪问题”到“物象化”的历程，正如本稿中的第四部分中所论述的那样，他研究的实际上原本是马克思关于人的问题，三木清之后又出现了广松涉。

广松在他的毕业论文中虽然没有提到三木清的名字，但是他参照了三木的论文“波尔察诺的命题自身”，这一点从广松波尔察诺的命题自身 = 真伪问题进行批判性的探讨上也能够清楚地看到[6](p.91)。正如村田纯一在对广松毕业论文的“解说”中所指出的，就像广松本人在《哲学家广松涉的告白式回忆录》中所回顾的那样，那是在广松的毕业论文，尤其是由其中的序、第1章、第2章中所建立的初型。按照毕业论文中就真伪问题所做的“认识论的主观”的分析，广松认为“认识论式的研究”与“马克思关系的研究”、“认识论的场面不是马克思的”[7](p.184)，“在研究认识论的时候，几乎与马克思没有关系”。尽管如此，广松的毕业论文奠定了马克思 = 广松物象化论的基础。

毕业论文中所探讨的“认识论的主观”发展成了“世界共同主观的存在构造”。那是我下面所说的那样的认识构造论。即，认识主体的（1）“我”不是“单纯个体的我”，是与他者的“个体的我”相关联的（2）“我—我”。与“我”的“我—我”的存在方式对应。认识对象（3）也不是“单纯物”，是对于“我—我”而言（4）作为“带有意义的物”出现的。“世界的共同主观的存在构造”就是这样构成“四肢的结构”。在深底统一“四肢的结构”的力量难道不是康德的创造力吗。“世界的共同主观的存在构造”的“四肢的结构”不是历史贯通的同质性的现象，而是由个人的关系的历史形态的差异所呈现出来的异相。广松在《资本论的哲学》中，通过考察近代市民社会的商品世界，将四肢的存在结构的近代现象作为通向近代人际关系的“货币”的物象化来加以把握。广松毕业论文中对“认识的主观”的研究孕育了他向《德意志意识形态》物象化论发展的可能性。以“真伪论”为主题的毕业论文是“物象化论”的胚胎。“真伪问题与物象化论”，这一问题也是柏林时代的马克思在准备博士论文时期的课题。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四、马克思的《论灵魂》评注中的物象化论

在柏林时代的1840年，马克思从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中读到了从一切中分离、分割的近代原理（chōrismos）。他用德语翻译了一部分下面的文章，在〔 〕内写下了自己的观点[13](p.38)。

“一般来说，正如行为事实是可以分离的那样（chōrista ta pragmata），正如行为事实（Sache）从质料（Materie）即自性地且对自性地分离并实际存在那样〔即，正如事物（Ding）从质料中分离存在那样，即正如由抽象进行分离是可能的那样〕，理性（nous）也是可以分离的。”[8](p.163)

行为事实（Sache）是可以从行为者那里分离的，所以从行为者那里“作为行为本身（Sache selbst）”可以自立并物象化。对亚里士多德的“理性的分离可能性”，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说是从行为事实的行为者中的分离，即是作为自立可能性来把握的。马克思理解的该可能性，是人的理性的抽象作用（形相）将他们的关系从他们本身（质料）分离并使之物象化的可能性。这一观点在之后被继承了下来，我们可以从马克思转向《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社会的关系的“物象的力”时的问题意识，以及《德意志意

识形态》的物件化=物象化论中看到。只有分离而没有结合的世界会解体，所以分离的东西必须结合。分离的东西要结合，结合的主体既是个人也是社会，而结合的方式是怎样的呢，结合是向虚伪（pseudos）转化。马克思在《论灵魂》的笔记中作了下列注释。

“亚里士多德强调了结合（Synthese）中有着虚伪的根据，这在任何一点上都是正确的。一般而言，表象并反省的思维是存在与思维的结合，一般的东西与个别的东西的结合，假象与本质的结合。这里，可以进一步地说，所有错误的思维和错误的表象、意识等也是从相互不适合的各自的外部的规定的结合中诞生的，客观的规定与主观的规定则是从内部的没有结合的关联中诞生的。”[8](p.164)

上述的三木清所分析的“真伪问题”的两个矛盾，即“（a）真理本身的（b）不正确的接受”以及“（a）虚伪本身的（b）正确的接受”是不适合的结合的例子。即（a）与（b）的结合，前者陷入了“正确与不正确”的矛盾，后者陷入了“不正确与正确”的矛盾。两者都是不合适的结合，是虚伪。三木清提出要导入否认双方矛盾的价值判断主体。广松也在毕业论文中指出“真伪在认识论主观的一侧价值对立性得以规整”。

马克思所研究的陷入虚伪的结合，不是单纯的逻辑性的结合，而是社会性的结合样式。从这一观点出发，马克思将问题确立在了客观的契机与主观契机的结合上。人在客观性“存在”中关照“意义”。这一关照的方式即便非常有用并作为个人的行为被意识，但它是用他人的关照方式的基础上的社会的文脉进行关照的行为。即便在如制作东西的“制作”的场合、在如物物交换的“实践”的场合，人，用自己与他者的关系构想实现的目的并试图达到实现的目的。此时，处在共同体集团中内部的人是如何通过媒介（例如：神）来结合的，或者自立=分离的个人是如何通过媒介（例如：货币）来进行社会性结合的这一条件中，构想力（imagination，Einbildungskraft.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phantasia）的活动方式被规定了下来。马克思在对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的研究中（1840）以这一事实为前提，对人的行为事实（Sache）的分离=结合的可能性，以及错误的结合造成的行为事实的自立的事态，即物象化（Versachlichung）进行了研究。三木清也在论文“波尔察诺的《命题自身》（1923）”中指出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的文本中“判断的真与伪，通过其要素的结合（synthesis）显示的是谈论关于逻辑性对象构造的决定性思想的东西”[9](p.281)。

马克思在1843年来到巴黎，仔细地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看到那里面的体系性的原理——分工论是由近代私有固有的「分离=结合（division and connection）」原理所构成；该原理具有货币发生的内在必然性；货币是黑格尔哲学中的实体，是主体（=基督教的神）。他确认了，在这一意义上宗教批判应该贯穿到经济批判。《经济学哲学手稿》=《詹姆斯·穆勒老记》中的货币论以及黑格尔哲学批判记录着马克思的这一问题意识。

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广松涉认为马克思的物象化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突然出现的。因而，在经济学批判正式开始的1843年的秋天以后与在此之前，在人的生活生产的现实的认识素材上有着重要的不同，因为对于马克思而言，真伪问题的近代形态才是问题。他敏锐地观察到其根据存在于经济关系，于是集中于经济学研究=批判，论证了真伪问题讲述的是货币这一被物象化的形态。因此，马克思柏林时代的哲学批判中的近代批判与巴黎时代以后的经济学批判中的近代批判的区别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以柏林时代的哲学批判的形态所探讨的真伪问题这一主题才是引导巴黎时代以后的经济学批判的动因。这一动因才是决定性的，十分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马克思物象化论的问题意识可以追溯到《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论题是近5年乃至6年前在柏林时代开始的。而广松涉的物象化论可以追溯到1958年提交的毕业论文中的真伪问题。

参考文献：

[1] 广松涉，增补马克思主义的成立过程［M］，东京：至诚堂，1984

[2] 广松涉编译，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M］，小林昌人补译，东京：岩波书店，2002

[3] 内田弘，双重不变的资本问题的理论射程［J］，专修经济学论集，1986（21）

[4] 广松涉编译，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M］，东京：河出出版社，1974

[5] 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M］，东京：岩波书店，1983

[6] 广松涉，“毕业论文关于认识论的主观的论考”、“广松涉毕业论文的解说”［J］，广松著作集，第16卷［M］，东京：岩波书店，1997

[7] 广松涉，哲学家广松涉的告白式回忆录［M］，东京：河出书房新社，2006

[8] Marx/Engels/Weydemeyer, Die Deutsche Ideologie, Text und Apparat［M］, Marx / Engels Jahrbuch 2003, Berlin: Akademie Verlag GmbH, 2004

[9] 内田弘，三木清——个性者的构想力［M］，东京：御茶水书房，2004

[10] 涩谷正编译，手稿完全复原版德意志意识形态［M］，东京：新日本出版社，1998

[11] 三木清，知识哲学［M］，东京：小山书店，1982

[12] 望月清司，本原性原始积累理论的视野与视轴——读《资本论》原始积累章［J］，思想，1982（695）

[13] Uchida Hiroshi, Marx´s Grundrisse and Hegel´s Logic［M］, Routledge, 1988

[14] 内田弘，《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原始积累理论、物象化论［J］，情况，2003（4）

[1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单位：日本专修大学经济学部）

（赵仲明　译）

从文献考证与文本解读统一的视角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中的主导作用

——析广松涉“恩格斯主导论”的文献学依据

姚顺良

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广松涉在进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版本考证过程中，作为副产品提出了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史上的地位问题。他认为，与通常人们形成的观念不同，不是马克思，而是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一文中，他为此提出了一系列论据，其中文献学方面的依据首先和主要来自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费尔巴哈”章写作过程的考证。[1](pp. 358-375)

我认为，广松涉确实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他的文章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少重要启示；但对其基本观点却不敢苟同。这是因为，在我看来，他的文献学考证存在着根本缺陷。

一

首先，广松涉的论据仅仅是建立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已有不同版本的考证和主观猜测的基础上的。且不说涩谷正已经通过对原稿的直接调查，否定了恩格斯与马克思在“生产力”这一德文术语缀词法上的不同[1](p. 378)，即使作为广松论据的主要之点，即《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特别是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的所谓“基底稿”的笔迹是恩格斯的，这一公认的确凿事实，也是可以作出不同解释的。广松涉猜测的主观性，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对手稿｛10｝c =（25）页恩格斯与马克思笔迹交替出现这一事实的解释上。他武断地说：“这一点不能成为主张第一

部分从开头起就是两人直接合作的证据。”张一兵已指出了广松涉在这一点上“显然是毫无道理的推断”。[1](p. 15)

在文献学考证方面我只想补充强调两点：一是手稿上马克思、恩格斯不同笔迹的文字和符号确凿无误地表明，尽管马克思直接动笔较少，但他对文章的内容、结构乃至于表述方式都具有不容怀疑的最终决定权；二是“基底稿”最后马克思所写下的供进一步修改手稿用的“纲目”（新MEGA2称为“笔记”，广松称为“备忘录”），以及最后写下的“序言”〔这两者均是马克思的笔迹〕，也都确凿无误地表明，马克思是手稿的写作过程的主导者和最后的定稿者。

二

更为重要的是，单纯文献学技术考证的意义是极为有限的，只有将文献学考证与文本学解读结合起来，从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费尔巴哈”时已有的明确署名文本或有把握确定作者的文本出发，将其同“基底稿”联系起来进行“互文式”的比较解读，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各自达到的思想境界，从而准确判断“基底稿”思想的原始提出者。

从这一观点出发，并利用新MEGA2的考证成果，本文拟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进行三个方面的“互文式”解读：“第一卷”内部三章之间的比较解读、“第一卷”与“第二卷”之间的比较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恩格斯其他相关文本之间的比较解读。这种比较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

一、对施蒂纳的评价。主要是恩格斯1844年11月19日和1845年1月2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论及施蒂纳的两封信与第一卷第三章比较。

恩格斯在前一封信中对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持基本肯定的态度。他说：“当施蒂纳摒弃了费尔巴哈的‘人’，摒弃了起码是《基督教的本质》里的‘人’时，他就是对的。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申出来的，费尔巴哈从上帝进到‘人’，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轮。达到‘人’的真正道路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像施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这里上升到‘人’。只要‘人’的基础不是经验的人，那么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认为尽管他的利己主义

原则具有“片面性”，“可是，这种原则里的正确东西，我们也必须吸收。”我们应当“**把它翻转过来之后**，在它上面继续进行建设。”[2](pp. 11-14)而在接到马克思回信后的第二封信中，恩格斯则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说到施蒂纳的书，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以前给你写信的时候，还受到对该书直接印象的很大影响，而在我把它放在一边，能多多地思考以后，我也发现了你所发现的问题。赫斯（他还在这里，两星期前我在波恩同他交谈过一次）动摇一阵之后，也同你的结论一致了。”[2](p. 16)

由于马克思的回信没有留传下来，我们无法确切地了解他在其中的具体观点。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三章现存手稿对施蒂纳的评价，恰好与恩格斯原有的观点相反。这一章认为，“‘施蒂纳’无条件地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幻想，并以此为根据继续创立自己的理论。”[3](p. 260)“从费尔巴哈那里来的上帝的宾词，成了统治着人们的现实力量，成了主教，这样的宾词就是‘施蒂纳’所发现的用来代替经验世界的怪物。他的‘独自性’竟如此地建立在‘启发’给他的东西之上。如果‘施蒂纳’……责备费尔巴哈，说他所得到的结果是无，因为他把宾词变为主词或主词变为宾词，那么施蒂纳就更不能得到什么结果了，因为他把费尔巴哈的这些变为主词的宾词神圣地奉为统治着世界的现实的个人，他把这些有关各种关系的词句恭顺地看作是现实的关系，并给它们加上‘神圣的’这个宾词，**又把这个宾词变为主词**，变为‘**圣物**’，这就是说，他所做的同他责备费尔巴哈所做的完全相同。在他用这种方法完全摆脱了这里所谈的那种确定的内容之后，他便开始了他的斗争，即放肆地‘仇视’这一‘**圣物**’，当然，这一‘**圣物**’永远是依然如故。在费尔巴哈那里还有这样的意识（因此他受到圣麦克斯的责难），即‘在他那里只谈到‘消灭某种幻想’’……虽然费尔巴哈过分强调了反对这种幻想的斗争的意义。而在‘施蒂纳’那里，连这种意识也‘全部完了’，他真正相信意识形态的各种抽象思想统治着现代世界，他深信他在其反对‘宾词’、反对‘概念’的斗争中攻击的已不是幻想，而是统治世界的现实力量。”[3](pp. 262-263)这就是说，施蒂纳不仅没有超越费尔巴哈，甚至比费尔巴哈倒退了。

上述文本的比较解读表明，第三章批判施蒂纳的手稿体现的正是马克思在他的回信中提出、后来又进一步发挥和成熟了的思想。联系到陶伯特从写作风格角度作出的文献学考证，即“手稿恐怕主要出自马克思之手，其篇幅在写作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长。此外，马克思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根据

施蒂纳著作的结构写作的。”[4](p. 51)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尽管这一部分的手稿笔迹是恩格斯的，但其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由此引伸出的进一步结论就是，原先构成第三章一部分、后来转入第一章的“大束手稿”第二、三部分的真正作者是马克思。

二、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评价。这集中表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与第二卷对赫斯的评价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通过对两卷文本的阅读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从最初大概拟题为《莱比锡宗教会议》的“基底稿”（除了后来构成第一卷三章的内容外，还包括后来抽掉的赫斯所写的批判“格拉齐安诺博士”即卢格的部分），到后来的整个第一卷的三章中，尽管多处提到赫斯，但总的态度是肯定（两处）和中性（多处），只有一处有所保留，即声明“‘莫·赫斯’（对于他的著述，恩格斯和马克思完全不负任何责任）”。[3](p. 113)但是，第二卷从一开始的导论性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到第一章（“莱茵年鉴”）和第四章（“评格律恩”），即除了赫斯本人写的第五章（“霍尔曼”）之外的整个第二卷，却把赫斯及其著作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总代表进行直接（点名）或间接（不点名）的批判。

上述文本学的比较解读，得到了文献学考证的印证，这就是陶伯特文章提供的有关1846年2月底马克思同赫斯、恩格斯发生分歧与冲突的资料。据陶伯特文章说：“马克思在1846年2月底肯定写过一封信（此信没有留传下来），其中谈到一些明显的分歧，并怀疑赫斯和恩格斯是否有从事严肃的科学工作的能力。在一封同样没有留传下来的写给燕妮·马克思的信（此信写于1846年3月23日的前两天或前三天，1846年3月23日寄到特利尔）中，马克思又一次谈到这些冲突，谈到他同赫斯在哲学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由于这些冲突和意见分歧，燕妮称赫斯为‘纯粹的玄想家’，并谈到导致赫斯动身离去的‘彻底决裂’。赫斯至早是在1846年3月22日、至迟是在3月29日动身离去的。1846年3月30日，马克思同魏特林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引起了轰动。)”[4](pp. 53-54)“不早不晚，也是在那个时候，即1846年2月底至3月底，第2卷的计划也拟订好了，该卷分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诗歌、历史编纂学和预言等内容。”“魏德迈1846年4月中旬离开布鲁塞尔。那时已经确定出版两卷著作，其中第二卷的内容是评论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4](p. 56)

陶伯特的考证与我对文本的比较解读结果之间只存在一个差异：那就

是陶伯特认为两卷的写作计划是在批判施蒂纳的“旧约”和“新约”之间[4](p. 56)；而“新约”[3](pp. 266-521)和“2、辩护性的评注”[3](pp. 522-530)的文本表明，其中对赫斯的态度并没有变化①。因而我**甚至推测**第二卷的计划**也有可能**是在整个批判施蒂纳的手稿，即不仅包括“旧约”，而且包括“新约”甚至“2、辩护性的评注”完成以后才制定的。这样一来，“三、圣麦克斯”就应完成于1846年03月22—29日即马克思同赫斯冲突之前，而如此篇幅庞大的手稿就不大可能像陶伯特所推测的“是在1846年1月初开始写的”[4](p. 51)，而很有可能是在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出版后、《维干德季刊》发表鲍威尔和施蒂纳文章前，就作为独立的著作开始写了。这里有两个文献学证据：其一是“1846年3月24日，燕妮询问批判施蒂纳的著作写得怎么样了，进展如何。她没有提及其他手稿。”[4](p. 55)其二是马克思1844年12月《致亨利希·伯恩施太因》也表明他在那时就曾经有一个要出版批判施蒂纳的书的打算。[2](p. 455)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因为它同陶伯特关于文中标注的考证、特别是同“新约”“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一节正文中出现的“这就实现了我们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个虔诚的愿望”的证据[3](p. 434)相矛盾。但是，从这一点来看，起码迪特·戴希塞尔关于第2卷第4章“格律恩”可能写于《圣麦克斯》之前的推断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一章开始不久就点名批判赫斯。[4](pp. 62-63)

联系到“1846年3月7日，丹尼尔斯在信中谈到马克思关于重新出版所谓的《德法年鉴》……以便‘审查’共产主义的哲学的计划”[4](p. 54)，以及马克思一贯的写作风格，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断定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的第一章为马克思所写，更不用说后来明确署名马克思而公开发表的第四章了。至此，《德意志意识形态》两卷本的结构和第二卷的思想属于马克思，这一结论可以说已得到基本确认了。唯一需要消除的疑问就是：赫斯是第二卷第五章的作者，如何解释“赫斯既是批判者又是被批判的对象”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或者说，赫斯为什么愿意处于此种尴尬境地？

其实，问题的答案就在第二卷导论部分“真正的社会主义”之中。那里说：“由于德国现在事实上存在着的各种关系，所以不可避免地形成了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3、294、387、391、486、524页。

这个中间派别，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想把共产主义和流行观念调和起来的企图。同时，以下的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许多曾以哲学为出发点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正是通过这样的转变过程走向了并且继续走向共产主义，而其他那些不能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的人，将终生宣传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因此，我们不可能知道，‘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中那些不久前写了我们在下面所批判的文章的人，究竟是停留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观点上，还是已经前进了。我们一般并不反对个别人，我们只是把刊印出来的文件看作是在德国这样一个泥潭里必定会产生的那个流派的表现。”[3](p. 537)这就是说，对以赫斯为总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批判。马克思自觉地通过批判和自我批判“已经前进了”，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影响下“正在前进着”，只有赫斯（尽管主观上想前进）最终没能“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实际上“停留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观点上”。

三、对费尔巴哈的评价。主要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的“费尔巴哈”札记与“基底稿”特别是“大束手稿”第一部分的比较。

由于“大束手稿”的二、三两部分已在前面讨论过了，这里只就第一部分进行比较。据陶伯特的考证，“这篇手稿是对鲍威尔进行批判的那篇文章的草稿，它没有完整地留传下来。此文批判的是发表在《维干德季刊》第3卷上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文。从留传下来的几张手稿看，对鲍威尔的批判是按照鲍威尔文章的结构展开的。留传下来的第6—11张的内容是针对鲍威尔文章中‘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这一部分而写的（鲍威尔在这一部分批判了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一书），其内容主要是讨论费尔巴哈的‘感性’范畴。”[4](pp. 57-58)与之相关的、有明确归属的文本是恩格斯的“费尔巴哈”的札记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恩格斯“费尔巴哈”札记的写作时间，MEGA1编者曾推断为1845年秋，俄文第二版编者也曾推断为1845年11月，广松则推断为恩格斯1846年逗留巴黎期间，应马克思之约作为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的素材而写的[1](p. 162)。从这一文本的内容，特别是所反映的恩格斯当时的认识水平来看，广松的推断是正确的。因为，一方面，其中的第3点（马克思改为“e”）关于“存在”与“本质”、“鱼”与“水”的论述，几乎完全再现于“大束手稿”第一部分的最后和巴纳1962年新发现的

"半张稿纸"中。但另一方面，整个札记对费尔巴哈的评价是全盘否定，这显然与第三章既批判费尔巴哈又承认其历史贡献的基调不相一致：后者强调"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世俗世界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不过是些**词句**），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这一道路已在'德法年鉴'中，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文章中指出了。"[3](pp. 261)。而我们知道，"大束手稿"的二、三部分原来正是属于第三章的。特别是札记中的最后一点即第6点（马克思改为"b"），更是全盘否定了费尔巴哈关于没有抽象的"自我"，个人总是男人和女人，并由此进一步引出人的类本质这一观点，不仅认为"如果费尔巴哈指的主要不是性行为、种的延续的行为、自我和你的共同性"，"人就是自我和你的统一""这句话是根本不能成立的"，甚至说"正是因为人＝头＋心，为了创造人而需要两个人，——在他们的交往中一个作为**头**，另一个作为**心**——**男人**和**女人**。否则就不可想象，为什么**两个**人比一个人更人性一些。"[1](p. 162)恩格斯的这一观点是直接与"大束手稿"第一部分｛7｝a＝（12）页关于"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的论述相对立的：那里恰恰强调这种关系是从"两性关系"、"家庭关系"发展到"社会关系"的。[1](p. 24)

上述情况表明，恩格斯的札记应写于1846年2至3月马克思同赫斯与他的争论之后，处于前面指出过的"正在前进着"的过程中，他直到此时的观点仍然与"基底稿"中以他的笔迹出现的思想有距离。至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些观点，甚至以几乎相同的语言再现于"基底稿"各部分之中，已没有必要举例了。

三

在明确了上述三个问题上恩格斯的观点发生过根本性的转变以后，我还试图进一步说明恩格斯的这些转变是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发生的。这只要从《神圣家族》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在上述三个问题上恩格斯观点转变的"断裂性"和马克思观点演变的"中介性"比较中就可以清楚地

看出。这里主要涉及马克思《评李斯特》、《笔记本中的札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恩格斯的《爱北斐特的演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有关书信、其他文章等文本的比较解读。在施蒂纳问题上的恩格斯的观点是直接在马克思影响下转变的，前面已经说明。这里只简略地就后两个问题作一些比较。

在对待赫斯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其他代表的态度上，恩格斯的转变有着明显的"断裂性"。恩格斯从1843年11月初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第二部分中，认定德国的"共产主义是新黑格尔派哲学的必然产物"、赫斯"是该党第一个成为共产主义者的"[5](p. 591)之后，一直"停留"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写完《神圣家族》中他所分担的部分返回德国以后，他一直和赫斯等人一起在巴门和爱北斐特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这在他的《大陆社会主义》、《爱北斐特的演说》（两次）和许多书信中都有反映。如，1844年9月20日写道："在爱北斐特，大约有我的六个朋友以及其他几个人都是共产主义者。"[6](p. 218) 1844年11月9日又写了《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发展》一文。1845年3月17日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说："昨天晚上我和赫斯在爱北斐特宣传共产主义直到深夜两点。"[2](p. 31)直到1845年10月中恩格斯还为德国"共产主义杂志《莱茵年鉴》"和在瑞士的"德国共产主义作家奥·贝克尔先生，以及属于同一党派的西·施米特先生和库尔曼博士"呼吁[6](pp. 299)，而这些人正是后来《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批判对象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

恩格斯在"书信"中对赫斯态度的改变，根据我所掌握的极不完备的资料，首见于1846年7月17日和8月19日《致马克思》的两封信。[2](pp. 35-36)最为明确的是1846年9月16日《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恩格斯在这封信中写道："赫斯老爷子。……可是前不久我却收到这位共产主义老爷子叫一个名叫莱茵哈特的人转来的信，想要重新和好。看了这封信，叫人笑得要死。当然，他是装着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完全显得平静而快乐，而且仍然是过去的那个老赫斯。他肯定他同'党'重新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谅解（犹太帮显然已经破产），说他'重新产生了工作的愿望'（这样的大事真应当敲起钟来宣传宣传）……我自然完全不理睬这个笨蛋……"[2](pp. 49-50)并将赫斯的思想和著作称为"赫斯的一切胡说八道"[2](p. 51)。恩格斯公开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第一篇

文章是《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第二篇是《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分别载于1846年夏天出版的《德国公民手册》年鉴（1846年卷）和1846年年底出版的《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2卷），俄文第二版编者分别推断为“写于1845年底”（后改为“1845年下半年”）和“写于1845年年底”，我认为是错误的，这两篇文章都只能写于1846年2—3月马克思同赫斯决裂以后。① 这里有一个佐证，就是恩格斯以《德国状况》为总标题、用书信形式连载于伦敦《北极星报》的一组文章的突然中断。恩格斯在前两封信中叙述了从“神圣罗马帝国”开始，直到1815年拿破仑垮台得以“光荣复兴”的德国历史和社会状况的演变，从“第三封信”开始，转入研究“‘革命’是怎样进入德国的”。“第三封信”写于1846年2月20日，载于1846年4月4日该报第438号，其中叙述了从1815年到1840年间德国资产阶级运动的状况，并在结尾处预告“将在下一封信里谈谈近六年来运动的情况”。但是，恩格斯应允的最后一封信未见于该报以下各号，而是突然中断了。[7](pp. 646-653) 由于原定要写的“第四封信”的内容正是“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联系到下面我要说到的马克思1846年1月的《声明》和前面已经说过的1846年2—3月马克思同赫斯和他的冲突，其原因就不言而喻了。

同样，在对待费尔巴哈的态度上，恩格斯在1846年2—3月前后也出现了“断裂”。直到1845年2月2日，恩格斯还在以《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为总标题的第二篇文章中写道：“但是从我上次给你去信以来，我所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费尔巴哈博士宣布他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并欢呼：“这样，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是他们的最杰出的代表）和德国工人（以魏特林为代表）的联盟，即马克思博士一年前所预言的联盟，就快要实现了。如果我们有哲学家和我们一起思考，有工人和我们一起为我们的事业奋斗，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力量能阻挡我们前进呢？”[7](pp. 594-595) 但是，在前引的《费尔巴哈》札记中，他已经对费尔巴哈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了。

在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的书信和著作中，找不到任何预示后来观点转变的蛛丝马迹，相反我们可以在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到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61、67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59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看到观点演变的明显轨迹。在《神圣家族》和1844年8月11日《致路·费尔巴哈》的信中最后表现了“费尔巴哈崇拜”之后，通过进一步研究政治经济学、现代国家问题和英法社会主义文献，马克思开始怀疑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的真理性，特别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更促使他重新审视费尔巴哈哲学以及从鲍威尔到施蒂纳的整个黑格尔哲学余脉。我作出上述推测的文本依据是这一时期留传下来的马克思的两部笔记（“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两个计划（“现代国家”和“社会主义者文丛”）、两份札记（“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和“笔记本中的札记”）。重新审视哲学的成果，就是从《评李斯特》开始，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完成的颠覆旧“哲学范式”的根本思想革命。

陶伯特等人依据“在写有《提纲》的笔记本中，在《提纲》第一条前面有四行文字（即《笔记本中的札记》——引者），将《提纲》的写作时间推延至1845年7月以后”[8](p. 70)，我认为是有道理的；但因此而指认马克思的《提纲》“只是《神圣家族》中唯物主义思想的延续”，就失于片面和武断了。诚然，这“四行文字”的内容同《神圣家族》中“对法国革命的批判的战斗”和“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直接相关，紧接着的《提纲》从**论题**上看也是《神圣家族》中唯物主义**论题**的延续。[9](pp. 122-125)但是，《提纲》的**写作意旨**特别是**立场**、**观点**、**方法**却是对《神圣家族》同一论题阐述的**否定**和**超越**：费尔巴哈不再被看作终结了“概念”和“实体”的争论、超越了黑格尔哲学的人，而是与包括法国唯物主义在内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一起成了批判的对象；原先肯定大费尔巴哈的“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现在被认定为“抽象的人”，并以马克思自己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取代了。联系到在鲍威尔《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中“费尔巴哈被授予‘**实体**’的骑士的称号”、施蒂纳的“唯一者”被称为“最强硬的实体”[3](pp. 91, 532)，马克思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批判施蒂纳和鲍威尔一样是用“概念”来反对费尔巴哈“实体”[3](p. 363)，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以及边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不再作为社会主义的哲学前提、而是被看作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3](pp. 478-484)，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四行文字”和《提纲》正是构成《神圣家族》到《德意志意识形态》过渡的“中介”。我**甚至推测**其不仅写于马克思读了施蒂纳的《唯一者》之后，甚至更晚，

有可能在《维干德》第3卷（1845年11月）以后，因为只是在这一卷，论战的各方才全面卷入。陶伯特等人认定《提纲》与《神圣家族》有关，其实不但不能否定、反而更加证明了《提纲》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联系，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初动因恰恰来自鲍威尔和施蒂纳对《神圣家族》的批判。

从上述对这一文本的解读来看，“四行文字”和紧接着的《提纲》，正是构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全书、特别是第一卷“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的批判”的**思想提纲**。而马克思写于1846年1月18日，发表于1846年1月26日《特利尔日报》的《声明》，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对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的**战争宣言**。因为正是在这一《声明》中，马克思第一次宣布了他与“真正的社会主义”彻底决裂：“我**从来**没有为该报写过**片纸只字**，因为该报那种资产阶级的慈悲的、十足非共产主义的倾向是同我毫不相容的。”[7](p. 677)

通过上述研究，我的结论是：尽管后来构成《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的“基底稿”的笔迹主要是恩格斯的，但其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口授记录说”固然难于成立，但马克思叙述后，至少是在马克思主导下二人讨论后，再由恩格斯复述性地写下来的推断，应该说是合理的。

当然，认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关键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并不意味着否定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中的应有地位，也不意味着全盘否定广松涉《青年恩格斯思想的形成》一文的历史和理论贡献。不过，那将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了。

参考文献：

[1] 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M]，彭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 英格·陶伯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问题和结果[J]，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2）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8] 鲁克俭，“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不能无视版本研究的新成果［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1）
[9] 聂锦芳，清理与超越—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篇的文本结构问题

——马克思学实证方法与思想史科学方法的根本对立

夏　凡

《德意志意识形态》（两卷本）[①]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一部未完成著作，在他们生前，未能以整书的样式出版，只刊印了部分章节。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全书的第一卷第一篇《费尔巴哈》中首次正面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因此这部著作对我们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然而，第一篇手稿的未完成性质（用马克思的话说，有些还“遭到了老鼠牙齿的批判”）使我们在理解文本时困难重重。

首先就是如何理解该篇的文本结构。

截至目前，《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篇至少有以下几种版本：（1）梁赞诺夫编《马克思主义文库》第1卷（法兰克福，1926年）；（2）兰茨胡特和迈尔编《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著作》第2卷

---

① 该书的全称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第一卷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哲学，主要分为三篇：一、《费尔巴哈》，二、《圣布鲁诺》，三、《圣麦克斯》（章序号是马克思用罗马数字标注的），此外还有《莱比锡宗教会议》和《莱比锡宗教会议闭幕》等内容；第二卷批判德国社会主义，也分为三篇：一、《“莱茵年鉴”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四、《卡尔·格律恩：“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1845年达姆斯塔德版）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五、《“霍尔斯坦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第二卷缺少的第二篇《“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歌》、第三篇《“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散文》手稿大多佚失了。

《九、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柏林，1932年）；（3）阿多拉茨基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版（historisch－kritisch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简称MEGA1）第一部分第5卷（法兰克福，1932年），1955年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采用的就是这个版本的编辑方案；（4）巴加图利亚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俄文版（莫斯科，1966年），1966年的新德文版和1988年的中文版《费尔巴哈》新译本都采取了巴加图利亚版的编辑排序方式；（5）英格·陶伯特等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Marx－Engels－Gesamtausgabe 2，简称MEGA2）试编本（柏林，1972年）；（6）广松涉·河出书房新社《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东京，1974年；南京，2005年）；（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莫斯科，1976年）；（8）服部文男监译·新日本出版社《新译〈德意志意识形态〉》（1996年）；（9）涩谷正《草稿完全复原版〈德意志意识形态〉》（1998年）；（10）小林昌人补译·岩波文库版（2000年）。要算上学者们提出的各种编辑意见，还远远不止这些①。真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啊！

值得注意的是，MEGA2的编者英格·陶伯特认为，MEGA2不能再延续以往《德意志意识形态》各个版本（包括MEGA2试编本在内）“把留传下来的各篇手稿编辑和解释成一部著作的传统”，而是另辟蹊径，提出了“作为独立成篇的文稿加以收录和编辑”的“新思路”[1](p.34)。按照这样的“新思路”，即将于2008年出版的MEGA2第一部分第5卷将以《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莫泽斯·赫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1845年11月至1846年6月）》为题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原两卷本的文本将被分割成19篇独立的文

① 韩国和日本学者的编辑意见，可参看郑文吉：《〈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编辑的几个问题，尤其是“费尔巴哈”章复原方面》，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集·1997年新成果》，德国论证出版社（Argument Verlag），1998年版，第31—60页；小林一穗：《〈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文献问题》，《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大石高久：《〈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1期，第62—68页；韩立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和日本学界对广松版的评价》，《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23—33页。

稿[2]。而从 MEGA2 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二篇先行本①来看，《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卷第一篇《费尔巴哈》被肢解为 7 篇独立的文稿（详后）。

恕我直言，陶伯特等人的编辑“新思路”是不可接受的。它实际上完全否定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两卷本）的存在，代之以一部马克思、恩格斯和赫斯等人的**论文合集**②。这样做，不仅没有解决文本结构的编辑问题，反而以回避问题的方式引发了更大的问题，必将引发新的理论混乱和新一轮的学术争论。这些争论不仅涉及如何编排手稿文本结构的问题，更直接关系到如何评价《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乃至如何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事实上，陶伯特直言不讳地声称，《德意志意识形态》不过是“《神圣家族》的回声”[3](p.7)，这等于否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思想史事实！据说，《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往的版本大多打下了政治意图的烙印，试图证明《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形成”，而《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二篇先行版的出版“将为重新研究和阐释其‘确立唯物史观的地位’铺平了道路”[3](p.3)。不仅如此，在《马克思恩格斯年鉴》的编者看来，陶伯特等人的编辑新思路不仅适用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也适用于《资本论》，它“具有纲领性意义，表明在意识形态时代终结之后能够重新对马克思进行哲学的解构”[3](p.4)。

因此，陶伯特等人的编辑“新思路”之所以不可接受，是因为它不仅转向了“去意识形态化”的西方马克思学立场，更抱有“解构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目的。针对这种错误的编辑方针，本文将对《德意志意识形

---

① 英格·陶伯特、汉斯·佩尔格等主编：《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约瑟夫·魏德迈：德意志意识形态。“Ⅰ. 费尔巴哈”和“Ⅱ. 圣布鲁诺”的文章、刊印稿、手稿、誊清稿片断和笔记》（以下简称《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二篇先行本），载《马克思恩格斯年鉴·2003》，柏林学术出版社（Akademie Verlag）2004 年版。

② 准确地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并非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认为，第二卷第五篇《“霍尔斯坦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出自魏德迈之手，陶伯特认定它是赫斯的著作（与恩格斯合作）。另外，赫斯也参加了批判卢格的部分《“格拉齐安诺博士”的著作》的写作（和马克思合作）。MEGA2 拟将这两篇文献也收入第一部分第 5 卷中。

态》第一卷第一篇的编辑问题提出一种新的**文本学解决方案**。在此，我还要强烈呼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编者在编辑《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切切不可采取MEGA2第一部分第5卷的所谓“新思路”和“新成果”。

一、《费尔巴哈》篇文献学问题的由来

在质疑陶伯特等人的“新思路”之前，我先概要地说明一下《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篇《费尔巴哈》的文献学问题的来龙去脉。这是为了让读者能够以最快时间进入讨论域。

现存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有关《Ⅰ. 费尔巴哈》这一篇的主要有24张大纸，另有巴纳（S. Bahne）1962年发现的半张大纸（以下代号为｛B｝）。根据广松涉的说法，手稿可分为大束手稿和小束手稿。大束手稿共有17张大纸，每张纸上都有恩格斯的编号。其中第一手稿是｛6｝～｛11｝，共6张（以下代号为α）；第二手稿是｛20｝～｛21｝，共2张（以下代号为β）；第三手稿是｛84｝～｛92｝，共9张（以下代号为γ）。另外，大束手稿的每张大纸都折叠成4页（以下用a、b、c、d来指代），马克思对页进行了编号。｛6｝a～｛11｝c被马克思编为【8】～【29】（其中第【29】页也是巴纳1962年发现的），｛20｝b～｛21｝d被马克思编为【30】～【35】，｛84｝a～｛92｝a被马克思编为【40】～【72】。另外，马克思在手稿第【72】页（最后一页）的下半页和未编页码的背面一页（即｛92｝b面）写下了一些笔记，这可能是为了进一步修改《Ⅰ. 费尔巴哈》而写的[1](p.60)。巴纳发现的半张大纸上没有张编号（因为是c、d面），但是有马克思的页编号（1）和（2），其内容是“我们不想花费精力去启发我们的聪明的哲学家，使他们懂得……‘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①。现在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它就是大束手稿的第【1】页和第【2】页，但一些日本、韩国学者坚持把它作为附录放在《Ⅰ. 费尔巴哈》的末尾[1](p.38)。

小束手稿由7张大纸组成，其中两张没有编号（巴加图利亚称之为第

① ｛B｝的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75页。

四手稿），其余5张有编号｛1｝～｛5｝（巴加图利亚称之为第五手稿），它们都没有（马克思的）页编号。现据陶伯特的考证，张编号3和5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加上的，张编号1、2、4是手稿后来的保存者伯恩斯坦编的。无论如何，这些张编号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1845—1846年间编上的，所以不能把它们（｛1｝～｛5｝）和大束手稿的张编号（尤其是｛6｝～｛11｝）看作一个体系。另外，阿多拉茨基用｛1?｝和｛2?｝指称没有编号的两张大纸，广松等学者（不包括陶伯特）都加以沿用。从**文本内容**看，小束手稿可以分为6个**部分**（注意！不是独立成篇的6篇文章）：

甲、“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总批判”，｛1?｝a～｛1?｝c。在标题“Ⅰ．费尔巴哈”下面，从“正如我们德国的玄想家们所宣告的”开始，到被删去的一段话为止。被删去的这段话大部分在b面，只有最后一句在c面，即（我们这些意见）“正是针对费尔巴哈的，因为只有他才多少向前迈进了几步，只有他的著作才可以认真地加以研究。只有他的著作才会进一步阐明一般意识形态的全部前提”①。

乙、“人类历史的前提和生产”，｛1?｝c～｛1?｝d和｛2?｝a（｛2?｝只写了一页，b、c、d面为空白）。在小标题“1．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和序号“A”下面，从被删去的一段非常著名的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开始，到“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为止②。

丙、“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总批判”，｛1｝。这是“甲”部分的誊清稿。在标题“Ⅰ．费尔巴哈”下面，从“正如德国的玄想家们所宣告的”开始，到“必须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一下这些喧嚣吵嚷”为止③。

---

① 被删去的这段话，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注。最后一句话“只有他的著作才会进一步阐明一般意识形态的全部前提”被编者去掉了，今根据广松版添加（参见广松涉编：《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至于（甲）部分的全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并未收录。

② （乙）部分的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68页，两条分隔线之间的部分。

③ （丙）部分的中译文见同上书，第62—63页。

丁、“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总批判”，{2}。在标题“Ⅰ. 费尔巴哈”和小标题“A. 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下面，从“德国的批判……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开始，到“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为止①。

戊、“分工和三种所有制形式（部落的、古代的、封建的）”，{3} 和 {4}（{4} 只写了2页，c、d面为空白）。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开始②。

己、“历史的现实前提和意识形态的关系”，{5}。从“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开始，到“这里我们只举出几个我们用来与意识形态相对照的抽象，并用历史的例子来加以说明”结束③。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篇的文献学问题，主要集中在小束手稿的6个部分的排序上。在广松等学者那里，还包括小束手稿和大束手稿的关系问题（见文末附表）。鉴于陶伯特的说法，“广松涉基于猜测而对文稿所做的编排是对马克思已注明页码的草稿的干扰”[1](p.42)，本文暂不讨论小束手稿和大束手稿的混合编排问题，而是把全部小束手稿都放在大束手稿的前面，也就是把它们视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的开头部分所做的若干次努力。道理很简单，在甲、乙、丙、丁各部分都标注了第一篇乃至第一章的标题，这是谁都不能视而不见的**文本学事实**。但是，陶伯特等人偏偏就置之不理。

二、“新思路”错在哪里？

现在可以开始讨论陶伯特等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篇的编辑“新思路”了。如前所述，MEGA2第一部分第5卷打算把留传下来的手稿编排为论文集，顺序如此：

---

① （丁）部分的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66页。

② （戊）部分的中译文见同上书，第68—71页。

③ （己）部分的中译文见同上书，第71—74页。

Ⅰ/5－1 马克思：《答布鲁诺·鲍威尔》①；

Ⅰ/5－2 马克思：《序言》②；

Ⅰ/5－3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历史。草稿和笔记》，即大束手稿；

Ⅰ/5－4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③；

Ⅰ/5－5 马克思、恩格斯：《Ⅰ．费尔巴哈。A．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的》，即小束手稿（丁）部分，{2}；

Ⅰ/5－6 马克思、恩格斯：《Ⅰ．费尔巴哈。1．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即小束手稿（甲）和（乙）部分，包括{1?}和{2?}；

Ⅰ/5－7 马克思、恩格斯：《Ⅰ．费尔巴哈。导言》，即小束手稿（丙）部分，{1}；

Ⅰ/5－8 马克思、恩格斯：《Ⅰ．费尔巴哈。片断1》，即小束手稿（戊）部分，{3}和{4}；

Ⅰ/5－9 马克思、恩格斯：《Ⅰ．费尔巴哈。片断2》，即小束手稿（己）部分，{5}。

（自Ⅰ/5－10“马克思、恩格斯：《莱比锡宗教会议》”以下，不属于《Ⅰ．费尔巴哈》的手稿内容，故从略。）

陶伯特等人主张，只有将各篇文献作为独立成篇的著作编排，才能尊重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的手稿和刊印稿的原貌。相反，任何把这些手稿和刊印稿编成一部著作的尝试，都“意味着要完成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没有完成的工作”，由于现在缺少足够的线索和根据支持这样的工作，所以对手

---

① 即《对布鲁诺·鲍威尔的反批评的答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364—367页。把这篇文章编进《德意志意识形态》，无非是要证明《德意志意识形态》只不过延续了《神圣家族》对鲍威尔等人的批判而已，意在否定其思想史革命的价值。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的《序言》是马克思写在3张信纸上的，不属于第1篇手稿的范畴。

③ 这是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撰写工作完成之后写下的一份摘录，原收录于阿多拉茨基编MEGA1第一部分第5卷《附录》，第538—540页，MEGA2首次将它纳入《Ⅰ．费尔巴哈》。参见陶伯特：《〈德意志意识形态〉各篇手稿的留传过程及其首次以原文发表的情况》，柴方国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年第3期，第55页，原载《MEGA研究》，阿姆斯特丹，1997年，第2辑。

稿的任何编排都只能导致“随意编成的结构”。[1](p.35)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费尔巴哈》被分成了7篇独立的文稿（Ⅰ/5-3至Ⅰ/5-9）。而且，在他们看来，唯一科学的方法是根据各篇“著作”的写作时间顺序编排。这样一来，由于小束手稿是在大束手稿写好之后写的，所以它们（Ⅰ/5-5至Ⅰ/5-9）就必须放在大束手稿（Ⅰ/5-3）之后。我认为，这种和以前所有版本（包括MEGA2试编本）的编辑方针都相悖的做法是没有道理的。而陶伯特所谓“按照写作的时间顺序编排”的说法，不过是遁词。如她所考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写了《Ⅱ. 圣布鲁诺》和《Ⅲ. 圣麦克斯》两篇的内容，然后再从中抽出一部分内容编入《Ⅰ. 费尔巴哈》。如果按照写作时间编排手稿的话，大卷手稿的3个部分就不能按照马克思编好的页码来编排，因为其中的β和γ部分是从《Ⅲ. 圣麦克斯》手稿中抽出来的。如果真的要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来编排《德意志意识形态》，就应当把《Ⅰ. 费尔巴哈》放在《Ⅱ. 圣布鲁诺》和《Ⅲ. 圣麦克斯》之后，就必须分解《Ⅰ. 费尔巴哈》和《Ⅲ. 圣麦克斯》的内容！这样一来，连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后定稿时的系统编排（我们现在看到的两卷6篇结构）都要打乱！这无疑是不科学的，也完全行不通。陶伯特自己也承认，完全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手稿势必破坏出版原则[1](p.47)。所以，MEGA2第一部分第5卷将大致保持《德意志意识形态》全书的两卷6篇的顺序。既然已经无法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文本，那么把明显是带有第一卷《绪论》（或者说《导言》）性质的小束手稿放在作为正文的大束手稿之前，岂不是名正言顺吗？为什么还拘泥于所谓“编辑准则”，一定要将小束手稿放在大束手稿之后呢？这么编排，明明就是在给文本编排一种**人为的逻辑**结构，为什么又自称“不再提出一种新的、同样是假设性的逻辑体系结构”[1](pp.36-37)，而称自己的编辑准则是“**按时间顺序**”呢？这难道不是学术上的不诚实吗？

进一步说，陶伯特等人拒绝“人为编造体系”的结果，并不等于维持了手稿的原貌，而是把自己对手稿的理解强加于人。这是一种打着“客观性”旗号的“主观性”！拿小束手稿的写作时间排序来说，广松等日本学者认为是甲、乙、丙、丁，陶伯特却认为是丁、甲、乙、丙。但是，对于这种时间顺序的考证理由，陶伯特既没有给出详细的说明，也没有真正地反驳广松的意见。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广松的结论“基于猜测”，“不能认为是合理的”。而广松却在摆出了有利于两方面结论的各种论据之后提

出，虽然说 MEGA2 认为（丁）的撰写在（丙）之前的看法是有根据的，但是相反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此，（丙）和（丁）的具体写作顺序实际上是无法确定的[4](pp. 340-341)。和陶伯特的武断相比，广松的学术胸襟不是显得更为宽容吗？既然如此，陶伯特不容异己意见的做法就值得商榷了。很不幸，陶伯特拿来攻击她之前的所有编辑者的话同样适用于她自己："某些版本的编者试图把自己的解释提到绝对真理的高度，排斥其他同样有说服力的假设，他们的版本就会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辑中的重大障碍"[1](p. 36)。

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看，陶伯特等人对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研究，完全是按照纯粹的实证主义方法进行的"马克思学"研究。实证主义的"马克思学"一味标榜"客观性"，拒斥"主观性"，所以只相信"眼见为实"，只相信纸张大小、材质、墨迹颜色、字体大小和笔法等等纯"文献学"事实，而对必须依靠对文本内容的精心解读才能捕捉到的"文本学"事实视而不见。**小束手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起草的若干份《绪论》，这是不容抹杀的事实。**但片面强调"客观性"的实证主义方法对此毫不关心。说穿了，这正是青年卢卡奇批判过的资产阶级"物化意识"在作祟。结果就是完全否认事物的总体性联系，否认"合理推测"在思想史研究中的科学作用，而一律斥之为"主观臆测"。实证主义"马克思学"的所谓"客观性"恰恰是一种最大的"主观性"，确切说，是主观盲目性。一旦面对它不能直观到的"事实"，就只能表现为理论上的**无能**。在无法确切地考证写作顺序的情况下，陶伯特等人只能采取回避问题的策略，即放弃编排文本的逻辑结构。结果，众多学者几十年来前赴后继辛辛苦苦取得的文献学研究成果，竟然就被这种所谓"客观性"的"新思路"一笔抹杀，一切推倒重来，这是相当可悲的！

值得警惕的是，西方马克思学的这种伪客观性思路也渗透进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当中。不可否认，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在文献占有和考证方面确实走在了中国学者的前头，其研究必然对正在努力寻求突破传统马列原理教科书模式的中国学者产生极大的吸引力。由于在学习、借鉴西方马克思学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对西方马克思学的立场、观点、方法缺乏清醒的认识，目前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不免有投向西方马克思学怀抱之嫌。他们关注的首先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而是其文本的写作过程、刊布情形、版本源流等问题。轻则试图用"文献学"的研究代替深

人解读原著的文本学研究，沉醉于“马克思究竟写了多少著作”之类问题；重则干脆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建立在西方马克思学的基础之上，甚至不惜推翻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已有研究成果。在他们看来，唯有在MEGA2新版面世后才能为研究者提供一个最少受到编辑者主观看法干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5]，因此，中国学者以往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依据的不过是“别人编辑而成的、俨然是一部完整的著述”① ——言下之意，不足为凭。虽然这种倾向的代表人物还是极个别的少数，但是这种倾向不可不防，不能任其蔓延。倘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味跟着西方马克思学的节拍起舞，就会沦落为“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急先锋。

三、文本学的“新思路”

在思想史研究中，写作时间的先后顺序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诚如广松所言，它“对于问题只具有次要意义”[4](p.341)，最终如何安排文本的逻辑顺序才是问题的最关键所在。换言之，文本学事实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那么，《Ⅰ．费尔巴哈》手稿告诉我们怎样的文本学事实呢？

在我看来，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在两张小束手稿上标注了张编号{3}和{5}，这个被陶伯特淡化了的事实是意味深长的。恩格斯为什么不把这两张纸标成{1}和{3}？或者标出{3}、{4}、{5}？他仅仅标注出{3}和{5}，就说明在他的眼里，究竟是哪三张纸是{1}、{2}、{4}，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用不着再专门标注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小束手稿的7张大纸的文本具有**自身的逻辑结构**。比方说，（甲）有了誊清稿（丙），而接着（甲）后面写的（乙）却没有誊清稿。显而易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写作过程中，（甲）和（乙）已经是可以废弃的草稿了！换句话说，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机会编排《德意志意识形态》全书的最终结构，想必不会把它们放进去。所以，这两张大纸既不是恩格斯心目中的{1}也不是{2}，更不会是{4}。

---

① 聂锦芳：《未完成的文本如何表述思想？——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过程的考察》，见“北大哲学论坛”，网址为http；//www. phil. pku. edu. cn/forum。

而从文本内容看，（甲）批判了整个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包括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三人），（乙）试图正面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考虑到（甲）的末尾删掉的那句话“（我们这些意见）正是针对费尔巴哈的，因为只有他才至少向前迈进了一步，只有他的著作才可以认真地加以研究……”和（乙）开头的小标题“1. 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可以认定，它们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不只是第一篇）而撰写的《绪论》的第一份草稿。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改变了“只针对费尔巴哈”的初衷，而将这里的批判对象扩展到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三人，所以，尽管有马克思写下的章标题“Ⅰ. 费尔巴哈”，这一部分内容仍然不仅仅属于第一篇，而且属于整个第一卷。

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放弃了这“第一草稿”，放弃了**从“现实的个人”以及“历史的前提”（物质生产）出发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打算，而是另行起草第一卷的《绪论》。于是，（丙）、（丁）、（戊）和（己）等部分（共5张大纸）就构成了《绪论》的第二份（甚至第三份?）草稿。但是，既然恩格斯标注了｛3｝和｛5｝，那么，这5张大纸就应当被视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当然，这种排序方式究竟是恩格斯自己的观点，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就达成的共识，我们并不清楚。各种可能性都存在。

抛开恩格斯和马克思本人的主观意图不谈，从文本内容看，这样的排序方式有其必然性。首先，（丙）和（丁）之间的**逻辑**顺序是不容怀疑的，一定是（丙）在前，（丁）在后。只有先提出“必须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考察一下这些喧嚣吵嚷”的任务，才能开始批判“德国的批判……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而决不能反过来，先批判“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然后再说“正如德国的意识形态家们所宣告的，德国在最近几年里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变革”。同样，紧接着（丁）后面的，只能是对“德国现实”和“物质环境”的描述，以及对意识形态和物质环境关系的描述。这正是（戊）和（己）的内容。（戊）概述了历史上的几种所有制形式（物质环境），（己）总结了意识形态与“物质环境”的关系，两者构成了对（丁）的末尾提出问题的回答，（戊）恰好是（己）的结论部分。

通过对小束手稿的文本内容的简略分析，可以看到，（丙）、（丁）、（戊）和（己）是一个整体，共同构成了全书第一卷《绪论》的“第二草稿”。小束手稿上从｛1｝～｛5｝的张编号也正是《绪论》“第二草稿”的逻辑序号。当然，由于手稿最后并未修改完成，各部分之间在语言上并不完全连贯，但基本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这是一条**从人类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正面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思路。这样看来，伯恩施坦在小束手稿上标注的｛1｝、｛2｝、｛4｝等张编号，并非随意性的产物，而是文本结构导致的“英雄所见略同”。陶伯特仅仅因为这些编号不是恩格斯编的，就彻底否定编号的合理性，有欠考虑。至于广松根据文本内容的相似性和大束手稿缺【36】～【40】页的事实，大胆推定（戊）就是大束手稿第【36】～【40】页的誊清稿，我认为这是很有想象力和说服力的推测，但广松忽视了《绪论》“第二草稿”的完整性不容分割的文本学事实，所以我不采纳他的意见。在我看来，小束手稿和大束手稿内容上的相似性，不但不能证明小束手稿是大束手稿相应部分的“誊清稿”或“修订稿”，相反只能说明它是全卷提纲挈领的《绪论》部分。

从文本内容看，巴纳1962年发现的半张大纸也属于第一卷的《绪论》部分。理由是，《绪论》“第二草稿”上有小标题“A. 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的”，新写下的序号“A”强烈暗示了序号“B”的存在（我揣测，其标题大概会是“B. 费尔巴哈”，这很可能就是整个大束手稿的标题）。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标题，其位置必然在｛B｝之后，而不可能在｛B｝之前！因为｛B｝的内容仍然是在批判“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的”，而不是专门针对费尔巴哈。换言之，｛B｝属于小束手稿，而不属于大束手稿。巴加图利亚和陶伯特等人把｛B｝视为大束手稿的第【1】和第【2】页，证据并不充分。仅仅依靠马克思标注的页编号（1）和（2）是不够的，它不能排除其他的可能性——比方说，恩格斯标注的｛3｝和｛5｝是接着马克思的（1）和（2）排的，这种可能性也存在（尽管同样缺乏证据）。无论如何，仅仅依靠编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还要看文本的内容。既然｛3｝～｛5｝已经说明了历史上的各种所有制形式以及它们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那么接下来说“我们不想花费精力去启发我们的哲学家懂得……解放是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岂不是顺理成章吗？作为整个《绪论》的结尾，它和《绪论》第二草稿的开始部分（“据说，这一切都发生在纯粹的思想领域”）首尾呼应。也就是说，｛B｝的合理位

置在小束手稿（《绪论》的第二草稿）的最后，在大束手稿之前，而不是大束手稿的第【1】和【2】页。如果把｛B｝作为大束手稿的开头，那么大束手稿就成为一个“无标题文档”：既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标注的篇标题《Ⅰ．费尔巴哈》，也没有章节标题“A．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的”或者“B．费尔巴哈”之类，而是突兀地从“我们不想花费精力去启发我们的哲学家”开始。这是不可想象的！至于日、韩学者主张把｛B｝当作《Ⅰ．费尔巴哈》章的附录，更加不科学。它没有看到，｛B｝的位置应当在整个大束手稿之前，而不是之后。

综上所述，我得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起始部分的编排顺序如下（序号只表示**连续编排文本**时的顺序，而不代表将它们作为单篇的论文分开处理）：

1. 全书标题：《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

2. 第一卷标题《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的批判》；

3. 马克思：《序言》；

4. 马克思、恩格斯：《绪论》，第一草稿，即（甲）和（乙）；

5. 马克思、恩格斯：《绪论》，第二草稿，即（丙）、（丁）、（戊）、（己）和｛B｝；

6. 第一篇标题，《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同时注明该标题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写在手稿末尾的，而不是手稿上的原标题；

7. 大束手稿，即第一手稿（α）、第二手稿（β）和第三手稿（γ）；

8. 第一篇《附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摘录《费尔巴哈》（Ⅰ/5－4）。

以上结论，是我从文本内容的解读得出的，相对于陶伯特等人的马克思学的“新思路”，不妨称之为文本学的“新思路”。“新”就“新”在首次提出了**第一卷《绪论》及其两份草稿**的概念。说得耸人听闻一些，它首次提出了小束手稿（包括｛B｝）并不属于《一、费尔巴哈》章，而是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卷。但仔细想来，这也算不上什么“新思路”，它其实并无多少标新立异之处，和梁赞诺夫、巴加图利亚以来诸多学者形成的主流意见大致相当。例如，巴加图利亚就把《绪论》的两份草稿（他认为是“誊清稿”）当作“第四手稿”和“第五手稿”，排在《Ⅰ．

费尔巴哈》的第一部分；小林昌人补译的文库版则排出了《绪论》的三份草稿（详见文末附表）。陶伯特等人之所以对这些编辑意见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只是因为实证主义的马克思学方法“宁愿相信尺码，也不愿意相信自己的脚”！所以才会对其他学者的杰出工作成果置若罔闻。在此，我呼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编者万万不可采纳MEGA2第一部分第5卷的“新思路”。也就是说，必须将《Ⅰ．费尔巴哈》当作**一个完整的文本**加以编辑。只要根据文本的内容整理其逻辑顺序，即使不完全采纳本文建议的编排顺序，最终编成的文本也不会是陶伯特说的所谓“随意编成的结构”。

附表：对《Ⅰ．费尔巴哈》文本结构的各种编排顺序

<table>
<tr><td>梁赞诺夫版</td><td colspan="2">甲（丙）①</td><td>丁</td><td>乙</td><td>己</td><td>α</td><td>β</td><td>γ</td><td>戊</td><td></td></tr>
<tr><td>阿多拉茨基版</td><td>丙</td><td>丁</td><td>乙</td><td>戊</td><td>己</td><td colspan="3">α，β，γ</td><td colspan="2">甲②</td></tr>
<tr><td>巴加图利亚版</td><td colspan="5">丙、丁、乙、戊、己③</td><td colspan="2">{B}、α</td><td>β</td><td>γ</td><td></td></tr>
<tr><td>广松涉版</td><td colspan="2">丙（甲）</td><td>丁</td><td colspan="2">α（乙、己）④</td><td>β</td><td>戊</td><td>γ</td><td>{B}</td><td></td></tr>
<tr><td>英文版</td><td colspan="3">丙（甲、乙）⑤</td><td>丁</td><td>戊</td><td>己</td><td>{B}</td><td>α</td><td>β</td><td>γ</td></tr>
<tr><td>涩谷正版</td><td>丙</td><td>甲</td><td>乙</td><td>丁</td><td>戊</td><td>己</td><td>{B}</td><td>α</td><td>β</td><td>γ</td></tr>
</table>

① 梁赞诺夫把（丙）当作（甲）的异文处理。另外，当时还没有发现{B}。

② 尽管MEGA1的编者阿多拉茨基对手稿进行了多处剪贴加工，该版本近乎“伪书”，但其基本的编排顺序还是看得出来的。小束手稿在前（其中插入了来自大束手稿的片段），大束手稿（除插入小束手稿的部分以外）被切成几十个片段重新排列。小束手稿的（甲）部分收录于卷末的“正文异稿”中。马克思在大束手稿末的笔记也被移到卷末的附录中。另外，当时也还没有发现{B}。

③ 巴加图利亚把小束手稿按表中顺序编排为“第一部分”，（甲）作为（丙）的底稿，在注释中予以说明；{B}和α合编为“第二部分”；β和γ分别是“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这也就是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编辑排序方式。

④ 广松涉认为（甲）是（丙）的底稿，（乙）是【11】～【12】页的异文，（己）是【13】～【16】页的异文，并把{B}当附录处理。

⑤ 英文版去掉了（甲）和（乙）文本中的所有章节标题，紧接着（丙）编排。

小林昌人版	甲、乙、己①			丙	丁	α	β	戊	γ	{B}
MEGA2 试编本	丁	丙②	乙	戊	己	{B}	α	β	γ	
MEGA2 先行本	{B}、α，β，γ				丁	甲	乙	丙	戊	己
本文	甲、乙		丙、丁、戊、己、{B}				α	β	γ	

备注：甲 = {1?} a ~ {1?} c，乙 = {1?} c ~ {1?} d 和 {2?} a，丙 = {1}，丁 = {2}，戊 = {3} 和 {4}，己 = {5}；{B} = 【1】和【2】；α = 【8】~【29】，β = 【30】~【35】，γ = 【40】~【72】。

参考文献：

[1] 英格·陶伯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和刊印稿的问题和结果［J］，柴方国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2001（2）

[2] 英格·陶伯特，汉斯·佩尔格，雅克·格朗尚，MEGA2 第一部分第 5 卷的结构［J］，MEGA 研究，1997（2）

[3] 陶伯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二篇先行版导论［J］，马克思恩格斯年鉴 2003，柏林：柏林学术出版社，2004

[4] 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 鲁克俭，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排序问题［J］，哲学动态，2006（2）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① 小林昌人版把（甲）（乙）（己）当作《绪论》的第一草稿，（丙）当作第二草稿，（丁）当作第三草稿。

② MEGA2 试编本把（甲）作为（丙）的异文，放在了副卷中。

社会批判理论经典拾遗：阿多诺

自然历史观念[1]

[德] 泰奥多·W. 阿多诺

在开始说正题之前，我首先申明，我的演讲既不会给出什么结果，也不提供什么系统的阐述。相反，我不得不说，它将依然保持在论说文层面上，其意图无非是着手解决并进一步发展所谓“法兰克福讨论”所涉及的问题。我承认，关于这场讨论已有许多贬损真相的事情被传扬出来了，但我同样明白：这反而有助于正确地接近问题；从原来的起点重新开始反倒是错的。

首先请准许我就术语问题说两句。虽然论题是自然历史，但它既不关涉传统的前科学意义上的自然历史的理解，也不关涉作为自然科学对象的自然史。这里使用的自然概念与精确科学所使用的那个概念毫无联系。我不能预先展开下文将叙及的自然和历史的意义。然而，如果我说本文的真实意图即在于辩证地克服自然和历史之间的一般对立，那么，我倒也没有无所事事。因此，不管我在什么地方运用自然和历史概念，都不意味它们

---

① “自然历史观念”（Die Idee der Naturgeschichte）一文是阿多诺1932年7月15日在康德学会法兰克福分会一次集会上所作的讲演。该演讲的主旨是对本雅明《德国悲苦剧的起源》一书的核心哲学观念进行阐释，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上予以推进。这篇演讲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比较全面地展现了阿多诺此时以“崩溃的逻辑”为旗帜的基本哲学观念，而且还清楚地呈现了阿多诺与本雅明对《德国悲苦剧的起源》中的哲学遗产的差异性理解，从而为正确理解两者30年代中后期的争论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背景。该文献在阿多诺生前未发表，后于1973年在《阿多诺全集》第1卷中首次公开出版。——译者注

有了最终的定义；相反，我始终都在捕捉那个推动这两个概念使之在纯然的差异中相互扬弃的点。如果要我解释这个我意欲消解的自然概念，那么，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个概念翻译为一般的哲学概念语言，而与之最切近的就是神话概念。不过，这个概念同样含混不清，其确切的含义也不能提前得到界定，只有在分析过程中才能被给出。我指的是从来就存在之物，即背负了人类历史的命定的、先行规定的存在，这样的存在在历史中具有实质意义。被上述表达所界划出来的就是这里我用“自然”所意指的东西。由此产生了这个自然与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里，历史意指在传统中建立起来的行为方式，而所谓传统行为方式的首要特征就是新质出现在其中，它不是一个在单纯的同一中、在既成事物的简单再生产中发生的运动，相反，是一个在新事物不断涌现中发生的运动，是一个通过在其中出现的新事物而获得自己真实特征的运动。

我希望能够在对当前争论中的本体论问题的分析或者说是正确的综述基础上，展开我所说的自然历史观念。这得要从“自然的”开始谈起。因为对本体论的提问恰如今天所提的问题那样，无非是我对自然所持的看法。我将从另一点开始，并力图在历史哲学的问题域之外展开自然历史概念。在讨论中，这一概念将能实质性地获得自己的内容和具体性。在上述两个问题的清晰表述得到勾勒之后，我将尝试着说清楚自然历史概念本身的含义，并为诸位分析它的显性特征。

一

首先应加以考虑的是当前本体论的形势问题：如果你要把捉的本体论问题是在所谓现象学语境、尤其是后胡塞尔的现象学语境中展开的，那么，从舍勒开始就可以说，此本体论提问的原本出发点意在克服哲学的主观主义立场。它意味着取代意欲把所有存在规定努力消解于思想规定之中的哲学。这一哲学相信自己能够通过这样的提问获取另一种原则上有差别的存在，一种超主观性的、实在的存在领域，而把全部客观性奠定在主观性的特定基础结构中。只要逻各斯（λόγος）是从存在（ὄν）之中发展而来的，本体论就是这个意思。所有现代本体论思想的基本矛盾就在于，用以获取超主观性存在的手段无外还是那个主观理性，即早先确立了批判的唯心主义结构的主观理性。既然其他手段和语言都不可利用了，现象学的

本体论思想因而就把自己呈现为一种以自主理性及其语言为手段，以图获取超主观存在提供保证的尝试。现在，追问存在的这一本体论问题可以以两种形式清晰地描述出来。在一种形式中，它是关于存在自身的问题，自康德第一批判以来，这一关于物自体的问题已经被击退到哲学研究的范围之外去了，而现在却又卷土重来了。同时，这个问题又变成了对存在的意义、对存在者的深意的追问，或者，简单地说，是对作为可能性的存在的意义的追问。正是这双重形式有力地证实了我的那个观点，即是我们今天涉及的本体论问题的双重形式，坚持把自主理性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只有当理性察觉呈现在自己面前的现实是某种陌生的、迷失的和实在的东西的时候，换言之，只有当实在不再直接可得、实在和意义的理性不再有共同之处的时候，存在的意义问题才是可以追问的。意义问题是由理性的出发点所决定的，但同时，现象学早期（舍勒）的轴心问题，即存在的意义问题，通过它的主观性起源也产生出了一个甚为广泛的问题域。因为意义的产生不过就是意义的插入，而这意义本身其实已经被主观性所设定了。意义问题不过就是主观向存在者的插入，这一洞见导致了现象学第一阶段的危机。对这一危机最明确的表达就是：理性不得不在自己为存在秩序提供保证的企图中，经验基础本体论范畴显而易见的不稳固性。就像它在舍勒著作中已经显示出来的那样，作为基础性的有深意的东西而被接受的因素，是从不同领域里生发出来的，它们根本不是存在之中的可能性，而是从存在者中被推论出来，并在事实上为存在者之所有未定性所浸润，这样，在现象学中，整个关于存在的问题就问题重重了。就对意义的追问能被呈现而言，它并不意味与经验事物相隔绝的领域可以获得有效的并且总是可以通达的意义；进而，意义问题其实不过就是 τίϑνöν（本质）问题，即追问存在本身到底为何物的问题。换言之，在这些语境中，意义和符号等表达都是含混不清的。意义可以是一个处于存在背后并通过分析显现而出的先验内容，也可以是存在者本身对什么是存在的典型特征的解释，而这种解释过了的存在却没有因此被证明是有意义的。把存在的意义问题当成存在范畴的符号，对存在的真正所是进行追问因此成为可能；但以原来的问题观之，存在者不是呈现为有意义，而是无意义，正如很大程度在今天发展的意义上表现的那样。

如果存在问题的这一反转已经发生，那么，最初的本体论反转的唯一原初意图，即朝着非历史性的转折，就消失了。这就是舍勒著作、至少是

他有着决定性影响的早期著作的情况。在这些著作中，他试图在对无历史的永恒内容的纯粹理智观照基础上，建构起一个观念的天国，它凌驾于经验事物之上放射出自己的光芒，并具有一种经验事物允许进入的规范特征。但同时，在这个现象学的起源中，在有深意的和本质的事物——它位于历史地显现出来的事物背后——与历史领域之间存在一种根本的紧张关系。在现象学的起源中，存在着自然和历史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在这个语境中，“自然”意味非历史的、柏拉图式的本体论中的事物），和它所体现的本体论反转的最初意图，已经矫正了它自己。存在问题不再具有柏拉图所问及的存在理念及质的差别理念之范围的意义，这些理念与存在者、经验相对照，处于一种规范关系或张力关系之中。进而，张力消失了：存在者自身变成了意义，超越历史的存在的基础训练被作为历史性的存在纲领（Entwurf）所取代。

如此一来，问题的状况就已经发生变化了。首先，本体论与历史主义之间的问题域至少在表面上暂时消失了。从历史或历史的批评的立场来看，本体论似乎要么仅仅是一个对历史的内容无话可说、可以在具体事物周围任意建立起来的形式框架；要么，就如在舍勒的质料本体论形式中那样，本体论的意图表现为内在历史事实（这些或许出于意识形态目的的事实保有永恒的、普遍的价值）的任意绝对化。从本体论观点看，问题恰恰是颠倒的，它正是支配我们法兰克福讨论的问题的反题：对本体论者而言，所有激进的历史思想，也就是所有旨在把内容严格还原到历史条件的思想，必须预定一个存在自身的纲领，通过这个纲领，历史已经作为一个存在结构被给予了；只有如此，在这个纲领的框架内，特殊现象和内容的历史排列在某种程度上才是可能的。

如今现象学的最新转向——如果有人还是愿意将之称作现象学的话——已经开始通过祛除历史和存在之间的纯粹对立来修正这一点了。一方面，放弃柏拉图理念天国，另一方面，在观察存在时把存在指认为鲜活之物，这样，形式主义就连虚假的静态平衡一起被祛除了，因为纲领似乎吸收了存在规定性的丰富性，对偶然事物向绝对的转化的怀疑也消散了。此刻，于极端扰动之中的历史本身已经变成了本体论的基本结构。同时，历史思想自身似乎也经受了一次基础性的反转。它被还原为一个至少作为人类此在之基础规定的历史性的哲学奠基结构。这一结构第一步使得类似于这样的历史成为可能：虽然历史是作为与这个完成了的、固定的、外在的

结构相对立的存在而被建立起来的。这就是法兰克福讨论所达及的高度，我将从这里切入开始引入批判的主题。

对我而言，我们在历史性范畴下已经达到的使本体论问题与历史问题同一化的起点，同样没能抓住具体问题；或者说，只是通过修正自己的逻辑、将那些并不能必然性地从设计好了的原则中产生的主题当作内容吸收进了自身。我将从两个要点上说明这个问题。

首先，这一纲领被限定在一般范畴之中。历史偶然性问题并不能被历史性范畴所把握。人们可以建立一个关于生活的普适的结构范畴，但是，如果人们试图解释诸如法国大革命这种特殊现象，纵然能在解释中发现生活结构的每一个可能要素，例如记录下了复辟的紧要性及其实现，确定导源于人的自发性的意义，发现因果联系等等，也不可能在最真实的存在之中建立起法国革命的事实性与其范畴之间的关联。相反，在最广大的规模下，却发现一个不能为其所容纳的“事实性”领域。这当然不是我的发现，而是在本体论讨论的框架中早就已经被阐明了的。但以前它并没有像在这里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而且，它还曾被问题域里的一种权宜之计加工过：就其本质而言，一切不能被装进本体论纲领的事实性被挤入了偶然性、偶发性范畴，而这个范畴却作为历史事件的决定性因素被吸收进本体论纲领。无论它具有怎样的逻辑连续性，它都包括了一个供认，即：掌握经验世界的企图已经失败了。同时，理论中的这一转向为本体论问题内的新转向提供了一个实施纲要。这就是向着同义反复的转变。

我不过是认为，满足于经验事物的不可致获性的新本体论思想，持续按照如下方案在进行：确切地说，在要素不能进入思想的决定性所消解、不能被透明化的地方，它保持住了自身纯粹的“停滞”，而现象的停滞被转换为一个普遍概念，并被赋予了本体论的尊严。这和海德格尔“向死而在”及历史性概念本身是完全一致的。在新本体论对问题的阐述中，历史性的结构只是对自然和历史的和解问题提供了一种表面上的解决，因为在这里历史被承认为奠基性的现象，它的本体论决定性或本体论解释被破坏了，因为它自身被美化成了本体论。海德格尔的情况是这样的：被理解为存在的广泛结构的历史与其本体论是一个意思。因此在历史和历史性之间虚弱的对立中无有他物，只有在此在中看得见的存在的质，而这种质已经被存在者夺取输送进了本体论的范围，成为本体论之规定。这种对立是有助于解释那些从根本上还将被提及的东西而设立的。这种重复不是语言形式的巧

合，而是嵌入本体论的必然性之中的。它坚持本体论努力，但因为自己的理性起点不能在本体论上解释它自己是什么：那就是一个与唯心主义理性（ratio）起点意义相关的产物。这需加以解释。如果有一条能走得更远的路，那么，它实际上就只能被“问题的修正”所预先规定。当然，这种修正不仅可以应用于历史问题，也可以用于新本体论问题自身。它能提示，为什么我觉得问题源于这样的事实，即唯心主义的起点甚至还没有在新本体论思想中被抛弃，因为这里呈现出了两种专属于唯心主义思想的规定性。

首先是与被统摄于整体之下的特殊事物相面对、关于广泛的整体的定义。虽说它不再被把握为一个体系化的整体，可它还是一个结构性的整体、结构性的单位或总体性范畴。人们相信即使在一个结构中也能够毫不含糊地合并所有现实，即使在对一切现实合并于一个结构的一种可能性中，他也暗示那个将一切存在者综合于这一结构下的人有权利和力量充分地认识存在者自身，并将之吸纳进那个形式之中。当如此要求没有被提出的时候，谈论结构整体就变得不可能了。我知道，新本体论的内容和我刚才所说的有很大差别。现象学的最新转向与其说是理性主义的，倒不如说表明了一种在“生活”范畴下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引进非理性因素的企图。如果非理性内容被嵌入了以自动原则为基础的哲学之中，如果不再假定实在是可以充分接近的，那么，它就产生了巨大的差异。我想指出的是，像叔本华那样的哲学正是通过严格坚持理智唯心主义的基本主题，即费希特的先验主观性的基本主题而达到他们的非理性主义的。以我之见，这正是具有非理性内容的唯心主义何以可能的明证。

第二个要素是对与现实相对立的可能性的强调。事实上，它是在新本体论思想的语境中所能够察觉到的最大困难，也即可能性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在这里，我要小心处理，不愿把这种新的本体论圈定在这个本体论本身就饱受争议的困境之内。但是，在存在的“纲领”至少较之受其处理的事实性具有优先性问题上，双方是一致的；作为一种后思并在其并非如此的时候被匹配进入存在的纲领的事实性服从于批评。在可能性领域的优势中，我发现了唯心主义的因素，因为在纯粹理性批判的语境中，可能性与实在的对立不过就是概念的主观结构和感性杂多之间的对立。新本体论与唯心主义立场的关系不仅能够解释它的形式主义和它的范畴不可避免的、事实性无法顺从的普遍性，而且为理解同义反复提供了一把钥匙。海德格尔说，进入圈子不是什么错误，唯一要紧的是以正确的方式进入。我倾向于赞

同他。但如果哲学为了忠实于自己的任务的可靠性，那么，正确地进入圈子就无非是说存在把自身规定或解释为存在，该存在在通过解释它自身如此这般的解释活动中弄清楚了那些要素。如我所见，同义反复的趋势只能通过旧唯心主义的同一性主题得以澄清。它通过历史性存在被归类于历史性的主观范畴得以产生。被历史性的主观范畴所归类的历史的存在应该与历史是同一的。它应当顺从于历史性所留给它的规定性。对我而言，同义反复与其说是语言在神秘的最深处的自我奠基，倒不如说是古典唯心主义主客体同一性观点的新伪装。海德格尔向着黑格尔的新转向似乎确认了这个解释。

问题修正了，它的出发点势必也要修正。把世界分裂为自然存在和精神存在或自然存在和历史存在两个部分，这一自主观唯心主义确立以来所通用的传统必须被克服。它所留下的位子必须由世界在自身中所达到的自然和历史的具体统一来填补。无论如何，具体的统一不是以真实存在和可能存在的对立为导向的，而是从真实存在自身的发展中生成的统一。如果不是被指引到存在的可能性，而是在具体的内在于历史的界定中被极端地指引到了如此的存在者，那么，新本体论中的历史纲领只是为赢得本体论的尊严、获得对存在的现实解释创造了机会。每一次把自然静止状态从历史动力中排除出来的做法都导向了错误的绝对，每一次把历史动力学从它之中不可克服地设下的自然性中孤立出来的做法都导向了糟糕的唯灵论。新本体论的系统表述的成就，就是彻底地阐明了自然要素和历史要素之间不可超越的相互交错性。另一方面，无所不包的整体必然清除这一纲领，进而，从现实的立场批评现实和可能的分离就成为必须了，而以前它们完全是没有关联的。它们首先是一般的方法论要求。但还有更多的东西要假定。如果自然和历史的关系问题是被严肃地提出来的，如果历史性存在在其最具有历史规定性之外，也就是最具有历史性之处做到了把自己理解为一种自然存在，或者，如果在自然看似最深入地固执于己的地方做到了把自然理解为一种历史性存在，那么，它就给解决问题提供了机会。问题不再仅仅取决于在历史性范畴之下（包括它自己）把历史事实正相反对地（toto caelo）构想为自然事实，而是要把历史之中的事件的被嵌入状态还原为自然事件的被嵌入存在。不再有居于历史之下的存在，也不再有居于历史之中的纯粹存在，历史性存在应被理解为像自然存在那样的本体性存在。将具体历史还原为辩证自然，这是历史哲学本体论的再定位的任务：自然历史观念。

二

我现在从那已经引向自然历史观念的建构的历史哲学问题出发开始进一步的分析。这个观念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到目前为止，在关于特殊质料、尤其美学质料的历史哲学著作的语境中，它拥有约束力的身份。说明像自然这类历史的观念之最简便的方式就是引用自然历史概念的源文本。我指的是卢卡奇和本雅明的著作。在《小说理论》中，卢卡奇在这个方向上使用了第二自然概念。卢卡奇所使用的第二自然概念的框架，是对一个有意义世界和一个无意义世界（一个直接的世界和一个异化的世界，商品世界）的一般历史哲学观念，他力图表现这个异化世界。他称那个由人创造、然而人却失去了对物支配的世界为“传统世界”。“在目的没有直接给定之处，那些在成长为人的过程中，心灵所遭遇到的、作为它的发生地和基础的构成物，失去了它们在超出个人的、理当如此的必然性中的明显根基；它们是简单的存在物，可能强大，可能脆弱，但是，它们既不携带对绝对的奉献，也不是灵魂的过度内在性的自然承载者。它们形成了传统世界，是只有灵魂的最深处才能逃避其万能的力量的世界，是一个在一望无际的多样性中无所不在的世界；它在生成和存在中严格的法则对于认知主体必然是明显的，在一切合法性下，它既不将自己作为意义呈现给探索目标的主体，也不将自己作为材料以感性直接的方式呈现给行动的主体。它是像第一自然一样的第二自然——对卢卡奇而言，‘第一自然’类似异化的自然，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那样，它只是作为众所周知然而无感觉的化身而能被界定，因此，在真实的实质中，它是不可理解、无可认知的。”[1](p.52)传统世界被历史地生产出来这一事实，和不能被解码然而可以以密码的形式面对我们的陌生化的事物世界，就是我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的起点。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自然历史问题首先是认识和解释这个异化的、物化的、死亡了的世界何以可能的问题。卢卡奇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陌生性和谜状的特征。如果我可以成功地给诸位说清楚自然历史的观念，那你们就不得不首先经验一种这个问题本身所意味的震惊（θανμάζειν）。自然历史不是自然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的综合，可能是视角的彻底改变。兹把卢卡奇触及这个概念的段落抄录如下：“人构造的第二自然没有感情的实在性，它的形式太僵化以致不能使自己适应具有象征

创造性的时刻；它的规则的内容反映被如此僵硬地界定，以致不能使自己从那些要素——这是一些在抒情诗中生成小品文作家的创造冲动得以生成的要素——中解放出来，确实，这些因素排他地享受规则的恩泽，甚至不具有独立于它们之外的感性亲和力，以至于没有这些规律，它们就会消弭于无形。这个自然不是静默的、显明的、像第一自然那样无感知的：它是一个感觉综合体，但已变得僵化和陌生。它是一个腐烂的内心的陈尸所，因此如果可能，只有借助心灵之物——因为心灵之物在其早期或应然如此的存在中创造或保存了它——的再次苏醒的形而上行动才能唤醒它，其他任何内心都不具备体验的能力。”[1](p.54)

这里的觉醒问题被当作了形而上的可能性，该问题正是此处被理解为自然历史的问题。卢卡奇展望了作为存在过的历史性的事物化为自然的演变；石化了的历史就是自然，或者说，自然的石化了的生命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纯粹产物。谈到陈尸所，里面包含的密码要素是：每一个事物都有所意味，但必须首先被选取。卢卡奇只能以神学复活的术语，在末世论的语境中思索这个陈尸所。

面对自然历史问题，本雅明完成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他的做法是把第二自然的复活从无限的遥远带入了无限的内在，同时使之成为哲学解释的对象。哲学着手唤醒密码化和石化了的客体的主题，从而形成了自然历史概念。有两处本雅明的文字对卢卡奇的论述起了补充的作用。一段是：“自然是永恒的瞬时飘荡在他们（寓言诗人）面前，在这永恒的瞬间，只有那几代人远古的目光认出了历史。”[2](p.178)另一段是：“如果历史随着悲苦剧步入舞台，那也是以书面的形式。在自然的面貌上，瞬时的‘历史’字样赫然可见”。[2](p.176)它们针对卢卡奇的历史哲学又新增了本质上不同的东西。历史和自然交会的最深点就在这短暂的要素中。如果卢卡奇使历史的事物实现了向自然的还原，那么，现象的另一边就是自然本身呈现为转瞬即逝的自然即历史。

作为普通的结构是不可能对自然历史提问的，只有作为对具体历史的解释才可能提出此问。本雅明认为，寓言不是纯粹次要要素的关系，也不是此概念之下内容的偶然符号。在寓言和寓言的意指之间存在一种事实关系，“寓言就是表达”。[2](p.160)寓言通常被用来表示一个概念的感性表达，因此，它被标记为抽象的和偶然的。但寓言之显现与其所喻之意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符号含义，而是特殊性的展示，它是表现。在寓言领域中

所展现的不过就是历史的关系。可以通过寓言表达的主题就是历史。关于显现之物、自然与它的所喻之意、短暂性的关系，是这样解释的："象征和寓言的关系可在具有决定性的时间范畴之下加以有力的和公式化的规定。将此时间范畴导入符号学领域是这些思想家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洞见。与此同时，在象征中，带着毁灭的容光，变形了的自然在救赎的光耀下匆匆地揭示了自身；而在寓言中，观察者面对着的是历史经受了最大苦难的面容，一个石化的原始图景。一开始，和延迟的、悲伤的、失败的历史有关的每一事物，就在面目——不，是在死人的头上——表现出来了。虽然如此之物缺乏所有属于表现的'象征的'自由、所有经典的构型协调、所有属于人的东西，然而，不仅一般人类存在的本质，而且个别人的传记历史性，却都在这个以本性最弱的手法、在这个像谜一样的形式中，充满意义地说了出来。这就是巴洛克寓言观的核心、把历史作为世界痛苦史的巴洛克式的世俗展示，它只是在它的衰朽之处才有意义。含义越深广，死亡的虚弱程度就越大，因为死亡对自然事物（physis）和含义的犬牙交错的分界线进行了最深入的挖掘。"[2](p. 164f) 这里的"短暂性"和"意义的原始历史"说明了什么？我不能以传统的方式展开这些概念。我们正在讨论的东西与从一种"纲领"进行的推演具有实质不同的逻辑形式，这些概念以普遍的概念性结构为其根本性的基础。非此即彼的逻辑结构在这里无法运用。这是一个星丛结构。这里不存在以彼概念对此概念的解释，而关涉观念的星丛，也就是由短暂性观念、含义、自然观念和历史观念等观念构成的星丛。对此星丛不可当作"不变性"去回溯。当下这个论题不是要去寻访这些思想，相反，这些概念聚拢在具体的历史事实性周围，该事实性在一个存在于其唯一性的要素的语境下开放自身。这些要素是怎么聚在一起的？在本雅明看来，这是因为，作为造物，自然带有短暂特征的标记。自然本身就是易逝的。因此，它包含着历史这个要素。历史的要素无论在何时显现，它都要反过来指向在它之中消逝了的自然要素。反之，无论"第二自然"在何时显现，当传统世界向我们接近之时，它都能够被解码，因为它的意义被清楚地显示为它的短暂性。正如本雅明所首先理解的那样——这里的讨论必须被进一步推进——存在着有某种原初历史的基础现象，它们原初地定在，但已经消逝，然而现在却在寓言中被意指，从而在寓言创作中作为文字依据返回。它不可能仅仅指出如下问题，即：在历史本身中，不仅原初历史的主题一再出现，而且作为短暂性的原初历史

在自身中含有了历史主题。尘世的短暂性的基本性质意指着的无非就是自然和历史的这种关系：所有存在或存在者将被把握为历史的存在和自然的存在的交织。如短暂性一样，全部原初历史都被绝对地呈现。它以“含义”的形式被呈现。“含义”说明自然的要素和历史的要素没有相互融合在一起，相反，它们既相互分离又相互交织在一起，在历史中最历史地呈现为自然标志之处，自然要素就表现为历史标志和历史。所有存在，至少是业已生成的存在，都把自己转换为寓言；由此寓言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史范畴。就像“含义”一样，它本身从历史哲学的解释学问题、从先验意义的问题，转变为构成性地把历史超实体化为原初历史的要素。这就是“原初历史的含义”。例如，在巴洛克语言中，暴君的垮台等同于太阳下山。这种寓言关系已经包含对某种程序的预感在内了，这种程序将能成功地在其历史的特征中将具体历史解释为自然，并接着把自然在历史的符号下辩证化。这一构想的实现就是对自然历史观念的再一次说明。

三

在勾勒出自然历史观念的起源之后，我想深化讨论。卢卡奇、本雅明和自然历史观念的相互位置，在陈尸所形象的问题上被联系起来了。对卢卡奇而言，它是谜状的事物；对本雅明而言，它则是需要解读的符码。对于激进的自然历史思想来说，无论如何，一切存在者都把自身转变为废墟和碎片以及陈尸所，自然和历史在此处交汇，历史哲学在此处获得其意向性解释的任务。因此，双重转向得以形成：一方面，我把本体论问题转化为了一个历史公式，并试图在本体论被具体地历史地激进化的方式中显示它。另一方面，我已经揭示出，在短暂性的面目之下，历史本身是如何在一定意义上压向了本体论转向的。我对本体论转向的理解完全不同于人们以普遍方式对该术语的理解。因此，我由于自己的原因而要求重新申明这个表述，但将辩证地引入它。浮现在我眼前的自然历史不是“历史的本体论”，也不是下面这个企图：把历史环境的语境遴选出来，并辩证地使之实体化，它们作为一个时代的意义和基本结构应该把握了全部，狄尔泰大约就是这么做的。因为他对事实性的处理不够严肃，所以，狄尔泰之建构历史的本体论的企图搁浅了。他仍旧处于精神历史的领域中，用无约束力的思想时尚概念的方式完全不能灌满物质性的现实。问题的关键既不是精

神历史，也不是试图重建一个时代接着一个时代发生的历史的原始图像的结构，而是在作为自然历史的历史性自身中洞见历史的事实性。

为了说清楚自然历史观念，我将从相反的方面开始论述第二个问题（这是法兰克福讨论意义上的直接继续）。人们可以反对我，说我正在提出一种历史妖术，并在它所有的偶然性中，用历史的东西来冒充自然的和原初历史的东西。因为显现为寓言，所以与历史相遇的东西就被圣化为有深意的东西。这怎么着也不是我的意思。当然，问题的系统表述的起点即历史的自然特征是令人惊奇的东西。但是，如果哲学想成为的不过就是这种对震惊的默许，即作为历史的东西同时表现为自然，那么，这一哲学将同样适用黑格尔对谢林哲学的批评：在无从区分的黑夜里，所有牛都是灰色的。人如何能逃避这个黑夜？那就是我将澄清的事情。

这里的起点是，当位于我们面前的时候，历史呈现自身为彻底的非连续性，不仅因为它包括完全不同的环境和事实，而且因为它包括结构性的不相等。如果茨勒（Riezler）列举出了关于历史性的三个既互为矛盾又互相交叠的范畴（那就是，命运女神 tyche、厄运 ananka 和自发性），那么，我并不打算用所谓的统一体来综合被划分为各种规律的历史结构。我相信，新本体论主义者确实已经在他们关于这一结构的构想中获得了丰富的成果。现在，如我所言，不能被合法地转变为一个结构整体的非连续性，不能首先把自身呈现为两种物质——已是之物的关于历史的神秘仿古的自然物质，和作为辩证的、被着重强调的新事物而浮现到历史表面的物质——之间的任何一个。这些范畴的问题性特征对我而言是清晰的。当它们在哲学语言中发生时，有差别的程序需要达到自然历史，而不预想它作为一个统一体，首先是人们接受并默许在它们的矛盾性中两种有问题的、不确定的结构。这是合法的，因为，通过研究呈现出来的结果，它表现为历史哲学时时发生为原初存在和新近生成之间的这种交错。请大家回忆一下，在心理分析研究中一切矛盾都以最清晰的状态呈现出来：不同于古代的象征（与它们无法建立起联想），也不同于内在于主体的、动态的、内在于历史的象征（它们能被消除殆尽，也能转化为心理现实和当下所知）。现在，历史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摘选、区分这两个要素，并将两者对立起来。只有在这种对立变得清晰可见的地方，才存在成功地完成自然历史构造的契机。在人们观察到古代神话和历史的新事物的时候，实用主义的发现才暴露出来，它们指明了这一发展进程的方向。很显然，作为基础的神

秘远古、所谓坚持物质性的神话决不是这种方式下的一个静态的基础。而且，在所有伟大的神话和我们的意识依旧承载着的神秘表象中，都存在一个具有历史动力的要素，而且其形式是辩证的。神秘的基础要素自身是充满矛盾的并矛盾地运动着的（这让人想起了双重人格现象和原始词汇的“相反意义”）。克罗诺斯神话就是这样的神话：极其令人崇敬的造物主的创造力是合二为一的，因为他是毁灭自己的造物、自己的孩子的神灵。同样，为悲剧奠基的神话学自身总是辩证的，因为它一方面使有罪的人的堕落和自然联系在一起，同时，它又从自身出发与这一命运和解：人把自己作为人从自己的命运中超拔出来。这里的辩证要素就是，悲剧神话本身带有向罪恶和自然的堕落，同时还包含了和解的要素，该要素本质上超出了自然关系。不仅是静态的非辩证的理念世界的观念，而且是那使辩证法突然中断的非辩证的神话观念，回指出了在柏拉图那里的起源。[3](p.78ff) 在柏拉图那里，现象世界潜存着；它被抛弃，且为理念可见地统治着。自从理念不再分有现象世界，它们就不再参与现象世界的活动了；作为理念从人的经验世界异化出来的结果，为了面对世界的动力学而维持自己，它们必然要转换他乡。观念变成静态的——冻结住了。可是，这已经是对意识作为直接性失去它的自然本质这一意识状态的表达了。在柏拉图时代，意识已经屈服于唯心主义的诱惑：自世界放逐而出、并与历史异化的精神以生命为代价变成了一个绝对。如果我们要获得对自然历史的具体表征，就必须使自己从关于神秘要素的静态品格的虚幻中解脱出来。

另一方面，辩证地产生出来的“新事物”，在历史中现实地把自己表现为远古。历史“在它是最历史的地方是最神秘的”。这提出了重大的难题。例如“貌似”（Schein）——我指的是先前所说的第二自然意义上的貌似。这个第二自然就是貌似的自然，它显得意义丰富，而其貌似却是历史地被生产出来的。要么因为我们失去了现实，并且我们在它虚化的时候还能把它理解成是富有意义的，要么因为我们如同在寓言中发生的那样，把主观意图作为含义插入了这个变得异在的现实，所以，第二自然是虚幻的。现在，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内在于历史的本质就是这类神秘事物的貌似。正如貌似的要素存在于一切神话之中，正如形式为渎神和瞎眼的神秘命运的辩证法总是由貌似开创一样，被历史地生产出来的貌似的内容总是神秘的。这不仅因为它们回到了古代原初历史之物、在艺术中每个幻觉要素总是与神话相关（这可以想想瓦格纳的例子），更重要的是，神秘的特

征在貌似的历史现象之中自我回归了。它的澄清将是一个真正的自然历史问题。这包括阐释，例如，在特定的房子中你感受到了貌似的某一特征，然后“曾经如此”和“被重新认出”的想法就随着貌似相伴而生。“似曾相识”（deja - vu）和“重新认出”这两个现象将在这里被分析。焦虑的神秘原始现象继续回到这个内在于历史的异化的貌似的前面。在传统的表象世界面对我们之处，远古的焦虑到处为害。此外，凶兆这个要素也是貌似所特有的。貌似有一个特征是把任何东西都像拖入漏斗一样拖入它自身，这也是神秘要素众多特征中的一个。貌似的现实性要素与它的简单图画正相反，在遭遇它的任何地方我们把貌似感知为表现，它不仅是能被丢弃的幻觉，而且还表达了在其内部发生、然而独立于其貌似因而无以被描述的某物。——这也是貌似的一个神秘要素。最后，我们可以做如下总结：神话的决定性主题即和解主题，亦为貌似所独有。情感总是与最微末而非最伟大的艺术作品相伴，这一点值得记住。我指的是和解的要素，它就在世界最虚幻之处显现出来的地方：在世界同时被所有“意义”最紧密包围的地方，和解的希望被最完美地给予了。由此，我提示你们注意貌似自身中的原初历史的结构，在它的如在（Sosein）中，貌似证明自身是历史地被生产出来的：或者用传统哲学术语说貌似是主客体辩证法的产物。第二自然在真理中就是第一自然。历史的辩证法不仅仅是对被重新解释过的原始历史质料的再度提及，而且是历史质料把自己向着神秘之物和自然历史的事物转换。

我其实想要谈论的是这些事情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但我只能说：它不是用一个理论来补充另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理论的内在解释问题。也就是说，我服从唯物辩证法的裁判。这可以证明：这里所说的，只是对唯物辩证法某些基本要素的一种解释。

参考文献：

[1] George Lukács, Die Theorie des Romans [M], Berlin, 1920

[2] Walter Benjamin, 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 [M], Berlin, 1928

[3] Sören Kierkegaard, Begriff der Ironie [M], Berlin Müchen, 1929

（张亮　译，吴勇立　校）

哲学的现实性[1]

[德] 泰奥多·W. 阿多诺

今天，任何一个选择以哲学为职业的人，都必须首先抛弃以往执行哲学计划时怀有的幻想：思想的力量足以把握真实事物的总体。在一种其秩序和构造打消了理性要求的实在里，并没有正当的理性；理性只是强辩地向认识者呈现自身为总体实在，同时，它只是提供如此希望：有朝一日进入正确和正当的实在。今天，把实在呈现为如此的哲学作用无他，只是遮蔽了实在，并使它的现存条件永恒化了。在一切回答之前，这样的功能已经被置入了一个问题之中——那个被认为是激进的而实际上最不激进的问题：关于存在（Sein）自身的问题。这一被新本体论纲

① “哲学的现实性”（Die Aktualität der Philosophie）一文是阿多诺于1931年5月7日在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所做的就职演讲。在这篇演讲中，阿多诺表达了自己对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运动的总体看法，以及对未来具有现实性的哲学发展的一般构想。从这篇演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本雅明《德国悲苦剧的起源》一书对阿多诺的强烈影响。该演讲在阿多诺生前没有正式发表，后编入《阿多诺全集》第1卷。——译者注

领明确地表述出来的①、尽管有很多矛盾却是诸唯心主义体系的基础的问题，据说已经被克服了。这一问题将其可能的回答假定为前提：思想绝对适应于存在并能进入存在；存在者（Seiende）观念是能够问明的。可是，思想对于作为总体的存在的适应性已经朽烂了，随后，存在者的观念自身也不再能让提问进入自身。因为，自从我们的生活形象仅仅能够通过历史得到保证，这一思想独自高居于完满的、封闭的实在之上，有如高悬于纯净的、透明夜空中的星辰，并且，它现在或许已经永远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也就是说，存在的观念在哲学中已经变得苍白无力；它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形式原则，这一原则的古代尊严有助于覆盖任何内容。作为总体性，真实事物的丰富性不能任其被归置在将意义赋予给自己的作为总体性的存在观念之下；而存在者的观念也不能从实在的要素中被建构出来。相对于哲学，它（存在的观念）失落了，因此，它之于真实事物总体的要求就在它的源头处被否除了。

哲学史本身见证了这一切。唯心主义的危机同时就成了哲学之于总体性的要求的危机。自主理性（autonome ratio）——这是每一种唯心主义体系都要涉及的论题——被假定能够使实在概念得以形成，并使得全部实在都从其本身形成。马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艰辛劳作，力图从逻辑范畴中得到实在的内容，它的确保存了自己作为一个体系的独立完整形式，可也因此放弃了对实在的一切权力并退缩到一个形式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对内容的每一个确定实际上都逃逸到了一个虚拟的过程的最远端。在唯心主义内部，与马堡学派对立的是西美尔具有心理学和非理性主义倾向的生命哲

---

① 阿多诺在这里指的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存在哲学。自1927年出版后，《存在与时间》对德国的知识界（包括形成中的法兰克福学派很多成员）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它实际构成当时人们思考、言说哲学之必须面对的前提。1930年之前，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认为应当以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去补充、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点在马尔库塞1928年向海德格尔提交的教职论文《黑格尔的本体论与历史性理论》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不过，海德格尔最终以沉默拒绝了这种发挥，同时，法兰克福学派也意识到它不可能构成有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而只可能是其批判的出发点。作为一个在现象学运动中成长起来、直接感受过《存在与时间》的理论震撼力的青年学者，阿多诺自然明了ontology这个术语在海德格尔那里的存在论新义，不过，从他的批判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其实认为海德格尔并没有跳出或逃出黑格尔本体论的唯心主义窠臼。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将相机翻译这个词。——译者注

学，虽然保留了与自己所应对的实在的接触，可如此也就失去了对强加给它的经验世界的赋予意义的所有权利，屈服于“生活”这个盲目而蒙昧的自然概念，它徒劳地希冀将此概念提升为“非常生活”的含混的、虚幻的超越。最后，执两用中的李凯尔特西南学派自称，较之于马堡学派的理想，自己拥有在价值上更具体、更便于应用的哲学标准，并且形成了一个方法，该方法在与那些价值有着一如既往的可疑的关系中设置了经验实在。然而，价值的地点和来源依旧悬而未决；它们居于逻辑必要性和心理杂多之间的某处，既不在实在中紧密相连，又不具有精神内的明晰性；不过是一个既不能回答价值由何而来，也不能解决价值为了什么的现象本体论。与唯心主义哲学的宏伟解决方案有所不同的是科学哲学，它在起点上就放弃了关于实在的构成的唯心主义基本问题，并在解释性的初级学科尤其是自然学科的框架里使之成为行之有效的前提。因此，在被给予的事物中找到安全保障的基础，要么是意识的关联，要么是对个别学科的探索。因为脱离了哲学史问题，所以它们忘了：在每一个前提中，它们自身的确定性都难以分割地与历史的问题和问题的历史相关联，不可能与后两者分开独立存在。

落入这种形势中的，就是哲学精神今天在现象学的名义下为我们所知的一种努力：该努力力图在唯心主义体系瓦解之后沿用唯心主义的工具即自主理性，获得超主观的有约束力的存在秩序。一切现象学意图的最深刻悖论在于，它们竭力通过从主观的后笛卡儿思想而生产出来的相同范畴，获得与这些范畴的原初意图相反的客观性。因此，胡塞尔的现象学始于先验唯心主义这一事实绝非偶然，新近的现象学著作越是试图掩盖这一点，就越是不能掩盖这一起源。胡塞尔在理性与实在的关系的基本问题意义上认识到了非演绎被给予性概念（该概念正是实证主义发展而来的），并使之有益，这是他真正创新的发现，其重要性超过了表面上更具有效力的“本质直观”方法。他从心理学中拯救了“源初给予直观”概念，并在哲学描述方法的发展中，赢回了在个别学科那里老早就失落了的有限分析的确定性。胡塞尔率直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一事实本身，证明了他伟大而清明正直的品质；但这也不能否认，胡塞尔对被给予事物的每一个分析涉及一个隐含的先验唯心主义体系，胡塞尔最终是这么表达其思想的：“理性的裁决”（*Rechtsrechnung der Vernunft*）是对理性和实在的关系的最终裁决，因此，胡塞尔的所有描述都发生在理性之中。胡塞尔从无节制的思辨中纯

化了唯心主义，使之达到它所能企及的最高实在性的标准。可他没能够冲破它。与科亨和纳托普一样，他的领域也是由自主精神统治的，重要的差别在于，不管怎样，他放弃了精神生产力要求以及康德和费希特的自发性，就像康德那样满足于拥有他能充分企及的领域。对近30年来哲学发展史的普遍解释，将会在胡塞尔现象学的自我满足中看到其局限性，把它看作能最终引向阐明存在秩序的计划的进程的起点，而在胡塞尔对意向活动和意向相关项的关系的描述中，这一秩序是能被正式制定出来的。我明确反对这一解释。实际上，以牺牲一种研究结果的确定性（只有这种确定性才能为现象学方法提供合法性基础）为代价只是获得表面上的成功。如果说，在舍勒的发展中，永恒的基本真理在突然变化中轮换替代，为的是被放逐到了先验性的无能为力中，那么，我们当然就能从其中看到一种思考的无休止追问的冲动，这种思考在从错误到错误的运动中唯一地分有了真理。不过，相比于单纯的个人精神命运的范畴，我们必须对舍勒令人困惑不安的发展做出更严格的理解。相反，它指出：现象学从形式的唯心主义向质料的客观领域的成功转变，既不是无迹可寻，也不是没有疑义的；舍勒的哲学曾经那样诱人地在封闭的天主教理论的背景上设计出超历史的真理的图景，可一旦在实在中被找寻到了，那么，它也就变得混乱，然后瓦解了，“质料现象学”纲领就是对它的理解。对我而言，舍勒本人从质料形而上的角度认可了永恒理念与实在之间的跨越，并克服了这种跨越，现象学因此进入了质料领域，于是舍勒把实在让给了一个盲目的“欲望”（*Drang*），该欲望与理念天空的关系是晦暗不明且问题丛生的，只给希望留下了最微薄的空间，舍勒最后的转向似乎拥有它真正模范的合法性。对于舍勒，质料现象学已经辩证地取消了自身。在本体论预谋中只剩下了欲望形而上学；他的哲学所拥有的最后永恒性是无边际的、无法支配的动力学的永恒性。就现象学的这种自我取消方面来看，海德格尔理论无非是将其理论以起点的痛苦出现，该痛苦能够说明其外在作用。

对于海德格尔，至少在他已经出版的著作中，对客观理念和客观存在的追问已经被主观理念和主观存在问题置换了。质料本体论的要求已被缩减到主观性领域内，它沉潜于主体性的深处去寻找，却对实在开放的丰富性熟视无睹。就此而言，海德格尔回转到了由西方思想产生出来的最新主

观本体论计划即索伦·克尔凯郭尔的存在哲学，[1] 这决非偶然，至少不是哲学历史意义上的偶然。但是，克尔凯郭尔的计划已经不可挽回地被粉碎了。没有任何被坚实奠基的存在能够达到克尔凯郭尔无休止的内在主观辩证法；向着它敞开的最后深渊就是主观性崩溃于其中的绝望的深渊，这个绝望是一个把主观性之中对存在的谋划魔化为对地狱的谋划的客观的绝望。它知道，除了跳入先验性之外，再也没有办法能逃脱这地狱般的所在了。这跳跃是一个非真实的、无内容的、本身为主观性的思想行为，并在以下这个背反中发现了它最高的规定性：此处的主观精神必须为自己牺牲，并为此保留一则信念，该信念的内容独独源自于圣经的语词，且对于主观性而言是偶然的。只有通过假设一个本质上是非辩证的、历史上是前辩证法的“上手的”现实，海德格尔才能逃避如此后果。但不管怎样，对主观存在的跳跃和非辩证的否定是海德格尔唯一的辩护理由。借着对发现之物的分析，海德格尔因此保持了和现象学的关联，并在原则上和克尔凯郭尔的唯心主义思辨划清界限，避免了信仰先验性及信仰先验性对主观精神牺牲的自发介入，反过来，他承认，只有在死中才能实现对生机论的“如在”（*Sosein*）盲目而晦暗的超越。凭借着海德格尔的死亡形而上学，现象学就此保证了舍勒已然以其欲望理论宣布开始的发展。我们不能隐瞒这一点：现象学正要结束其生机论，而这生机论正是它最初向之宣战的对象。西美尔的死亡的超越性与海德格尔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始终是心理范畴，而海德格尔是在本体论意义上言说的。不过，在事实中，例如在对焦虑现象的分析中，发现区分这两者的可靠方法非常困难。

与对现象学向着生机论变迁的解释相一致，海德格尔能够通过历史主义逃避现象学本体论的第二个巨大威胁的途径是他将时间本身本体论化，并将时间确定为人的构成本质。因此，在人之中发现永恒事物的质料现象学的努力也就悖谬地自我解除了，作为永恒，只有暂时性被保留下来了。仅有若干范畴能满足本体论的要求，现象学正要把思想从这些范畴的独断统治——纯粹的主观性和纯粹的暂时性——下解放出来。因为“被抛”概念被设定为人的存在的最后条件，所以，生命自身才在生命哲学中变得盲

---

① 在1930年提交并获得通过的教职论文《克尔凯郭尔：审美对象的建构》中，阿多诺曾专门讨论过克尔凯郭尔与海德格尔的关系问题，其基本结论是：海德格尔哲学与作为其思想起源之一的克尔凯郭尔存在哲学的本质都是唯心主义的。——译者注

目和意义空虚，而死亡不论是在这里还是在那里都无法给生命赋予肯定的意义。思想对总体性提出的要求被抛回思想自身，并在这里最终又破灭了。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去理解洞见海德格尔生存论范畴里诸如被抛、焦虑和死亡的狭隘性，这些范畴不能消除生命的丰富性，而纯粹生命概念恰好完全抓住了海德格尔的本体论计划。如果这一切没有在骗人，那么，对现象学的进一步发展而言，现象学哲学随着这次扩大已经准备了自身最终的解体。现在，哲学第二次苍白无力地面对着对存在的追问。与早先能从自身展开相比，它同样不能把存在描述为一个自立的奠基性。

我方才讨论了最近的哲学史，但这不是为了一般的思想史定位，而是因为哲学的现实性问题仅仅是从问题与解答的历史纠葛中精确地产生出来的，并且是在用简单的形式建立一个宏伟的总体哲学的努力失败之后产生出来的：哲学自身还是现实的吗？我们不应在关于一般思想境遇的、没有束缚力的观念的基础上，将“现实性”理解为哲学的暧昧或不成熟性，而应在更准确的意义上来理解它，即：在最后的伟大努力失败之后，在哲学问题和它们被根本解决的可能性之间，是否存在适当性？这些问题的新近历史的真正结果是否说明，它们首要的哲学问题在本质上是不可回答的？尽管这个问题绝不是一个修辞学问题，但也应当被逐字逐句地对待。如今，不是使自己依托于当下的精神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安全性，而是真理之上的每一种哲学，都面对着一个对哲学本身进行清算的问题。科学，尤其是逻辑学和数学科学，已经以前所未有的严肃开始了清算哲学的工作。这种严肃性相当重要，因为包括精确自然科学在内的个别科学，早就摆脱了自然主义概念工具。而在19世纪，它们曾将这种概念工具置于唯心主义认识论之下，并完全获取了认识论批评的事实内容。在锐利的批判性认知方法的帮助下，最先进的逻辑学——我指的是从石里克开始的新维也纳学派，如今在卡尔纳普和杜布斯拉夫的继续领导下与罗素及其逻辑分析学家建立了紧密联系——正企图把经验之所有可靠的可广泛达及的知识保存在一个隐秘的处所，仅仅在同义反复和分析命题中找寻所有超越了经验循环及其相对性的命题。据此，康德对绝对先验综合判断的构成的追问就成了无本之木了，因为这样的判断根本不存在；所有对借助于经验的可验证之物的超越都被排除了，哲学仅仅具有整顿和控制个别科学的职能，而不允许从它自身及个别科学的成果中添加本质的东西。对于这种纯然的科学哲学的理想而言——不是对于维也纳学派而言，而是对于这样一种见解：企

图面对单纯的科学性要求为哲学辩护、并且自行认可这种要求的见解——哲学诗性的概念被归类为补充和附录，这种概念独自在真理面前的约束力缺乏被其不懂艺术和美学的低下所超过。但较之于用诗性理想作为哲学清算的辅助手段，一劳永逸地清算哲学、把它溶解到个别科学之中，倒是更加可取的，因为前者无非是对错误思想拙劣的粉饰。

我们在这里必须要说的是，这个主题，即原则上所有哲学追问能被化解为个别科学的追问，即使在今天，也绝不是确凿无疑可以成立的，首先，它绝不是像它表现的那样没有前提。我只是想提醒大家注意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建立在那种无以克服的主题基础上的。第一，就是“被给予之物”自身的意义问题，一切经验主义的基础范畴问题，在这样的范畴下对于相关主体的追问不时产生，并且只能用历史哲学来回答：因为被给予之物的主体不是非历史地同一的和先验的主体，而是呈现为随着历史而改变的、可以历史地理解的形式。这个问题恰好没有在经验批判主义、甚至在最现代的形式的框架之中被提出来，反过来，它天真地接受了康德的出发点。另一个问题对它来说也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只不过被武断地、以没有任何说服力的方式被解决了。对经验批判主义而言，未知的意识、异化的自我的问题只要通过类比就可以获致，并随之在一个人自己的经验基础上被构成；可事实上，经验批判方法已经必然地在它拥有的语言中及其可验证的假定中预设了陌生的意识。仅仅把这些问题摆出来，维也纳学派的理论就被拖入了它想与之远离的哲学发展的连续性。这不是无损于这个学派非同一般的重要性。我之所以看重它，倒不是因为它成功地完成了计划中哲学向科学的转换，而是因为它借助于它在表达哲学之中的科学时的严密性，使一切不从属于逻辑和个别科学的哲学内容的轮廓线变得清晰了。哲学不会变为科学，但是在经验主义攻击的压力下，它将从自身中放逐所有追问，这些追问因其特殊科学的属性正当地从属于个别科学，并使哲学问题的提出变得模糊。我的意思不是说：哲学将再度放弃或放松它与个别科学的联系，这样的联系是它最终重新获得的，并且这种联系的获致是最新精神史进展所获得的最杰出的成就。正相反，我认为，单单从个别科学的各自状况之中哲学就能理解问题的质料内容和具体化。它不会因为它将自己的“结果”当作完成的“结果”接受下来，也不会因为它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对此“结果”进行冥思而允许自身凌驾于科学之上。但哲学问题依旧在于——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替代的——把自己锁定在个别

科学最具体的问题之中。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并不像今天平庸的见解所认为的是依据一个更高层次的普遍性来决定的。哲学与科学的甄别既不是通过其范畴的抽象，也不是通过其质料的本质。核心区别在于，个别科学把它们的发现或最后的和最深刻的发现理解为不可分解的静态之物，而哲学则致力于把它所遭遇的第一个发现理解为需要解谜的标志。简单地说：科学的理念是研究，哲学的理念是解析。这样，就保留了一个巨大的乃至是持久的矛盾：哲学从未掌握过一把可靠的解析钥匙，它却不懈地并以真理的名义从事解析；在存在之物谜一般的形象和它们令人吃惊的纠缠中，被给予的不过就是稍纵即逝、消逝着的踪迹。哲学史不过就是这种纠缠的历史。因此，它几乎没有获得什么“结果”。它必须不断地重新开始，而且不能缺少先前纺织出来的哪怕最短的线头，因为可能正是这样的线头充了文学，使密码转换成了文本。

接下来要说的是，解析的理念绝不和“意义”问题相一致，两者在一起通常变得更令人困惑。一方面，积极地呈现这个意义，把实在描绘为一个意义丰富的事物并为其辩护，这决不是哲学的任务。对存在着的事物的每一个如此的辩护，都为存在自身中的碎片化所阻止。我们的知觉图景可能是精神的，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则不然，它是由纯粹知觉图景之外的东西构成的。哲学必须阅读的文本是未完成的、矛盾的、碎片化的，它之中的很多东西已经被移交给了盲目的精灵（*Dämonie*）①，事实上，对它进行解读就是我们的任务，通过解读，我们能学会更好地认识精灵的力量并学会驱逐它。另一方面，解析的理念并不要求假想一个第二性的背后世界，这个背后世界只有通过对显现事物的分析才能被打开。精神和经验的二元论是康德系统阐述出来的，只是经过后康德主义视角的整理它才被归结到柏拉图那里，他的理念天国是无伪装的、对精神敞开的——二元论可以更好地归类于探索理念而非解析理念；在除了回答之外没有什么是必要的地方，探索理念期待着问题向着被给予和被认知的要素的还原。从事解析的人在现象世界的背后探索构成其基础和支撑的自在世界，他们的举止

① 在现代西文中，*Dämonie* 通常都是些只具有消极意义的恶魔恶鬼。不过，阿多诺显然是在歌德的意义上来理解 *Daemon* 的，着重强调了它的积极意义。参见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31—233页。——译者注

好比有人想在谜中发现一个藏于其后的存在的映像，谜面反映出了此映像，反映出它承载了什么；相反，解谜的功能就是如闪电一般照亮那谜并扬弃它，而不执著于谜后面的事物和模仿它。纯粹的哲学解析不是偶遇已存在于问题之后确定的意义，而是突然地、暂时地照亮它，同时毁灭它。恰如解谜之构成是因为问题之单个的被分散的要素被导入各种派别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直到它们聚凑为一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的图形——同时，问题也就消失了。因此，哲学不得不把它从科学中得到的要素长久地导入变化中的星丛，不按照星相学的方式而根据科学之当下更流行的方式来说，就是导入变化中的实验组合，直到它们进入一个能被解读为答案的图形中，同时，问题也就消失了。哲学的任务不是探索实在之被隐匿的和显明的目的，而是去解析非意向性的实在，因为，借助于从实在之孤立的要素中构造图形或表象的结构，它扬弃了问题，对这些问题简明清晰的把握即是科学的任务。[①] 对这个任务，哲学总是保持着义务，因为它的光亮只能照亮这些坚实的问题。在这儿，我们可以发现如此惊人和令人奇怪的亲和性：它存在于解析哲学与一种思想之间，这种思想最强烈地把意向性观念和意义观念从实在之中排斥出去，这就是唯物主义。通过把在分析中被孤立起来的要素并列起来，以及假借这样的解析对实在的阐明，对非意向性事物的解析就成了每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知识论的纲领，对于这种纲领而言，唯物主义的程序越公正，它就越是远离它的对象的“意义”，其自身和一个含蓄的准宗教的意义的关联就越少。因为解析早就把自己和对意义的所有追问分开来了，换言之，哲学符号败坏了。如果哲学必须学着去放弃总体性问题，它就意味着：它必须学会在没有符号功能的情况下运作，到目前为止，至少是在唯心主义中，特殊好像代表普遍。它必须牺牲宏大问题，过去总体性曾想确保其伟大，虽然在今天，解析已经从宏大问题的大网眼之间滑掉了。如果真实的解析只有通过把最小的要素并置起来才能成功，它就不再参与传统意义上的宏大问题，或者说它仅在一种方式上参与宏大问题，这个方式就是它把总体性问题安顿在一个具体结果上，这个总体性问题是它从前似乎象征性代表过的。最小的和非意向性的要素的建构，因而属于哲学解析的根本性诸前提；向着弗洛伊德所宣称的“对

① 参见本雅明：《德国悲苦剧的起源》，柏林 1929 年版，第 9—44 页，特别是第 21、23 页。

物理世界的拒绝”（*Abhub der Erscheinungswelt*）的转向，因此拥有了超越精神分析领域的合法性，犹如进步的社会哲学向着经济学的转向，不仅仅产生于经济学的经验优越性，而且同样产生于哲学解析本身的内在需求。今日之哲学应当追问物自体和现象的绝对关系，但现实情况是，为了直截了当地追寻存在的意义，抓住当下更加流行的表述，它要么徒具形式、毫无束缚力可言，要么被分裂成了许多可能的和武断的世界观立场。

假如——不谈它的实际可操作性，我仅仅举一个思想经验的实例——一种社会分析的要素可能被如此编排：它的联系形成一个形象，而该形象的每一个要素却都在此被扬弃了。此种形象当然不是有机地呈现，而必须是被制造出来的，即商品形式。这无以解决物自体问题，即使在所谓社会条件被揭示、物自体问题出现的情况下也不行——这正是卢卡奇以前认为找到的解决之道——因为一个问题的真理内容在原则上与它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心理学条件是不同的。不过从对商品形式的充分建构出发，物自体问题的绝对消失倒是可能的：就像光源一样，商品和交换价值的历史形象可以使一种实在的构型揭示出来，物自体对此的隐蔽之意的发掘努力只能是徒劳的，因为，它根本不具有能被从前和第一时间的历史现象所取代的隐蔽意义。在这儿我不打算给出任何实质性的阐述，只想指出我认为是哲学解析的任务的方向。如果这些任务表述得正确，就要树立若干关涉这些哲学原则的问题的事物，而对此问题的明确立场则是对我力图回避的。也就是说，传统哲学研究对于超历史的、被象征性地表达出来的理念的期待，将在历史中被构建，非象征地完成。由此，本体论和历史的关系也因以不同的方式来定位，而无须动用艺术，无须在单纯的“历史性”构型中将历史本体化为总体性，如若这样，解析及其对象之间的每一个特殊的张力就失落了，而仅仅留下了一个戴面具的历史主义。以我之见，历史不应当再是这些观念产生、独立地凸显出来和重新消失的处所。相反，历史表象同时就是它们自身的观念，这些观念的关系构成了非意向性的真理，而真理并不是作为意向性显现在历史之中的。

但我要在这儿打断这个思想：因为一般陈述没有比在一个要求驱除抽象和一般陈述、只是在转变的必要性中需要它们的哲学中，更加可疑的了。对此，我想指出解释哲学和唯物主义的第二个本质关联。我说过，在这两者可同时存在的方式上，谜的答案并不是谜的“意义”。答案包含在谜之中，谜只不过描绘它自己的显现并把答案作为目的包含在自身中。进

而，答案就作为谜的严格反题而走出来，它需要从谜的要素中被建构出来，去毁灭谜，而一旦答案被决定性地给予了谜，那它也就不再意义丰富而是无意义了。在此过程中发生的运动被唯物主义以认真的方式执行了。认真在这里意味着详情没有停留在封闭的知识领域，而是被赐予它的实践。对现有实在的解析及其取消相互关联，实在并不是在概念中被取消的，但是，在实在构造的建构意义上，紧随其后马上产生了对这个实在进行真实改变的要求。谜的过程导致改变的姿态——不是它像这样的纯粹解决提供了一个解决的原始表象，只有唯物主义实践独自具有这种解决。唯物主义以哲学证明的方式为这个关系取了个名字：辩证法。对我来说，哲学解析才是唯一可能辩证的。当马克思谴责哲学家们仅仅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解释世界的时候，并反驳他们说，哲学的任务应当就是改变它，这个判决不仅是从政治实践，同时也是从哲学理论中获得了合法性。只是在取消问题的过程中，哲学解析的真实性才被证明是有效的，单纯的思想并不能展开它：因此，问题的取消使实践成为必要。由是观之，把对实用主义观念的理解（在此理解之中，理论与实践的纠缠如同在辩证法中一样）清楚地剔出来，纯粹是多余。

我清楚地知道推动我提呈给你们的纲领的不可能性——一个不是根源于时间的局限性，而是普遍存在着的不可能性——因为作为一个纲领，它无法在完全性和一般性中推行。当然，我也清楚地看到我的责任即在于给你们一些提示。首先，哲学解析的观念不会从哲学清算中缩回来，这个清算对我而言是以最近哲学对于总体性的要求的崩溃为信号的。对所有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论问题的严格拒斥，对不变的一般概念（也包括人的概念）的回避，对精神自足的总体性的每一个构想的拒斥，或对自我包含的“精神史”的拒斥，哲学问题集中在具体的、内在于历史的、不可拆分的复杂性之上，这些假定的确与迄今以来被认为是哲学的事物的分解变得极其相似。虽然（至少是官方的）当代哲学思考到目前与这些要求保持了相当距离，或它无论如何企图以稀释了的形式单一地吸收它们，然而，首要的和最现实的任务之一，似乎就是对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考的激进批判。我并不害怕有人批评我的否定性毫无成果，这个说法曾被高特富瑞德·凯勒定性为“华而不实的表达”。如果哲学解析事实上可以辩证地一枝独秀，那么，第一个辩证的攻击点就是由一个曾化育了那些问题的哲学提供的，较之于给老问题增加一个新答案，这些问题的排除显得更具有紧迫的必要

性。一个本质上非辩证的哲学，一个旨在获得非历史的真理的哲学，很可能错误地认为：通过忘却和在新起点上重新开始，老的哲学问题就可以被排除掉。起点的欺骗，事实上正是海德格尔哲学最先受到诟病之处。只有在与最新的哲学解决企图和哲学术语的最严格的辩证交往过程中，哲学意识的真实改变才能成功。因为解析的组合过程要求把那些细小的、非意向性的、依旧与哲学材料关联的要素具体化，所以，这种交往将从——首先是从社会学——中获取了个别科学的质料。

当代最有权威的学院哲学家对哲学和社会学的关系问题大约会做如是回答：如果哲学家像一个设计和执行房屋蓝图的建筑师，那么，社会学家就好比一个蠹贼，他从外面爬进来，偷走他能拿到的东西。我愿意接受这个类比，并站在有利于社会学功能的立场上为哲学家做一番解释。这所房子、大房子，它的基础很久以前就腐朽了，不仅可能毁灭在里面的所有东西，而且会使保存在其中的所有东西都被毁灭，其中很多东西是拿不走的。如果这个蠹贼偷走了这些事实上快被忘却殆尽的珍宝，那么，这些物品得到了拯救；他不可能将这些珍宝保存得很久，因为它们对他并无价值。当然，由哲学解析来评价社会学需要做一些限制。解析哲学的关键在于打造好钥匙，在这样的钥匙面前，实在霍然开启。至于关键概念的尺寸，都是专门按照订单来制作的。旧唯心主义挑选的概念太大，因此根本就插不进钥匙孔。纯粹唯名论哲学选的又太小，插进去了，门却打不开。许多社会学家在唯名论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以至于选择使用的概念太小，不能很好地与它们合作，一起“构成星丛”。留下的是单纯的这个决定因素之非逻辑因果关联，它嘲笑每一个认识分类，决不提供批判的标准。例如，阶级概念被废弃，由无数对单独集团的描述取而代之，由此，它们不再能被安排进具有重要意义的单位，虽然它们在经验中是如此显现的。再如，人们把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即意识形态概念，剥夺了其锋芒，他们的做法是将此概念正式地界定为按照某集团而做的某意识内容的归类，而不再允许对内容的真假性质疑。这种社会学把自己划分为一种一般的相对主义，它的一般性和其他一般性一样，都不能被哲学解析所承认，因为哲学在辩证的方法中拥有一个充分的方法能校正它。

关于哲学对概念质料的控制，我有目的地论及了组合和实验安排、星丛和建构。并非构成此在的意义但又消解和解决它的问题的历史表象，不是简单的自我给予。它们并不有机地现成地存在于历史之中，需要被意识

到的不是展示（*Schau*）或直觉。它们也不是被接受和被尊崇的魔术的历史神性。相反，它们必定是人类生成的，并且仅仅因为在令人信服的证据中实在聚集在它们的周围，从而使它们获得了合法性。在这里，它们最主要地是使自己与由心理分析所发现的古代的神秘的原型（*Urbilder*）区分开来，路德维希·克拉格斯希望把后者作为我们的知识范畴保存下来。不过即使历史表象与后者有一百个相同点，它们也在人类具有描述它们宿命论的轨道这一点上使自己与之区别开来了。即使在它们作为客观存在的磁力中心使自己客观地整齐一致的地方，历史表象也是容易管理和可以理解的，它们是人类理性的工具。它们是模型，通过它们，理性试探地尝试着接近那拒绝服从规律的实在，如果影响是正当的，这规律就会不时地模仿模型的式样。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重建旧哲学概念的企图：发明的艺术（*ars inveniendi*）的概念——这个概念由培根系统表述，在莱布尼茨时代曾被热烈地争论过，是一个被唯心主义作为古怪念头加以嘲弄的概念。模型的每一个其他构想应是有灵知的和无法辩护的。但是，这种发明的艺术的推理法就是幻想。一种正确的幻想，一种严格地停留在科学提呈给它的质料中、并且只有在最小的特征上超越了它们的幻想。如果我为你们发展的哲学解释观念是有效的，那么，它可以被表达为一个不时用想象来回答关于每次被预先给予的实在的问题的需要，这个想象重新组合问题的诸要素而又不超越这些要素，在这个问题的消失中可以控制这些要素的正确性。

我知道，你们中的许多人并不赞同我所提供的东西。不仅科学思考，进而基础本体论都与我对当前哲学任务的确信相抵触。但是，旨在把握事实关系、而非在事物本身中孤立的有效性的思想，习惯用以证明自己存在的权利的渠道不是反驳那些暴露了自己对立立场的批评，也不是声称自己是无可驳倒的，而是假手于歌德所使用的术语意义上的丰产性。但是，我可能要对最近的反对意见还要说一句，不是像我已经分析的那样，而是像基础本体论的代言人表述它们那样，就像他们第一次让我按照到那时为止都仅仅局限在哲学阐释的实践中的方法来进行理论的表述那样。

核心反对意见是一个以我的理解为基础的人的概念、此在的纲领；只是出于在历史的权能面前的盲目恐惧，我不敢把不变的东西清楚地、连贯地呈现出来，而是任其被遮蔽。我取而代之地给予了历史事实性或它的排列以一种属于不变的事物、属于本体论大地的力量；对历史生产出来的存在进行偶像崇拜褫夺了哲学中的每一个永恒不变的标准，让它在一个美学

的画片游戏内蒸发，把第一哲学（*prima philosophia*）转换成为哲学的论说文主义。

我在回应中只能采取如此办法：我承认它们在内容陈述上的大部分事实，但是，我要把它们作为哲学的合法性加以保卫。至于关于人类和此在的理解是否以我的理论作为基础，对此我将不做出裁决，但我定要否定诉诸这一构想的必须性。它是一个唯心主义的要求，一个具有绝对起点的要求，因为只有纯粹的思想才通过它自身得以实现。它是一个笛卡儿式的要求，相信对思想的前提形式和公理的形式进行思考是必要的。可是，哲学不再对自主性进行假设，不再相信实在能在理性之中被奠基，但是，它转而永远假定通过存在实现对自主理性的规律制定机制的突围，这个存在对它而言是不充分的和不能作为总体性被设计出来，这样的哲学将不能走完合理假定的路径，而是在不可还原的实在打断它的地方停了下来。如果它继续进入假定领域，它将只能够以牺牲它的实际任务被储备于其中的实在为代价，在形式上达到它们。但不可还原的事物的中断，却具体地历史地发生了，因此，历史要求思想向着它的预设运动。思想的生产性只能在历史的具体性中辩证地证明自身。思想和历史二者在模型中建立交往。鉴于为了如此交往而获得一个形式的努力，我很高兴忍受对论说文主义的攻击。英语世界像莱布尼茨那样的经验主义者把他们的哲学著作称为论说文，因为新开发的实在的力量（他们的思想与此力量相碰撞），不断强迫他们去冒实验的风险。直到后康德主义的世纪，实验的风险才连同实在的力量一块消亡了。因此，从伟大哲学的形式出发，论说文成为一个小的美学形式，在此形式的表象中，解析的具体性找到了避难所，在它的问题的大的维度上，真实的哲学早就不具有具体性了。

随着伟大哲学之中所有安全感的瓦解，实验也就进入其中了；如果它因此与对美学论说文被限定的、被划出轮廓线和非象征的解释捆绑在一起，那么，如果对象选择得正确，美学论说文也就不再显得是可以指责的了：精神真的不能制造或抓住真实实在的总体性，但是，它却能够渗透到细节之中，小规模地突破大群的单纯存在物。

（张亮　译，吴勇立　校）

胡塞尔与唯心主义问题[1]

[德] 泰奥多·W. 阿多诺

哲学家的功绩，即他真正的哲学功绩而非他作为一个教师或发起人所可能具有的功绩，不应由他在思维中所获得的“成果”来界定。那个胡塞尔自身曾确然分有的观念——哲学家必须形成固定的一套不可辩驳的结果——假设：他为自己设立的所有任务都能被切实完成，他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存在一个答案。不管怎样，这个假设极易引发争论。存在不能实现的哲学任务这倒是可能的，尽管这个任务是在一个自洽的思维过程中被提出来的；它们因此导致僵局，这既不是哲学家的过错，也不是一个应当由哲学史的偶然性来解释的意外事件，而是源于问题自身内在的二律背反。我将要讨论的唯心主义问题就在此之列。人们可以把这里的唯心主义理解为一种哲学，它试图把实在或真理这样的观念置于意识分析基础之上。像在最新例子中那样，它把“能建立一种主客体同一性”这样的一般假设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从体验（Erlebnis）领域中而来的观念最终陷入僵局，

---

① 留学英国期间（1934—1937年），阿多诺曾以胡塞尔现象学为主题创作过“一部内容广泛的手稿”，本意是想以此申请牛津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不过，阿多诺最终因为移居美国加入流亡中的社会研究所而放弃这一计划。后来，阿多诺曾从牛津手稿中拆分出四个部分独立发表，1940年用英文发表的“胡塞尔与唯心主义问题”（“Husserl and the Problem of Idealism”,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ume XXXVII, No. 1, 1940）一文就是其中的一篇。该文提纲挈领地表明了阿多诺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唯心主义本质的看法，可以作为他1956年出版的《认识论的元批判：胡塞尔和现象学二律背反研究》一书的理论预告来阅读。——译者注

这是唯心主义哲学的宿命。这可以由被给予性观念和直接内在经验观念来解释。在思想发展的最后阶段，胡塞尔最终还是批判地处理了这种观念。在《形式逻辑和超验逻辑》一书中，他说："即使在这里，在能够以某种更加精确地描述和限定的方式，来谈论在建构性体验中实际呈现出来的内在质料的地方，也必须警惕这样的错误，仿佛这个作为对象的质料已经伴随着它的实际呈现而被完全建构起来似的。"（第251页）另一方面，很显然，没有意识分析能像洛克感觉理论中发生的那样离开被给予性观念。人们必须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较之康德的先验综合观念或胡塞尔作为过程的明证性理论中的高度区分和中介的诸观念，直接给予概念更接近人类精神的心理学操作和行为。被给予性观念不能被最终确认这一事实，并不起因于它与确定体验不符合这一事实；它导致胡塞尔所描述的那种困难，因为他假定真理的终极源泉是意识统一。胡塞尔对任何给予性观念的异议，都关涉在那种统一之中的被给予之物的功能和每一被给予性在那种统一的语境之中必然假定的关联性，这非常有特点。很清楚，像胡塞尔对被给予性的批评这样的分析，在当前词语意义上没有产生任何结果；胡塞尔既没能以更充分的术语来替代被给予性观念，也没能像以基础事实术语来表达明证性的意向过程那样，表达据以阐释如此过程的理论假说。不管怎样，整个程序的价值在于它扭转了"主客体存在最终同一性"这个唯心主义预设。对我而言，胡塞尔哲学确切地就是一个从内部摧毁唯心主义的尝试，一个以意识工具去击穿先验分析之墙、同时力图尽可能完成这一分析的尝试。从胡塞尔哲学中选择出来的少量分析将在胡塞尔的立场上阐明这一违背唯心主义传统的尝试，进而阐明他因此遭遇的困难，因为他从来都没有从唯心主义预设中充分解放出来。

我认识到，像"问题自身的内在对抗性"这样的短语听起来容易招致反对，同时，详述包括上面提到的被给予性观念在内的观念运动的方法总是与黑格尔式的思辨有关。胡塞尔确实曾分有过这种猜疑，因为他不仅夸张地认为自己不曾理解黑格尔所说的任何一句话，而且，在讨论黑格尔拒绝矛盾原则这一事实的时候，他认为黑格尔是一个不能分清天才和疯子的糊涂蛋。对我而言，更有趣的是胡塞尔无意中为黑格尔的方法提供了一个实例。除了胡塞尔的最后时期之外，在他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的思想中，"动力学"或"过程"这样的术语，再也没有像在胡塞尔哲学中那样微不足道的了。他不是把思维解释为活动，而是解释为对事物的观看，就像在

博物馆欣赏绘画作品那样面对它们。他不是想通过精神过程使思想相互联系，而是想尽可能干净彻底地使它们相互分离。从他讨论算术问题的开端到最近，他关注的只是对永恒的实录法（*vérités éternelles*）的正当性的证明；对于消逝着的现象，他与古典理性主义者一样轻蔑。简言之，他是同时代最关注静态思维的思想家，这把他带到柏格森的基本对立面上。因为他使用的观念直观或本质直观概念经常与柏格森的直觉联系起来，所以人们经常会拿他与柏格森进行比较。尽管如此，他的思想还是在相反的形式中发展起来了，直到最后，一个和他所归属的时代的整个思想领域相对立的反题也发展起来了。胡塞尔起先是奥地利哲学家弗朗茨·布伦塔诺的学生，一种与布伦塔诺有关的类似性贯穿了他的整个哲学生涯。布伦塔诺哲学分别得到罗马天主教亚里士多德传统和英国经验主义的滋养。终其一生，他都试图把这些来源调和为一个自洽的思想体系，也就是说，他试图把严格本体论的客观先验论和庞大的心理学认识论融合起来。布伦塔诺的这一尝试一开始就具有一种强烈的反康德主义倾向。对布伦塔诺而言，真理中的先验要素不能被主观地构成，而应具有严格的客观品格，同样的观点在他的道德哲学中，特别是著名的《道德知识的起源》一文中得到了坚持，在这里，他试图以正确与错误术语，就是说以爱的客观正义或与问题中的观念相关的憎恨等术语去描述美德。这听起来有些自相矛盾，不过，正是先验性的客观本质这一表述使之倾向于经验主义心理学。如果与我们的知识相关的实质是客观地被给予，而非由我们的思维过程所构成，那么，思维过程就失去了它康德式的尊严和令人注目的特征：它可以在严格经验基础上被处理。不管怎样，布伦塔诺没有使自己满足于独断论和与批评相对的怀疑主义的崇高结合。他试图统一自己思想中的本体论和经验主义倾向，也正是这一统一的尝试使他对整整一代奥地利思想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了表达这种综合，他起用了一个学者的古老概念，据我所知，它首先是由邓·司各脱发展出来的。这就是指向特定精神活动——“体验”——的意向性概念，它从基础上被描述为具有超越它们的“意义”。在导入这个概念的过程中，人们可以看到一种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的激进的经验主义倾向。对这一看法而言，休谟关于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要微弱一些且为印象所修正的学说就不那么靠得住了。在分析古典经验主义称为观念的经验的时候，我们有权以体验术语来解释它们，而体验不是印象。保持在严格的表述水平上，我们只能说它们意味着它们不是某物。例如，

如果我现在想起昨天的牙痛，那么我现在的体验，即思维活动，就与其目标即牙痛不同；同时，另一方面，某种意义上，在我现在的思维行为中，我昨天的牙痛被精神地暗示为它的意向对象，而与它的超验实在或非实在没有什么关涉。意向性稍后成为胡塞尔的一个主要工具。他从他的老师布伦塔诺那里接受了这一概念，以及实质的客观特征观念和结合客观实质学说与对主观思维过程的分析这一欲望。胡塞尔起先是个数学家。他的思想材料一开始就与主观反映的相对性分离了，这一材料具有超越一切可能产生的怀疑的客观性。而且，在布伦塔诺的影响下，他试图把那个时代的心理学认识论运用到这一领域中，并给他的算术哲学一个适宜于算术的心理学基础。当他的算术批评者使之意识到这一尝试的必然失败时，他思想中的那个相反的动机才第一次被感受到。在第一次论及它的时候，黑格尔的术语“过渡”逐步转化成胡塞尔自己的语言，这一点意义重大：“思维的心理联系如何过渡到思维的内省的逻辑统一（理论的统一）上去，在这个问题上我却无法获得足够的连续性和清晰性。”（《逻辑研究》第1卷，序言，第12页）从此之后，胡塞尔尝试着从心理学的反映中把数学、不仅是数学而是作为整体的逻辑合法性解放出来，以证明它是一个自为的领域。胡塞尔在他的时代中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应归功于这么一个尝试：重新占有真理的客观性以反对相对主义的心理主义。人们应当看到，90年代早期，除了新康德主义之外，没有一个德国哲学家不宣称自己是心理主义的。为什么胡塞尔的《逻辑研究》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答案是：胡塞尔所代表的方向在实证主义之中自有根源，正是因为这些方向，胡塞尔成为他那个时代的心理学实证主义的敌手，当然这是与现在的逻辑实证主义极为不同一种实证主义。即使在他的成熟时期，在《观念》中，胡塞尔也坚持认为：“如果说‘实证主义’是指一切科学均绝对无偏见地建立在‘实证之物’，即原初地成为可把握之物之上的话，那么，我们就是真正的实证主义者。”（《观念》，吉布森英译本，第86页）也就是说，当他批评对数学进而对逻辑学的心理学接近时，他的动机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沉思，而是因为他发现：在人们科学分析数学真理（例如在实证的数学科学中被给予的数学真理）的实质的时候，它不可能被还原为与这些真理相关的心理行为。当胡塞尔哲学一再强调与事实观念相反的实质概念时，这一强调的来源是一种科学的来源。胡塞尔认为他正在坚持事实本身，即数学真理与任何事实存在无关的理想统一这个“事实”。在被给予之物必须如

其所是地被接受、不能被任何说明性的假设所修正的意义上，这些真理自身必须被理解为事实。虽然胡塞尔自己不首先想保存一个更高级的世界——可这正是它所暗示的东西——然而，在德国战后知识氛围中，他的哲学还是有力地成为一个通过实证科学自身而重建某种价值等级制的方法。他实际想展现的是：一个由数学程序训练出来的真正科学的进步的方法，不可能使自己满足于心理学方法，而必须寻求不同的证明。对他而言，逻辑的心理学基础是假言的思辨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形而上学的。

他反抗心理主义的斗争并不意味着独断论的偏见的重新引入，而是把批判理性从包含在朴素的、非批判的、他挑战其心理学形式的“事实”领域里的偏见中解放出来。胡塞尔哲学中的这一要素，就是我今天所看到的它的“真理”。

我所归因的这一点如此重要，以至我希望更具体地展现的实际就是《逻辑研究》第1卷所从事和再生产出来的核心证明，虽然与成熟的现象学哲学相比，此时胡塞尔显得尚不够成熟。这个核心证明被标示出来以反对那个假设，即作为“思维规律”的形式逻辑规律与“自然规律”或依据关于事物的心理过程是相互结合的因果规律是同一的。他坚持认为：根据实际思维必须以和理想的逻辑标准一致的方式进行的这个原则，因果性标准决不与这些理想形式自身等同。（参见《逻辑研究》第1卷，第68页）“一个生物被如此地建构起来，以至于它在进行统一的思维时不会作出任何矛盾性的判断，或者说，它不会得出任何违反三段论的结论的判断。但在这些事实中并不包含着这样一个论点，即：矛盾律、完全三段论等等是一些能够解释这种［生物］建构的自然规律。”胡塞尔以计算器为例说清楚了这一点。“未解决的数字的相互结合的建立所依据的是机器的规律，这种‘自然规律’根据被假定的算术原则的意义加以调节。不管怎样，没有人会以算术规律取代机器规律以按照物理学的方式来解释机器的工作原理。”胡塞尔在这里用以与机器进行比较的物理行为领域，就像加法机的机器工作原理可以根据数字出现的数学规则加以解释一样，可以从逻辑标准领域中推导出来。正如胡塞尔所说：“心理主义的逻辑学家忽视了在观念规律和实在规律之间、在规范性规定和因果性规定之间、在逻辑必然性和实在必然性之间、逻辑基础和实在基础之间所具有的那种根本性的、永远无法消除的差别。无法想象能够在观念和实在之间建立沟通。”（同上）逻辑真理向着心理学还原的不可能性把胡塞尔带到实在和观念的总体的割

裂，因为，以他之见，不假设在逻辑的和数学的原则自身中存在不可能的基础而把它们连接起来，是不可能的。柏拉图之后，通过思维曾被暗示出来的可能正是这个最极端的分离，因为思想本身就暗示一个心理行为——不过，它根植于一个严格的、想使纯粹数学免除经验所带来的污染的科学真理概念。

胡塞尔像以往任何哲学家一样不容忍这种分离、实在和观念之间这种极端的不可调和的二元论。他的反题的发展的第二步就是试图把它们合起来。现在很显然，“实在”、人的心理学实在和观念、逻辑和数学真理的合法性相互结合的唯一道路就是思维过程，这是在《逻辑研究》第1卷中作为证明方法而被拒绝的同一个原则。因为观念真理是且仅是思维的真理。没有数学命题或逻辑命题能以异于可能存在的思想的术语被构想。另一方面，思维意味着人的思维，那种不预定现实生动的个人的现实的物理思维行为的思想是我们所不能了解的。因此，下一步，胡塞尔的哲学就不得不在其实在和观念之间的含混性中集中考察思维自身的本质。胡塞尔经常被责备在《逻辑研究》第2卷中重新引入了心理学，它的副标题是“关于现象学和知识论的探究”。我不想对胡塞尔是否实际地堕落到了心理学之中这一问题进行裁决。《逻辑研究》的第2卷是他著作中最晦涩的部分，大段大段的作品，即使是最有耐心的读者也很难确立起明晰的意义，特别是因为在这本书中，胡塞尔没有在思维结构的实际描述和专门的术语讨论之间做出足够清楚的界划，尤其是没有分析当代认识论中的一些主要术语的双关含义。相当程度上，这可以归结为裁决“这些分析与实际的心理学过程究竟隔了多远”的难度。我发现，不管怎样，相似的困难也为康德哲学所遭遇，这特指《纯粹理性批判》第一和二版中的范畴演绎。对我而言，似乎事实领域和思维领域以某种方式纠缠在了一起，这种方式既企图分离它们又企图把世界还原为二者中任何一个原则，注定是要失败的。非常吸引人的是，实在的反面和观念所暗示的极度抽象转义到如此程度，以至我们无权认为这一抽象是可以归因于存在实质自身的基本原则。试图把世界还原为事实或实质的任何一个人，终将这样或那样地陷入敏希豪森的境地，他试图拽自己的辫子把自己从泥沼中拉出来。人们必须承认：在他完全摆脱事实性的敏希豪森式的企图中，当他把观念作为被给予的某物、能被给予的事实的时候，胡塞尔面临着不可超越的困难。我不打算进入《逻辑研究》第2卷的迷宫。这些研究之中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就是最后被称为

“知识的现象学启蒙的要素”部分。它实际假设为理想和现实提供了一座桥梁。它尝试建立一种知识方法，通过它我们能直接意识到那些逻辑客观性和理想统一。这桥梁，这达到，通过它我们可以“思想”不是由我们产生出来的、把绝对合法性贯注到理性明证性之中的理想现实性，胡塞尔称为范畴直观。这个观念对后来所有现象学尤其是对孔拉德－马修斯、舍勒的现象学都具有奠基性，但正如海德格尔所暗示的，后来被称为直观的本质直观，或吉布森所翻译的 essential insight，事实上只是在第 2 卷的最后一个研究中才发展出来的。在胡塞尔的《观念》中，这一观念或多或少被认为只是导引性的或第一章的基础部分。那些听说过胡塞尔的名字的人可能认为这一观念是第一性的。它导向胡塞尔哲学中唯心主义问题的核心。对我而言，自从胡塞尔的所谓主要著作即《观念》有了可以获致的英译本之后，而在范畴直观理论实际展开的《逻辑研究》没有被翻译过来之前，考察这个问题似乎是最明智的。

胡塞尔真的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人。作为形而上学沉思的革新者，使他声誉崇隆又声名狼藉的范畴直观观念在最后一个研究中只扮演了一个有限的角色，在它被引入之后，它变得有限并被废弃以至实际再也没有什么是留给它的了。他的整个直观理论是从比它实际证明的更无害的地方出发的。如果在胡塞尔那里仍旧存在一些独裁主义的动机，那么，能够认可的仅仅是那个证明真理是一个超人的客观性的欲望，在它那里依旧有相反的东西存在，一种批判态度，同时伴随着对把它交付给不能被承认是永恒的绝对的确定的几乎夸张的恐惧。胡塞尔是非理性主义的理性主义者，关于他的似非而是的性质已经由他的范畴直观理论所揭示。

使自己满足于作为预先被给予的某物之真理的纯粹发现物的思想所拥有之似非而是的结构，在特定意义上，导源于胡塞尔《逻辑研究》第 1 卷的逻辑绝对主义的本质。人们可以认为，范畴直观学说是与思维主体相关的逻辑绝对主义的必然后果。因此，即使在第 1 卷，我们也发现了一段包含了全部学说的文字：“他可以被心理主义证明欺骗，甚至依旧与一般模糊考虑保持密切联系。就其真实意义和它赖以被统觉为自身中的真理的明证性而言，对任何逻辑原则的纯粹的观看［Hinblick auf］都倾向于摆脱一种持续性幻觉。”（《逻辑研究》第 1 卷，第 64 页）范畴直观理论的主题是：“自身中的真理”、如其所是的客观地被预先给予之理想条目，因“纯粹的观看”［blossem Hinblik］而自明。这些真理被称为“事态”。翻译这

些术语的困难在问题自身的困难上有所指示。我在这里用“条目”（item）来翻译它，这是可以得到的最抽象的术语，它在自身中不包含任何指向问题中的“事态”的事实性本质的暗示。“事态”的字面意义是事实的相关性。它在这里所意味着的东西事实上极其似非而是。一方面，它意味着像一个事实的某物，因此它是被给予的某物，是我们自己没有增加的某物、我们不能改变的某物、我们对它没有权能的某物，简言之，是使你记起“顽固的事实”这一英语短语的某物。另一方面，“事态”就是事实：它们就是像数学原则一样的纯粹理想规律。在胡塞尔的“事态”观念据以建立的模式之后，它就不再涉及算术原则，不管是否还存在什么现实的、“世俗的”、能够依照这些原则点数的客体。它们仅仅描述了如此客体的可能性、决不因为它们可以与之联系的现实性而受影响的合法性。胡塞尔说：“当感性客体与感性直觉相关的时候，‘事态’或多或少与意识着它的给予行为相关。我们被推到如此远的地方，以至我们要说，‘事态’，纯粹的逻辑真理，就像感性客体与感性知觉相关那样，与它的知性知觉相关。”（《逻辑研究》第2卷，第140页）理性主义者胡塞尔想通过范畴直观，证明那对实证主义者胡塞尔显现成为知识的唯一合法源泉的直接被给予性的价值。一方面，他采用了布伦塔诺的“自身中的命题”，即合法性的纯粹统一；另一方面，他假定对洞察力的所有可能证明得以导源的意识领域是存在的，同时，还假定被给予之物、经验和生动经验领域的存在。这两个领域仅仅通过意向性得以连接。［直接给予性］象征性地被意味，并由实际经验所表示。以胡塞尔之见，意向易于导致直接，即完全不主体化和关系化它们。在直接自身中的存在被假定为“显现”。它不能被解释为由主观反思或抽象生产出来的存在，但可以被解释为自身被给予和可知觉的某物。不管怎样，它们不能被强迫以成为纯粹事实性和偶然性这样的方式去承受那个惩罚，一个简单的感性知觉必须承受的惩罚。在胡塞尔哲学中，范畴直观是突然出现的救星，通过这个救星它试图使其哲学中相互矛盾的两个动机达成和解。这两个动机一个是拯救真理的绝对客观性这一欲望，另一个就是他对实证主义证明之迫切需要的接受。

现在，这么一个似非而是的成果是不能从意向性观念、从纯粹意义中要求孕育的。因为意向性观念仅仅暗示：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意识之流中意指客观本质；它没有对它们的本质做出任何暗示。意指某物，意指像算术语句那样的理想条目，肯定不能与“是自明的”等同。人们也可以意指错

误的某物。胡塞尔因此以“直观的实现”来补充意向性。“一个首先象征性地发挥功能的陈述，稍后，将被一个对由这个陈述所意指的东西的或多或少是充分的直观所跟随。如果这发生了，我们就将经验一个自成一类的实现‘意识’。假如这个意图是指向某个目的或预谋的，那么，纯粹意指行为、纯粹意图就将在它的直观表征行为中发现自己的实现。”（《逻辑研究》第2卷，第32页）整个范畴直观学说的核心就是实现理论。让我们举一个不像胡塞尔学说那么抽象的例子：“国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是政府的唯一可能形式。”这是一个意图，就是说，我依据一个单独的意义排列了一组单词。可能对有些人而言这个意义不够自明，虽然他们可以理解它的意思。他们将不得不通过对它整个意义的直观以尝试着实现它。它的一些要素，例如在这个句子中提到的政府，将通过感官知觉在最后的分析中被实现。命题的其他要素，如“和”、“不”、“唯一可能”，就不是这样。胡塞尔担心的正是这些要素。但在他对命题真理的客观性的研究中，他拒绝这个观念：它们是我们自己思维的功能。他希望它们不仅是主观的要素。他归因于实现这个术语的意义。他说：它不能由自己的直观、一个非感性然而直接的察觉来实现。

“‘一个’和‘那个’，‘和’和‘或者’，‘如果’和‘因此’，‘所有’和‘非－’，‘某物和无物’，数量的形式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命题的重要因素。但是，即使我们完全有权把它们归因为相互关联的，它们客观的相互关联也不能在真实客体领域中被发现。这意味着与可能感觉直观客体领域相同的东西。”（《逻辑研究》第2卷，第139页）范畴直观概念发现了如下极端的公式：“如果我问，如果不是在我们在说感性一词时所暗示的狭义直观知觉中，意向的范畴形式将在何地发现它们的实现。答案将由上面的考虑清晰地呈举给我们。首先，只有当我们预设它为一个当然的事物时，任何一个对任一关于一个先行知觉的忠实命题的描述，将使它超越那个怀疑即形式将能发现它们的实现。”或者：“必定存在一个行为，一种经验，它对意向的范畴要素提供了一种相同的服务，这是一种简单的感官知觉曾让渡给意向的纯粹物质要素的服务。”（同上，第142页）为像“如此”和“和”这样的词提供服务的行为导致胡塞尔称整个语句的自明性为“范畴直观”，而当我们对红或绿有了一个感性知觉的时候，它也为这样的词提供类似的服务。只有当不仅是它之中的质料而是它意义的整体能通过知觉被完成时，陈述才是显明的。严格地说，胡塞尔没有能通过现

象学方法达到范畴直观，他没有描述任何范畴直观的实际行为，但他以某种假设的形式把它们演绎了出来。人们几乎可以说，他与其说通过观察事物自身不如说通过讨论术语而获得它们。在意义分析的标题下，胡塞尔及其部分门徒古怪地相信，它们能够通过观看词汇的纯粹意向而发现真理。虽然胡塞尔始终提防遁词，但在这里他还是成了自己遁词的牺牲品："范畴直观"术语在自身中是含混的。胡塞尔归因于对事态的意识、或声称隐匿在像"如此"和"和"术语之后的理想现实的直接性特征，正是实际判断行为的直接性。这可以系统表述如下：被主观地观看的判断是一个行为，一种经验，是直接被给予的某物。判断或意识到一个被判断的事态是相同的，或更准确地说，第二个表达是第一个的隐喻的划界。不存在意识到人已经判断的东西的、附加于实际判断自身的第二个行为，当然，除非一个人在反思这个判断。不管怎样，这个反思必然要超越实际判断行为的直接性，这个判断自为地将成为反思的客体。判断的直接性是由胡塞尔对事态的意识观念暗示出来的。但对事态的意识对胡塞尔而言也意味着向自己再次保证判断的真理。在"意识某物的给予行为"术语中（同上，第140页），严格地说，遁词（1）对一个事态的意识，即实现对判断的综合，因此（2）使这个判断绝对显明。没有表达的意义能被解释成为范畴直观。判断综合不是范畴直观，因为根据胡塞尔的说法，自发思维中的判断通过某种直观寻求其完成。根据胡塞尔的说法，反思，作为由范畴直观所保证的显明性的必然条件，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直观的。反思把事态放置到与其他事态的关系之中：它自己的结果是一个新的范畴化。即使最后分析中的反思回到感性、知觉要素，它也将在自身中容纳非知觉的反思、概念形式。胡塞尔称之为中介的直接，因为他相信那个材料：他想从谬误的纯粹可能性中拆除中介，即范畴直观。转而，他把普遍性和必然性归因于仅仅通过中介和反思过程是不能达到的直接性。

人们经常谈论胡塞尔柏拉图式的实在论。当然，在胡塞尔著作中，这种实在论是由极端认识论唯心主义伴随着的：就是说，他归因于柏拉图的那种现实的本质，就是与现实、事实、在时空中构成世界完全没有联系的本质。当我们进一步观察胡塞尔调和他的准柏拉图实在论的本质和唯心主义思维理论的企图时，人们可以看到，他堕落到了那被称为朴素逻辑实在论的东西之中。他使只是在与思维相关中才具有现实合法性的逻辑原则实体化了，就好像它们是有第二种力量的事物。如果它们是事物，那么，指

向它们的思想将退化为纯粹被动的接受。胡塞尔把康德思想自发性观念降低到了纯粹被动性的水平上。对胡塞尔而言，思想更多地是受影响，而不是康德关于我们的感觉是受先验的物自体影响理论的类似物。当康德试图把我们的经验奠定在对意识形式的唯一性分析之上时，他由于其先验物自体观念而陷入困境。我希望已经说清楚：胡塞尔由于坚持那个具有第二性力量的物自体而陷入的困境，就是说，他的独立于它们的主观构成的真理观念和他对这些思想向着纯粹消极直观的还原，并不比康德遇到的少。换言之，整个范畴直观观念实际上并不是现象学的新发现，但它不仅对德国哲学而且对整个现代哲学都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影响。范畴直观学说是一趟辛苦的旅行，它力图使意识分析和自身中的真理的结合成为一件杰作。

为什么胡塞尔在这个杰作中找到了避难所？值得指出的是，他的整个哲学都是为像范畴直观这样自相矛盾的观念所充斥；甚至在他的最后著作中，人们也可以发现像先天偶然性或本质自我这样的观念，这些意味着严格的个人、身体化的可仍然被假定为是绝对的非事实性的意识、纯本质，意味着不能从任何个体意识的多数性导源出来。这些自相矛盾的观念明确地指向一个方向。用他自己的话说，胡塞尔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无法解决的任务。术语的自相矛盾正是问题的不可解决性的表达。他的问题大约可以表述如下：在试图以纯粹唯心主义的工具，即思想和意识结构的唯一性分析去贯穿唯心主义的围墙的时候，他造了唯心主义思维的反。在扭转心理主义的方向时，胡塞尔赋予这一术语以较之于通常理解更宽广的意义，这一点是基本的。他对心理主义的攻击直接指向一个主体的观念，这个主体导源于“世俗”存在被预设为一个“世界”，要多抽象有多抽象。对他而言，即使是笛卡儿的自我也是“一丁点世界”，因为它是由我们对“无可怀疑之物”的世俗经验的界划过程所得到的，而非像胡塞尔所希望的那样，是由“我在”相关联的“改变了的态度”所得到的，这个“我在”不是一个现实，而仅仅是一个纯粹可能性。如果康德讨论“我们的”意识，如果对他而言，知性工具的功能发挥必定是事实性的，没有范畴是空洞的现实印象因此缺乏合法性，那么，对胡塞尔而言，康德也是一个心理主义者。事实上，胡塞尔在《哲学》期刊上的最后出版物已经把整个文艺复兴之后的现代哲学都谴责成了心理主义。换言之，他的攻击不仅指向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同时也指向唯心主义，他的影响主要来自反唯心主义哲学家这一称号。

“回到事物自身”这一口号已经成为一种攻击，他坚持诸如直观这样的观念的动机事实上就是回到质料自身的欲望。他想摧毁纯粹思维行为和意义的所有假设的上层建筑，摧毁所有出自体系化偏见的任意构造。如果我可以说的话，他的战役指向了所有哲学装饰、不属于事物自身的所有东西。对于所有德国唯心主义的宏伟体系而言，思想的自发性是全部真理的源泉，但对他而言，则就是思辨谬误的主要源泉。他在这个特定意义上是反唯心主义者。

但在胡塞尔哲学中，“回到事物自身”这一口号暗示出了最大的困难。他想达到事物，不仅仅是为了避免任意概念构造的谬误，而且是为了坚持一个绝对安全的不可动摇的不可置疑的真理。坚持绝对者的欲望、在最后的分析中用一种绝对的严格性从绝对的点上把万物演绎出来的欲望，是一个栖身于反唯心主义哲学之中的唯心主义欲望。一旦试图建立一个绝对哲学，他就被抛回自我的相同原则、他所拒斥的自发性。很清楚，他的哲学最后回到的观念是唯心主义的。以胡塞尔之见，赖以把捉事物自身的原则的原则，就是他如下话语：“最原始的直观是知识权威的来源，在原始形式中（就像在它的身体性现实中），在直观中展现自身的东西将作为它所展现出来的东西而被简单地接受下来，虽然只是在它展现自身的界限之内。”（《观念》，第92页）在这一原则的后面，除了陈旧的唯心主义原则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这一原则就是：我们意识的主观资料是所有知识最终的源泉，因此，任何奠基性的哲学分析必然是意识分析。另一方面，在胡塞尔那里，被给予性的反面，纯粹观念或胡塞尔称为本质的东西，通过向纯粹主观意识的还原而得到自己的证明，而与所有事实性和偶然的东西隔绝开来。被认为是胡塞尔反唯心主义的最后一击的本质学说却揭示自身为唯心主义的顶点：纯粹本质，似乎驱除了任何主观构成的客观性，不过就是它的抽象性之中的主观性，思维的纯粹功能，康德意识统一意义上的“我思”。

（张亮　译，张廷国　校）

论音乐的社会情境[1]

[德] 泰奥多·W. 阿多诺

一、概览、生产

今天，无论音乐何时响起来，它都以最确定的线条勾勒出当今社会存在的诸多矛盾和裂隙，同时正好通过最深的裂隙与这个社会分离开来。这

---

① 《论音乐的社会情境》(Zur gesellschaftlichen Lage der Musik) 是阿多诺 1932 年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社会研究杂志》上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论文，全文分上、下两部分于 1/2、3 上刊出，它也是阿多诺早期音乐社会学最为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其中包含了阿多诺后来音乐社会学思想发展的最核心主题。其写作动机直接来源于阿多诺与奥地利音乐家恩斯特·科内纳克 (Ernst Krenek) 关于音乐的历史与社会问题的讨论，部分内容已经出现在 1928 年的《固化的音乐》(Die stabilisierte Musik) 一文。在这篇长文中，阿多诺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尤其是《资本论》把论述的主题分为“概览、生产”，“再生产、消费”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阿多诺根据作曲家与社会的关系发展出音乐生产的类型学观念；第二部分，阿多诺分析了欧洲音乐历史的合理化过程，并由此孕育出后来“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源头，文章结尾部分阿多诺分析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全文观点庞杂，异常晦涩，其理论基础主要出自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理论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由于该文过于明显的马克思主义倾向，阿多诺在世时拒绝再版，但并没有放弃其中的观点。该文的中译有助于汉语学界考察阿多诺思想的发展过程，澄清学界对阿多诺审美“救赎”说的误读。原文载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8,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7, SS. 729 - 777。本译文根据 Richard Leppert 修订的 Wes Blomster 的英译文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usic (载 Adorno, essays on Music, Uns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翻译，根据德文校对。——译者注

个社会把自身连同它的裂隙一起制造出来，却不能从音乐的残渣瓦砾中吸收得更多。在这个社会过程中，音乐扮演的只是商品的角色，它的价值是市场的价值。它不再效力于直接需求和使用，而是与所有其他商品一样受制于抽象一致性的交换并与交换价值达成一致。其使用价值——无论何处它仍然存在——屈从于交换的强制性。19世纪尚能容忍的前资本主义时期“音乐演奏”（Musizieren）① 孤岛现在已经被冲刷得无影无踪：无线电和有声电影技巧，从属于强有力的垄断并且对全部资本主义宣传机构的无限支配，甚至已经占据了家庭音乐训练的核心。19世纪家庭音乐演奏的可能性——类似于全部资产阶级私人生活——只不过构成了社会躯体的反面，私人资本生产则是它的正面。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法清除了音乐所提供的最后直接性——本质上仅仅是一种幻象，其中个体生产和社会理解力之间的平衡频频受到威胁，而且自《特里斯坦》② 以来，这种平衡已经被彻底摧毁了。只要音乐生产与消费的资本主义过程无休止地纠缠在一起，音乐与人之间就会彻底异化。当然，这个过程包含了音乐的对象化与合理化，它从最初作为艺术铸造出来而使用的纯粹直接性中分离出来：转瞬即逝的声音赋予它以延续性。同时，这个过程赋予音乐以深远的冲动升华、人性的强制性交谈（Aussprache）。然而今天，合理化音乐与合理化社会一样陷入同样的危险，一旦它与阶级状况自身相对立，阶级利益就要求它终止。现在，这种情境已经把人置于一种合理化状态——一旦他的进一步辩证发展的可能性受到阻碍——把他在悬而未决的矛盾之间碾得粉碎。把音乐构成为艺术的同一物化，只留给他一种永不复故态的纯粹直接性——希望人而不是艺术被放逐到前劳动分工的阶段。今天，这种物化已经从人那里攫取了音乐，只留给他一种幻象。然而，总的看来，只要音乐不屈从于商品生产的戒律，它的社会责任感就被剥夺了并被放逐到真空地带而掏空了内容。这是今天每一个不愿陷入欺骗的人对音乐的社会情境所持有的观念。这些欺骗由于真实状况被掩盖的缘故而存在着，而且为音乐自愿受经济胁迫作辩解——被控制的商谈。它们同样出于这种事实：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出来的音乐公司的霸权控制下，音乐自身意识到自

① Musizieren，原来是一个动词，在欧洲音乐传统中是指几个人为了娱乐在一起合奏、弹奏音乐。这里是动词的名词化，姑且译为“音乐演奏”。——译者注。

② 瓦格纳的三幕歌剧，全称《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译者注

己的物化以及音乐与人的异化。同时，由于音乐对社会过程一无所知——也就是说，它也是社会的产物并在这个社会中得以生存下来——由于这种原因，音乐谴责自己而不把这种情境归咎于社会，因此它停留于这种幻相：音乐的这种孤立是它自己的孤立，即，这些情况只能从音乐方面来修正。现在有必要正视音乐的社会异化这一棘手事实——有人认为，所有这一切是因为一种草率、无知的音乐改良主义使用了贬损性词语，诸如个人主义、庸医术以及技巧秘教的结果。但实际上它本身是社会事实，是以社会方式产生的。因此，这种情境不能在音乐内部得到修正，只能从社会出发，也就是说，通过社会变革的方式来解决。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何种音乐可以辩证地促成这种变革依然悬而未决。然而，如果仅仅致力于建立一种直接性，这种直接性不但是今天社会正在遏制的，而且完全不可修复或甚至令人满意的，它的作用就可能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助长对情境的掩饰。接下来的追问是，从何种程度上说，音乐——就它在社会过程中能够介入而言——作为艺术而介入社会。目前，无论它可能给予何种解答，音乐只能在自身结构中描绘这种同样对它自己的孤立负有责任的社会对立。音乐越好，就越能在它独特的形式语言的对立中深刻表达社会矛盾并克服社会必然性，用受难的符码文字来呼唤变革。对音乐而言，不是在无助的恐慌中凝视着社会：如果它通过它的素材①并根据它的形式法则表述了社会问题，它就准确地履行了它的社会功能——这是音乐在它的技巧核心中所包含的问题。因此，作为艺术，音乐的任务与社会理论的任务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果把音乐的内在发展作为一种绝对而建立起来，作为社会过程的纯镜式反映，这恰恰认可了音乐拜物教特征，这是今天音乐所呈现的主要难题而且也是它最基本的问题。另一方面，不能根据现存的社会标准来衡量音乐，因为这个标准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同时又使音乐处于一种孤立状态。音乐不是完满无缺的、抽象的、远离真实社会关系的“精神”现象，也不能通过它的影像预示任何独

---

① 音乐素材（Material der Musik）的观念是阿多诺音乐社会学中极为重要的术语。在他看来，所谓音乐素材不是纯粹自然被给予的声响组合的体系，而是受一定历史环境制约、具有历史沉淀的精神（Geist），音乐素材中的历史关系成为阿多诺审视音乐合法性的重要尺度之一。后来《审美理论》中的艺术素材观念便是从音乐素材观念演化而来的。——译者注

立于经验现实的社会变革的希望，这是一切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而不是纯“精神历史”的方法。由此显而易见的是，当代音乐和社会的关系在所有方面均存在着问题。这种关系与社会理论一起分担了它的难题；然而，同时它也分担了表达或应该表达对这些难题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认识特征**是对今天任何希望保护其生存权利的音乐所提出的要求。通过它的素材，音乐必须赋予这种本质上从来不是纯粹自然物质，而是一种社会、历史产物的素材所指派的问题以清晰形式；在这个过程中，音乐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与理论大致相仿。当然，它提出的社会假设与实践的关系是经过最大限度地中介过的，无论如何，决不能轻而易举地得以解决。然而，这些假设决定了是否以及如何才能获得进入社会现实的最后方式。（存在着）这种短路：这种音乐是无法领悟的、秘传—私人的，因此是反动的，所以，必须拒绝它，也就是说，这种音乐是建立在一种浪漫、原始音乐的直接性观念基础之上的，这种直接性是当代社会经验意识舆论产生的导火线——一种在褊狭与无知中被抬高的意识，而且，在阶级统治面前为了这种意识的持存，这种意识甚至被抬升到神经质的愚蠢地步——与其说可能被看作不再异化的积极措施，倒不如说是自由人的财产。但是，至少我们不能把政治从与社会辩证法有必然核心关系的意识状态中抽象出来，也不赞成认识通过阶级统治产生的意识来规定它的边界并进一步把它当作无产阶级意识承担的被阶级机制弄残的伤痕。作为不能为当代大众意识理解的理论，音乐还应对此负责。然而，理论与实践处于一种辩证关系，它根据实践提出要求并同样从实践中接受要求；以同样的方式，已经获得其社会功能的自我意识的音乐与实践处于辩证关系。目前，这不是通过音乐屈从于把自己规定为商品而且只承认其直接性幻相的“应用”而获得的，而是从音乐自身发展出来的——对社会理论状态的认同——所有这些因素构成了对阶级统治客观意向的克服。如果当前先进的作曲生产完全受其问题内在发展的制约，在高度合理和明晰结构的原则中设定资产阶级的基本范畴，诸如创造性人格及其心灵表述、私人情感世界以及除行为之外明晰的内在性，那么，这种音乐仍依赖于资产阶级的生产过程，也就是说，与其把它看作“无阶级的”或未来的真实音乐，倒不如说这种音乐最切实地履行了它的辩证认识功能。当今，这种音乐遭到猛烈抵制，不管如何从文学——政治上强调，这种抵制都超出所有对应用和团体音乐（Ge-

brauchs - und Gemeinschaftsmusik)[1] 的抵制。但是，尽管如此，这种抵制似乎表明了这个事实：即，在实践中的音乐的辩证功能，无论作为一种纯粹的否定还是作为“毁灭”，都已经可以觉察出来。

从社会立场出发，可以把当今音乐训练（Musikübung）、生产和消费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其一，无条件地认可商品特性、放弃任何辩证的干预，根据市场需求来校准自己的要求；其二，原则上不接受市场取向。另外较为灵活一些的看法是：第一类音乐，在与社会的异化中——消极的、非辩证的——采取了社会的立场；第二类音乐采取了音乐的立场。实际上，资产阶级的音乐文化所认可的“轻”音乐和“严肃”音乐之间传统方式的划分与这种划分貌合神离。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大多数所谓的“严肃”音乐，以和轻音乐作曲家一样的方式迎合市场的需求，即使这是在一种不透明的经济“模式”的庇护下，或至少是根据市场需求的计算来进行生产的。这种音乐市场功能通过人格概念、朴素或“生活”概念的伪装只不过有助于美化它并间接增长了它的市场价值。另一方面，正是轻音乐，通常以与卖淫同样的方式，为当今社会所容忍，同时也遭到社会的唾弃，这种对比并非徒劳——以它的“裙子令人诱惑地撩起来”的方式，也许发展出描绘当今社会冲动满足的某种要素，然而，它的官方主张与这种满足相冲突。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音乐因此超越了它所效力的社会。在轻音乐和严肃音乐之间进行划分，人和音乐的异化只能以歪曲的方式反映出来，也就是说，正如资产阶级本身所描述的那样。斯特拉文斯基[2]的《圣歌交响曲》和最近的罗伯特·斯托尔兹[3]的畅销歌曲共同参与了这种使严肃音乐免除异化的努力。把异化归咎于“媚俗艺术”标签之下，作为这种社会中冲动星丛（Triebkonstellationen）的精确反作用，此二人的作品是唯一与之相匹配的音乐。然而，正是这种适宜性拒绝为这个社会承担责任。

---

① Gebrauchsmusik，音乐学术语，大体上接近“应用艺术”或“功能艺术”。这种艺术类型主张艺术的社会效用，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以及先锋派新音乐。应用艺术与后来所谓的“文化工业”论有着直接联系。Gemeinschaftsmusik，是阿多诺杜撰的一个词，与应用艺术有关，主要是指为政治服务的合唱音乐。——译者注

② 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1882 - 1971），20 世纪杰出的在俄罗斯出生的作曲家、指挥家。——译者注

③ 罗伯特·斯托尔兹（Robert Stolz，1880—1975），奥地利作曲家和指挥家。——译者注

由于这个原因，这里采取的是一种不同于将音乐划分为轻音乐和严肃音乐的传统做法：这种观点认为音乐的两个部分世界同样出自异化的立场：一个整体的两部分绝不可能通过另外两半相加得以重建。

狭义上，不是无条件地屈从于市场法则的音乐生产是表现异化的音乐生产。也就是说，“严肃”音乐除了在数量上占明显优势以外，它同样以伪装的形式为市场效力。因此，这里可以建立起一种粗略的图式：第一类音乐没有意识到它的社会定位或对此漠然置之，它仅仅以一种内在的方式提出问题、使之明朗化并予以解决。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莱布尼兹的无窗的单子，当然，它并不代表着一种预定和谐，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历史地产生的不和谐，即“意味着”社会对立。这类音乐，作为独特的“现代”音乐，它为听众提供了重大震惊，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阿德诺·勋伯格**和他的学派①。第二类音乐把异化的事实看作它自己的孤立、看作“个人主义”，并进一步把这种事实提升到意识层面。但是，它只是在它自己内部、在形式内在性以及纯粹审美中来完成的，而无视现实社会，大多数情况下，它是通过一种退回到过去的风格形式而获得这种领悟力的，它认为这种风格形式与异化无关，而无视不能在一个彻底变化了的社会、通过彻底变化了的音乐素材重建这种风格。这种音乐不包含任何社会辩证法，在非存在的“客观”社会的图像中，或者根据其所引用的“团体”意向，大致上把它称为客观主义。在高度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客观主义又被叫做**新古典主义**②；在不发达的农业国家，客观主义被称之为民俗主义(Folklorismus)。客观主义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是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他以超人的智慧一个接一个地、但从来不是同时地，把所有主要方面全都展现了出来，他是这两个方面的领袖人物。第三类音乐是以上二者的混杂形式。与客观主义密切相关，这类音乐家发源于对异化的认识。然而，他们比客观主义更为机警，并且同时认识到他的同行们对问题的解决只是一种幻相。这

---

① 勋伯格（Arnold Schonberg，1874—1951），奥地利人，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第二维也纳学派创始人。勋伯格学派另外两位代表人物是安东·韦伯恩与阿尔本·贝尔格。——译者注

② 新古典主义，18世纪兴起于罗马，并迅速扩展到欧美地区的一种艺术运动。它一方面是对巴洛克和洛可可艺术的反动，另一方面则是希望重振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信念。新古典主义的艺术家刻意从风格与题材模仿古代艺术，并且知晓所模仿的内容为何。这种观念曾分布各艺术领域，影响深远。——译者注

类音乐家放弃了肯定的解决，而满足于让社会的诸多断裂通过破碎的、将自身设定为虚假的结构产生出来，而不是通过审美的总体给它们架设拱顶。他们同时使用了两种音乐语言，一部分是19世纪资产阶级文化音乐的形式语言，另一部分是当代的消费音乐语言。这些手段被用来显示他所发现的裂隙。随着对审美内在形式的超越，这类作曲家进入文学领域。这种音乐类型和法国超现实主义为超现实主义音乐语言进行辩解之间遥相呼应。它发源于斯特拉文斯基中期阶段，最重要的作品是《士兵的故事》，在库尔特·维尔和贝尔特·布莱希特①合作的作品，尤其是《三分钱歌剧》和《马哈冈尼》中得到完善。第四类音乐试图从自身内部、甚至以其内在化形式的代价来打破异化。这类音乐通常被看作“**应用音乐**”（Gebrauchsmusik），然而，正是这类应用音乐，尤其为无线电和剧院定购而生产——这就明显说明了这类音乐依赖于市场，今天的讨论暂不涉及它。它要求关注的是生产“团体音乐”（Gemeinschaftsmusik）的努力，这条路线是从新古典主义孕育出来的，其代表是欣德米特②和汉斯·艾斯勒③的无产阶级合唱作品。

阿诺德·勋伯格，被人们贬斥为唯智论、毁灭性、抽象、秘教，每一部新作品都遭受抵制，这种抵制与人们对心理分析的抵制并没有什么两样。当然，这不是根据音乐与全部心理学关联完全不同的具体主题内容而言的，而是针对其社会结构来分析的，他的确显示了与弗洛伊德深远的一致性。勋伯格对音乐素材语言批判的纯化努力与弗洛伊德和卡尔·克劳斯④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个维也纳人可以称得上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中的辩证现象——这个词完全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使用的——它在所谓“专门化”问题领域中发挥着作用而无暇顾及一种预设的社会总体性。然而，在这些领域中，他们获得了突变而且变成被人忽视的与个体主义前提

---

① 库尔特·维尔（Kurt Weil，1900—1950），德国作曲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德国现代剧场改革者、剧作家及导演，倡导审美陌生化理论，对20世纪文艺理论影响甚大。——译者注

② 保罗·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1895—1963），德国音乐家、音乐理论家。——译者注

③ 汉斯·艾斯勒（Hnas Eisler，1898—1962），勋伯格的学生、德国马克思主义左派作曲家。——译者注

④ 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1874—1936），奥地利批判报刊撰稿人、诗人、语言学家。——译者注

相对立的解决；由于这些解决原则上拒绝一种社会取向的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因而对于资本主义的解决之指向总体性的洞见——这种洞见的确没有到达根据——来说，就必须以各种“间接”、因而是委婉的解决来支付。倘若弗洛伊德为了获得客观符号并且最终在历史中获得人的意识的客观辩证法必须实现对个体意识和潜意识的分析；倘若克劳斯为了在“上层建筑”领域中重新完善社会主义概念只是以自己正确个体行为规范面对资产阶级的生活；那么反过来，他们就向个人主义展现了他们自己的规范：因此根据这种图式，勋伯格已经废止了私人资产阶级个体的、仅仅追求特有的前后一致性的表现音乐（Ausdruckmusik），也就是说，在那里安置了不同的音乐，但是在他的音乐中并没有注入直接的社会功能——助长与听众最后交流的社会功能。然而，根据内在的音乐特性和音乐素材的辩证净化，他把同时代所有其他音乐抛得远远的。因此，他提供了一种如此完美、合理的通构（Durchkonstruktion），即与当今社会状况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无意识地通过其彻底批判的表征采取了一种防御立场并呼吁天性借以抵抗意识的攻击。在他的音乐中，可能也是第一次在音乐的历史中，意识掌握了音乐的自然素材并控制了它。但是，在他那里，意识的突破不是唯心主义的，不能把它理解为纯精神的音乐生产，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辩证法。因为勋伯格的完美乐章来源于对如何把这个乐章置于素材自身之中的追问。激发这个乐章的生产力含有一种心理冲动的现实性——即这种冲动趋向于不加掩饰、不受抑制、本质上无意识的心理表现。在勋伯格中期作品，包括《期待》、《幸运之手》和钢琴小品中，都可以最准确地发现这种现象，这些作品与精神分析有着直接关系。然而，这种希望所面临的客观问题是：勋伯格从瓦格纳那里继承的素材以及另一方面从勃拉姆斯那里接受的素材，技巧上均已获得高度发展，如何使它们服从于激进的心理表现？要想如此，只有通过屈从于改变了的基础，即他必须放弃所谓全部妨碍个体表现力运动自由的关系与责任：作为对每一类**装饰**的彻底批判，这些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现在被个人苦难所放弃的个体心理“认同”的反映，对墨守以技巧的重复为基础的传统音乐的对称关系的克服，无论它采取何种形式，都与卡尔·克劳斯相一致，也近似于阿道尔夫·卢斯①的建筑学意向。

① 阿道尔夫·卢斯（Adolf Loos，1870—1933），奥地利建筑学家。——译者注

鉴于这种批判并不只把自己限制在音乐建筑学、对称以及它所否定的装饰等所有音乐要素，它同样也涉及结构的对称关系与调性的和声语境，同时与作为激进表现原则支座的不合谐音不期而遇；随着调式图式的衰落，迄今受三和弦限制的对位被解放了出来，并且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名之为“线性”的复调形式。最后，传统管弦乐队弦乐合奏的本质所支撑的全部同质音（Klang）受到抨击。现在，问题的实质是不能从传统思维模式来评价勋伯格的成就——自从他最早期的作品以来，比如《歌曲》op. 6，所谓素材的表现批判及其形式从未以一种极权、轻率的方式对异质性素材“表现主义地”施加主体意向。取而代之的是，他的每一种介入素材结构的姿态同时也是他对素材自身内在问题形式的解答。勋伯格所取得的每一种主体——表现的成就同时就是客观—素材矛盾的消解，这种矛盾既是瓦格纳式的半音阶次列技巧中的矛盾，同时也是布拉姆斯的全音阶变奏技巧连续性中的矛盾。因此，与其说勋伯格不是一位作为专门化、不具有音乐的社会相关历史而保留下来的秘教人物，倒不如说他是一位从他的音乐素材辩证法立场被投射到社会辩证法的人物。事实表明了他的正确性——以他所继承、接受、坚持的素材问题的形式——在产生这种素材并且把这种社会矛盾规定为技巧问题的社会中得以呈现出来。勋伯格对技巧问题的解答具有社会关联性，尽管他全部作品中的代替物证实了它们的孤立状态，尽管且由于他特有的表现起源、由于任何私人的偶然性，可能相当正确地被人们看作一种带有客观秩序原则的古风音乐作品，但它决不是从外部强加到素材上去的，而是从素材自身提炼出来并通过一种合理透明的历史过程与它建立了关系。这是从技术上采用作为“十二音作曲”① 形式化革命的意义。正是在那个环节，总音乐素材（gesamte Musikalische Material）受到了表现力的制约，表现自身被清除了，仿佛它只是由素材、自身“相异的”并且与主体相异的抵抗力而赋予活力的。装饰和反复环节的主体批判导致一种客观的、非表现的结构，它取代了对称和反复，决定了单元之内的反复的排除，即，在音阶中每一个音符得以重复之前，使用音阶的全部十二

① “十二音作曲”技巧，中期勋伯格音乐创作手法，用12个半音作曲。首先选定12个半音排列成一个序列，即原形，再派生出三种变形：逆行、倒影、逆行倒影。原则上序列的选择横向不能形成音阶，纵向不能形成三和弦。序列的基本形式及其变化所得出的48种结果，就是十二音音乐写作的全部材料。——译者注

个音符。这种相同的结构进一步防止在音乐作品中插入任何一个“自由”、任意的、无结构相关性的音符。以相应的手法，一个补足的音符置换了表现连接的声部进行的和声。从外部强加于音乐所有客观规范的激进自由是内在结构的极度严谨，所以音乐通过自身的动力，至少废除了自身内部的、作为主体形式和客观素材的异化。这样，音乐趋向于阿罗斯·哈巴①杜撰的优美表现“自由的音乐风格”。当然，音乐对内在异化的克服仅仅是通过完美的表现及其有关的外部完成的。如果有人设想一劳永逸地克服这种音乐难题，这只不过是一种对技能的浪漫式美化，包括对勋伯格以及最优秀的当代音乐的美化，就等于未能认识这些解不开的难题。因为随着他最近由于歌剧《今天到明天》脚本的选择，一种对自由观点相对立的资产阶级婚姻的美化，与“爱”和“时尚”非反思地形成强烈对照。尽管如此，勋伯格本人仍然把他的音乐归属于依据他的客观特征攻击过的资产阶级私人领域。在同一方向上完全可以指认出勋伯格最新作品中所察觉到的全部形式建筑中的某种古典倾向。然而，最重要的问题是：首先，封闭的艺术作品的观念——在自身内部处于静止状态——勋伯格从古典主义继承下来的并且恪守的观念是否可以通过他已经规定的手段而获得调解；其次，这种艺术作品概念，作为总体性和宇宙（Kosmos），是否仍然可以从根本上得以坚持。从最深的层面上说——勋伯格的作品很有可能与这种观念处于对立状态，产生于幻相缺失的环节认同了它，这个环节已经在他与装饰音斗争中被表现出来，在他目前音乐措辞中更为冷静——同样出现在文本的措辞中——甚至是他的作品中固有的敌视艺术的秘密，即根据这种寓意，这种作品用贝多芬的历史的、彻底合理化的手段——自治——再一次迫使自己成为自足、强有力象征的艺术作品。然而，这种重建的可能性，正如克劳斯对纯粹语言的重建一样，颇为令人怀疑。当然，是这里而且仅仅是这里而不在他的作品的非通俗性中，勋伯格的社会洞察力抵达了一个极限（Grenze）；与其说是他的天赋的极限，倒不如说是他的天赋功能自身的极限，仅仅通过音乐不能越过它。勋伯格的学生阿尔本·贝尔格②位于这个极限。在某种程度上，他的作品技巧代表了勋伯格最高级的作品

---

① 阿罗斯·哈巴（Alois Haba，1983—1973），捷克理论家、作曲家。——译者注

② 阿尔本·贝尔格（Alban Berg，1885—1935），奥地利作曲家、勋伯格的学生、阿多诺私人音乐老师。——译者注

与前一代作曲家——瓦格纳①、马勒②，某些方面，也包括德彪西③——之间的联系。然而，这个谱系是从勋伯格的高度，从他的技巧成就立场出发勾画出来的：如勋伯格作品那样，极端变奏和通构以及被用于更老的色彩素材的十二音方法，包括声部处理，并没有“放弃”它：表现的功能由此被保存了下来。因此，贝尔格比勋伯格更多停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音乐，即风格批判的新德国学派传统范畴中。但是，在其他方面他和勋伯格一样彻底摆脱了它。不能把在音乐表现（Ausdrucks）领域中得以贯彻的贝尔格的辩证法看作一种空洞—集体主义的新现实派（Neusachlishkeit）④而断然加以拒绝，也不能无条件地视之为“个人主义”的辩护。表现的问题只能用具体的术语，只能根据表现的基础、被表现的对象，而且根据表现自身的有用性才能得以解决。如果严肃地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表现音乐（Ausdrucksmusik）的范围内提出这个问题，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这种表现音乐不仅作为音乐是有问题的，而且作为表现同样也是有问题的，即与19世纪的“心理学”的小说众多章节相似，它们根本不关系到主体的精神现实性，而是一种虚构的、风格化的、在众多方面语言表现的伪装。在音乐中，心理学表现和浪漫主义风格概念的交织是事态的显现。如果音乐成功地打破了虚构的心理学基质并从一开始就冲破瓦格纳式的英雄——色情人物图像并渗透到真实基质的话，那么与资产阶级个体有关的音乐功能便发生了变化。与其说它不再使个体理想化并作为一种规范而确立起来，倒不如说揭露了被音乐传统同时也被心理学掩盖起来的痛苦与受难；通过表现个体的痛苦或邪恶，与其说没有把他抛弃到一种孤立状态，倒不如说同时使痛苦对象化，音乐最终指向事（Dinge）的秩序，在其中它即作为音乐而起源，而且被表达的个体作为个体，但它在音乐中获得了自己及其绝望的意识。一旦这种音乐——就本身而言与心理分析内容有充足关联，而非徒劳地擅长梦和精神错乱的领域——清除了传统的表现心理学，同时与作为这种心理学起源的音乐的

---

① 理查·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德国作曲家。——译者注

② 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1860—1911），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

③ 德彪西（A. C. Debussy，1862—1918），法国印象派作曲家。——译者注

④ 新现实派，一种早期20世纪广泛的艺术思潮，遍及各个艺术领域。在建筑中被称为“功能主义”，在文学中被称为“现实主义”，在视觉艺术与音乐中被称为“新客观性”。——译者注

传统形式语言相对立，那么它就瓦解了表面的轮廓，并通过音乐的内在性用极小量音乐的表现建构出一种新的语言；尽管贝尔格采取了与勋伯格完全不同的方式，但二人最终还是同归于一途。贝尔格作品中包含的这种辩证法，而且正是由于这种辩证法才使得彻底理解他以毕希纳①的悲剧《沃采克》为脚本所创作的音乐成为可能。可以把它与精美艺术作类比：贝尔格与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的表现音乐的关系类似于考考斯卡②的肖像画和印象主义的关系。个体心理的真实描写——既是对资产阶级心理描写，又是对通过资产阶级产生的无产阶级心理的描写——在《沃采克》中被突然转变为一种社会批判的意向，当然没有摧毁审美内在性的框架，这是贝尔格作品的深刻悖论，他的作品中所内在地呈现出来的社会对立，这种批判的发展可能关系到来自过去的、现在通过他的批判变得明晰了的素材。在《沃采克》最重要的场景、在客栈的宏伟场景中，都可以找到这一点。在这里，贝尔格的方法与超现实主义是交织在一起的。同时是这种语境——至少在这部戏剧中——使贝尔格的作品免于孤立并引起资产阶级听众的某种共鸣，即使这种共鸣源于观众把《沃采克》误解为最近的瓦格纳式“音乐剧”。它听任《沃采克》中呈现出起源于无意识之穴的一股邪恶、危险之流，通过这种误解涓涓滴进流行的意识。最后，在这个语境中，必须简要设略一下勋伯格学派的第三位代表人物安东·韦伯恩③。毫无疑问，他的作品具有超凡的音乐的特性，对这种作品进行社会阐释所呈现出重大难题，这里不作展开讨论。（在韦伯恩的作品中，）与社会相对立的孤独和异化——在勋伯格那里取决于作品的形式结构——成为主题并被转化为内容，即他的作品中每一个音符都是对无以言表以及彻底异化的宣言。如果有人采用构成勋伯格学派基础的内在辩证法的基本概念来解释韦伯恩的话，那么，他就必须用克尔凯郭尔作品的一个副标题——他（克尔凯郭尔）足以接近韦伯恩——谈及“辩证的抒情诗”④。

---

① 毕希纳（Georg Büchner，1813—1837），德国戏剧家，后被认为是表现主义的鼻祖。贝尔格以他的《沃伊采克》为脚本创作出歌剧《沃采克》。——译者注

② 奥斯卡·考考斯卡（Oskar Kokoschka 1886—1980），奥地利表现主义画家、作家、表现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③ 安东·韦伯恩（Anton Webern，1883—1945），奥地利作曲家、勋伯格的学生。——译者注

④ 这里的作品指克尔凯郭尔的著作《恐惧与颤栗：一部辩证的抒情诗》。——译者注

因为在这里，最极端的个体差异，所谓素材的解决——就音乐而言远远超出勋伯格，就表现而言超出贝尔格——仅仅被应用于这个目的：为了一种音乐的自然语言的解放，为了纯粹声音的解放，韦伯恩必定拒绝倒退到一种自然素材、调性以及“自然”的泛音关系。为了在历史辩证法中产生出一种自然图像（Bild），这才是韦伯恩音乐的意图以及它提出的谜。作为谜，它提出了一种与所有积极的自然—浪漫主义完全相反的解答。这个谜只有很久以后才会被解码。

斯特拉文斯基及其追随者们的鉴别力与勋伯格及其学派正相对立。在这里，游戏与幻相缺失相对立；面具的令人诱惑—任意的改变——它的佩带者是相同的然而毫无意义——与有责任感的辩证法相对立，它的基座在突变中自己发生着变形。从社会方面来说，客观主义音乐比勋伯格学派的音乐越具有明晰性，它就越少密切地取决于自己的技巧。因此，客观主义的社会阐释恰恰出于客观主义的技巧方法。任何客观主义音乐都试图从内部对音乐的异化进行修正，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社会现实性的观念，即不是通过对内在辩证法、对作为个人主义—极度差异化的探究，斯特拉文斯基便足够荒谬地把勋伯格和奥斯卡·王尔德①相提并论，并斥之为唯智论—抽象、与自然相疏远。（客观主义音乐）试图通过退回到更古老的、彻头彻尾前资产阶级的音乐形式，在一种音乐的原初的自然状态中来对这种异化进行音乐方式的内在修正，因此，人们可以把它看作一种适合于人的本质及其身体结构的音乐人类学。这就解释了为何所有客观主义音乐偏爱舞蹈形式以及起源于舞蹈的节奏——它消除了历史变化，因而易为任何一个时代所理解。客观主义把自己与浪漫主义从风格历史概念上作了如此重要的区分，这种浪漫主义被舒曼②以一种极端的准则规定为“传奇风格”（Legendenton）。这个过程不但包含了一种过去的音乐环境用否定的当今情境作为它早已希望重构的某种实证之物的反差，甚至在更大程度上，某种过去绝对有效之物的图像中的结构在一切时代均可得以实现。这就是为何客观主义以它的理论宣言向浪漫主义发起猛烈进攻的原因所在。然而，从一种适用—音乐的观点来看，所有这些手段都是客观主义向它的历史模式

①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英国唯美主义艺术运动的倡导者、作家、诗人、戏剧家。——译者注

② 舒曼（Robert Shumann，1810—1856）德国作曲家、音乐评论家。——译者注

的倒退——无论是原创音乐还是伪乡村的民间音乐，中世纪的复调音乐还是“前古典”音乐会风格——目的不只是重建这些模式；客观主义颇为例外，它作为风格复制（Stilkopie）的形式承担了这种重建。然而，在其生产的范围内，在“新客观性”（neue Sachlichkeit）名义下努力的客观主义，忠实地强调其合乎时代性以及它已经获得的事实，使用对它的真实素材而言老化了的、臆测的永久模式：这种同样和谐—自由、倾向于复调并且从表现抑制中解放了出来的素材，它来自勋伯格学派的辩证法，现在被客观主义非辩证地接管了。这种高度差异化的前分工、静态—自然的形式，呈现出物质分工的全部印记：这就是音乐客观主义的观念。

因此不由得产生了不容驳回的事关当前社会的类比。高度工业化经济语境的不动产—法人划分，在客观主义音乐中表现为顺从的映像：法西斯主义把自己凌驾于“领导精英”的社会“机制”之上，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也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强烈要求，而所谓音乐机构则受制于霸权作曲家。引入一个不和谐音，悬留音（Vorhalt）的解决，既不是通过一种根据真实素材废除了的预定图式，也不是通过结构内在性、合理的强制性借自然之名作出的否定，而是通过嗜好，也就是说，根据作曲家的“趣味”来决定的。作为类比是如此令人诱惑，而且它无论可能揭露出多少事态真相，都没有必要为缺乏抵抗力的表现负责。在俄罗斯移居国外的斯特拉文斯基那里，甚至在新古典主义者如卡瑟拉①那里，在艺术政治上有如此抱负，这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是无可争辩的。然而，对音乐进行社会阐释，与其说涉及作者的个人意识，倒不如说涉及他们作品的功能。这是讨论的难题所在。首先，如果把客观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关系理解为某种现实，那么，就必须找到中介范畴并解释这种中介自身。然而，这种中介机制还不为人知。它极可能通过对流行事态的分析而被揭示出来。比如，斯特拉文斯基通常凭借他的老练的依赖性，不允许新古典主义的本质形式要素通过对内在—技巧问题的追问来规定它们自己，这些要素首先是从作品外部来设定的，然后再被转换为艺术作品的技巧内在性。然而，方式自身明智地回指社会—经济事实（Tatsache）。与其说这表明了音乐中介问题的解答被人毫

① 卡瑟拉（Alfredo Casella，1883—1949），意大利作曲家。曾公开支持墨索里尼。这里，阿多诺提及卡瑟拉借以分析斯特拉文斯基在音乐文化政治领域中的野心。——译者注

无察觉；倒不如说只是更为准确地涉及这个问题的定位。其次，关于法西斯主义的客观主义进行的社会阐释一定会遇到内容问题。这些难题是由客观主义作为其任务而提出的同一异化状态、内在一审美的清除或遮蔽而导致的。也就是说，它是根据这种的确是垄断资本主义阶层（Schicht）中的最高级音乐的意向和客观结构而假设出来的，这个阶层仍然既不能理解也不能消费这些音乐。只要客观主义致力于根据图像去排除异化，就丝毫不会触及现实中的异化。音乐技巧的专门化已经如此进步以至于听众不再能理解这种音乐，即使它是一种听众自身意识形态的客观表现。另外，其他类型的意识形态力量，诸如作为来自过去精神商品积累的“教育”概念，对听众来说比音乐中社会观念的直接赋形有着更为重大的音乐效应；这类听众早已把置于赋形之上的核心价值从音乐中清除掉了。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远比理查·施特劳斯①的音乐更准确地反映大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尽管最近一代大资产阶级的作曲家怀疑作为“摧毁者”的斯特拉文斯基，但是他们偏爱聆听对他有利的斯特劳斯更甚于聆听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因此，异化使社会平等变得复杂。然而，它也使内在一审美问题暴露出来，这可能是大资产阶级反对“它的”音乐而持怀疑态度的真实来源。这种偏好，即作曲家能够随意处置其材料而无须对之进行客观、强制性的预构（Vorgeformt），音乐形象的内在结构自身也因此无须对音乐的合法与非法进行明确判断——形象自身内部的结构分歧与这种坏的任意相应，在形象中，被唤起的形式意向与事实的内容状况之间的矛盾依然悬而未决。

最恰当处理作曲方法的代表人物是匈牙利作曲家、民歌学者贝拉·巴托克②，他放弃了上面所提到的形式客观性的虚构，回到前客观的、真正的古风素材，然而，他的特殊解析恰恰与时下的素材关系极为密切。因此，激进的民俗主义在他特殊素材的合理通构中，与勋伯格学派的手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然而，在客观主义领域中，巴托克完全是一个特例；另一方面，他早期的合作者科达伊③，把真实的民俗学篡改为通过把原始

① 理查·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1864—1949），德国作曲家、指挥家。——译者注

② 贝拉·巴托克（Béla Bartók，1881—1945），匈牙利作曲家。——译者注

③ 科达伊（Zoláta Kodály，1882—1967），匈牙利作曲家、人种音乐学家。——译者注

化的旋律和感觉温和、后印象主义和声加以比较而指责自己的完整民间生活的浪漫的理想（Wunschbild）。斯特拉文斯基的面具游戏通过他的高度精确、谨慎的艺术理解力使这类真相免于暴露。他那了不起、危险的成就，对他自己而言同样危险，他的音乐在把自身作为一种游戏呈现出来并在其中使用了其强制对立的知识。然而，他决不简单地把音乐作为一种游戏而且从未把音乐作为应用艺术，而是采取了一种不断盘旋于游戏和严肃之上、游走于风格之间的立场，这就使得几乎不可能通过名称来称呼他的音乐，因为其中的讽刺性妨碍了对客观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解。然而，这是一种一切表现都是合法的绝望背景，因为没有恰当地与它相适的单个表现；同时，他把面具游戏带进与阴沉背景相悖的解脱中。在这种摆动中，一种游戏可能会在任何时候变得严肃，并在突然间成为魔鬼的笑声，用一种非异化的音乐的可能性嘲弄着社会，这使得斯特拉文斯基被当成一个时髦的作曲家，同时他的傲慢把他的音乐抬高到不可能的地步。正是这种艺术安全性使斯特拉文斯基认识到一种受社会条件制约的积极一审美解答的不可能性，同时认识到他在大资产阶级眼中受到怀疑的社会自身的对立。在他最好的、最令人瞩目的作品《士兵的故事》中他唤起了对立。与其他所有客观主义作家相比，斯特拉文斯基职业中的优越性危及其风格的一贯的意识形态的实证性，这是社会对他的要求：因此，在他那里，艺术逻辑的一贯性成为社会辩证法。由此看来，他已经用赞美诗交响乐暴力神学击退了各种统治性力量对大都市“工作室”艺术、颓废派和瓦解的怀疑。

欣德米特音乐的基本社会功能是通过天真来解读对斯特拉文斯基的客观主义并接管它。他的客观主义提供了一幅一贯严肃性的图画；人为的安全性变成了工匠的名望，因此作为一位“乐师”工匠的观念再一次与非分工的再生产状态、音乐中生产与再生产的不可能的差异相符；关于“健康的幽默”的欣德米特的魔鬼般反讽，这种显示出客观主义中自然的非反思状态的健康，被斯特拉文斯基的面具的龇牙咧嘴打断了，就他的幽默的挑衅性反讽而论，无论是先锋派的反讽还是势利的反讽，两者都暴露出和社会环境的原则性调解。斯特拉文斯基的绝望——彻底的历史绝望在《士兵的故事》中被追逐到精神分裂症的边界——一种主体性的表现，只能通过碎片和过去的客观音乐语言的幽灵来捕获。在欣德米特那里，这种绝望是温和的，趋于纯粹自然的、未解决的，但仍然是非辩证的多愁善感，他把死亡视为一种实情（Sachverhalt）的永恒状态，类似于当代哲学的某些意

向，在“存在的”（existentiell）大旗下规避具体的社会矛盾，因此甘心情愿地把自己归属于人类学的客观主义超历史观念。斯特拉文斯基把社会矛盾吸收到艺术对立中来并赋予它们以形式，欣德米特掩盖了它们。由于这种原因，他的盲目赋形充满了对立。他那能穿透一贯连锁运动而且穿透声响织体中的配器切实可靠性的锐利的技巧眼光，处处暴露出他的技巧缺陷：作为动机使用的随意性素材与形式合法性之间的差异，部分的原则不可重复性和授予外表连续性的重复形式之间的差异，基于大范围的平台建筑和随机性之间差异，再加上有序化的必要性、个体台地的有序化，——与其说所有这一切仅仅是由于“客观”建筑不包含所谓一种先验组织原则的个体生产冲动，倒不如说是作品的任意性强加给它们的，因此导致了在新客观性标记下伪装的外表。当然，正如在斯特拉文斯基及其诸多追随者那里一样，这种客观主义内容意味着巧合，根据变化中的意识形态需要，它是可以互换的，没有被社会结构明确预定，音乐无处（Keiner Stelle）可以为它作证，更确切地说是，在人性标记下的音乐掩盖了阶级秩序。毫无内容的纯形式客观性，是在它空洞（leere）中作为主题内容、为客观性而客观性而被提出来的，正如在斯特拉文斯基那里常见的那样。这种模糊的空洞也因此被颂扬为一种非理性的自然力。现在，在欣德米特那里，它是作为一种集体性的证据而被引入的，也就是说它构成了小资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机械化形式或以青年运动意欲影响生产的方式，同时简单地回避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现在音乐被设定为一种音的游戏，为人们提供消遣或创造公共性；为人们提供膜拜或存在的严肃性。音乐客观主义的主题内容和社会控制权力的旨趣一样具有差异，也和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有着一种不同——与社会认识的状况仍然为目前开处方一样暧昧地使用概念——这足以在客观主义作品中清晰地反映出来。这里，也必须提出“中介”问题。所有客观主义的音乐都具有某种共同点：从社会环境**转移注意力**的意向。它试图使个人相信他不是孤独的，而是与他人处于由音乐为他展现的、没有规定其社会功能的亲密关系；它试图使全体（Gesamtheit）展现为通过向声音媒介的纯粹转变、积极而且令人满意地实现了个体命运的一种有意义的组织。然而，这种基础和这种联系的意义是可以互换的。大致说来，只要转移注意力的真实意向呈现出来，而并不仅仅是孤立一审美领域中愿望的反映，它就可能被视为失败。客观主义以合唱协会和器乐演奏、“乐师行会”以及劳动集体，向小资产阶级大献殷勤，在销路

上一点也不成功。资本主义危机的困境把客观主义及其普及者所专注的团体归之于其他的更顺从的意识形态，而且归之于复杂方式操纵的没有明确内容的客观主义意识形态。他们难以发现在“秘教”勋伯格和“乐师”欣德米特之间进行区分的倾向，二者连同作为文化布尔什维主义的爵士音乐一起遭到拒绝，就他们来说，坚持军队进行曲的复活。

因此，这种状况预示了那类作曲家们的本质的难以解决的社会困境：他们不再在审美图像中克服异化的事实，而是实际上希望通过乐曲结构方法中真实的社会意识克服异化；他们通过把音乐的起点转变为社会终点的方式对它进行处理。在较低的层面上，客观主义展现了一种朝这种方法发展的鲜明趋势。对于审美—内在的似团体（gemeinschaftmäiβger）音乐的要求随着连续性而被转变为一种对以美学方式抬高的应用音乐的呼唤。库特·维尔作为音乐超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显示出他本人极大地优于这种方法以及这种提升的劣等观念，这是因为他对社会环境有广博见识：与其说通过音乐而把积极的社会变革看作一种可能性，倒不如说他是把通过音乐而揭露这些状况看作可能。他没有为人们提出一种试图适合于应用的原始艺术，而是在他艺术方法的变形镜中向人们展示他们自己的“应用音乐”，因此作为一种商品而使它显示出来。维尔的《三便士歌剧》和《马哈冈尼》的风格比欣德米特更接近《士兵的故事》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一种基于蒙太奇的风格，它废除了新古典主义的“有机的”外表形式，与碎石和碎片一起挪动，从谎言、幻象中建构出真实的作品，通过有意地附加伪音，19世纪的和声今天已经得以显示出来。这种震惊连同维尔的作曲手法过于暴露了习以为常的作曲手段，撕去了它们作为幽灵的面具，表现了源于这个社会的恐怖，同时，它是一种对作为真正的应用音乐而被暴露在恶魔般庸俗大笑中瓦解了的肯定的团体音乐的可能性的活生生的否定。当今的作曲手法用过去的幻象手法承认了它们自己的幻象本质，并且在它们的天然光辉中社会状况的符码原本变得清晰可辨。与其说这禁止了对每一种审美意象中的安抚——因为这种状况的矛盾再一次出现意象自身——倒不如说和人如此亲密接近，以至于他不再考虑自治艺术作品问题。维尔和布莱希特从这种星丛中发展出来这种质的丰富效果是令人钦佩的。他们在一群瞬间闪光灯（Blitzlicht）中勾画出歌剧院革新的轮廓，同时辩证地变得和歌剧剧院自身的可能性相对立。维尔的音乐无疑是今天唯一真正具有社会—论战的冲击力的音乐，只要他处于否定性的巅峰这一顶点这种冲击

力就会保持下来；其次，这种音乐已认识到自己，从而采取了这个立场。但是，问题是他不可能停留在这个巅峰状态；因为作为一个音乐家，维尔一定试图逃避一种工作方法的责任感，从音乐的观点来看，这种方法类似“文学”，就某些方面而言，又貌似超现实主义绘画。像消费畅销曲一样宁静地消费《三便士歌剧》中歌曲的观众的误解，正如这些歌曲既对自己又对听众怀有敌意，作为辩证交流的工具才可能被合法化。事件的深入过程含糊地暴露了另一种危险：此前被掩盖着的假象存在着的框架渐渐变成虚假的实在性、团体艺术中的毁灭，并且在嘲讽的原始性背后，一种回归的自然信仰的原始主义——为这种原始性的苦难所吸引——现在不再是明显古老的复调音乐，而是亨德尔的主调音乐。作为一个实验者，韦尔确恰恰如此根本地远离一切对无意识机体的信心，因而可以相信，实验者不会屈服于没有危险的事情的危险。

在最广大的程度上，团体音乐和应用音乐已经衰败。它们的行为将自己置于虚假境地——在音乐而不是在社会中，因此它们在两种状况下都失败了。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邻近（Miteinander）状态是一种虚构，其中某些东西可能是真实的，当面对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时它却又软弱无力，音乐中“公共性”的虚构掩盖了这个过程却没有改变它。同时，用内在音乐的说法，团体音乐是反动的，也就是说它与客观主义是一丘之貉，只是更粗俗点而已。它把音乐素材的深入的辩证运动当作“个人”和“智力”的运动而加以拒绝，并试图代之以一种直觉性重构中的静态自然概念：“乐师”。就它使用一种个人主义**辩证法**的批判和内在矛盾的修正而言，这无疑是有道理的，然而如若把它看作为争取人类音乐的解放所迈出的必然步骤，那么它在各个方面都采用了原始的、前个人主义阶段的资源，没有对有关素材革新的新古典问题进行任何深入的陈述。这种基本错误在于音乐和公众正相反对的功能观念。公众意识被绝对化了：在小资产阶级团体音乐中，这种意识被看成是“天性”，然而由汉斯·艾斯勒所代表的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音乐却把它看成是现在被积极理解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未能认识的恰恰是生产应该根据可歌唱性、素朴、本质上的集体有效性来定位自己的需要，这种状态必然依赖于一种通过阶级统治而被抑制、带着镣铐的意识状况，而正是这种状况导致了对音乐生产力的束缚，没有人比马克思本人更为准确、更为清晰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无产阶级理论和艺术实践不能简单地漠视包括近50年在内的

资产阶级历史的内在—审美结果，除非这种期望会使由阶级统治在艺术中产生的状况永恒化。归根到底，废除这种社会状况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坚定不移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意识自身暴露出团体音乐的顺从与意识当前状态的关系是一种谎言。因为与警卫队小官僚有关的有声电影中的流行歌曲受人欢迎的程度在构思上超出赞美无产阶级的团体音乐。这种煽动性价值以及其中的无产阶级团体音乐的政治权利——比如，艾斯勒的合唱——是毫无疑问的，只有乌托邦—理想化思想可以要求代之以一种内在地适合于无产阶级功能的音乐，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却不能理解它。然而，一旦音乐从逐渐变为反思并把自己确立为一种艺术形式的直接的行动阵线上撤离出来，它就会很明显，与其说生产形式经受不住与进步资产阶级生产的对立，倒不如说采取了一种拒绝来自已经废弃的内在—资产阶级风格形式的可疑的混杂形式，甚至包括那些小资产阶级合唱文学以及来自进步“新”音乐的残余形式。通过这些混杂物，丧失了抨击的尖锐性以及每一种技巧规则化的一致性。可以设想，取代这种调解的解决方法是，当前流行的庸俗资产阶级音乐的旋律，可以配以新的歌词，用这种方法可以造成一种辩证法的“再运转”。尽管如此，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迄今最坚定的无产阶级作曲家，出自勋伯格学派之门的艾斯勒，怀着接触的渴望，似乎与这个学派自身背道而驰。如果这种接触富有成效，它必须发现辩证法的使用：这种音乐一定不是通过被动、使用者——包括无产阶级意识的片面立场获得指令，而是通过它自己的形式自身积极地干预意识。

二、再生产、消费

音乐与社会之间的异化在音乐生产的对立中得以反映出来：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只有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中才是切实的。音乐**再生产**中介着这两个领域，它为生产提供供给，只有通过再生产，生产才能直接呈现出来，否则它只能是无生命的文本。（再生产）是所有音乐消费的深层形式，对于社会而言，只能接受再生产的作品而从来不能接受纯文本的形式。对生产的要求（理解为对真实性要求），对消费的要求（理解为对可理解性的要求），同等程度上针对再生产而言并与之绞缠在一起：对某些作品进行“清晰”演绎（Wiedegade）的假设同样完全适用于根据其真实意义对文本进行描述，适用于听众可理解性的描述。当生产和消费以这种方式在再生

产的最深层单元相汇合时，再生产便为彼此冲突提供了最精确的剧场细节。如果再生产只包含异化的音乐，那就不能指望它对社会产生影响；作为社会再生产，它未触及作品的本质。因为与其说具体的再生产——作为流行的艺术批判总是希望人们忘却——既不关心一种永恒的作品自身也不关心依赖于不变的自然环境的听众，倒不如说它与历史环境有关。不但听众的无意识依赖于社会环境的变化，不但再生产的意识依赖于既定时代的音乐机制的总体状况，而且作品自身及其历史都在这种体制中发生着变化。它们的文本只是一个不确保明确意义的纯符码文字，其中变化的主题内容随着音乐辩证法的发展而产生，反过来它又包含着社会环节——这种变化在作品的再生产中有保留地显现出来——作品自身中的变化置身于再生产中。也就是说，在激进的异化迹象中，作为再生产的自由消失不见了。音乐行会的传统，有时甚至是单个家庭的传统控制了前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这种传统的环节确保了演绎的连续性中音乐及其听众之间的固定关系，作品与社会并不处于一种对立的孤立状态，更确切地说是它通过再生产而对生产施加影响的，直到18世纪末——即，直到维也纳古典主义淘汰通奏低音乐器的实践之前——生产、再生产和即兴演奏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而是交织在一起的。甚至像巴赫的赋格这种严格的作曲形式，作为对中世纪复调音乐的继承，也并没有使自己屈从于通奏低音的实践，只不过在文本中偶尔略加限制而已，完全听任演奏者在速度和力度变化上的自由。这种规则所赋予的一种传统，在平均律引入之后的几百年中仍然与非理性趋势纠缠在一起。所有这一切随着资产阶级的胜利发生了变化。作品自身确立起自己的独立，在一种社会合理的符号体系中，在与社会的关系中把自己规定为商品；演奏者传统和他们的行会之间随着自由竞争的强制而中断了往来，“学派”只关心训练，无暇顾及训练内容以及品质集体。马勒在维也纳遭遇了传统音乐训练的残余分子，用他的话来说，这些残余分子显然是“草率”的。作品中演奏者的介入，在作品明确物化（Verdinglichung）之前的时代总是可能的，而且是对自身的要求，现在却成为一种坏的任意的、但却是合理构思的作品必须远离的本真性。上一世纪，音乐再生产的历史已经摧毁了再生产的自由。演奏者只有在两种合理特征的要求之间作选择：要么他必须把自己严格限于实现，充其量局限于对音乐符号精确语言的解码；要么他必须根据市场的需要来调节自己，在这种需求中作品的形式衰亡了。19世纪，“演奏者人格”在资本主义过程中在

非理性再生产最后的音乐避难所的两种要求之间起着调解作用。这种人格与自由竞争的形式以及含有等量的非理性之间关系清晰。它通过在说明性文本及其符号框架中用作品本身重新生产出的内容而服务于作品，这通过以下方式成为可能：作者与演奏者的结构具有同质性，此二者既是资产阶级“个体”，同时又是资产阶级个体性“表现”的完成。李斯特和鲁宾斯坦，此二人都是“富有表现力”的作曲家、演奏者、“再创造者”，他们是这种演奏方式的原型。他们为之献出音乐的这个社会，事实上正是按个人主义方式构成的，在他们那里社会再一次认识了自己，通过他们而占有了作品，在为技艺名家准备、远比那些著名的作曲家伟大的凯旋中，社会褒扬了它自己。与19世纪相比，当代音乐再生产所经历的决定性变化是个体社会和个体生产之间的平衡遭到破坏，再生产的自由随之变得高度可疑，再也没有比从竞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中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这种现象了。当然，“演奏人格”在音乐生活中继续存在并可能比以前发挥更大的社会效应，但是它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彻底变化。这种霸权——作品和听众强烈需要的——以独裁的方式掩盖了自由演奏者和作品之间的深渊。然而，音乐生产大体上主张独立于任何市场而要求演奏者彻底从属于文本，与其说这种从属不受当前生产的制约，倒不如说它同样成为过去生产的必要前提——只要根据先进生产旧作品演绎的生产还是可能的，且没有导致这些作品在严格演奏者面前处于明显的失语状态。作为作曲家，勋伯格根除了调性终止式和弦以及来源于它的所有形式手法；然而，却因此丧失了无可非议地归入这些手法以及尚未明确规定的表现方法的表征的解放，而这种手法恰恰是早期演奏者的自由保证。现在，这些文本被注解到最后一个音符、节拍的最细微差别，演奏者只能成为作曲家明确意志的执行者。在勋伯格那里，这种严格性的辩证法来源于作曲手法的严格性，因此，社会提供担保的素材是彻底“构成的”，而不是被给予的。在斯特拉文斯基那里，他的音符—文本较少是精确规定的，但是通过风格和客观主义的“趣味”清除了演奏者的自由。也就是说，这是通过非辩证的方式获得的，但是具有类似的结果。当然这种客观主义并不纯粹产生于结构，然而要求所有演奏者屈从于客观主义态度。这种从属关系，即使在作品而且在符号给予（Zeichengebung）中是不确定的，但至少被规定为一种非感情的演奏手法，类似于用平淡无奇的朗诵方法演奏机械式乐器。这种机械式乐器领域中的改良与革新——使得比平庸、无节制的“自由”演奏者更为精确的

演绎成为可能——可能彻底影响了再生产观念。无论如何，只要他们的问题的内在复杂性造成再生产自由的同样局限性以及趋于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外在于音乐的机械化与合理化经历的同一倾向，它就肯定了音乐再生产状况的社会阐释的要求。机器的完善以及通过机械力量取代劳动力同样在音乐中成为现实。这些趋势并不局限于当代音乐的演绎（Wiedergabe）：模糊文本框架作品内部的历史变化不是一个随心所欲的过程，确切地说它严格服从于音乐生产领域中获得的认识。总之，旧的音乐、尤其是“古典的”德国音乐屈从于更精致的直觉，如果它要像当今自己的结构把自己向世人呈现出来那种方式实现的话，那么它就需要和最新的音乐同样严格的演绎，抵制演奏者每一种即兴演奏的自由。对作品进行客观恰当的演绎的要求已经把自己从作者难以控制意志中解放了出来，正是在这种解放中再生产的历史特征令人信服地展现出来。如果今天试图“自由地”演奏某首早期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用随心所欲的即兴演奏方法，尤其是改变单个乐章的基本速度，根据当今的说法，这是以贝多芬本人演奏的方式来演奏的——以前的东西，通过后来的生产，看似本真的演奏手法必然使完全可辨认的乐章结构整体表现得滑稽可笑。

然而现在，只要内在地面对最先进的作品、根据生产的真实状态来定位的演奏进行深入研究，就会获得自我扬弃的观念；正是在全神贯注于作品的纯粹演绎的最优秀的表征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与社会的公开冲突、与观众的公开冲突，这些观众认为，在作品中演奏者代表了他们，而现在通过作品的牺牲，这些观众意识到自己彻底被从作品中放逐了。在趋于合理化关系中，社会的矛盾心理比关于生产与再生产的对立表现得更为尖锐。随着节省劳动力目的的技巧手段趋于完善，随着根据商品的一贯性独立音乐的发展屈从于作为最终与社会彻底分离的抽象整体的交换，资产阶级社会不仅加深了音乐的合理化过程，而且只有通过这个社会这种合理化才成为可能。然而，合理化的结果，在它的基本范畴中抓住了资产阶级秩序的不变性，并且退回到一个概念世界，这并不纯粹是内在—音乐世界，而且很久以来也属于过去的内在—资产阶级背后的实在性。然而，它再一次表明自己尤其适合于掩盖社会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意识形态。音乐生产和再生产的合理化，社会合理化的结果，作为“去心灵化”（Entseelung）被披上一层恐惧色彩，仿佛它惧怕坚持自己主张的社会状况的非理性，尽管根据激进的艺术合理性全部合理化已经变得太过于明晰，这样一

来，“心灵”便与资产阶级—独立的私人悄然无声地等同起来。人们试图以意识形态的方式用更大的明晰性来规定它们的权利，它们越被人们以经济—社会方式追问。最乏味的对立对于这种消费者的意识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希望根据其认识特征使自己免于真实的再生产力量以确保一种音乐演奏（Musizieren），其主要功能是通过梦、陶醉以及沉思来掩盖现实。同时，这种再生产正是在审美图像中为资产阶级提供了实际上是对他们的禁止冲动的快感。然而，艺术作品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它构成整体所必需的赋形。机体变得与机械相对立、内在性与空虚相对立、人格与匿名性相对立。客观主义试图以它更为抚慰的德国形式，通过同化失去的再生产自由采取生产的立场驳回这种被给予的与合理生产相对立的异议，或至少在文本中采取“乐艺”形式的幻象使文本进一步从乐器演奏的方法中展开，仿佛它只是使生产自身首先成为可能的再生产的自由可能性，这种未遂中介（Vermittlungsversuchs）的幻相特征因此被暴露出来，这种功能恰恰是应该在生产中实现的。这使得“文本”和具体作品成为最后“乐艺”的实例，乐师的音乐修养成为作品的纯装饰佐料。至于与听众的利害关系，纯粹为音乐而音乐（Musiziermusik）总是无效的。观众的意志曾经在作为19世纪音乐中个人表现的转折点、且它的功能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的同一“演奏者人格”中得以实现，现在，这种人格必须履行双种功能。首先，用它的霸权“观点”，通过驱除一种增大或过于可塑性（überplastik）的作品形式在作品和公众之间确立失去的交往，尽管它可能与作品不相称，但确保了对观众情绪的影响。其次，它必须进而唤起作品作为个体人的动态与私人活力的表现，尽管如此，但是，它们都不再是用魔法招来的。这种特性是使得作品在别久情疏的赋形中呈现出来的另一属性，的确，它们可能从未拥有过这种使“杰出的”超群的特性。那些更具生机的充盈、自由的活力、更为活生生的有机、更为直接、非物化的内在性的希望意象都是由他独自为那些资本主义经济事实实际上拒绝实现所有这些希望的人而提出来的，这种意象同时在他们的本质中、在他们的信念中通过那些不朽更确切说是永恒的、（指挥）像魔法一样唤来的作品加强了他们。凭借着他们的教育力量，这些听众牢牢控制了这些作品并同时尊之为拜物教。与19世纪前辈严格比较起来，这种指挥与当代生产处于相异或否定的关系，他不时提供一部现代作品作为威慑范例或最多允许新音乐采取一种向古老心灵艺术的修复转变的立场。然而，他拥有英雄—资产阶级式的往昔——贝

多芬或如布鲁克纳，他把社会活动的奢华与杰出演奏家所表达的对生气与内在性的要求结合起来。同类型的担任贪婪地沉醉于布鲁克纳第八交响柔板庆典乐章的指挥，过着一种极为类似康采恩首脑的生活；这是一种准确无误的社会必然结果：这个人的任务是尽可能地把众多组织、机构和管弦乐队联合在一起，并在资本主义音乐托拉斯和内在性内部把它们还原为同一公分母。当今杰出演奏家所代表类型的历史现象表明，指挥扮演的是凌驾于管弦乐队机制之上，抑制器乐、声乐大师的自由竞争的总个体角色。他是一个个体，但也是一种“人格”：一方面他控制了观众与音乐，另一方面又以公众名义控制着音乐，但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且带着他从过去引用的控制姿态。最后，他对听众驳回的控制姿态支持了他的成功，所有这一切揭露出这个事实：表面上克服机械化的个人，正如垄断寡头隐瞒个体洞察力的合理—机械机制为了把一切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一样，二者是同一回事。一种名望支持了他的意识形态控制，在那里社会反复复制他的修复—再生产成就。阶级意识恰恰与一种演奏者相称的观念合调：清除与之不相符的演奏者，无论他的职业特性、甚至他们的启发力量如何无可置疑，这种做法在战前的维也纳和当今的米兰以及与柏林并没有什么两样。

当今社会要求音乐在其愿望的满足中作为意识形态而为这个社会效力，正如这些愿望以“演奏人格”的形象在再生产的问题域得以辩证地显露出来一样，这种要求控制了全部官方音乐**消费**，并进一步得到资产阶级社会教育主管机构的认可。它的“音乐生活”暂时固守在歌剧院和音乐厅的传统位置。资产阶级社会已经结束了与异化音乐的休战，反过来以调节的形式谨慎地和它联手。当然，这种休战可以在任何时候终止：“音乐生活”在资产阶级那里对社会形势的一切变化作出迅速、准确的反应。比如，中上阶层通过通货膨胀和危机的剥夺已经把这个阶层从歌剧院和音乐厅中赶走了，在无线电前放逐了。这种分神充分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原子化以及从资产阶级个人公共事务中的排除：根据“混合经济运作”说法，坐在扬声器前，资产阶级屈从于经济与音乐方式的垄断。因为音乐生活如此直接地记录了内在—资产阶级结构的变化，对它的分析必须考虑到内在差异以及资产阶级的矛盾。孤立艺术作品的领域的自治要求已经被打破，并被市场需求所取代，统计学可以为社会阐释收集基本素材。然而，这种素材不可获取，尽管如此，但是，观察还是可以提供大量发现物。首先，就

歌剧所涉及的范围来看，它已经失去了作为一种消费渠道的真实性。它在19世纪的主要功能中的表征功能，至少今天已经被剥夺了。大量贫穷中间阶层不再有经济实力支持这种表征，他们也不再是任何形式的文化整体，这种升华的表征曾经能在歌剧院中发现。他们所能做的最多是回想《纽伦堡的名歌手》[①] 上演时的快乐年代。然而，能够而且乐意从事于体现的大资产阶级——回避过于公开扮演统治和有经济能力的社会阶层；目前，他们扮演的仅仅是包厢中可接近每一个观剧镜的上流人物。而且，他们对歌剧剧目缺乏兴趣，偏爱在大型音乐会经理处确立他们的音乐领地，他们从经济上控制这种组织，同样也通过节目单政治进行控制，而不过分暴露自己的身份。尽管如此，但是可以设想，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形式的进步政治教育的发展，歌剧可能重现昔日的社会光彩。目前，歌剧部分受到来自“有教养的”中层老一代订户的关注，他们在歌剧中经历了他们自己的过去，享受着引用瓦格纳的凯旋而归的资产阶级陶醉。同时，通过坚持一种在它的生产范围中受社会状况影响比较小的艺术形式，他们能够免受艺术革新以及相关的社会意向的影响。光顾歌剧院者组成了其他资产阶级圈子成员的另一部分观众，诸如小商人、甚至仍然要求某种经济标准的工匠职业代表，由于他们的出身以及所受的“教育”而被排除在外。这是一类歌剧院光顾者，他们自然很高兴再一次听到《阿依达》[②] 中的进行曲以及《蝴蝶夫人》[③] 中的咏叹调——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都是从电影院、咖啡馆里熟悉的，而且符合他们的音乐教育水平；同时，他们认为这种情况得益于他们真实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以及被陈旧的资产阶级教育观点与承认歌剧院光顾者在奉为神圣之地接受这些商品的社会名望的可能性，至少在他们看来，某种意义上说，出现在歌剧院中代表着教养的尊严。可以假定，歌剧院观众中这种类型是真实存在的，当然需要作重大修正。今天的特征是完全缺少年青一代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雇员。这种预设结构主要是在地方歌剧院遭遇到的。在大都市中心，柏林、维也纳，高度发达的娱乐机构把资产阶级的注意力从歌剧院中分散出来，所以那些城市的市民比地方上的市民较少光顾歌剧院。另一方面，歌剧以真实存在或虚构的

---

① 《纽伦堡的名歌手》，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歌剧作品。——译者注

② 《阿依达》，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歌剧作品。——译者注

③ 《蝴蝶夫人》，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歌剧作品。——译者注

“局外人”名义被授予一种代表性的尊严并因此把大资产阶级吸引过来，这就使得歌剧上演作为“社会事件”成为可能。

资产阶级家庭中的音乐会功能仍具有更重要意义。音乐会中没有歌剧的粗俗主题内容。很大程度上，它表明了近几百年来内在一音乐的发展经过从声乐到器乐的重大转变，巴洛克遗产依然完好无损。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中的歌剧角色只有在风格最伟大作品，在莫扎特那里、在《费德里奥》① 中、在《自由射手》② 中才是非直接的、无可争辩的。正是这些主题把中下层阶层吸引到歌剧中来，他们在那里可能寻找某种类似于倒退到前资产阶级状态的东西。然而，同样的主题吓走了发现它“天真”、“原始”或“粗俗”的上流社会。他们可能意识到前资产阶级精神或歌剧院的非资产阶级世界的危机，一种它们总是寻求政治上刺激自身的危机；他们可能旨在掩盖作为纯粹事（Dinge）的世界的现实性特征，正如它通过歌剧带着无拘束的发现的欣喜而呈现出来的那样——他们试图掩盖这种情况正因为直到今天它仍然是资产阶级现实的特征：上流社会从这种现实中退入过去的“内在性”，他体验的快感越多，也就越远离社会状况以及对这个矛盾距离的洞察。这种洞察力甚至可以通过音乐呈现出来并被掩饰在直接的集体性的幻相中，大资产阶级喜好音乐会，他们在音乐厅培养人文主义—理想主义的、有教养的意识形态——而没有与自己达成妥协；这种意识形态培养并吸引了大量的有教养阶层（Bildungsschicht），包括贫穷的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在音乐厅获得意识形态调解的“教养和财产”的歧义性以成倍的管弦乐队在无数城市打下深刻烙印：当“爱乐乐团”在昂贵的音乐会上为大资产阶级演奏时，有专门家庭定购系统担保承担，和非常著名的客串明星一起演奏以及非常有限的认可，为大资产阶级演奏礼仪性的作品，“交响乐队”以谨慎的态度在传统节目单中配制新奇性包括“本地”天才的节目，如果经济状况许可，他们还为中等教养阶层预留廉价的入场券。独奏音乐会，由于音乐会卖方危机的增长而导致数量缩水，风光不再；通过减少数量，他们越来越从公众的意识中退却并明显把自己限制在垄断明星的圈子内。音乐会，诸如虚饰地象征着当代独立生产的新

① 《费德里奥》，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歌剧作品。——译者注

② 《自由射手》，德国作曲家韦伯（Carl Maria Weber）的歌剧作品。——译者注

音乐国际协会[1]的集会，通过极端的经济措施展示它的孤立。不论他们宣传的现代性路线如何，他们几乎还是得到有关音乐家的关注，免费为观众供票；因此，这些音乐会得以保留在音乐生产领域，而且在经济上完全是非生产性的：它们是依赖于补助金、赤字财政的事业。支持他们的为数不多的业余爱好者、大部分资产阶级成员，只是非直接地或根本不分担经济生产过程，这些人已经被经济危机从中清除掉了。根本不存在新音乐的“消费”这回事。只要它曾经经历过再生产，这种情况通过以下方式变得可能：通过他们之中那些难以承担经济负担的艺术家组织，或通过单个国家对时下音乐生产采取的立场以及他们旨在“精神交换”而证明原来是虚构的政治风味的国际会议，而且不再能预知他们的作用。这些会议——以自由主义方式坚持基于经济动机的消费以及“交换”的功能——通过他们的政治纲领中所包含的折中，即使从音乐内在性立场来看，已经牺牲了任何互惠方式带来的责任感。

不能把官方音乐生活的消费意识还原为任何纯粹的规则。任何有关资产阶级音乐消费意识形态特征的评论都需要解释。认为音乐消费没有基于音乐消费的真实需求是不确切的，尽管全部音乐生活只不过是一幕资产阶级社会为了掩盖其真实意图而搭起来的发出声响的文化—舞台背景，然而存在于它的真实场景背后的却是经济政治生活自身的演变。无论音乐生活同化这种功能的程度如何，也不论它分享特殊“社会”的表征如何重大，也就是说，它事实上与真实音乐生活处于分离状态，单凭这些事实不足以提供一幅完整的图画。确切地说，音乐消费的意识形态力量越大，作为纯粹幻相以及作为一种稀薄表层光彩的明晰性就越少，根据真实需求它就更为确切地交流着。然而，这种方式导致了一种“伪意识”，消费者的真实社会情境被掩盖了。对音乐的需求出现于资产阶级社会，随着尚存疑的社会状况而增长——这种社会状况导致个人寻求了超越了拒绝他这种快感的现实。这种快感是音乐生活通过对资产阶级趋势的接受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提供出来的——辩证地产生的——逃离社会现实并通过为他们提供社会现实中从未拥有的，或早已失去的满足而为它们重新解释这种现实的趋

---

① 新音乐国际协会［Interational Gesellschaft für Neue Musik（IGNM）/International Sociey for Contemporary Music（ISCM）］，建立于1922年，纳粹上台后被禁止。——译者注

势。这种满足包含着妨碍社会变革的客观意向，而恰恰是这种意向必然揭示了使对这种满足的真实认同的真相。音乐生活的这种意识形态本质是它足以满足资产阶级需要的能力，与其说通过这种快感的形式接受并使现存的意识静态化，倒不如说以自己独特的形式揭露了社会矛盾并把它们转变为关于社会特性的形式与认识：这来自于音乐生活的意识形态本质。当尼采把音乐唤起的“陶醉”谴责为非生产性的“陶醉”、不纯与危险而加以拒绝时，尽管他范畴的可疑性、而且他是无条件根据瓦格纳作品取向的音乐场面获得这种看法的，但是，他正确认识到需要的满足与意识形态的云遮雾盖之间的关系，他发掘了资产阶级音乐训练的法则，并进一步把无意识当作那种关系的剧场。资产阶级和音乐的联姻发生在无意识保护之下：与“音乐生活”的“合法”联姻，在更大程度上，是与“轻音乐”的“非法”联姻。这种关系的无意识同时为音乐—事（Musik - Dinge）的拜物教特征提供了保障；与其说敬畏，倒不如说以扭曲的形式从神学领域投射到审美领域，禁止任何涉及音乐的意识“分析”、为“情感”而保存的观念，也就是说，私人—资产阶级反动手法的难以控制性与音乐结构自身似拜物的孤立相吻合。一切可以阐明某种音乐的社会功能、对音乐结构进行解释的技术沉思，均以感觉之名而遭到拒绝。同时，以教育之名促进了普遍知识和无意义的风格概念。敬畏和情感坚持过去的名望，在它们面前所有的批判都变得缄默，并且在它们那里，资产阶级喜好肯定它自己的血统以及他们所有英雄品质的源泉。今天，在合理化的社会中，由于辩解是官方音乐文化的首要职责，效用（nutzen）等同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性——“古典主义”，资产阶级放弃了主体性——“浪漫主义”；资产阶级理性胜利的赞美同样也是处于绝对主权的资产阶级音乐生活之下、在规范化的作品中得以表现的个体的受难。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中发现同等满足的矛盾心理是资产阶级自己理性的对立面。在理性构成的客观性和以非理性方式强调的、个人内在性之间的张力之外，在“音乐生活”中记录了资产阶级向高级资本主义阶段的腾飞阶段。在《纽伦堡的名歌手》中，最富有启发性的、所有作品中最受社会受欢迎之一的场面是资产阶级企业主地位的上升以及他以一种梦的置换方式与封建主义进行“民族—自由”式调解的主题，这是符合情理的。与其说经济地位上已经获得成功的企业主的梦的愿望使他不被封建主所接受，倒不如说是富裕的资产阶级接受了封建主，梦想家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容克，他的梦同时讴歌了对已经失去的、前

资本主义的直接性的重建，与资产阶级“雇主”发展出来的统治的合理体系成鲜明对比。根据他自己的资产阶级的个人遭遇，根据异化的现实，与《纽伦堡的名歌手》并列的《特里斯坦》，与志向于世界经济扩张的企业主意识联合起来，憎恨小资产阶级贝克梅沙。企业主已经经历了现存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并可能带有封建主的浪漫意象，渴望用垄断取代自由竞争。在歌剧第三幕的节日牧场上，事实上不再出现竞争，只提供了一种容克·瓦尔特和贝克梅沙面对面的拙劣模仿。在汉斯·沙克斯和容克的审美胜利中，武装民船与出口商彼此钩心斗角的观念之间获得了平衡。在资产阶级消费的最后一位重要资产阶级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那里——正如恩斯特·布洛赫早已认识到的那样①——世界经济控制业已获胜，内在性和悲观主义已经被清理掉了。“激情”——作为企业家的精神——解放了自己。作为早先的资产阶级音乐从既定、非理性的体系解放出来的手段，一种抨击、改变音乐素材的辩证基座的伴音阶乐风与不和谐音，已经丧失了革命—辩证力量，类似于主题中的异国情调和倒错，成为世界经济自由迁徙的赤裸裸的象征；它们是一种任意连接起来的技术污渍，尽管任何时刻都可以通过四六和弦的健康的乐观主义来清除掉。最后出现在施特劳斯音乐中的素材是所有资产阶级音乐中非常原始的素材，全音阶—调性，尽管全部结构发生了变化，事实上正如资产阶级如此忠实地坚持利润率原则一样坚持这些素材。在施特劳斯那里，通过屈从于自由市场文学、东方、古董与18世纪②带着某种玩世不恭粉墨登场了。在施特拉斯的言之无物的旁征博引与“技巧的完美无缺”之间存在着尖锐分歧，也就是说，从外部强加的，对素材而言不是内在的，而是随心所欲地、事实上是对机制的非理性“控制”——从历史角度来看是一种原始状态的、无害的、愉悦的音乐本质；这种分歧不但完全适合于1900年前后大资产阶级工业企业家意识的经验状态，而且它进一步清晰地表明了资产阶级与其自己的必须同时强化与抑制的理性的自我疏远。尽管如此，但是在后瓦格纳的音乐情境中，通过社会发展以及瓦格纳作品的内在辩证法，音乐素材与社会中的异化已

---

① 阿多诺指的是恩斯特·布洛赫在《论音乐哲学》中对理查·施特劳斯的音乐作品的分析。

② 阿多诺指的是理查·施特劳斯的作品：《埃莱克特拉》（文学）、《莎乐美》（东方）、《阿里阿德涅在纳索斯》（古董）、《玫瑰骑士》（18世纪）。

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以至于诸如施特劳斯的生产力不能简单、无条件地漠视这种素材的挑战以及社会自身可能指明的顺从。当然，他最优秀的作品《莎乐美》和《埃莱克特拉》已经预示了这种分歧；在施洗者圣约翰的音乐、《埃莱克特拉》整个结尾部分充斥着陈词滥调，但是在《莎乐美》的开头，在埃莱克特拉的独白以及她和克莉塔纳斯特拉在一起的场景中，在某种程度上他的作曲素材宣告了它的独立、进步、事与愿违、迫近调性范围的边界。这个边界同时也是消费的边界：面对这两部作品，听众被音乐和内容所震惊以至于最终拒绝它们，如果不是出现在所有歌剧院舞台，至少出现在常备剧目安全地带中。听众对施特劳斯的界限存在着最后的宽容，反过来这个界限影响了他后期的作品。但是，在另外一层意义上，斯特劳斯也给自己规定了一个界限。所有资产阶级作曲家中，他可能最具阶级意识；《玫瑰骑士》是他最成功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素材的辩证法从外部失去效用。全音阶清除了所有的危险酵素，屋大维，一个女演男角的大家庭的年轻小伙子，出乎意料的是和新贵的女儿结了婚，然而作为汉斯·萨克斯和艾索德的女继承人的马克西林，却生活艰难，只能在短暂抽象意识中找到一丝安慰。随着知识分子对消费意识的牺牲，斯特劳斯的生产力被熄灭了：《玫瑰骑士》变成了工艺美术。斯特劳斯成为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断裂的牺牲品，作为一个生产者只是在德国以极端形式出现的。法国的工业化进程欠发达，因此资产阶级秩序的对立表现得不很激烈，二者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保持谐和状态。嗜好音乐的资产阶级有大量自由支配的时间，再经过印象主义绘画的培养，它可以进一步追随这种运动；音乐——由于对社会持有争议，因此在自身内部尚未被孤立起来而且不是辩证的——能够在自身内部使它的手法升华而不对这个社会进行实质性抨击。甚至类似印象主义画家的自治作曲家的德彪西，把他们的技术移植到音乐，根据声响与旋律带进他高度苛求的资产阶级烹饪音乐、甚至沙龙音乐的要素的艺术方法中。当然，德彪西步尘斯特劳斯，在他的音乐中出现的全音阶，同样是贫瘠而且古风的。这同样也出现在他的理论中——自然泛音的教条并由此产生的卢梭风格的暗语，是资产阶级的原始音乐素材极端升华的结果。作为饱识之士的拉威尔，发现没有比通过心理学文学的满足更为适合于这种情景的其他方法，换言之，他求助于善意的讽刺。然而，在法兰西，这标志着调解的终结。后拉威尔一代的作曲家呈现出法兰西艺术家可能遭遇到的最令人怀疑的缺陷，即职业的缺陷。延续了如此久远的

传统已经中断；勋伯格意义上孤立的音乐训练尚未成熟——严肃生产和资产阶级消费之间的真空随处可见。那种内在性中的生产获得的具体化依然无法达到，然而，根据消费而调节的再生产被大资产阶级自身在依从懦弱中作为“模仿”而拒绝了。因此，资产阶级明确意识到自身被拉回到不再能扩大的“古典”领域，退却到前自由主义的古典音乐，甚至“温和的现代性”的拒绝恰恰和经济政治求助于前自由主义的形式相吻合。由于这种求助受到自由主义自身辩证制约，因此它不再渴望超越自身。

在“音乐生活”之下、在教育和表征之下，伸展着“轻音乐”的巨大领域。它与工业美术和小歌曲、男声合唱文学以及复杂的爵士乐一起，不断地延伸到音乐生活，从上面吸收了它所能得到的东西，向下它延展到远远越出资产阶级“流行歌曲”的无底深渊的下层社会，并且从其中诸如只有特殊场合喷发的令人恐怖的歌曲“干杯！干杯！亲爱的弟兄，干杯！”上升进入意识。轻音乐满足直接需要，不但满足资产阶级的需要，而且满足全社会的需要。然而，作为纯商品，所有音乐中它是与社会极端背离的；它不再表达一切社会苦难和矛盾，反而本质上形成与社会的独特矛盾。这是通过授予人的冲动的满足，以歪曲对现实的认识而这样做的。人被迫远离现实，既远离音乐又远离历史。只要社会对作为“媚俗艺术”的轻音乐采取容忍的态度，也就是说，不要求审美权利，而是作为一种消遣手段，它就不屈从于任何批判。社会因此以这种方式调节了所有音乐中轻音乐一方面与人最近另一方面又与人最远的悖论。这些像白日梦一样充满了人们意识到或未意识到的产品，被资本主义及其所有技术强加给同样的人，而他们对此没有任何影响，也没有被问及，他们自己也对之抵抗。轻音乐采取众多方式以免遭受认识的领会。首先，它被看成是无害的，被看成人们不必被剥夺的一种次要的快乐；其次，它被看成是缺乏严肃性、不值得有教养者思考；最后，通过轻音乐愿望满足的机制如此深植于无意识，并被如此谨慎地归因于无意识的无知，正是在最重要的情形，没有理论的帮助难以理解，比如这首“荒唐透顶”的流行歌曲《谁把奶酪滚到仓库?》便足以使这一事实变得清晰。在资产阶级的“艺术”阐释看来，这种研究要求高度精确的阐释，甚至需要非常精确的心理学训练。用技术反思的观念难以说明这个问题，因为就它无从发展出一种自治技巧而言，他们只能概括庸俗音乐的特征，尽管它能轻易满足作为商品消费的需求，但这是自治的技巧不能回避的问题。技巧分析应该代之由一种少些的事例陈

述、退化持存的、明显古风—象征类型以及庸俗音乐运作的图表，其次，应该绘制出颓废的图式，其中只有轻音乐记录历史并把它整合进冲动的古风机制；最后，轻音乐中的变化需要经济机构的描述与文献，尽管它们的类型是“非历史性”的，但是它们涵盖面广且具有重要性。系统化科学对此无动于衷，所涉及的素材甚至不是以文献学方式提出的。这种研究没有越出当代和旧庸俗音乐、流传下来的舞蹈形式、交际歌曲、女丑和歌舞喜剧——“原始动机”连同它们提供的民俗学满足的确证之间的明显关系。然而，其中不变性是完全明显的，所涉及的关系与它们的功能阐释相比少于它们的规定关系；轻音乐依赖于进步社会的被给予状态适用于相同的成分以及同一冲动结构所呈现的完全不同的意义将得以展现；比如，同类型的庸俗歌曲，是17、18世纪年轻资产阶级对封建等级制度的世俗性的揭露与拷问，今天恰恰是对合理的资产阶级世俗世界的美化和辩护，他们的打字机——尽管彻底合理化——甚至在音乐中安顿下来并自我吟诵——因此转变为“直接性”。此外，应该把所有类似轻音乐中的形式与功能变化的语境放在一起研究。如果轻音乐的伪造特征使这种社会研究复杂化，可以通过它内部的任何生产的自治辩证法的消失把它简化，对庸俗音乐的揭露不需要通过它内在矛盾的技术指示来中介，因为，它服从于社会律令，提供了远远少于独立生产和有教养的音乐生活的社会范畴的对立面。然而，轻音乐的晦暗领域仍未得到审视。所以，从预先判断它的地形学出发将会一无所获。因为有限的基本类型连同这种音乐中众多现象的激进意识形态功能，容易造成整个领域的过早预想，而没有用必要的实用原则来规定它的“观念”的误导——因此不但剥夺了社会阐释的可靠性，而且也同样可能剥夺它的生产性。甚至自诩轻音乐概括的处理仍然是顺从，通过借鉴轻音乐所用的模糊反讽——像当代电影一样——倾向于对自身一笑置之以避开质询，这种观念作为游戏对象而被接受下来，这种游戏被无情的眼光，被笑声的无动于衷看作轻音乐中浓缩欺骗的厄运。直到这种观念成为可能，碎片暗示必须充足。

艺术音乐和庸俗音乐之间的张力如此陈旧，只是在高级资本主义中它才变得激进。早些年代，艺术音乐能够时常使其素材获得再生，并通过求助于庸俗音乐借以扩大它的范围。可以在中世纪的复调音乐中发现这种情况，因为它利用民间音乐作为它的固定曲调，莫扎特也是如此，他把西洋景宇宙学、歌剧系列和歌唱剧结合起来。甚至19世纪轻歌剧大师，奥芬巴

赫和约翰·施特劳斯也足以驾驭音乐生产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分歧。今天，这种平衡的可能性已经消失并试图合为一体，爵士乐风靡的时代勤勉的艺术作曲家承担了这种融合，但依然一无所获。再也没有能歌善舞并通过艺术而升华的“民族”；市场的开辟和合理化的资产阶级过程已经使整个社会都成为资产阶级范畴的囊中之物。这种状况同样也延伸到意识形态领域。当代庸俗音乐的范畴完全是资产阶级合理性的社会范畴——其目的是屈从于消费，它被保存在资产阶级社会强加的意识限度中，这种意识的限度不但压迫被压迫阶级，而且同样也压迫资产阶级自身。庸俗音乐的素材是旧的或颓废的艺术音乐的素材。约翰·施特劳斯①的音乐通过它的“流派”从当时的艺术音乐出发，但是这种分离不彻底，他的华尔兹为谐和的差异留下了余地；其次，它们是从微小、但从不屈服于纯粹空洞重复的对比整体中以主题的方式形成的。是这些碎片的惊人的连接赋予施特劳斯的华尔兹以魅力、“刺激”，同时也使它与维也纳古典主义的传统产生了联系，经过施特劳斯兄弟，从中发展出兰勒、舒伯特②。这种近来庸俗音乐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如明确的断裂、与独立生产的关系的牺牲、轻音乐中正在增长的真空，与生产的工业化完全相符。匪夷所思的强烈竞争迫使轻音乐作家从事大生产，他们之中的成功者已经退回到战前，在作品的托拉斯中联合起来，这些人驻扎在奥地利萨尔茨卡默古特，经过精心策划和自由主义者以及戏剧指导携手排斥局外者和新手。他们通过对自己数量有限的作品的限制，从而为轻歌剧的创作建立起规范，规定质量和个体“数量”的类型。同时，他们通过对自己作品销路的提前计算，借以避免由于种种原因可能妨碍回想以及作品旋律的歌唱性的所有难题——1880年维也纳和巴黎资产阶级的方法仍然是可能的。音乐生产的工业化迹象是旋律中所有对比的彻底根除以及对结果进行单独的控制，当然，它早已经被当作通过它让音乐给听众留下印象的手段。为新风格确立的范例出自《快乐寡妇》的华尔兹；资产阶级接受雷哈尔的轻歌剧的喜悦足以和第一家百货公

---

① 约翰·施特劳斯（Johann Strauss，1825—1899），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译者注

② 兰勒（Joseph Lanner，1801—1841），奥地利音乐家。舒伯特（France Schubert，1797—1828），奥地利音乐家。——译者注

司的成功相提并论。比如，仍然扎根于维也纳传统的奥斯卡·斯特劳斯[1]，已经具有熟练的手艺并对发展一种更为丰富、更加复杂的轻歌剧音乐尽了很大努力。然而，他必须既通过商业音乐——约翰·斯特劳斯缺乏这种社会影响力——又适应于工业化以求谋生。雷欧·法尔[2]是最后一位以同样的尊严从这种事务中撤退的作曲家。然而，所有这些作曲家，仍然和资产阶级艺术音乐关系密切，在轻歌剧形式中把自己表现为一个整体或一种“总体性”——即便是以一种讽刺性的方法来完成的，这种整体或“总体性”要求他们在其作品特征中具有音乐建筑以及强烈的个人轮廓，当然也包括原创性和灵感。轻音乐工业的发展终止了最后的审美责任感，并把轻音乐转变成一种商品。讽刺时事滑稽剧素材的主题清除了主体的、轻歌剧的形式要素，在它对观众的心意的投合中，观众削弱了轻歌剧的力量。舞台因此向无责任感的欲望游戏举手投降了。通过这个舞台，讽刺时事滑稽剧—轻歌剧足够奇怪地接近了独立生产的自觉意向。滑稽剧的这条路线产生了维也纳轻歌剧及其匈牙利副产品的严酷竞争的行会。有声电影清除了全部原发性音乐灵感。而一首流行歌曲如《华冷西亚》，就控制市场而论，仍然要求通过非对称、“机灵”韵律和其他陈腐性在其次要调遣之间作出区分。有声电影流行歌曲的彻底合理化工厂及其资本主义的分工排除了这种努力。不论他们的产品看上去、听起来如何成功，听众被迫自哼自唱这些歌曲，不但是因为最精密的机器把这些东西敲入他们的头脑，尤为重要的是，音乐有声电影的垄断妨碍了他们对所有其他的音乐商品的选择，接触。这里，垄断资本主义以纯粹、极端的方式肯定了自己，在制作粗陋的诸如《蒙特卡洛的炮击》[3] 的努力中，它进一步规定了全能的政治向度。即使就形式与结构而言，资产阶级社会的教育范畴中除掉了庸俗音乐，而这种音乐深深涉及与它们的连续性有关的范畴，它坚持作为拜物的教养题材。轻音乐的工业化和它实现的资产阶级教育遗产的剥蚀联合起来。同时，在那里，轻音乐真实生产的最后一次机会已经被根除绝不是偶然的。轻歌剧滥用舒伯特的《丁香花时代》，剽窃他的旋律，从事于“创造性的”

---

① 奥斯卡·斯特劳斯（Oscar Straus，1870—1954），奥地利作曲家。——译者注

② 雷欧·法尔（Leo Fall，1873—1925），奥地利作曲家。——译者注

③ 《蒙特卡洛的炮击》，汉斯·施瓦兹（Hans Schwarz）与福兰兹·舒尔兹（Franz Schulz）合作的早期德国喜剧电影。——译者注

艺术家的颂扬，这是流行歌曲所伪造的经济基础的必不可少的成分，既作为广告又作为意识形态，而且工业机制的每一步深入的发展都加固了轻音乐中仍然更为极端地栖息于其中的教育遗产的拜物特征。带有异国情调的《弗雷德里克》和《微笑的大地》①，二者是姊妹篇；现成的爵士工业寄居于“古典”音乐改编之篱下，因为这种遗产为爵士乐提供了原素材。反过来，这种遗产作为一种拜物通过重新遭遇的快感而得以加固。当它首先把自己确定为当代庸俗音乐的上层资产阶级形式时，爵士乐的意识形态功能掩盖了这种音乐的商品特征及其生产的异化风格。它在“优质商品”的商标下被供给出来。爵士乐在轻音乐的领域中将唤起即兴自由和直接性的幻象，这就是为何它可能如此方便地被艺术音乐中相似意向的努力而改编的原因所在。爵士乐的花招在心理学上成功已经多年：这是由于合理化机制不可避免地制造在市场营业额利益中伪装自己的必要性的一种社会结构所造成的。爵士乐的商品特征客观上是显而易见的。在爵士乐中不可能谈及“直接的”生产；成为“发明家”、校对者、和声演唱者、配器专家的分工——如果可能的话——在这种情形中比在轻歌剧制造者那里仍然会得到进一步提高。总的来说，貌似畅销音乐的即兴演奏完全是一套固定的规范表现，它可以追溯到一些基本的类型：首先，从音乐的固有立场来看，爵士乐中的自由、丰富的节奏是一种幻相；其次，节奏中充斥着八小节结构，切分法的使用和伪节奏插补只是作为装饰。然而，在它的和声形式关系中，这种结构断言自己没有遭到挑战，而且节奏的解放局限于低音鼓的持续不变的四分音符。在爵士乐华丽外表下内含着——贫瘠、一成不变、清晰的分离——最原始的和声—调式图式伴随着分解成半终止和全终止以及同样原始的节拍、形式。就社会以及音乐而言，它同样揭露了当危机中发生政治颠覆时——这种危机发展表明大资产阶级雇主取代世界市场的扩张的冲动，国家独裁的庸俗音乐中异国情调—民俗学及其关联并进一步对应用艺术的要求——爵士乐队和爵士音乐作品能轻而易举地服从军队进行曲的方法。低音鼓以前是殖民地人民类似舞蹈的原始情感的表征。现在，爵士乐使用了音乐表现主义的要素——全音阶、九和弦、和弦的平行移位——在这种状态中一成不变。它们并非直到艺术音乐的辩证法把它们抛得

① 《弗雷德里克》、《微笑的大地》，匈牙利作曲家雷哈尔（Ferencz Lehár）创作的两部轻歌剧。——译者注

远远的、随着作为它们的刺激价值耗尽之后才出现的——以同样的手法，19 世纪后半叶的庸俗音乐从以前的浪漫主义音乐中接收半音阶。然而，更为本质的是，爵士乐中这些手法的应用彻底丧失了一切形式力量，所有旧沙龙音乐片段、华尔兹、特征化片断以及被插入爵士乐的幻想曲使用了只是以调解的音符形式异于没有和声基础本身的半音阶和声。同样，爵士乐中印象主义的花招只是作为插补而没有干扰和声—节奏图式。轻音乐固执地把全音阶作为它的“自然基础”，这种基础越可靠，它越偏好容忍自己，和爵士乐一样，是这种迹象之下的一种过剩。

如果资产阶级艺术音乐的静态原始素材中的内在性预示了轻音乐堕落的图式，即调性；如果根据这些方式轻音乐和艺术音乐的关系并没有提出什么难题，那么类型学中所包含的难题就越发重大。甚至正是轻音乐中类型的基本事态，对句和副歌的分离，不易为人理解。如果考虑到独唱和合唱歌曲及其互换之间的历史起源，如果把它与当代众多对句中叙述副歌故事的流行歌曲的骗局相比较，以下的解释似乎是可能的：轻音乐试图以它老套的形式通过吸收传说、观察、分离的个体来控制异化的事实。一旦他开始副歌，他就进入了一个虚构的集体。反过来，这个个体通过分享副歌的客观性就找到他得以加强的重要性；的确，他把体验副歌文本的内容作为对句中他自己的内容。于是，他惊奇地认可了副歌中的内容并将其提升为一种集体内容。由此说来，自恋是流行歌曲生产中的心理学机制；对畅销曲调中随心所欲的可歌唱性的要求与此吻合：只要每一个听众用他被操纵的方式跟唱这些旋律，他就立即认同了旋律的原有载体，认同了被抬高的人格或吟咏这个歌曲的勇士集体。因此，他忘记了自己的孤独并接受了他既被包含在这个集体中而且他自己也是一个被抬高的人格这种幻相。尽管如此，但是这种机制并不流行：即使流行歌曲生产的主要部分坚持对句和副歌之间的区分，这些战后最成功的流行歌曲——如《舞蹈小手鼓》和《着色的洋娃娃的婚礼》——还是逃避这种区分。第一首歌曲由三重奏伴奏的舞蹈乐章组成；第二首歌曲是 19 世纪的一种“特征乐段”。在这个乐段中，它的成功并非由于它的文本，这种心理机制并不易说明；在《小手鼓》中，尤其是在三重奏中，它可能是某种旋律轮廓；在歌曲“洋娃娃”中，幼稚症的冲动具有一种影响力，但是这种说明的意义远远小于被每一首流行歌曲所唤起的心理分析特征。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用心理分析的个体意义来掩盖一种次要的而且更危险的重要性：这首歌曲的社会意义。然

而，如果在这两首器乐伴奏歌曲中，音乐在产生的效果中的角色如此值得思考，那么人们几乎提不出正当理由忽视这些带歌词的歌曲的影响。适用于分析这种音乐心理学影响的方法还没有发展出来。甚至恩斯特·库斯①的音乐心理学也没有就这个问题提出充分说明，实际上，它可能是音乐的社会解释中最重要的一门心理学。这就存在着一个更深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学是否充分，也就是说是否社会理论不再提出决定性的范畴。在传统意义上，流行歌曲的“心理学”导向的是冲动恒量（Triebkonstanten）。因此，对“荒谬”类型的流行歌曲所做的解释明确涉及了肛门退化（anale Regression）及其一般流行歌词中常有的虐待狂成分；荒谬被描绘为众多空白，审查机构造就了这些空白，但是它们很容易被填满。对这些流行歌曲所做的肛门—虐待狂结构的界定，丝毫没有提及它们当下的社会功能，而是将它们的影响追溯到冲动的一种自然倾向及其与社会的那种一般意义上的冲突，这个方面的特殊性在任何时代都是同样可能的，与此同时，却根本没有追问资本主义内部的流行歌曲的起源和功能。然而，只要社会辩证法与冲动结构的分析还没有相互结合或仅仅是外在地彼此“互补”，只要轻音乐的具体效应尚未被看透，那么它就会被分配给许多不同的学科来处理，在资产阶级科学体系的意义上，这些学科都是孤立地发展的，并且在其相互隔绝中各自强调资产阶级思想本身最值得怀疑的分裂之一，即自然和历史之间的分裂。最终，轻音乐和所有音乐的社会解释面临着一个核心问题：可以用什么方法来避免对自然的静止状态（在冲动的组成中）和历史的动态特性（在其社会功能中）作更进一步的模棱两可的方法论假设。迄今，如果音乐所做的是要逃避个体心理学图式，如果它最基本的效应预设了一种它倾向性地暗示的具体社会状况，如果自然自身出现在历史的意象中而不出现在音乐中，那么，音乐的素材特征就可能提供一种暗示：辩证唯物主义可能不回答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关系“问题”，然而它却可能有助于在理论和实践中消解这个问题。

（方德生　译）

---

① 恩斯特·库斯（Ernst Kurth，1886—1946），瑞士音乐学者、音乐理论家。——译者注

域外之声

“第二自然”：卡尔·魏特夫的社会批判哲学

［日］石井知章

引言

卡尔·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虽然属于风靡一个时代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人，但与后来成为世界思想界权威的同一学派的其他社会科学学者不同，时至今日，关于他的评价问题仍未有定论，且争议颇大。这位凭借《中国的经济和社会》（1931 年）、《东方的专制主义》（1956 年）等著作，在东方社会研究中开拓了独自的领域并在中国研究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战前作为德国共产党员积极活动，战后在亡命地美国又呈现出与麦卡锡主义保持同一论调的姿态；也许是由于他经历了这两种极端的政治参与的缘故，对他的评价也分为两种[1](p.140)。但是，迄今为止对于魏特夫的批判，大多数都是以他的政治态度为主要焦点，没有进行内在的分析，不过是对他进行的理论批判的延续，很难说经过了正常的学术程序。① 对于魏特夫的核心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和

① 例如，匈牙利汉学家杜克义（Ferenc Tokei）指出，法国的《思想》（La Pensee）于 1964 年 4 月，在自 1931 年的列宁格勒讨论以来首次提出的关于国际性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专刊号中认为，“寻找‘地理的’道路，魏特夫终于将所有的亚细亚社会都称为‘水利社会’，更有甚者，他在自己认为的官僚制或者‘全体主义的’场合中，也这样来称呼欧洲社会”（本田喜代治编译《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岩波书店，1967 年，第 9 页），没有深入内在的分析就进行批判。还有，法国的让·谢诺（Jean Chesneaux）也将魏特夫称为“马克思的叛徒”，对他提出了激烈的责难：“一种社会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在与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下的生产要求的关系中成立的社会各种关系，这种原则并不存在。在魏特夫笔下，亚细亚社会被称为一种法术公式，变成了

“亚细亚专制主义”的批判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自那以后，伴随着围绕这两个理论的争论，对他的评价时至今日仍然固定在这样一种两分状态。

（接上页）‘水利社会’这种东西。而且，这位作者充满憎恶地对现在的社会主义世界展开了批判。指出那种东西是以前亚细亚专制主义的翻版，但这种批判是在幼稚的地理决定论下进行的。”（上引《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第61页）法国的罗歇·加洛蒂（Roger Garaudy）甚至进行露骨地叫骂，他将魏特夫的《东方的专制主义》定论为“粗糙的地理决定论”：（1）在集体所有的基础上构筑阶级社会和专制主义体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2）然而，社会主义是建筑在集体所有和大规模公共土木工程事业之上的，（3）所以社会主义构成了身为东方专制主义及其衍生出来的剥削的一种形态的国家和官僚这样一种新的剥削阶级，没有做出上述“单纯的三段论法”，就“像死心眼一样”抛出了“水利依存社会”这种简直让人不屑一顾的说法。

同样的事情也或多或少地发生在我国（这里指日本——译者注）深具影响力的中国研究者身上。例如西嶋定生认为，东方的专制政治的概念，在孟德斯鸠以后的欧洲思想中孕育而生，又经过黑格尔、马克思、韦伯等人的相互继承，被理解为特殊的西欧的东西，被设定为基于魏特夫所说的各种自然条件的亚洲的宿命体制。因此，西嶋才认为，“这个概念是在欧洲近代自我意识的自我觉醒过程中作为对称概念被设定的，通过将价值的基准置于他们自己所处的世界——欧州，而使之成为一种相对概念，这种概念是立足于价值基准使自我认识成为可能的素材”（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和构造》，东京大学出版会，1961年，第49页）。

的确，魏特夫经常言及西欧近代市民社会，将中国这个国家与之对比，同韦伯一样，多启发性地描述社会的特质。但是，尽管如此，这些描述本身并不单单是“素材”，为了执笔作为《东方的专制主义》的蓝本的《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等著作而积累的大量实证研究也不只是为了形成“欧洲人自己喜好的跟他们住在不同地方的外部世界相关的概念”（同上）的“素材”。正如西嶋定生所主张的那样，假如即使承认西欧的、近代的自我意识是将魏特夫代表的理论框架设定为“对称概念”，其自身也并不意味着，理论构筑之时的价值基准只置于欧洲，只用欧洲的价值基准来说明外面的中国，“不能说明来自中国史内部的发展”。不管怎样，无论还是不是一个“与必须探索规定自己现在的历史条件这一我们的问题设定相去甚远的想法”（同上，第50页），我们都应当首先站在魏特夫建起的平台上，沿着具体的立论方法，才能讨论这个问题。

同样，作为战后中国古代史学旗帜性人物的增渊龙夫这样批判道：“魏特夫氏之所以将治水灌溉的国家管理作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因为他立足于意在从生产力的自然基础上说明东方社会的停滞性的‘自然的环境决定论’之上，这与他的东方社会停滞论密不可分。”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批判道：“治水灌溉的不可或缺性和国家管理，如果像魏特夫氏这样，仅从基于中国的不变的自然条件这一个意义上来立论的话，只要不出现像那样的自然条件被打破的某些契机，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人口支配就会丧失其历史性格，必须永远持续着循环和停滞，有陷入这种矛盾的危险。”（增渊龙夫《中国古代专制政治问题的历史考察》（《历史学研究》，第227号，1959年1月，第34—35页））诚然，站在将克服“亚洲的停滞论”作为重要课题之一的日本历史学的立场上来看，并不是不能将增渊的这种议论作为一种方法来理解。但是，尽管如此，可以断定，“今日中国的变革，不能用他（魏特夫——引用者）的‘东方的社会’论来说明来自中国史内部的发展”。原本，通过强调自然、地理要素的第一性，正如“给东方社会带来破坏和变革的契机，不是得自内部之力，而是始于外部影响。”（同上，第33页）的这种议论，果真出自魏特夫吗？实际上恰恰相反，他认为：“所谓的‘停滞’的论点是错误的。即使全然不说与停滞这种说法相伴而生的宿命论的影响，一旦生产形成，社会体制内部成熟，就会将经济的中国和精神的中国相当程度地长时间置于活跃的活动（及发展）的状态中。”（卡尔·魏特夫：《中国经济史研究》，横川次郎编译，丛文阁，1935年，第55—56页）这不表明他已开始退出自然·环境·历史的决定（宿命）论了吗？对此我将在正文中予以讨论。当我们听到增渊所说的：“与停滞社会论紧密结合的他的中国研究，肯定会遭到希望中国变革，意图寻求中国史中发展和变革的契机并满腔热血要求实践的人们的极大不满和批判”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感到其中有某种任意的、政治主义的背景的存在。

对魏特夫的批判，其前提是以冷战体制为背景的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换言之，不能否认其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时代的”上下文这样一种事实。但是，在那种历史前提条件本身都已消亡的现在，回过头来研究魏特夫其人的理论和思想，从根源上再次探讨在曾经的上下文中被固定的谎言及真相，是我们面临的新的“时代的”要求。所以本文主要是想探讨打下魏特夫后期世界观的基础的初期（20 世纪 20—30 年代）著作，特别是其主要著作《东方的专制主义》（1957）所反映出的他的自然观和社会观。

盖所谓近代的思考，肇始于以培根的人类和自然、笛卡儿的思维和存在、康德的认识主体和经验等思想中所说的以人类为主体，以自然或者社会为客体的两元论。但是，对于这种传统的思考持批判态度的法兰克福学派，不只对社民系、共产国际系这两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其认识也统一于反对卢卡奇和科尔施依据黑格尔提出的作为“主客的绝对的同一性”的“全知体”[2](pp.31-34)。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本身的忠实的研究，魏特夫还深入地认识到，例如，卢卡奇和科尔施所说的“现实”，与其说是基于“具体的现实”，不如说是基于对纯粹的思考的沉醉[3](p.53)。其中，魏特夫意识到在自然和社会之间存在着另外一个自然，如果不将自然的概念还原于社会，自然本身就不能与社会的发展相联结；换言之，构筑于自然内部的制度的、文化的方面，为了使社会向一定的方向发展而作用于人类，将这种作为自然和社会之间中间项的第二自然定式化，克服了传统的二元论。这个新的发现，是忠实地埋头于马克思思想之中才得来的，这点很重要。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魏特夫进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开始正式的研究生涯，在追求马克思意义上的“理论和时间”之间的紧密的相互关系之中，采取面向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不久，又强调说明在关于中国和亚洲的多个实证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基于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当为和存在”的紧张关系的社会认识的重要性。确实，在亡命美国强化反共立场的 50 年代以后，他才开始提出第二自然这样一种新的定式化。但是，在提出上述主张的魏特夫的理论发展过程中，非但不是对此前作为批判根据的“脱离”、“变节”，反而体现了其思想的一贯性。

一、劳动和自然

在《布尔乔亚社会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考察》（1922年）中，虽然是片断，但是魏特夫首次提及了自然和社会。科学是“以考虑生活为目的的自然以及社会的体系的定位手段”[4](p.8)，本来有“社会的机能”，形成作为生产过程中组织起来的社会构造的“历史的统一态”，这样理解是恰当的。所以，“自然科学的发展是由生产关系，即所有关系的历史地位来决定的”[4](p.30)。此外，在《市民社会史》中，魏特夫通过对布哈林的《历史唯物论》的内在研究，认为自然和社会在现象上都遵从有一定规则性的“合法则性”，作为其解释，提出了追问合目的性的“目的论”和追问与目的（“为了什么”）相对的原因（“何故”）的“因果论”这两种观点。要知道，“目的、合目的性这一概念并不单纯适用于世界一般，各种现象的合目的性并非目的论的合法则性”[5](pp.415-417)。在此，支配历史的是原因还是目的这一追根之问的最终解决，是“拥有意志的人类”，是“人类的劳动”本身[5](p.427)。对于魏特夫来说，“劳动者并非只改变自然物，同时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意识的目的。而且这个目的，作为法则，决定他的行为种类以及方式，并且他必须要使自己的意志从属于它。”（马克思《资本论》）[5](p.427)

这样，人类的劳动虽说是以其意志为媒介，主体的自由意志也不是立于自然和社会之外，而是立于其内部，在这个意义上，根据原因，结合各个前提，就难以说是完全的自由。的确，在这里，历史中的人类劳动所拥有的不被制约的目的和被制约的原因这样两种相对的意思相互交错。魏特夫在这里原封不动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历史的严酷事实所展现的是“被自然制约的劳动生产力”[5](p.439)，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基于自然背景，这一事实已很明了。盖所谓自然，在产业发展史上，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开始阶段，发挥了最具决定性的作用，不是土地的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译者注

"绝对的丰饶可能性（absolute Fruchtbarkeit）"，而是其分化和天然物的多样性才成为劳动的社会分工的自然的基础，迫使其追求劳动手段和劳动方法的多样性。魏特夫认为，此处社会地统制、节约自然力，由人类的劳动将其大规模地占有、驯服，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扮演着最具决定性的角色，这已被埃及、伦巴第、荷兰，或者印度、波斯，以及其他地域的灌溉工程典型性地展示出来[5](pp. 439 - 440)。

二、地理的唯物论批判

魏特夫在其论文《风土政治学——地理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1929年）中以系统归纳的形式明确地论述了政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当时在德国，以社会民主主义者格拉夫（Gg. F. Graf）等人为中心，在弥补轻视"土地和文化发展的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缺陷的名义下，对"地理的政治论"和"风土政治学"论述颇多。其中，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拉采尔（F. Razel）、辛普尔（E. C. Semple）、切伦（R. Kjellen）等人，在1924年之后，集中于在德国发行的《地理政治学杂志》周围，逐渐形成了自己纲领性的立场，根据这一立场认为地理政治学是：（1）与政治的各个过程的地理拘束性（Erdgebundenheit）相关的理论；（2）以政治的空间和政治地理学为基础；（3）作为地理学对象的地理空间的本质界分政治过程，等等[6](pp. 11 - 12)。总而言之，李希霍芬等人认为，应当从地理的拘束性，从对于地理学因素的政治生活的依存性上来把握政治生活。与此相对，魏特夫对于那种建立在政治过程受制于土地的"不正确"的且"非辩证法"固定性基础上的议论，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那样的议论忽视了一点，即地理性要素并不"直接"地对政治生活圈产生作用，只是一种"媒介"作用。如果从这一视点出发加以严密观察的话——其结果没有任何科学的客观性，并且只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政治性意义，那么这才是古代市民革命家的地理唯物论的纲领。[6](p. 14)。例如，李希霍芬主张，"对于一定生活形态的冲动是从自然的地理学的关系中自己发展而来的。在后者的影响下形成了一定的类型"，基于自己的这一命题，推导出"干燥地带的澄澈天空诞生了观察天体的天文学"这一结论。在魏特夫看来，这个结论完全无视经济领域的意义。原因在于，并非澄澈天空本身，而是由于干燥性作为经济发展之必然的灌溉，

简言之，在干燥地区为了耕作的可能而供给水的灌溉，才是有必要进行正确的四季计算的原因所在[6](p.19)。此外格拉夫主张去除“经济的中间项”，“气候已将国家完全镶嵌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人口的稠密化和国家的形成本来只局限在温带气候”[6](p.67)，这些只能说都是将地理要素“直接”与政治要素相结合的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所谓“风土”论的机械唯物论。但是，依魏特夫之所见，一般来说，政治的立法形态，不是由于这种“抽象的地理部分的契机”，而是由“在一定的自然的社会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生产过程的种类和量”所规定的，“具体地说，那些有人工灌溉的可能性、炎热而又干燥的地区，才有可能养活众多的人口，形成大的国家”[6](p.68)。

马克思主义主张人类和自然是在一切的社会生产发展中作为终极的不可或缺的根本因素而活动的“两个竞演者”[6](p.213)，这才是克服这种“风土（地理）政治学”的基本缺陷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的见解中，社会生活首次被还原到其真实的基础——物质的生产方法上来。只有这样，自然的——只限于对人类的经济历史意义成为问题时的——把握本质的分析才成为可能。马克思主义的自然的契机，在与物质生产的本质关联中来把握，“一定的发展阶段所拥有的物质的生产力，被统一于物质生活的一定生产内，又在实践中被表现出来，成为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生活过程的必要条件”[6](p.223)。的确，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这不是在自己选择的状态下，而且始终都处于他所指出的一定的客观状态下。总之，在那里人类的活动力是动因，自然是由其实际的构造显示这个活动力的一定的方向的客观基础，这种历史贯通的基本构造始终横亘于前[2](pp.232-233)。所以，在此条件下，如果有变革的可能性的话，那只能是在自然容许社会生产力增大的情况之下。除那以外的情况下，莫如说人类的劳动不能驾驭的自然关系非常重要，受自然制约的生产力，例如像干燥地区中的灌溉农业那样，常常产生出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生活形态。具体地说，在埃及和中国，集中水利灌溉的重要角色因其国土的孤立之故，对军国的封建任务来说不是本质的，产生了以文官和僧侣组成的官僚作为其支配阶级的“相对的极其纯粹形态的亚细亚专制政治(asiatischer Despotie)”[6](p.240)。

三、生产方式和自然

魏特夫更进一步，在《经济史的自然基础》（1932 年）中，与经济史的方法相关联，将围绕自然和社会的关系的理论更加细致化、更加深入具体地展开。如前所述，人类和自然是社会生产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两个竞演者”，以此为基本立足点，活学活用，在那上面进行了理论加工。

魏特夫认为，制约从事社会生产的人们的意志方向的，直接的是人类的生理性状，间接的是在那时达到的发展阶段使之变化了的客观基础。例如，尽管桑巴特将自由意志这一假定作为历史分析的出发点，但在进行具体的、科学的分析之时；他不得不承认神学的要求妨害了对于社会科学的认识。其结果，桑巴特认为作为本来理应是自由的意志形成统一的要素，由于对“性格”、“魂和血”、进而对“外在状况”这一“基础诱因”的设定，而重新“倒退到了野蛮的地理唯物论”[7](p.222)。我们为了不重蹈桑巴特的覆辙，首先应该将自然和社会，自然的以及社会的生产力看作“相互地发挥两种原则各异的机能”[7](p.224)的要素，进一步说，一方面，从事劳动的人类，对自然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自然引导着劳动行为走向一定的方向。

魏特夫所说的社会劳动过程的发展，在这里也是指根据其样态和活动制约的生产力的发展。这个过程中，生产出来的东西和未被生产出来的东西，作为构成社会的必要条件下的东西和构成自然的必要条件的东西的生产力的两大要素相互作用。即一方面，一切以自然作为必要条件的生产力，只具有在一定的历史状态下活动的历史性质；另一方面，社会的生产力都受在当时活动的自然所决定的必要条件的生产力性质的制约。“进行社会劳动的人类，遇到由自然所决定怎样的必要条件，制约它的，不言而喻是社会发展的生产力（劳动技能、科学以及其技术学的适用、劳动组织、生产手段的范围及作用）的整体。但是，这一社会形态中的劳动过程究竟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进而，通常能否发生变化——这并非由从事生产的人类随意决定的，而是在社会于那个时候‘所能够达到的’程度下，由自然决定必要条件的生产力的样态、多样性以及其组合决定的。”[7](p.224)这样，在一方面的生产方式的概念中，虽说社会的契机是应该考虑的，然而在那里从事社会劳动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前景中是最为重要的。与

此相对，在另一方面生产关系的概念中，虽说同时考虑到了面向自然的劳动技术方面，但是事物的社会的方面，在前景中是最为重要的。总之，前者作为制约的方面发挥作用，后者作为被制约的方面发生作用，在那里首先是从事社会劳动的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接下来人类相互的关系才开始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对于魏特夫来说，具有第一重要性的自然，绝不是与社会无媒介存在的、二元的抽象对象。并且，那绝非只是一成不变地受动，而是作为由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所购成的生产力双重的力量所产生的新的对象。“产业和社会状态，新‘生产’了两种自然的外界。一种是根据自然的本质特性的变形，另外一种则是根据它的现实化。这种变化的两种形式间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并不排除其形式屡屡发生（必然的吗？不！）的结合。自然的变形是进行生产的人类的劳动行为的直接结果”[7](pp.230-231)。更加具体地说，例如，在可耕作的高原、开拓人工灌溉、水渠地筑造、对耕作地和土地物产的利用等中所见到的“自然的变形”，的确只能说是“劳动过程中产生的立脚点的变化的结果”[7](p.231)，结果在它们现实化了的时候，“在劳动过程中，对人类来说重要的自然契机，常常同一，所以，又完全不成为问题了”[7](p.231)。在自然本身悠久的历史中，也许对自然来说只不过是相对细微的变化，但在对人类关系中，特别是在对从事社会劳动的人类关系中，是最有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但是，目前只不过是说“得以”变化而已，绝不是说自然的“变形”等于人类对于自然的活动和其现实化的必然的联结。因此，从“变形”到“现实化”的转化过程，带来力本说“发展”的另一个内在要素变得不可或缺。

四、“第二自然”的发现

魏特夫在20世纪30年代目睹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现实，逐渐放弃了对于主要生产手段的国有化也许能够带来政府的民主主义统治和无阶级社会的勃兴的希望。随着对苏联社会性格理解的深化，开辟了洞察官僚的专制主义构造和意识形态的道路。自1939年斯大林和纳粹缔结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之后，魏特夫就脱离了“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以亡命美国为契机，强化了“反共主义”的立场。那时他对作为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极

度失望，但并未舍弃作为社会认识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倒是埋头于“亚细亚的”事物的概念中邂逅“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了那其中所欠缺的韦伯提出的以亚细亚“官僚制”为中心的权力论的重要性。“在再次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东方社会的见解之时可以发现，显然‘亚细亚的’这一概念并非马克思所创造，他只不过是在古典派经济学者的著作中找到了这一已经完成的概念。我进一步意识到，马克思尽管将古典派的见解作为许多重要基本点来接受，但下面这一点是站在他自身的理论立场上所得出的不可避免的结论，即他得出了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各个条件下，农业管理的官僚制构成统治阶级这一结论，这一结论是错误的。”[8](p.25)就这样，在这个时期，魏特夫遭遇了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和韦伯（亚细亚官僚制）的方法论。

魏特夫自身的政治立场的变化本身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即使在他的《东方的专制主义》（1957）一书中也同样继续了他固有的对自然与社会研究的基本立场。这里的自然，是被人类作用的对象的同时，也是以它所容许的生产力为媒介使社会向一定方向发展的作用于人类的对象。同一制度条件下人类对自然的活动，因自然背景的不同使新的形态的技术、生活、社会管理的发展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的确要不断地改变自然，使新的生产力现实化。这样做，“自然获得新的机能，并渐渐地呈现出新的外观”[8](p.33)。但是，其所作用的新水准的活动能否达到，或者即使达到将引往何处，这种变革的可能性，各自依存于（1）制度的秩序，（2）人类活动的终极对象，即“人类获得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世界”[8](p.32)。总之，魏特夫一方面看到在固定的所与以上的、作为被人类活动变形了的自然的同时，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作为决定劳动过程的变化将向什么方向发展的客观基础的自然，在此也是强调自然对于社会的第一性。只是在这里应该注意的事实是，相比自然本身，强调的是某种条件下获得的制度的和文化方面的重要性。这意味着，魏特夫已经游离了自然的本来概念，他开始关注第二种自然，即由人类的活动而业已形成的文化，进而，经过“自然的转形”而终于使人类能够获得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世界”——即通过人的作为而从自然本身内部创造“制度的秩序”（institu-

fional order)。①

确实，人类在某种技术条件下，通过作用于自然本身，也许能够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获得第二自然。但是，魏特夫认为，操作几项灵活的自然要素，根据必要使之变化，即使有这种可能，其他的自然要素依然存在于那个社会发展阶段中技术条件难以企及的人类控制的范围之外，所以被看作恒常的东西（constants）②。具体到与农业相关的自然景观上来说，首先，温度和地形在很多情况下是显著的恒常的要素，土地的地形因与灌水农业运营相关，会进行平整化等诸多的小调整，但基本上不受人类活动的影响。与此相反，植物和土壤，比如说可以将有用的作物移植到原来没有的地方，虽说不怎么有效果，也可以将肥沃的土壤运往贫瘠的田地里以改良土壤。

---

① 在此，“第二自然”是笔者自己的叫法，并非魏特夫在《东方的专制主义》等著作中使用的说法。诚然，魏特夫在《风土政治学——地理的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1929年）中，在说到同样的情况时使用了“人类的第二自然”（die sekundäre Natur des Menschen）这种说法，但那只包含了由人类的劳动作用而发生“变化”的，与原本的姿态“区别开来”的自然这一抽象的意义。（上引《地理学批判》，第155—156页）但是，根据《东方的专制主义》中魏特夫自己的说明，作为“制度的秩序”的第二自然这种定式化，在强调“制度的”以及“文化的”要素的第一重要性这点上，与前述论文和《经济史的各种自然基础》（收在前述《东方的社会理论》中）中强调自然本身第一性的时候有本质的不同。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能在历史性开放的条件下产生出人类可自由地作出纯粹性选择的这种认识。诚然，他的这种思想的变化，或许“对我以前所接受的马克思的若干思想的批判很重要”。但是，尽管如此，从那里不能派生出他思想的彻底转变，魏特夫自己补充说：“除去这些订正，我仍旧继续保持着初期见解中的重要观点。”（OD.，P. 11，参考了前述《东方的专制主义》第43页）

② 艾蒂安·白乐日（Etienne Balazs）也用“恒常”这种价值中立的表现代替“停滞”来把握中国社会。一方面，他批判魏特夫的水利社会论，“依靠官吏实行的诸多机能中，只选出一个，即与水利建设有关的机能”；另一方面，也对官吏国家“全体主义的”进行了评价，他认为，“中国这个国家，是管理者的国家，干涉者的国家。（中略）交易、采掘、建筑、仪式、学校，事实上公共生活的全体和私生活的大部分都在国家的规格化和组织之下”，采取了与魏特夫相同的立场。白乐日又进一步分析道，“帝制下各种制度的永续性，特定的现象，例如儒教主义的恒常性就不容否定。它虽然屡次改头换面，但一直持续至今”，主张官吏国家即使不是“停滞的”，在“恒常的”这点上也毫无改变。（艾蒂安·白乐日：《中国文明和官僚制》，村松祐次译，みすず书房，1971年，参照了第10页以后的内容。）

五、水力和权利

我们意识到其中另外一个自然的必要条件——水跟其他的自然景观不同，具有特殊的性质。“水比大部分的作物都重，尽管如此，我们可以更加方便地驾驭它。不受固体物凝聚力的妨碍，遵从重力法则，水自动流向其所处环境附近的最低处。在被赋予的农业景观中，水是卓越的自然的变数(natural variable)”[8](pp.36-37)。但是，虽说是可变的，在水缺乏的景观中，在试图将其大量地积聚的时候，人们碰到了极大的困难。对于这点，对从现在的状况和变更后的状况得到的双方利益进行比较考量的结果，有十分的好处，且在自然的和技术的条件被估量允许的情况下，人们就会敢于进行那种尝试。

这样，当人们想在虽然干燥但却是潜在的肥沃土地上进行恒久的、有收益的耕作的时候，必须要保证水的确实的供给。尽管如此，这种必要性也绝不是像利用新的自然的机会那样具有一味的强制性，而是“状况已经明了，灌溉农业的途径只不过是众多可能的选择中的一种”[8](p.38)。的确，“在自然环境所给予的全部课题中，刺激着人类使之发展社会管理的水力的方法，是不安定的水状况所给予的课题”[8](p.34)。但是，魏特夫说，从依赖“降水”这种直接的自然的农业转移到依赖“灌水”这种通过人们作用于自然获得的第二自然的农业，是件全然属于“纯粹的选择”的事情。之所以这么说，一个是因为对非农耕民集团来说灌溉农业的选择，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只拥有从属于近邻农业国的这一种有限的魅力，另一个是因为，实际进行选择的集团数量与不进行选择的集团数量相比是少数这一事实，如实述说着“选择的自由”的存在。就这样，魏特夫跟以前曾经论述自然和社会关系的时候一样，在强调水力社会的第二自然的相对第一性之际，慎重退出了根据自然条件决定社会状况的“地理唯物论”①。

---

① 例如，阿诺尔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批评说，《东方的专制主义》的依据是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对此，魏特夫进行了如下的反驳：“非但没有采取顽固的经济决定论，反而显示了对经济事物的生态学要素的依存，是后者对在日益开放的历史状态中提供各种选择的各种文化条件的依存。偶然性，是；决定论，否”。(Karl August Wittfogel, “Reply to Arnold Toynbe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2, No. 2, June 1958.) 这个发言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它启示了魏特夫所说的制度、文化之类的第二自然在自然本身的内部被多层次地把握。

但是，向水力农业转换也好，不转换也好，这件事情本身如果没有秩序和指导的话是无法进行的，同时，要求由一个集团来作出决策。如果这里选择了灌溉农业的话，在决策上的权力集中应探索与其水准相适应的两条道路。即一条为共同体内的决策，另一条为超共同体的决策。诚然，事实上灌溉农业与降水农业相比需要大量的人力劳动，但是，挖水渠、筑水坝、分配水等地方工作，依靠少数农民、他们的家人、邻居小集体在共同体内部是能够胜任的。在这里依靠小规模灌溉的农耕，即使使之加大粮食供给，也绝非说其自身伴随着水力农业和东方的专制主义。与此相对，许多农民已经开始尝试各种各样的小规模灌溉共同体，在仍然干燥实际上却十分肥沃的地区发现可以到手的水资源的时候，人们就会追求超越共同体水准获得水的可能性。这才是真正的对自然支配的可能性转向对社会支配的可能性，才是水力社会专制模式产生的瞬间。魏特夫这样描述水的统制和专制权力生成的过程。

“灌溉农业如果依赖于水的大规模供给的操作效果的话，水所具有的独特的性质——其大量积聚的倾向——就成为制度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大量的水只有依靠大量的劳动才能流入水渠，也才能够储存在各个地域境内。这种大量的劳动必须要被调整、规律化、被指导。这样，热切期望征服干燥的低地和平原的众多农民们，不得不依赖提供给他们成功机会的组织这一设置，这是在机械之前的技术性基础。他们和伙伴们一起劳动，必须服从一个统一的指令权力”[8](p.40)。

这样，作为第二自然的灌溉用水就成了事关农民死活的条件，因此，对驱使他们进行大规模的劳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唯一能将此事组织起来的专制权力正以此为背景，将自然的支配转向社会的支配。然而，走向这种专制模式的条件，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历史性、地理性、相对性的机会，绝没有历史决定论式的必然性。如果说为什么政府的水管理并不意味着政治的专制方法，那只不过是因为“超越了掠夺式的自给自足经济的水准，刚刚开始走出降水农业强大中心部的影响，还未达到基于所有权的产业文明的水准，人们才对水资源不足的景观产生一种特殊的反应，走近特殊的水力生活秩序”[8](p.34)的缘故。

诚然，从表面上看，或许人们必须要遵从在灌溉农业社会中受水制约的各种条件。但是，当新的生产力超越在原状态下能够支配自然的曾经的水准时，人们在那里发现了更加强大的自然，所以暂时断念了对自然本身

的支配，反倒利用它转向社会的支配，结果只是自己适应了那个客观基础。总之，如前所述，在从“变形”到“现实化”转化的过程中，加入了与其相称的发展这种新的高级要素。“几种要素，在现存的技术条件下，对于全部的实际目的来说，人们还控制不到，所以，只能将它看作恒常的东西。其他的要素更具灵活性，人们操作它，如有必要，也可以改变它。”[8](p.35)导致恒常的东西和灵活的东西这两种分类的，不是自然本身，是带来自然的支配的“技术条件”，是决定其水准的生产力。这样，魏特夫的自然—社会论，自始至终都着眼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和更进一步的与其发展水准之间的关系，从而推导出水力社会论绝不是“超历史地”形成的。

小结

到这里我们已经知道，魏特夫慎重避开“地理决定论”的立场，而且将自然作为对相对第一条件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基础构造施加影响的对象来把握。已很明了的是，对魏特夫来说，自然是被人类作用的对象，同时又是通过以容许的生产力为媒介使社会向着一定的方向发展而作用于人类的对象，是上述两种意义的存在。在同一制度条件下人类对自然的活动，因自然背景的不同使新形态的技术、生活、社会管理的发展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不断地改变着自然，将新的生产力现实化。但是，这样是否果真能够达到新水准的活动，或者即使达到了，又将引往何处？这种变革的可能性，依存于制度的秩序和人类活动的终极对象，这里也是强调相对于社会的自然的第一性。只不过在这里，相比自然本身，也强调在某种条件下获得的制度和文化方面的重要性；在人类作用下产生的制度，进一步而言，经历了“自然的转形”才开始成为人类获得对象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世界，即作为自然和社会之间中间项的第二自然成了值得关注的问题。

魏特夫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作为自然的必要条件之一的水，与其他自然景观不同，具有特殊的性质。在被赋予的农业景观中，它是卓越的自然的可变量，因此，大规模的聚集，即灌溉等新的尝试成为可能。想在虽然干燥却是潜在的肥沃土壤上进行耕作的时候，人们获得了确保水的确实供给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其必要性决非像利用新的自然机会一样强制一

律，莫如说，灌溉农业的道路只不过是几种可能选择中的一个。从依存“降水”这种直接的自然的农业转移到依存“灌水”这种通过人作用于自然获得的第二自然的农业，是件全然属于“纯粹的选择”的事情。就这样，魏特夫跟以前曾经论述自然和社会关系的时候一样，在强调水力社会的第二自然的相对第一性之际，慎重退出了“地理唯物论”。

进一步说，灌溉农业如此依存于水的大规模供给，这意味着水的大量积聚的倾向在制度上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大量的水只有依靠大量的劳动才能流入水渠，也才能够储存在各个地域境内。所以，作为第二自然的灌溉用水，在专制权力下对驱使他们组织进行大规模的劳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将自然的支配转向社会的支配。确实，人们在某种技术条件下通过作用于自然本身或许能够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获得第二自然。但是，操作几项灵活的自然要素，根据必要使之变化，即使有这种可能，其他的自然要素依然存在于那个社会发展阶段中技术条件难以企及的人类控制的范围之外，所以被看作恒常的东西。但是，此处走向这种专制模式的条件，仍然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历史·地理相对的机会，决非历史贯通的·决定论的必然性。诚然，从表面上看，或许人们必须要遵从在灌溉农业社会中受水制约的各种条件，但是，人们只不过在那里发现了更加强大的自然，所以暂时断念了对自然本身的支配，结果只是自己适应了那个客观基础。反言之，当超越一定阶段的水准基于稳固的所有权的产业社会出现之时，启示人类才有支配自然本身的可能性。[①] 就这样，魏特夫避免了将第二自然作为历史的决定因素，让自然—社会论着眼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

① 但是，人类由于社会的发展进而就能够支配自然的逻辑可能性，是科尔施、卢卡奇等人作出的倾向于“主体的能动性”（voluntarism）的一种解释，决非魏特夫自己作出了那样的明示。据马克·巴鑫（Mark Basin）说，这种魏玛时期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冷漠的（vague）”定式化，才是在与以魏特夫为首的地理政治学的关联中论述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基于正确解释（correct）”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特征，同时也暗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原有的多元主义（pluralism）”。它还显示，在再次考察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得到“生态学的”意义，在以今日为背景的环境和社会中才有可能再次评价马克思主义。（Mark Bassin , Nature, Geopolitics and Marxism; ecological contestations in Weimar Germany, WWW;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1996.）此外，关于魏特夫和生态史观的关系，参考了上山春平的《历史观的摸索》（《上山春平著作集》，第2卷：《历史的方法》，法藏馆，1996年所收）。

上下文，进一步说，是着眼于伴随其总体的发展产生的生产方式的转换与其水准之间的关系，严格地说，不能将其与“自然唯物论”、“机械唯物论”同等对待。

参考文献：

[1] 刘易斯·科塞，亡命知识分子和美国［M］，荒川几男译，东京：岩波书店，1988

[2] 清水多吉，1930年代的光和影——法兰克福学派研究［M］，东京：河出书房新社，1978

[3] G. L. Ulmen, The Science and Society: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M］, the Hague; Mouton, 1978

[4] 卡尔·魏特夫，布尔乔亚社会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考察［M］，北村奎之介译，东京：丛文阁，1928

[5] 卡尔·魏特夫，市民社会史［M］，新岛繁译，东京：从文阁，1936

[6] 卡尔·魏特夫，地理学批判［M］，川西正鉴译，东京：有恒社，1933

[7] 卡尔·魏特夫，经济史的自然基础［M］，收录于东方社会的理论，平野义太郎译，东京：原书房，1976

[8] 卡尔·魏特夫，东方的专制政治［M］，汤浅纠男译，东京：新评论，1991

（作者单位：明治大学商学部）

（张俊跃　译）

海外名家：托尼·安德烈阿尼

从否定辩证法到肯定辩证法：革命路径的转换

［法］托尼·安德烈阿尼[①]

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换一种方式看待革命？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到底该用怎样的方式呢？

一、革命被视作消除对立

我想从对革命的传统认识说起。是什么样的认识呢？简言之，革命就是颠覆，无论是通过民主的途径，或是暴力的方式，若这两者都行不通，有序与无序将并存。革命是阶级间激烈斗争的结果，旨在消灭异己阶级。正如巴伯夫所说，革命是为了创建平等的社会。没收剥削者的财产，造福于人民，代表人民的首先是一个新成立的国家，一种民主制度，从上至下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巴黎公社就是很好的例子。其次，革命是以一种“协调的计划”代替盲目的市场力量（通常采用新的货币单位，依据劳动力体能或劳动价值）。值得指出的是，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伊始，在那个相

---

① 托尼·安德烈阿尼（Tony Andréani）是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政治哲学系荣休教授、国际知名的政治哲学家，曾任法国巴黎第十大学哲学系主任、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国际马克思大会社会主义学科主席。安德烈阿尼教授长期致力于政治哲学、社会学理论、马克思哲学、社会主义史等领域的研究，成就斐然。他非常关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曾多次来华访问、调研，并形成了一些深刻而广受关注的观点。

对开放的时期，所有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讨论在这一“战略性后退”的阶段结束之后，就最终达到的目标达成了共识：实施一种可以决定必须生产的物品以及如何生产的经济政策。（其实，之后的事实证明这样的经济政策是不可行的，这是一种配给制的计划经济，由政治权力决定一切：不同等级的需求、优先的部门、分层次的奖励、价格、生产单位之间的运输等等。）

我们谈论的是社会的“有机观”，每一个生产单位都是庞大社会机器的一部分，用这种新的生产模式可以对抗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和失业或阶段性危机的恶果。与“有机观”相对应的是劳动的“社会连带组织”。劳动者在社会分工中占据位置，期待手工劳动和知识性劳动的分离。他们以集体主义和革命服务为主要动力，“新兴的人”超越了个人的私利。人从此以理智作为向导，意识形态让位于科学，宗教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类进步的理想。

这在当时堪称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使曾经的历史都黯然失色，成为前史。人最终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一切的对立冲突——阶级对立与取消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政府的镇压与群众民主之间的矛盾、利益冲突与品德高尚的新兴人之间的对立、意识形态斗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都消失了。现在西方普遍认为，这是一种乌托邦，脱离经济需求和个人与人际关系的现实，因此，会导致效率低下、专制主义、镇压，并最终失败。尽管这一论断已经灭亡，但还要指出，革命的尝试除了不可避免的错误和罪恶以外，也曾经历过胜利，至少在最初的几十年里，也有广大的群众参与。

这意味着，从某些方面看，革命适应了现实的需要，满足了种种需求（简言之，团体的需求，集体选择的要求，国家方针的一致，同时是普遍性的承载者）。一旦革命不再适应这些需求，成为空洞浮躁的言辞，掩饰歪曲长久存在的矛盾，革命就会黯然失色。如果革命只用一条腿走路，而牺牲了另一条腿，也会失去原有的光彩（概括起来说包括，个人欲求，自主需求，文明习惯）。革命的理论是反辩证法的，意思是它旨在通过消除矛盾的一方来消除矛盾，这样可以避免任何的“分解”。

二、既然矛盾是不可超越的，发展就是将否定辩证法转化为肯定辩证法

我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人是矛盾的个体，不应怀着遗憾，逆来顺受，而应该从中找到行动的准则和希望的源泉。在此，我只想简要地论述一下。

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论断出发，人是一个不断自相矛盾的主体，即使最小的决定，也会深思熟虑，对自己的想法提出种种异议。计算机从不会自相矛盾，动物能够做出决定，但似乎不能思考，而人却常常在思索着（除非事情异常紧急）。如果我们说只有人，按照精神分析的原理，有一种无意识（抑制本能），矛盾就会变得非常激烈——独立于所有理性行为理论之外的东西。弗洛伊德从中看到了人类悲剧的根源（本我和超我之间，生与死之间的永恒斗争），可这是与时代的悲剧性紧密相连，我们并不一定要接受这样的悲观主义思想。这一矛盾同时也可以解释幸福是不可能得到的。我们永远不能与自我相遇，除了难得的时刻，如快乐，痛苦，或者恋爱（这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

如果矛盾位于灵魂的中心，我们不难知道人受到对立欲求的控制。我至少能举出三种不可缓和的矛盾，即前面提到过的三种。我再补充几句，不作具体的展开，也不分析其根源。首先是在个人内心、个人需求和团体需求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私利（包括利他主义的动机）和超越个人的团体归属（从家庭开始）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或者是竞争与合作之间的矛盾。其次，是加入限制型团体和大规模团体之间的矛盾。例如，作坊和办公室是关系比较亲近的地方（有低一级的工作小组），相对而言，一个单位，一家企业，它们都有自己的前景和利益，与企业、市场或国家经济中的一个工作组的利益是大不相同的。最后，是植根于社会的作为个人的个体与作为政治主体、作为民主社会中的公民的个体之间的矛盾。比如，作为个人，我想要一辆马力大、速度快的汽车，作为公民，我要想到我的车不能让其他公民受到危害，不能污染环境。

但是，回到共产主义乌托邦，它似乎鼓励矛盾的一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甚至要将其摧毁。集体中最重要的只有附属感，其余的只是小资产阶级或离经叛道思想的反映。这种方法也许可以走得通，特别是因为这一政

策符合亲密、平等的需求（只有看到苏联高速发展时期一致现象的重要性和社会进步的可能性，才能理解斯大林主义带来的凝聚效果）。但是另一方面，个人主义的需求被严重损害，以至于偏离正轨，如表现为野心勃勃，为时代所不齿的享受特权（限制放宽之后全面爆发）。我同样可以举例说明归属于不同集体间的矛盾（社会规范使单个的人能够团结一心，这是社会有机理念的必然结果，但是受到行政干涉的经济使个人看不到行为的尽头，对结果也不感兴趣，因此苏联劳动者的积极性逐渐下降。），以及个人需求和声称代表普遍的国家意志之间的矛盾，使得国家常常被控制在一个自以为无所不知的政党手中。

三、法国左派内部的集体主义乌托邦转向

法国社会党很久以前从共产党中脱离出来，强调个人自由和议会民主。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它一直致力于实现这样的政治主张：捍卫自由，却慢慢与私人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只是希望通过给劳动者更大的权利而能将其同化，可成效不大。“革命”党（包括那些想要深刻变革现有体制的人）看到苏维埃体制的失败及最终倒台，精神上受到巨大创伤，他们也不同程度地颠覆集体主义乌托邦，鼓励矛盾的对立方面。共产党的情况尤其特殊，20世纪90年代中期，它着手进行“调整”。它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开始为“新兴共产主义”而斗争。这一共产主义被定义为“建立在个人价值提升基础上的社会发展，称之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31号国会决议，2001年10月）。每个人应该“自我肯定”、“自我实现”，成为自己生命的创造者和艺术家。超越资本主义不应通过革命，而应通过小范围的改造，一种对体制的缓慢破坏、权利的侵占，实现“公有”、“共享知识和权力”。所有的重点都转向了个人，与团体的形式相左，被怀疑其本质是反动的。这样的言论始于极端自由主义，只是利用基督教个人主义的回声加以修正（个人尊严，社会公正）。它也许会利用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就是提升个人，将个人从阶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但马克思也认为，单纯进行社会体制的深刻变革就能实现个人的解放（我认为，他低估了与团体相联系的必要性）。然而，法共不愿进行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和体制的革新，因为它害怕过于偏向经济和国家化的理

念所带来的后果。此后，每次召开国会，它又将重心放在社会适应的形式上，却从不真正实施大政方针。因此，与其说它沾染了个人主义，不如说它走向了资本主义，但十分巧妙地挽回了局面。下面我想就此阐释一下。

四、资本主义何时能变成极端自由主义，巧妙地利用各种矛盾

资本主义要想炫耀自己的劳动、储备金、家庭、禁欲道德，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它的基因中确实有这些优点，但是，正如许多社会学家先前预见的那样［我想特别提一下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资本主义成为主流的同时，已经变成极端自由主义、消费至上和极端个人主义，甚至有些“左倾”［可参看布尔当斯基·夏贝娄（Boltanski et Chiapello）的分析］。一切都变成合法的（如淫秽工业），广告充斥在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广告。公众隐秘和表现癖侵占了所有的私人空间。个人被要求是流动的，冒险的，突变的（甚至包括在性欲方面）。一位作家将其称之为“流动主义”。做一切事情只需清楚强制的社会规范。民主变成市场的民主。简言之，在自由的环境下，矛盾的对立双方被消解了。

所有的反对派不会任由被缩减或轻易地被制服。团体的要求又在各式的小团体主义中浮出水面（有宗教的、伦理的、新部落的），其特征是自主和排他。资本主义与小团体主义一拍即合，甚至为己所用，只要它们不进行大范围的信仰传布、主张暴力或者恐怖主义。企业受到质问，为何不顾及普遍利益？这没有什么关系：企业履行的是“社会责任”——这是决定企业的唯一要素。新自由民主引来争议，因为它已经黔驴技穷了。那么它会被“出色的北部管辖区”取而代之吗？取而代之的是“股东的共和”，每一位股东都可以在“企业的政府层”中（根据所占股份）行使自己的权力。然而，一切都阻止不了企业的消亡，而业已成为消费者的公民也会要求重新由国家来保障财产和人身安全，重建最起码的公共道德。当然，这一点，资本主义也会做，它终究不会抛弃之前的一系列维护道德和秩序的规范。

在资本主义的领地上与其作斗争，即使对那些深受其害的人而言也是一项不可思议的战略，同时，也是一项必然遭受失败的战略，因为其有过多的权力和途径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控诉异己。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企

业承担社会责任，并不是无稽之谈，但是需要由企业自身（或其领导者）来决定和执行，其实只要国家不对其责任作出规定，也不惩罚企业（似乎能使它回到间接的计划经济形式），占便宜的是新自由主义。换句话说，“企业”是劳动的团体，而国家是民族的团体，就是我所说的肯定辩证法：一方面，企业必须根据普遍利益重新规划工作重心和投资方向，这将会给它们带去除单纯利润之外的其他合目的性；另一方面，国家无需调查一切，而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

为了摆脱一个党派内的意识形态混乱，如共产党，也包括所有的左派，我建议重新思考我们的目标，根据这一肯定辩证法，也许会使目标变得更清晰更可信，只要能与个人的期待相悖，因为现今的个人已经不知道自己的信仰在哪里。我将就关键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这个问题是很多法国人也不仅仅是法国人问及和最受关注的问题：除了资本主义，是否可能存在其他的选择。

五、作为肯定辩证法的社会主义

如果说大家都知道何为资本主义，却没有人知道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能够与之相竞争，更别提一种被大卫（David）称之为“后继的社会制度”。我们知道，社会党的大多数人虽具有社会主义者的称号，但却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前景。但更可气的是，共产党竟然放弃了以苏维埃及其类似体制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而左派的极端主义者对谈论这一话题谨小慎微（他们认为，摆在面前的工程通过斗争才能完成，而且是最不可预见的）。然而，社会主义旨在积极地利用各种矛盾，而不是让其中一方消灭另一方。我想从刚才提及的三种矛盾出发，作一个简单的阐述。

首先，享受平等权利的政治主体和处于不平等条件下今天已经走向排他主义的经济个体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良策是拓展公共服务领域，使得公民能够拥有各项利益，如健康、教育以及各种形式的社会保障。但同时也包括经济服务的领域，如职业培训、劳动就业和从事各项事业的费用。相反的，资本主义倾向于尽可能地缩小公共服务的范围，逐渐使公民身份成为一个空壳。然而，却正是他们保证了公民作为活跃的经济主体地位，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反过来，经济的发展又使个人能够充分行

使公民的权利。更清楚地懂得政治决策的风险。这样极大地有利于经济民主的发展，不仅可以作为提高效率的因素，而且可以作为政治民主的坚强后盾。我们知道，矛盾的任一方都可有利于另一方的发展。

其次，从属于企业这样的团体与从属于国家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或者简单地说，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解决的方法是进行一定程度社会投资的控制，使其符合集体重大决策中规定的走向和优先发展策略。这样，又恢复了计划经济，但却是一种更灵活的计划经济，赋予企业以最大的自主权。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落入行政手段控制经济的旋涡（缺乏活力和动力的不良财政划拨）。值得指出的是，计划经济并非要取回公共财产，也可以通过许多其他的所有权形式来实现。若是社会形式占主导地位，就更容易实现了。这也是我们称之为“社会占有”的一层意思。这里也是矛盾的一方推动了另一方。激励（如税收、信用率）可以比行政指令更好地实现集体的最终目标。而投资控制可以为企业提供对社会最有用的资金，它在根据经济收益选择投资体制中是不可能的。

最后，个人欲求与集体要求之间的矛盾。有众多可以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比如由公共部门提供的社会资产（尤其是那些被称之为“文明资产”），与之相对的是没有消费者的“私人财产”。所有的一切在做个人选择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例如消费者组织公平的商业竞争、一致的金融投资，都告诉我们从今天开始如何实现市场及私人财产的社会化。

我还想就另一种矛盾多说几句，它现在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势头，那就是民族归属和在国际政治经济中所处地位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显然由来已久，工人运动曾试图通过国际主义化解它。但是，那时，经济大部分是自主集中，尤其在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然而，即使在这一阵营里，“真正的社会主义”也没有取得建立合作关系的胜利：苏联曾想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身上，政治上无非是从属或是竞争关系，兄弟党派背后捣鬼，经济关系即使没有变成纯粹的利益算计，也已经极度不平衡。换句话说，民族主义战胜了国际主义。但是今天，所有的一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发生了改变，经济全球化使这一对矛盾变得异常尖锐，天秤倾向了另一端，牺牲了民族和民族归属。矛盾的一方正在摧毁另一方。

这里，我不想解释为什么和怎样出现这样的现象。结果已经摆在我们眼前：作为民族刽子手的全球化已经引起了国际关系的混乱、社会的瓦解，这必然导致极端种族民族主义的暴力再次抬头（如东欧），以及宗教

理论主义的蔓延（至少其中一部分是关于被遗弃、被轻视的民族）。我们不难预见到，长此以往，这样的全球化将会遭遇一定程度的限制，包括人口（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随着人口增长减缓而慢慢枯竭）、自然资源的贫乏（愈加危险的导火索）、无可挽救的环境危害……因此，这一领域也需要找到肯定的辩证法，有助于重建民族和国际化两极间的动态平衡。大致的框架如下：更为自主集中的发展模式有利于国际的交流；适度的保护主义旨在制止不正当竞争，使经济与民族（或地方整体）相协调，可以签订交流协议，但必须符合社会公约或相应的补偿原则（也有利于弱势国家的劳动者）；当然还要控制资本流动，通过授权或者征税。在此，我们又看到采用社会主义模式的必要性，因为单凭调整“昏了头”的资本主义，并不能真正建立起活跃的国际关系。

六、共产主义又如何呢？

首先，应该有这样一种思想，共产主义代表着矛盾的终结。如果这一想法是正确的，如果各种矛盾处于灵魂的中心，如果个人有相对立的要求，如果整个社会存在有限集体和大集体之间的矛盾，如果人既是有需求的动物又是政治性的动物，其特征，正如康德所说，“非社会的社会性”——这也是我刚才提到过的矛盾之一，那么就应该换一种角度看问题。让我们回顾一下马克思指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几大基本特征，应该对此怎么看？

首先是一个富庶的社会，几乎可以不劳动而能享受丰富的物品，这都得益于高度发展的劳动生产率。这似乎不太可能实现，原因有二。第一，个人对于物品的数量，或只是花样的要求是无止境的，因为即使社会中的其他条件都一律平等，面对无可改变的本质差异，他们会有竞争心理。我们并不认为，在一个合作、友善、谦逊之类的品德占主导的猎人—采摘者的社会中，这种竞争心理便会消失。这样的社会确实存在过，但受到社会生产力的诸多限制：没有财产所有权的企业（尽管企业有能力囤积，但知道囤积会改变一切，因此后来才出现囤积）只能通过共享劳动、资源、产品才能存活。卢梭分析得好，一旦允许企业拥有财产，所有权的争夺就开始了，至少会出现随意挥霍的行为，因此一切免费的做法绝非解决问题的良策。第二个原因是，星球就这么大，加速的生产对生态平衡的威胁越来

越大，所以必须节制需求。如果资源匮乏成为不可逆转的命运，难道不应感到惋惜吗？最好将未来的社会视作一个寻求需求和物品（和服务）生产之间良好平衡的社会、一个长期的盲目生产也不会威胁生存环境，反过来也不会以现实为借口停止生产的社会……这就是反对人口增长的人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或者说是一种挑战，与基本的财产分配无关（大部分人不知道体面生活需要的条件），而是要抑制一部分不必要的、有害的生产，鼓励另一些生产，生产出新的物品，丰富自己的文明。

马克思指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二大特征是社会阶级的消亡，生产工具普遍适应社会发展，这在第一个阶段（社会主义）已基本实现。社会阶级支持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它们诞生于社会分工（社会分工产生了私有财产）。但是，野蛮的教训也是十分突出的。我们可以有所保留地说，猎人—采摘者社会多少代表了共产主义的原始形式。其实，这些社会是不存在社会分工的，除了一些与观念和抚养孩子有关的性别分工，因此，既没有剥削，也没有男人对女人的统治。但是，一旦开始进行门类更多的生产活动（包括囤积、农业和畜牧业的开端），手工劳动的分工和慢慢出现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在成为生产力一大要素的同时，孕育着阶级关系的诞生，反过来，阶级诞生又将加速社会分工。如今，按照马克思的思想，劳动者可以穿梭于一个部门的多个分支（即综合工科人才），也可以循环地完成同一项重要任务（如操作、构思、管理等等），但这似乎真的是乌托邦：超越了个人能力，生产力下降，破坏了个人状态（不同的兴趣适合不同的岗位和工作）。结果是，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不断出现社会阶级分化。这就是为何我与毛泽东的观点一致，认为根本矛盾永远不会消失，应该不懈地为减小其不良后果而斗争。是不是又感到很遗憾？在这里，又可利用肯定辩证法的观点加以分析。

解释一下，阶级间的矛盾（呈现出剥削和统治的双重面貌）无疑代表了否定辩证法。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的言论可以代表肯定辩证法，也就是说，肯定辩证法能最终从双方中都得益，因为社会的不平等性是发展的强大动力。这种观点一直难以使人信服，为了反驳它，应该回到这边，回到不同形式的社会分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生产型劳动和管理型劳动，管理部门与被管理部门等等），以寻求这种分工对双方有利或不利、加强或减弱双方实力的精确条件。我们由此发现，加入对方的生产活动能丰富自身，同时能更好地完成生产，满足需求，取得更高层次的成果。我想强

调一个观点：寻找好的措施或者好的平衡点，不应与寻找妥协混为一谈，因为从后者得益的往往只有一方。举个例子，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管理收揽了一切可以在社会技术领域找到的利益，赋予执行者以一部分的自主权，或者给工人一定的发言权，但是我们也知道对减少劳动分工作出了重重限制。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阶级结构内部往往存在对抗，起着破坏性的作用；唯一积极的一点就是，能指出社会分工走出了歧途。总之，如果社会分工真的不断发展，或者导致阶级激烈对抗，共产主义的目标便是摧毁所有的对立，回到社会分工的原本状态（其所有权体制只不过是一种思想的结晶），并对它加以改造。共产主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斗争。

马克思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一大特征是，将劳动转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有评论家指出其中的前后不一致的地方：马克思曾将自由定义为从劳动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但这里劳动又成了“需要”。要是我们借助肯定辩证法来看待劳动与自由时间之间的矛盾，那么这种前后不一致就不存在了。将闲暇时间的自由和想象运用于劳动中，劳动会变得更丰富，更令人满意，更能满足基本需要，最终比限制性的劳动具有更强的生产力。而若因为劳动（还有社会化，现实原则）又获得了闲暇时间，那么闲暇活动也会更加活跃精彩。二元对立的一方促进了另一方。

这些观点看似普通，却有助于构想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景。共产主义社会既不取消劳动分工，也不废除劳动本身，而是寻找一种动态平衡。共产主义很大一部分要求一定的自主管理，以避免所有权垄断推动或重新造成阶级间的对立。但共产主义并没有寻求绝对的民主，因为这样的一种民主会压得个人喘不过气来，而不能充分地享受闲暇时间的欢愉（而且，会产生一些恶果，造就“权力瘾君子”）。共产主义设法建立起基础性的团体、基础性的事业和集体抉择（一切都让人想到依然存在的一些东西，如民族）之间的良好关系。它的目的是在政治层面上建立代表性的民主和直接民主之间的平衡。代表性的民主和经济层面的一样，代表着责任，而在直接民主中，每一位公民既是诉讼人，也是法官。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但是我们很清楚发展的走向，社会主义是一个阶段或者说是一个过渡，正如我们在发展中所期待的那样。只要大政方针能够明确地表述出来，社会和政治的各种力量有机地组织起来，根据经济规律和发展方向，与所有的反对势力作坚持不懈的斗争。这将导致一系列其他的问题（政党处理与其他组织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些政党的民主化等等）。

小结

总而言之，我认为已经是时候进行革命，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解放的途径。共产主义乌托邦和新自由主义乌托邦决非想要消除对立，而是通过各自的方式向我们承诺，应该认清各种矛盾，并承认一些矛盾是无法解决的。解放之路的目的在于联合各种活跃的反对势力，以此适应反对派的需求。二元对立不再是破坏性的，而是可以使多方受益的。换句话说，是用两条腿走路，防止一瘸一拐，在发展的道路上迷失方向，不知道出路在何方。这样我们还可以避免历史性的灾难，迎接我们的是进步，朝着更辉煌的未来前进。

让我们不要再幻想对立能消除。毛泽东早已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对立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生命活动，犹如人类生存中不可或缺的盐。迪诺（Dino）在一部短篇小说中描绘了一幅极乐世界的画面：那里的人极度苦闷，因为他们无所事事，也没有任何欲望。然而人类历史上，矛盾对立常常成为无尽的痛苦和不幸的根源，而且，既然星球是有限的，我们只能等待世界末日的到来，期待下一天更美好！解决各种具有破坏性的矛盾迫在眉睫，它们歪曲乌托邦的特征。任务是艰巨的，却并不是不可克服的。我们应该寻找有力的工具，锋利的解剖刀，将矛盾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相分离，既而去检验一切。

（作者单位：法国第八大学政治哲学系）

（沈珂　译）

社会主义的模式

［法］托尼·安德烈阿尼

什么是模式?

首先，我们要廓清“模式”的内涵。模式并不是现存物的简化表现——例如，当代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明显特征，而是对未来的展望，一种期望实现的制度。但是也不能因此说模式是理想的制度，是乌托邦：它从历史的角度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有现实为依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新事物总是出现在旧事物中。

其次，模式只是一个“构想”，一个未来社会的模型。它只能提供基本的结构，主要的制度，以使建立一个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第三，模式既然是可以实现的，因此是具有试验性的：由实践来决定是否可行，只要实践没有被陈规所束缚，最后又根据实践来修正甚至改变模式。

第四，模式首先是指经济方面的，但广义上说，也包括制度，尤其是司法制度。将重点放在经济方面，是为了重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新型的“生产方式”，因为它是所有一切的关键，而且也是面对资本主义的主要挑战，即效率的挑战。但是始终存在着哲理性的顾虑，有道德的、司法的、人类学的，因为效率是为资本主义道德标准的不同价值服务，但又不仅如此。我们可以特别关注盎格鲁－撒克逊的作家们，他们都加入了关于司法制度的广泛争论中，要求改变原有制度。

最后，模式研究表现出“构成主义”，甚至唯意志论的特征。尽管资本主义进行着自我调整，不断发展，出现问题之后也会有相应的制度和规

章应对，但是社会主义不仅希望解释世界，而且能改变世界，这也是对马克思思想的阐述。模式的观点认为，不存在历史的必然，对出现在一些文章和论断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提出质疑。与其说这个观点不错，不如说历史在一个特定的时期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必须去发现和探索这些空间。然而，模式主义者最大的悲剧在于，迄今为止，除了在少数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里，他们大都离权力中心甚远，并且不能对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产生大的影响。

一、探寻领域

从历史的角度看，纯粹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模式主要在前苏维埃联盟国家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开花。前苏维埃联盟国家经过20年代的大讨论，一起接受了“苏联体制”，关键问题是，随着封锁迹象日渐明显，是否需要“改革”苏联体制，以使其更高效。所有试图彻底改变这一体制的努力被视为异端——正因此，南斯拉夫体制因为改革而受到污蔑。如今，俄罗斯和东欧遭受政治创伤之后，相关讨论陷入沉寂。而盎格鲁－撒克逊的国家，则要达到另一个目标：通过革新，找到一种集效率、公平、民主于一体的制度。现在，西方国家的探寻和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中国、越南、古巴）的探寻之间的距离依然很大。双方需进一步靠拢——我个人也愿为此献绵薄之力。

我们可以追溯到19世纪，社会主义模式出现在有文字记载之前。那时已经有三大类型：联合模式，以协作和社会联邦组织为基础（创始人如欧文和蒲鲁东）；计划模式（代表人物是圣西门、西斯蒙第，主要是马克思）；市场社会主义模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张，主要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经济篇中）。但是，这离我们太远了。因此，我想以时间为轴，从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模式化发展讲起，以此来阐述呈现的问题以及属于不同“家族”的现代模式试图作出的不同类型的解答。

（1）全面计划模式。即使在改革派中，最赞成利用商品关系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也没有提出真正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他们所采用的模式，是指令性的计划模式和一种“劳动消耗法”取代“价值法”的模式。突然转变成国有或至少是归集体所有（集体农庄不是国有的，而是集体所有），实施指令性的计划经济，生产单位之间受行政干涉的流动（常形成垄断），

这些都不利于进行强有力的改革。之所以进入新经济政策阶段，主要因为生产力的社会化较弱和苏联的孤立处境，而且与世界革命也不协调（大多是托派分子推动的）。

需达到的目标，并不是很明确。是否必须根据使用价值建立经济核算（与马克思所说正好相反）？是否必须根据劳动力消耗的计算建立经济核算（马克思的观点，最后形成商品关系）？这样并不一定会排除价值—劳动之间的交换，但会取消货币，通过发放“劳动券”来代替工资。或者，是否必须根据反应社会需求的政治要求来确定“价格”？众所周知，我们实行的是最后一条道路：无产阶级国家决定一切：需求等级、工资等级、资源分派、优先权（一般优先权赋予重工业），最后是价格，大部分价格完全由行政控制（国家计划决定）。由于这种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必须借助物质措施（“物质平衡”）来实现，而相应的价值体系又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仅仅扮演了会计的角色，因此，这些措施背后是一种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经济。唯独脱离了配给制的消费从供求上看，才反映出一定的商品关系。

所谓的苏联体制正是这一模式的具体体现，而这一模式所依赖的理念是一种有机观：所有的生产单位（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应该如同一台庞大机器上的一个个齿轮。劳动者不再以个人利益为动力，而是时刻怀着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意识”。经济可被视作一个大企业来加以调控，就像某种巨大的卡特尔，彻底结束市场的动荡和不透明性。

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全面的计划模式后继有人，那就是民主计划模式。

（2）竞争的计划“西方”模式。20世纪30年代，另一种模式蓬勃发展，势不可挡，不是在苏联，因为那里所有的公开争论都被斯大林扼杀了。这不再是一种利用某些商品关系作为过渡的社会主义，而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社会主义，充分利用大部分的商品关系（商品市场的关系，以及劳动和资本市场的关系），而使计划发挥宏观操控的作用（代替虚拟的拍卖估价员），所以我称之为“竞争的计划”，尽管看起来有些矛盾。这一模式以“兰格－勒纳”而闻名，这是两位主要贡献者的名字。

计划可以通过反复试验确定价格平衡，实现最理想的资源划拨，代替滞后的市场调节。如果计划经济中心办公室利用这样的试行办法，那么它只需进行几百万的即时方程核算。它发布价格，企业（公共的和有竞争关系的）对此做出反应，将自己的供求情况上报给办公室，于是中心办公室

进行调整，以实现整体平衡。计划优于市场，是因为计划能做出更快的反应，同时拥有多方面的信息。

计划只是单纯地代替市场的功能吗？计划还执行其他功能：直接确定长期积累率（再也无需依赖存储选择来决定）；通过固定利率为不同部门和企业分配资本，以达到资本的供需平衡；决定一部分的收入分配（因此一部分的利润能分配给劳动者），使之更公正公平。

“兰格－勒纳”模式过于理论化，尤其在市场刺激计划方面的观点（哈耶克指出，鉴于经济中持续出现的变化，应该不停地反复试验）。然而，我们将看到，不久就会出现继承者，即后来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模式，同样利用新古典主义的理论，结束有效划拨，鼓励资本市场，形式不仅有信贷市场，还有股票市场。由此，今天对中国的改革，一场错综复杂的改革会提出质疑，但是，其中一个大的方向可能是实现国家社会主义，这与兰格的竞争计划模式相类似，又有很多差异。

（3）分散模式。20 世纪 60 年代转型时期，苏联共产党召开第 20 次代表大会，打开了批判斯大林的闸门，重新开始大讨论，一大批的经济学家对由行政指令干涉的中央集权经济模式提出质疑，并着手建立另一种模式，即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弗提出的所谓“分散模式”。他于 1960 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问题》无疑是这一理论改革的代表著作。那么其主要特点是什么呢？

这一模式强调计划和市场的真正结合。计划在集体的重大决策方面保留其重要性（积累和消费间的比率，各部门和地区间投入的走向）。但是，只要不涉及国家基金，就不使用直接手段，而采用“间接手段”，借助各种经济杠杆，如价格和工资政策、税收和信贷政策、海关和外汇储备政策。市场是为一切生产资料和劳动建立的，但这是一个必须不违背计划确定的股票份额和发展走向的“受管制的市场”。没有金融市场，也没有纯粹意义上的信贷市场，因为都是受到管制的。价格又重新扮演重要角色，但也有相关政策加以引导（如税收政策）。因此，可以说，我们利用的是一部分的市场机制，但再也不是操纵经济运行的“价值法规”，除了市场自发做出的调整外，还可利用其他调节。

另一方面，也是必然的结果，就是企业又有了高度自主管理权。所有不与计划直接相关的决定都在企业内部做出（大部分指标并不是必须完成的），依据赢利原则进行管理，一部分利润分发给企业成员和作为自负盈

亏资金；另一部分则注入投资中心基金中。高度的自主管理可以使劳动者广泛地参与到企业管理中来。

这一模式有很多不同的形式，那么又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

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实行的改革只是对现存体制的一些调整，旨在给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权，用强有力的行政干涉使之摆脱冲突尖锐的困境。最终失败了，首先是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原因：法律没有跟上，行政部门急于收回丧失的权力，结果破坏了改革。然而，失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供货商、顾客、价格均由行政手段决定，“票证”和“转让”制度依然存在，那么生产消费指数还有什么意义？没有真正的体现资本投资回报（除了很低的利息外），又何为利润？国家把大部分的利润抽走，刺激基金岂不有名无实？这样，自主权受到很大约束，而劳动者的报酬与劳动成果不挂钩。

而在苏维埃阵营中的其他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尽管1968年新上台的政党用血腥镇压使原本大刀阔斧的改革被迫中断，但是分散模式还是得到一定的推行。尤其在匈牙利，经过长时间的调整，实施了“新经济体制”。在苏联，一直等到改革开始这一模式才被戈尔巴乔夫的议员们所广泛接受。我无意去评判原本大规模改革在小范围取得成功而最终失败的原因。总而言之，这一模式实行时或者不够统一（如苏联），或者不够坚定，抑或出现了没有预料到的困难（如匈牙利）。事实上，历史已经证明，这一模式虽然独立于强有力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但还是过于集中。而控制有力、进行得有条不紊的中国改革的历史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我们还可以说分散模式是一系列自主管理理论模式的先兆。自主管理模式在分权的路上会走得更远，而且会将最大化原则贯彻得更为彻底，并不是国家投资收益最大化的原则，而是劳动收入的最大化原则。

继续谈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要提一提集中模式和其他两种模式遗留下的问题。因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正是“社会主义新模式”理论探索的基础。

二、尚未解决的效率问题

我先不提出效率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很普遍。然而效率只对社会主义的终极性有意义。我想就这些疑问作一个简单介绍。

第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是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划拨效率问题。如果一个真正竞争型的市场（资本主义经济永远不能实现）能够大体上解决流动资料的问题，投入划拨的效率问题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因为这是依据不确定的未来做出的选择（意识到未来的不确定性是凯恩斯主义优于马克思主义的地方）。资本主义经济是根据利润率（现在的和将来的）最大化标准做出选择——如今则根据股票价值最大化标准，由金融市场中的重要角色对股票价值进行估算。但是，全面的计划是失败的，至少在“现代化”投资方面，因为计划既然不能对一切问题做出决定，就必须把一部分决策权交给企业，而且由于企业往往不愿意提供有效信息，造成信息不足，同时也不能很快地预测未来（尤其是品位变化和技术更新）。而“竞争型”的计划，将所有的决策权交给企业（除了对价格的规定），却也不能在充当估价师的同时发挥好协调的作用，从而为企业的未来指明道路，因为缺少足够的有深度的信息，这正与兰格的观点相左。再看分散模式，它遇上了一系列关系方面的难题，如经济管理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联合与冲突之间的关系，甚至是投资基金直接划拨或使用经济杠杆（利率、补助、税收、价格控制等等）过程中产生的连环腐败现象。其实，真正的障碍是国家资产，因为国家发挥着多种功能，它既是担心资产的投资回报率的财产所有者，也是社会关系的协调者，需处理好多种利益关系，很少进行结构调整，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股东却很少有这些忧虑。因此，会认为必须把企业投资的选择权交给其他的公共决策机构，而不是经济管理的决策部门，必须推动其他形式社会资产的发展，而非国家资产。每一种模式都有各自的解决办法。

第二个问题是领导者的动机问题，即“动机效率”问题。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是企业的经理人，如何才能让他们停止追逐自己的个人利益，而去关心他们的委托人（这里说的主要是公共企业、国有企业）和企业成员的利益？其次是劳动的集体性，怎样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是借用资本主义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还是另觅他径？全面计划经济业已失败，原因在于计划最终是从外部强加的，不能被劳动者所内化，剩下的只有第一种办法，但是比起资本主义体制，它在这种被认为代表劳动者利益的体制下操作性更差。竞争型计划模式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它预先假定，所有的经理人都是严格执行规章制度的忠诚的领导人，社会红利由国家在抽取一定利润之后统一分配。分散模式则主张大部分的利润直接分给企业的劳动者，并由选举产生领导

层。尽管这已十分激进，但还不足以激发起劳动者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拿到股份之后，他们就会意识到“有利可图”），体会到最终的实惠。

第三个问题称之为动态效率，可以分成两大方面。首先是信息传递的规则。不仅仅要指出“信息的不对称性”，还要强调信息常常具有心照不宣的特征，只有通过学习和探索才能获得。全面计划模式和竞争型模式完全忽视这一问题，分散模式也只不过隐约提到。其次是企业精神和革新探索。这也许是支持财产私有和资本主义的主要依据。为什么要创办企业，为什么要想方设法地开发新产品，或者改良旧产品（即使由其他企业完成，如研发部门）？我们无疑是为了增加财富，但也是因为开发的过程能带来一种特别的乐趣，当与经济责任（区别于在家修修补补的“无偿”劳动，或是纯粹的科学研究）联系在一起时很难获得的一种乐趣。全面计划经济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因为企业不愿冒风险，而且革新会影响估算和日常管理。竞争型的计划无视这个问题，经理人都是些工程师，关注现时回报。分散模式也没有对此予以重视。

三、回归社会主义的目标

回归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为了指出，效率本身并不是目的，脱离社会主义的大目标，效率就毫无意义。社会主义的目标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已经有过阐述：公平分配（按劳分配）、控制发展（“协商的计划”）、配给制的经济（既高效又透明，摆脱盲目崇拜）、个人的全面发展（得益于劳动分工的衰亡）和国家的消亡（或者行政职能的专门化）。但是，这些目标似乎只是空想，而且或多或少有些自相矛盾。每一种社会主义形式都会在社会主义道德标准中对优先的事做出不同的划分。然而，已经出现了一种普遍趋向：民主是一块三角石，既可以推广这些道德标准，也可以提高效率。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民主呢？

我们这里谈论的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与经济问题紧密相关。长期以来，左派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一切苏联体制（最接近集中模式）经历的曲折都会随着政治的民主化而消失，或是以类似于西方民主的形式，或者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尤其如中国改革呈现出的紧密的党群关系，并且群众充分参与政治生活）。“全面”计划并不一定导致官僚权力的极度膨胀以及执政党的一党专制。相反的，一种以放弃集体决策为代价而过多地依赖市场力

量的模式只能沦为空泛的民主。今天，社会主义新模式中比较明显的问题是，寻找一种更具活力更真实，并区别于自由主义民主（涉及另一种权力平衡）的民主形式。但是，政治民主只有在两种条件下，才能进步：1、明确规定哪些属于集体选择，哪些属于个人选择。两者之间的分歧在不同模式中表现也大不相同；2、政治民主建立在经济和社会民主基础上，同样的，单纯地参与决策和自主管理也有很大不同。

下面，我就当代模式作一个概述（至少需要两三页纸的篇幅才能准确地阐述每一种模式的要点），分类可能比较任意（因为种类繁多，有几种模式是混合型的）。

（1）全面民主的计划模式。这一模式的提出者认为，要抛弃市场，回到全面的计划经济，但与官僚主义模式又有双重区别：由经济民主决定（不同的模式略微有不同）消费资料、生产和劳动资料的划拨，旨在实现完全平衡；实现的途径是以劳动者个体和劳动时间或机会成本加以核算。

至于这些模式，我就不一一展开了。我只想说，它们不能及时解决四个效率问题（划拨、动力、动态和革新），而在其中两种模式中，民主进程以听取生产者和消费者建议为基础，负担过于沉重，内部冲突也较多（各自利益不同），成本太高。因此，完全放弃市场是很困难的。

（2）以经济回报和利润平等分配为基础的模式。社会主义市场模式放弃了对价格的直接管制，完全放开对竞争性市场的利用。之所以依然称之为社会主义，原因有三：1、最重要的资产形式归国家或归社会所有（直接归公民所有）；2、社会主义的平等目标通过利润的相对平等分配得以实现；3、对长期投资和外部控制进行一定程度的鼓励性计划。

至于具体的各种模式就不展开了，其中有些也是混合型的。不妨通过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模式来简要地看一看这一模式的特征。

普兰纳布·巴德汉建议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任何一家企业都可以得到另一家的股份，另一家成为企业的一部分，并与银行有联系，银行就是为信用财团而成立的。企业把所拥有股份的红利分发给劳动者。银行利润大部分回到中央政府，由此为公共事业如教育和医疗提供资金。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参考日本资本主义的结构形式呢？其实是为了解决动力效率的问题，保证大众股民对领导层而非对国家（其他企业和银行，它们的代表进驻该企业的董事会）的监督，还为了解决划拨效率问题，采用的方式是对信贷市场和投资回报最大化的倾斜。

约翰·罗默提出另一种所有权体系，所有公民手中握有票据，然后把一部分兑换成互助基金，可以在以息票运转的金融市场上自主选择买卖公司（公共的）股票。股票并不是用于为企业提供资金，——企业的所有资金或来自自主筹款，或银行贷款——而是使股票持有者享有分红的权力。这一体系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因为这样，每一位公民拥有同等数量的票据，既不能用货币进行买卖，也不能以遗产形式转让给他人。但是可以根据这些基金的市场表现和能够获得的收益，用重新兑换成息票的互助基金与另外一种互助基金相交换。这里解决的还是动力效率的问题（经理人受到投入资金的监督，股票行情成为银行发放贷款的信号灯）以及划拨的问题（必须借助由红利总数和股票行情预算出的资金回报）。

这些模式均属于广义上的市场的社会主义。罗默认为，如果市场不包含外部性（“公共资料”，如教育带来的影响；“公共危害”，如污染）并且能预测未来的价格，那么计划就是无用的。而需要计划时，常常是一种刺激性的计划，通过间接杠杆如利率、税收起作用。这些模式同样利用资本主义的机制来保证效率，因为它们依赖的是一个金融市场，这个市场具有巴德汉观点的局限性（只在企业内部的团体中起作用）和罗默观点的普遍性（是植根于一种很特殊的货币形式，即票据货币）。

我们首先要寻思一下，是不是这样离“资本主义”更近，而离社会主义更远了。若是存在平均化，那么只能存在于分配中：权力、职能、任务、工资（在一般的劳动市场）的分配，按照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严格定义，还是没有改变。

那么，值得质疑的就是效率本身。如果说经理人因为有了董事会或互助基金的监督而积极性大增，那么其他的职工则并不如此，他们还远离决策层（认为自主管理效率低下的人至多承认职工是一种“参与”）。管理层和普通职工之间的冲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普通职工都很难相信，在从其他企业或其他地方获得的票证中所获得的红利是自己劳动的成果。我们若是模仿资本主义很可能没有它做得好。至于动态效率，依然保持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样，因为市场并没有更为协调或者更为社会化。

这并不是说这些模式无利润可言。即使不实行这些模式，票证体系（实施的办法确实大不相同）只是俄国和东欧国家设下的一个大骗局，日本模式也不足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效仿，那么它们也不完全与如今如中国的模式毫无关联，政府试图将一大批国有企业转型成可以接受私有资本的

股份制企业，从而使国有资产更明晰更具活力。但是，如果金融市场大规模发展，而劳动者的参与减少到非常小的比例，那么，我认为，我们进行的就是社会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建设。

（3）自主管理模式。这一模式是最多的，也不可能做详细的介绍。我只想随意地分一下类。所有模式的共同点，是以企业民主为基础，不再（至少是不主要地）追求资本的回报，而关注劳动收益的最大化。它们从某种程度上回到了19世纪的合作传统，与国家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但只要民主计划依然发挥重要作用，而且投入的效率和分配受到，至少部分受到公共制度的监督，就还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

从效率的角度看，自主管理模式的优势在于动力效率，劳动者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因为他们首先是为自己而劳动，自己的劳动决定（按照一些普遍规定）所得工资、劳动条件、有效劳动时间，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劳动对社会有用，得益于市场发出的信息以及其他的一些流程。他们同样有权监督由他们选举出的领导人，只要他们具有相当的能力。“一人一票”的原则不仅体现了人的尊严，而且抑制了恶性竞争和自私自利的行为，同时也是对合作的强有力的促进。

动态效率也是这一模式的一大优点：鼓励实干精神，尽管有某些局限，但有利于革新，可以使所有的劳动单位受益，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尽力挖掘市场反映的信息。但是，更有利的是，它至少可以减弱部分不透明的影响，以及竞争市场中信息的恶性传播和滞留，还可以重建与其他分支企业及消费者，甚至其他经理人的合作关系。从这一点看，走得最远的是迪亚娜·埃尔森和帕特·德凡提出的模式。我们简要地提一提，不对其制度的内容展开讨论。

迪亚娜·埃尔森提出的模式中，价格委员会（公共的）首先通过企业所必须加入的公共信息网使企业的信息，如生产方法、成本和利润等进入流通。这样，企业间就有可能进行协调，也可获得消费者的信息。由此，企业可以决定价格标准，不再是强制性的，而是经过协商的标准，有例外情况则需做出解释。首要的是结束计划控制，而要根据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工资委员会在就业供求方面也同样具有这些特点。消费者联合会不仅将产品的质量告知消费者，还要把产品生产的社会环境和对环境的影响告知消费者（有点像今天的“公平贸易”）。因此，不再像全面计划体制那样，将市场的作用减弱为指示器的附属品，而是真正地将市场“社会化”。

这一切反而是能获得最大利益的，但似乎不能保证划拨效率和动力效率。事实上，存在着一个公共企业协调局来保证公共资本的划拨（利益的承载），以备自主筹款不够之需。但是，似乎很难避免串通勾结的现象，这些现象在苏联模式以及分散模式中，显示出经济管理和企业间关系的特征，以及自主管理资本收益的企业的信息偏见。这一模式顾及到监察主体和其他避免划拨失调的措施，但是这种控制是很难付诸实施的，而且必须假定所有的官员非常廉洁。

帕特·德凡提出的模式旨在解决这些困难，解决的方式是引入消费者代表，还包括供货商、地方政府、企业管理决策部门的代表。这样，不仅信息的流通可以更为直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控制是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至于大的规划，既不需要提前，也不会滞后（有间接激励的帮助），而是通过多个层次直接交中央“商议协调”（最重大的决定由议会作出）。由市场提供的关于企业盈利能力的信息可以共享，以此确定投资结构。价格取决于长期成本、劳动力成本、投入成本和政府对资本征收的税金。

这一模式试图这样确保划拨效率（资本流向最有用的地方）、动力效率（得益于自主管理和扩大的董事会对管理的监督）、动态效率（得益于协商）。这一模式在实现动态效率上是最理想的，但是在可行性方面依然有阻力：可能引起管理层内部的权力纷争，过程过于繁琐，因此社会成本会增加。

事实上，实行民主计划的自主管理模式，最大的难题不是动力效率层面的，也不是动态效率，而是资本的划拨。所有意识到合作社的资金内外遇到阻力的人都从两条路上——所有权凭证市场和信贷市场——寻找解决的办法。

为了解决资金问题，而不求助于公众，自主管理的企业或者可以建立一个税费联合市场（合作者可以买卖进入税，但只能在其他合作者之后）——这是陶和萨塔尔提出的解决办法；或者呼吁外部的投资者，从中抽取选举税，这种获取资金的方法是维斯可夫提出的；或者允许其成员在由政府担保的条件下承担企业资本风险——这是由鲍尔斯和季亭士提出的。这里不能详细阐述这些模式，但其中的问题一方面是像资本主义那样以经济回报为中心，由此必然引发劳动者心中增加资本收益和改善工资水平之间的矛盾（这种精神分裂在资本主义形式中屡见不鲜）；另一方面，可能扩大同一企业内部以及同一行业不同企业中劳动者的不平等性，资本越多的地位越高。

这就是为何第二种形式将投资的重心放在信贷上的原因。一句话可以概括这一模式的精神：从此不是资本雇佣劳动，而是劳动雇佣资本，通过支付一定的税或利息。这一模式与其他模式的区别是巨大的。一方面，再也不存在所有权凭证市场，即使条件的限制性很强。另一方面，引导劳动者的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缴纳预先确定的不同形式的税之后劳动收益的最大化。施韦卡特、戴维尼、弗勒拜伊等人走的就是这条路。企业的自主投资被取消（阻碍私有资本的积累），信贷通过公共银行或自负盈亏的银行来发放，这就实现了投资的社会化，对企业的监督和不同形式的市场与计划相结合。

结论

整个对社会主义模式的阐述，是想指出它们都曾经历不短的历史，长时间的“真实社会主义”已经完成了对主要走势的塑造，即使苏联模式最终瓦解了，探寻之路依然没有停止，反而正在稳步前进，因为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利用了经济理论的成果，包括一些主流的亲资本主义的形式（新古典模式中关于划拨问题的理论、奥地利流派的理论，尤其是哈耶克关于动态效率的观点，还有信息理论关于动力效率的论述）。现今的模式尽管各不相同，但都推动着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经济理论事业的发展，更无需说政治和哲学研究的广阔天地。但是，都没有提出可以应对本世纪挑战的法宝。所以应该将这些理论视作“思想的工具”、“练习本上的方格”，以此更好地理解和分析如今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和部分采纳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国家中的一切，最后着手找到具体的解决办法，以便在经济大开放（这些模式最大的局限是基于方法论上的原因，它们是封闭型的经济，对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或脱离只能提供微不足道的信息）的日益严峻的形势下排除发展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如果说需要记住这些模式中几种大的走向，那么或许是以下几种：民主政治决定集体选择，确定社会财产（由公共部门生产的，这里我们没有提到，却是公民政治、社会、经济身份的基础）。

——多种所有权形式（国有合作形式），不排除存在小型私有企业以及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部门（扩大再生产被资料转移上的司法规定所限制）。

——投资体系根据经济部门的不同而不同，但是，归国有及合作社所有的财产主要依赖于银行信贷，对股票市场的使用是次要的，或完全不利用（否则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经济就会自取灭亡，而使资本主义性质的财产得利）。

——物质财富和服务的交换受到市场规范和社会化的控制。

——就业市场需社会化和规范化，但也赋予一定的灵活性。

——计划中的一部分是程式化的（如公共服务），但大部分是激励性的（我们知道若是每一种模式都在市场上有一定的份额，那么将市场功能减弱为单纯的信号灯的模式在今天可能就不存在了）。

——消费者积极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可以通过国家组织的联合会，也可参与企业的管理。

——为了引导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要开拓公共空间，以此鼓励社会范围内的大讨论，树立新的文明形式。

（作者单位：法国第八大学政治哲学系）

（沈珂 译）

Contents

1. The Critical Project of History: Manfredo Tafuri and Venice School (Xia Zhujiu)
2. The Sphere and The Labyrinth, and Others (Hu Heng)
3. The Limits of the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Hu Heng)
4. The Wasteland of History: the Crisis of Project (Tanaka Jun)
5. Toward the Ideological Critique of Architecture (Manfredo Tafuri)
6. The Preface of Architecture and Utopia (Manfredo Tafuri)
7. Critique of Ideology and Historical Practice (Alberto Asor Rosa)
8. On Critical History (Demetri Porphyrios)
9. Architecture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Fredric Jameson)
10. The Culture Market: Françoise Very interviews Manfredo Tafuri
11. Text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Standpoint of Marxist Studies: A Reply to Mr Lu Kejian and Japanese Scholars (Zhang Yibing)
12. On the Significance of Hiromatsu's German Ideology in the History of the Formation of Marx's "Das Kapital" (Uchida, Hiroshi)
13. Marx's Leading Role in the Composition of German Ideology from the Unification of Textual Research and Textual Reading (Yao Shunliang)
14. The Text Structure of the First Chapter in German Ideology or, the Antinomy between Marxology and Marxist Scientific Method (Xia Fan)
15. The Idea of Natural History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16. The Actuality of Philosophy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17. Husserl and the Problem of Idealism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18.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usic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19. The Second Nature: Karl Wittfogel' s Critical Philosophy of Society (Tomoaki Ishii)
20. From Negetive Dialectic to Positive Dialectic: the Transition of Revolutionary Path (Tony Andréani)
21. The Modes of Socialism (Tony Andréani)

中文摘要

1. 批判的历史计划：曼弗雷多·塔夫里及威尼斯学派　　夏铸九

摘要：回溯塔夫里“历史的计划”之精炼过程，其立场与见解的转变说明了塔夫里知识之旅程，借此可以将塔夫里的思想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1）60 年代的青年塔夫里。在这一阶段，塔夫里还未曾完全拒绝其青年时期之传统黑格尔式的意识形态。这些唯心主义的观点也提供他一个经由设计理论的类型学方法来联系历史分析与设计方法的幻觉。这是卡萨贝拉团体、威尼斯学派、或“设计方法”团体们，在不同的立场上却共同特有的普同的哲学基础。（2）1969 年之后的意识形态分析及其对史学方法的研究。指出建筑史本身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于是倡导一种阶级批评的建筑理论，将历史研究转变成“建筑意识形态的批评”，最终在 70 年代末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方法论。

关键词：历史计划；意识形态批判；塔夫里；威尼斯学派

2. 《球与迷宫》及其他　　胡　恒

摘要：作为当代西方最重要的建筑理论家和建筑史学家之一，塔夫里在国际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强劲的红色思维。但是，国内学术界对其思想的研究却是凤毛麟角，这不能不说是理论界的一件憾事。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向国内学术界引介塔夫里及其主要思想，对他的五本重要专著，即《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建筑与乌托邦》、《现代建筑》、《1944—1985 年意大利建筑史》和《球与迷宫》的写作背景及主要思想作简要介绍，希望能够有助于增进国内学者对塔夫里思想的了解和研究。

关键词：塔夫里；球与迷宫；建筑与乌托邦；现代建筑

3. 建筑史的极限　　胡　恒

摘要：塔夫里认为，历史就是“关于危机的计划”，就是将主体、将全部的现实世界都推向危机。因而，塔夫里认为，其任务就是在这种危机之后对这种建筑史进行彻底重建。从总体上来看，这一彻底重建需要三个前提条件：（1）构造新的现实层；（2）建立一个赋予一切建筑都有生存权的历史参数；（3）将建筑史学家和建筑师的身份完全区分开。

关键词：塔夫里；历史“计划”；危机；历史

4. 历史的废墟：“计划”危机　　［日］田中纯

摘要：塔夫里认为，历史就是“关于危机的计划”，就是将主体、将全部的现实世界都推向危机。勒·柯布西耶为了应对这种危机，发起了“走向新建筑”的探索运动，对建筑本身进行了起源的追溯，试图以此来拯救这场危机。建筑自身发展的历程本质上就是建筑师在“大写的他者”的支配之下将意识形态的欲望投射到对象体中的历史，这种历史是被意识形态所渗透的历史。而对建筑学的重建就是带着哲学批判的思维将原来被神秘化的历史化为废墟，借助于意识形态的批判原则来重构历史的天使的过程。

关键词：历史；计划危机；建筑；他者；

5. 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　　［意］曼弗雷多·塔夫里

摘要：塔夫里认为，现代建筑从启蒙运动到现在，与之相伴的都是持续不断的意识形态生产。也正是立足于此，塔夫里将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城市意识形态构成了克服建筑浪漫主义的一种途径；在第二阶段中，作为一系列意识形态计划，艺术先锋派试图通过建筑和城市规划完成绘画、诗歌、音乐、雕塑等艺术形式无能为力的任务，因为绘画、诗歌、音乐、雕塑只能在理想层面上谈论问题，而建筑和城市规划是唯一有望将理想转化为现实形式的艺术种类；然后是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建筑意识形态转化为一种规划的意识形态。本文还着重分析了这几个阶段中最为关键的代表性人物：从启蒙运动时期的自然主义到先锋派的辩证法再到柯布西耶的建筑理论；塔夫里通过对这些典型代表的分析向我

们详细展示了建筑本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所承担的功能，并进而倡导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的建筑理论，使建筑理论真正成为一种客观的历史的阶级批判。

关键词：自然主义；乌托邦；意识形态批判；规划的意识形态

6.《建筑与乌托邦》序言　　［意］曼弗雷多·塔夫里

摘要：《建筑与乌托邦》这本书是塔夫里对《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这篇长文的拓展，而本文只是这本书的一个简要的序言。在这个序言中，塔夫里以一种概述性的方式对其前期研究中所设定的假设进行了反思，并且指出了本书所要研究的主题。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关键词：意识形态批判；塔夫里；假设

7. 意识形态批判与历史实践　　［意］阿尔贝托·罗萨

摘要：本文在介绍了塔夫里研究著作及其研究路向的基础上，进一步展现塔夫里的学术理路，大致勾勒出中期塔夫里的红色思维的延展轨迹，指出了塔夫里的非常坚定的左派立场：认为从启蒙运动到现在整个建筑生产史在本质上就是不断被意识形态所渗透的历史，于是倡导一种新型的历史实践，要求对建筑本身进行意识形态批判，这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关键词：塔夫里；意识形态批判；建筑；

8. 论批判性历史　　［希腊］德米特里·波菲里奥斯

摘要：建筑学话语是存在于生产的建筑、制度的建筑以及意识形态的建筑之间的一个建构过程。这一过程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再生产。正由于此，建筑学表现为一种自然的、犹如事实一般的常识，沦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同谋。而批判性历史就是针对这种作为意识形态的建筑学而产生的，它的目标就是检验建筑意识形态成为神话的这一自然化过程，揭露那些被掩盖了的历史与主体之间的真实联结，最终达到意识的自由。

关键词：建筑学；意识形态；自然化；批判性历史；

9. 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　　［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

摘要：本文从三种不同的角度对塔夫里的《建筑与乌托邦》这一著作进行解读。首先，由于该文就是在马克思主义语境背景下写就的，因此第

一个角度就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语境进行研究。第二个角度是塔夫里进行写作的话语形式，即历史编纂形式，尤其是叙事性历史。这种话语的形式困境和问题决定了塔夫里的某些组织性概念。最后，是在更广阔的当代事件的语境下重新思考这部重要的著作。这个当代事件，即对盛期现代主义的批判，这是一种日益普遍的感受，即现代主义运动本身从此灭亡了。本文透过这三重视角重新展示了塔夫里作为建筑史学家所独具的意识形态批判意义。

关键词：塔夫里；乌托邦；意识形态批判

10. 文化市场——瓦里采访塔夫里

摘要：曼弗雷多·塔夫里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建筑理论家和建筑史学家之一，也是当代意大利左派知识分子的象征人物之一。本文在介绍了塔夫里研究著作及其研究路向的基础上，进一步展现塔夫里的学术理路，大致勾勒出中期塔夫里的红色思维的延展轨迹，展现了其所达到的智力高层。

关键词：塔夫里；文化市场；建筑学

11. 文献学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科学立场——答鲁克俭先生和大村等日本学者　　张一兵

摘要：2005年以来，我主持编译的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其中，鲁克俭先生依据马克思学的“最新成果”批评了我在《代译序》中所持观点的历史“陈旧性”。我并非没有注意到陶伯特等人的这些新资料，只是坚持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不能简单地建基于马克思学之上。经典文本的理解和基本编排方式，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说，不只是文献的结构问题，还涉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问题。日本学者大村等人认为广松没有理解1970年代以来的最新成果，并批评我对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评价过高。然而，译介广松涉是因其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更是由于他是一位自觉进行东西方对话的思想大师。这些不同意见表明：必须认真谨慎处理西方马克思学的文献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研究之间的复杂关系，重要的是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理论逻辑的认识，并用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实践成果推进这一科学思想运动。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文本学；马克思学；文献学

12. 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资本论》形成史上的意义

［日］内田弘

摘要：《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阐发唯物史观的重要文本。这种历史观主要体现在共同体论、对比论、原始积累理论，这三者在逻辑上是相互联系的。然而涩谷版和陶伯特版都完全无视这种关联，割断了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在编辑原则上都是不合理的。而广松版则把这三者有机统一在一起，真正呈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内涵，这恰恰证明了广松版的编辑原则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在广松看来，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在本质上就是从异化理论到物象化理论的范式转化，而《德意志意识形态》恰恰就为这种物象化理论奠定了基础。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形成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

关键词：广松涉；德意志意识形态；物象化；

13. 从文献考证与文本解读统一的视角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中的主导作用

——析广松涉“恩格斯主导论”的文献学依据

姚顺良

摘要：本文针对日本学者广松涉提出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费尔巴哈”章写作过程中的“恩格斯主导论”，从文献学考证与文本学解读相统一的视角进行了反驳。文章首先指出了广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手稿的文献考证方面存在重大缺陷，然后通过对第一章手稿与第一卷其他两章、第一卷与第二卷、《形态》与同时期其他相关文本之间的“互文性”比较解读，揭示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施蒂纳、以赫斯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费尔巴哈的评价上的差异，指出恩格斯在这三个问题上观点转变的“断裂性”同马克思观点演化的“连续性”是不相同的，确认了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章和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广松涉

14.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篇的文本结构问题

——马克思学实证方法与思想史科学方法的根本对立

夏　凡

摘要：《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篇《费尔巴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重要文献，但其手稿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并未发表。目前对该篇手稿的编排已经有了不下10个版本。可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MEGA2）的编者陶伯特等人推翻了“把手稿编辑成一部著作”的传统，将《德意志意识形态》变成了由若干独立的文稿组成的论文集。这种实证主义的编辑“新思路”与西方马克思学“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意图一脉相承，实际上否定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确立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史地位。但《费尔巴哈》篇的手稿包含了马克思、恩格斯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起草《绪论》的两次尝试，即从历史的前提（“现实的个人”和物质生产）以及人类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所有制形式）这两个角度出发，正面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因此，必须在正视上述文本学事实的基础上，把《费尔巴哈》篇编排为一个完整的文本，而不是独立文稿的结集。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学；实证主义；文本学

15. 自然历史观念　　［德］泰奥多·W. 阿多诺

摘要：在旧本体论中，自然存在和精神存在或自然存在和历史存在被分裂为两个独立的部分，在阿多诺看来，这一传统必须克服，它必须要由世界在自身中所达到的自然和历史的具体统一，即自然历史观念来填补。这种自然历史观念并不是旧本体论所宣称的那种相互分离和具有等级的关系，它在本质上是历史存在和自然存在的交织的一种星丛：历史的事物可以实现向自然的还原，同时，自然本身也是一种转瞬即逝的自然即历史。

关键词：自然；历史；星丛；自然历史观念；本体论

16. 哲学的现实性　　［德］泰奥多·W. 阿多诺

摘要：哲学与科学核心的区别在于，个别科学把它们的发现或最后的和最深刻的发现理解为不可分解的静态之物，而哲学则致力于把它所遭遇的第一个发现理解为需要解谜的标志。简单地说：科学的理念是研究，哲学的理念是解析。这种解析必须要摒弃传统哲学的那种总体性的宏大叙事，从一种较小的非意向性的要素出发，这是解析哲学的根本性前提。同时，这种解析必须采取辩证的形式。只有这样，才能在历史的具体性中辩证地证明思想自身，建构一种真正现实的哲学。

关键词：哲学；科学；解析；辩证法；现实性

17. 胡塞尔与唯心主义问题　　［德］泰奥多·W. 阿多诺

摘要：在胡塞尔看来，逻辑的心理学基础是假言的思辨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形而上学的。因而，他试图摧毁纯粹思维行为和意义的所有假设的上层建筑，摧毁所有出自体系化偏见的任意构造。胡塞尔哲学就是一个从内部摧毁唯心主义的尝试，就是要建立一种知识方法——范畴直观，试图通过它将人们直接意识到的那些逻辑客观性和理想统一起来。这一方法不仅对德国哲学而且对整个现代哲学都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影响。同时，胡塞尔为了对抗纯粹思维行为的唯心主义，倡导“回到事物自身”，这是有其积极意义的；然而这一口号的背后掩盖的却是更为唯心主义的东西——纯粹本质，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胡塞尔“回到事物自身”的哲学仍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纯粹思辨。

关键词：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范畴直观

18. 论音乐的社会情境　　［德］泰奥多·W. 阿多诺

摘要：阿多诺在其30年代最为重要的音乐社会学文章中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立场出发，以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为出发点，分析了音乐生产的四种类型。这种类型学的区分表明了阿多诺的批判的音乐社会学的价值取向，表现了人类真实境遇的音乐才是好的音乐；另外，阿多诺分析了欧洲音乐历史的发展，音乐的生产、再生产和作为消费的音乐生活，根据精神分析剖析了流行音乐的心理机制，并由此开创了后来“文化工业”理论的先河。阿多诺在文章的结尾分析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生产；再生产；消费；中介

19. “第二自然”：卡尔·魏特夫的社会批判哲学　　［日］石井知章

摘要：魏特夫的“第二自然”并非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第二自然。对魏特夫而言，原始的自然是第一自然，而经过人的劳动改造过后而形成的“制度的秩序”的自然是第二自然。第一自然强调自然的原始性，而第二自然则强调文化和制度要素的重要性。第二自然是连接第一自然与社会的中间项，是人实现对第一自然的支配向对社会支配的过渡点。同时，魏特

夫自然—社会论着眼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即着眼于由总体的发展产生的生产方式的转换，避免了将第二自然作为历史的决定因素，与地理环境决定论划清了界限。也正是以第二自然为基点，魏特夫建构了自己的社会批判哲学。

关键词：劳动；自然；第二自然

20. 从否定辩证法到肯定辩证法：革命路径的转换

［法］托尼·安德烈阿尼

摘要：传统认识中，革命被看作颠覆，看作为消除矛盾双方的对立，这是一种误解。矛盾是无法超越的，因此，真正的革命或发展并不是通过否定辩证法来消除矛盾，而是通过肯定辩证法将矛盾双方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有效地控制矛盾的消极方面，更加合理利用矛盾的积极方面，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中所存在的种种矛盾提供一种合理的解决途径。这种从否定辩证法到肯定辩证法的转变，恰是社会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处理矛盾的根本法则。

关键词：革命；否定辩证法；肯定辩证法

21. 社会主义的模式　　［法］托尼·安德烈阿尼

摘要：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社会主义的模式总体上存在三种模式：全面计划模式、竞争的计划“西方”模式和分散模式。但是这些模式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都没有真正地解决好效率问题，而这一问题恰是与社会主义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当代关于社会主义新模式的讨论则出现了几种新模式：全面民主的计划模式、以经济回报和利润平等分配为基础的模式、自主管理模式。

关键词：模式；社会主义；效率

稿约

一、《社会批判理论纪事》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集刊，主要刊发与国内外社会批判理论的历史发展、研究现状与未来走向等有关的论文及译文。

二、本刊实行匿名审稿制和三审定稿制，取舍稿件重在学术水平。

三、来稿以10 000字左右为宜。欢迎简明扼要而又论证充分的短文。所论重大学术问题的论文篇幅可不受此限。

四、本刊发表的所有文章均为作者的研究成果，不代表编辑部的观点。译稿请附原作者或有关出版社的委托书。稿件凡涉及国内外版权问题，均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权法》及有关国际法规。

五、稿件请径寄编辑部，且勿一稿多投。稿件寄出3个月后未收到刊用通知者，可另行处理。来稿一经采用，即奉薄酬和当期刊物2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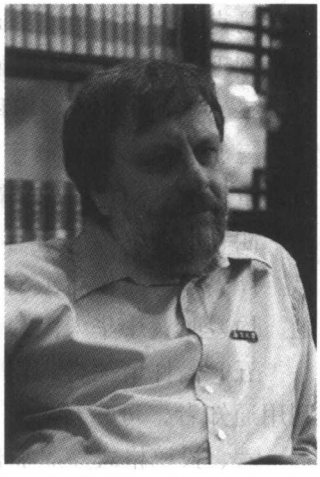
六、投稿格式参照本刊已出刊物，并于后文附上作者简介，要求注明作者真实姓名、性别、年龄、职称职务、工作单位、详细通讯地址及联系电话或电子信箱。

七、投稿请寄：210093，南京市汉口路22号，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编辑部，或电子信箱：Marxism@nju. edu. cn。

《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编辑部

第3辑专题预告

斯拉沃热·齐泽克首次访华专题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和哲学高级研究员，长期致力于沟通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与社会批判理论，将精神分析、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批判熔于一炉，形成了独特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也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激进理论思潮的领军人物之一。应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和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的邀请，齐泽克教授于2007年6月6日抵达南京，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学术访问。在宁期间，除参加“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文化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外，齐泽克教授还与我中心研究人员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当代资本主义批判、西方左派理论话语的最新进展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并且专门为南京大学广大师生作了四场精彩的学术报告。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南京之行系齐泽克教授第一次访问中国，这次访问不仅对于国内学者了解当代西方激进思潮的最新发展，而且对于展示中国学者的理论研究水平、扩大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国外左派理论的交流和对话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齐泽克教授为首次访华准备的会议发言、学术报告及其与中方学者的对话和讨论，我们将收录在本刊第3辑中，以飨读者。

反思建筑就是对具体的由建筑“付诸实施”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因此它必须在更为具体的特殊领域中才能走得更远。在这样的领域中，揭示建筑发展的本来面目只是建筑反思的目标之一。但是，只有未来的阶级斗争状况才能告诉我们，我们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先锋性的还是后卫性的。

——曼弗雷多·塔夫里

最后，塔夫里则描绘了晚期资本主义（始于1931年，二战后得到辩证的加强）不断发展的封闭性。通过不断系统地破坏各种审美可能性，晚期资本主义最终传达了一种让人瘫痪的、叫人窒息的感觉：在同样不可思议的分水岭即总体社会革命的这一端，一切建筑创新或都市设计创新都是徒劳无功的。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我其实想要谈论的是这些事情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但我只能说：它不是用一个理论来补充另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理论的内在解释问题。也就是说，我服从唯物辩证法的裁判。这可以证明：这里所说的，只是对唯物辩证法某些基本要素的一种解释。

——泰奥多·W.阿多诺

ISBN 978-7-80211-478-4
9 787802 114784 >
定价：48.00元